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上午9時正會議繼續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華明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G.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湯家驛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陳健波議員，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J.P.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梁家騮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梁鳳儀女士，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J.P.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主席：各位早晨。本會現在恢復會議，繼續就“致謝議案”的第1個環節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議員議案

致謝議案

恢復經於2009年10月28日動議的議案辯論

梁家傑議員：主席，早晨。我們在這一節討論的其中一個焦點，當然便是經濟的發展事務。何謂好的經濟呢？主席，並非只是把生產總值提升這般簡單，最重要的是能令市民的生活好過一點，生活質素得以提升。可是，如果察看今次這份施政報告，就這方面卻完全沒有展現高瞻遠矚的看法。即使談到六大產業，這個不能救近火的遠水也仍是非常空洞無物，因此，這份施政報告難免給市民一個非常差勁的感覺。

主席，民生對經濟是一個良好的指標，而影響民生的，在香港最關鍵的便是高地價。大家可能不知道或感覺不到，其實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是備受高地價政策所影響的。我們為了供樓，可能要犧牲睡眠時間，犧牲聽音樂的時間，犧牲一些發揮我們的創意或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其實，這政策影響着所有香港市民的每一個生活細節。

如果高地價政策推行得好的話，使庫房有充足收入，可以減少其他稅收，大家是間接地交稅，而不是交直接稅，這是未嘗不可的，總算有個存在的理由。可是，觀察近年的發展，主席，只見地產發展商可以謀取暴利，但庫房卻沒有多大收入。過去20個月，據數字顯示，除了兩幅蚊型土地之外，地產商是沒有勾過土地的。

還有，便是那些“發水樓”。主席，我最近支持環保觸覺這個團體，就“發水樓”進行研究。該研究結果說起來也頗驚人，原來翻查自2001年起落成的屋苑售樓書、屋宇署月報和圖則，我們發現在這302個樓盤中，因環保露台、工作平台、預製組件或擴闊電梯大堂而獲得豁免的總面積，達1 000萬平方呎，平均“發水率”接近5%。如果把這個呎數以當時的樓價來運算的話，其實是相等於535億元。換言之，庫房又少了535億元收入。

最近，主席，當然我們也察覺到，有樓宇的第四十四樓層被稱為88樓，我們敦促了多年，希望政府可以立法規管，例如售樓的面積多少；

我們正要購買的單位面積是1 300平方呎，名義上還是1 300平方呎，但實質卻是750平方呎？這些都是完全沒有進展的。可能政府也感到不妥當，這項高地價政策推行至這樣子，還得召集地產商來加以訓斥，不過，有人則指這只是出口術。可是，主席，長遠來說，如果是高瞻遠矚的政府，可能真的要想一想，這項高地價政策既然不可以根據其原來的意思來運作，對市民也造成很大的影響，令生活質素下降，那麼可能便是時候要檢討一下。當然，我也明白，要檢討高地價政策不是這麼簡單，要考慮如果我們沒有了這項政策，究竟庫房的收入可由哪些產業結構製造出來呢？或許，對於那些已經擁有地產物業的市民，究竟他們的地產物業價值如何可軟着陸呢？一籃子的問題當然要解決，但絕對不如特首所說，置業不是問題，“上車盤”到處都有。這是脫離民情，聽起來令人感到有點涼薄的說話。

主席，除了說長遠而言應該檢討高地價政策之外，近火當然也要援救。以我的分析，目前樓宇的價格所以脫離我們市民所能負擔的能力，基本上是出於兩個問題。第一是土地供應的問題，第二是發展商根本不能自律所造成的問題，它們連最後的一仙也要賺取。土地供應方面，其實政府是可以下些工夫。如果特首可以在短期內來一次賣地，我相信這對於他的民望會有點幫助。至於日後會否定期或非定期賣地，我本人是支持應該有一個賣地的制度，而不是只有勾地表的運作，令一些尤其是中小型的發展商可以進場和發展。

至於發展商不能自律這個問題，其實本會已經跟進了很久，但我想，我們為何不肯立法來規管，解決例如縮水樓，或現時你花錢購買一個全海景的單位，誰知5年後的景觀卻面對着別人的洗手間的問題呢？當然，對於政府為何遲遲不立法，公眾自有公論，亦心中有數。然而，如果說要搶救燃眉之急，我當然相信，除了賣地外，亦要以立法來令市民作出畢生的投資時可以得到公道，這也是很重要的，這便不會使樓價因為地產發展商所出的口術和甚麼意向價等，而令市民有所損失。

主席，另一點是關於居屋的重建。現時單看數字，我們大概有82 000個符合購買居屋資格的家庭正在等候，他們是有資格購買居屋的。可是，主席，即使是貨尾單位也只有4 000個，假設所有單位也賣出，仍還有78 000個家庭既不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他們也沒能力購買私人樓宇，那麼他們可以怎麼樣呢？我真的要呼籲政府認真地想一想，興建一些居屋。

我今天看報紙，有報章提出一項很具創意的建議。它說如果政府不想居屋與私人地產商爭利，政府可否要求這些購買居屋的人士將來不可

以享受樓宇升值的利潤，例如人們在居屋住得久了，儲到足夠的錢可以購買私人樓宇時，便要以原價出售予房屋署。這項建議當然是值得研究的。然而，主席，無論如何，政府只是光坐着、束手而不採取任何行動，這並不是一個選擇。

最後，我想用餘下的時間說說領匯的問題。主席，其實，自從領匯上市後，對於公屋居民的生活和一些原本在公屋商場營運的小商戶，的確造成極大的傷害。政府經常說領匯是一間上市公司，屬私人的商業運作，所以不好插手。主席，這其實是錯的，因為《房屋條例》第4條說得十分清楚，房委會、房屋署的責任是要確保能提供設施予公屋居民的。

如果領匯繼續採取這種運作模式，把屋邨的醫生全都趕走，原本常吃每碗15元及第粥的街坊，現在卻要花26元光顧一些連鎖的快餐店，其實這些情況積聚起來，是會令政府有可能違反《房屋條例》第4條的規定的。因此，我在此呼籲當局千萬不要在領匯的問題上坐視不理，最好是與領匯有一個定期的、恆常的溝通機制，那麼便不會令當局在將來有朝一天被判違法。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茂波議員：各位同事，早晨。主席，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後，我曾經在記者會上說，這份施政報告欠缺遠景和深度，未能提綱挈領地展示治港的理念。在香港面對的新挑戰中，施政報告對於內地經濟急促發展所引起香港的角色轉變，其實在掌握和分析也是不足的，亦迴避了香港內部管治帶來的挑戰。施政報告也沒有關注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不過，就相關的部分，我會在稍後的討論環節中再說。

今天早上，我想集中說數項跟經濟有關的問題。很多同事均提到樓價，無須多說，大家對此均很關注。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其實，在我們業界中，有很多朋友對於施政報告的討論(特別是年青人)並不很熱烈，但一旦說到樓價，我的電郵箱便接獲很多電郵，很多年青人對於樓價及樓價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有很多意見。他們作為專業人士，出道數年，很辛苦地工作，但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上車盤”，所以均感到很失望。最近，社會上有一些關於興建居屋的討論，在這方面，我認為應審慎行事，不可因一時的現象而很快地投身下去，說我們必須復建居屋或要興建多

少居屋。其實，房委會的土地是從何而來的呢？是由政府撥給它的。如果房委會把政府撥給它的土地興建居屋，便會有機會影響公屋的建設，而現時公屋名冊上的輪候時間亦比較長。把土地用來興建居屋，對公屋有否影響呢？對於解決基層市民的居住問題會否有更負面的影響呢？這是我們有需要慎重考慮的。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再撥更多土地給房委會興建居屋，便會構成對珍貴的土地資源的競爭使用，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真的要審慎行事。在我們社會上，有很多人辛苦地儲錢買樓，而很多均是一些面積細小的樓宇。雖然初步而言，居屋市場的數量未必很大，但我們也不可忽視這一個環節的中小面積樓宇的供應，對已購買私人樓宇的市民的影響。大家均擔心高地價政策，這是我們要注意、要處理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很審慎，因為一下子處理不當，對樓市造成負面影響，其實不單會影響我們香港人的生活——因為香港人很多時候畢生主要的投資便在於自己的房屋——對於社會其他環節也會有影響，所以我們也必須很謹慎處理。

我覺得在這方面，政府應該重新考慮，希望財政司司長稍後可在其財政預算案提供更多資料給我們看，便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在外國，例如在美國、英國，它們對於一些符合資格的首次置業人士，是會提供一些財政上的支持的，我們香港以往也有首置貸款。在香港，我們會讓置業人士——如果是自住的話——把部分供樓的利息用作扣稅，但在美國，如果是自住的樓宇，其利息扣稅是不設時限的。我認為在很多方面，政府應要實事求是地作出檢討，也要進行一些較穩妥的研究，提出一個較佳的方案，解決大家在這方面的憂慮。

主席，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施政報告提及六大優勢產業，並提及我們4個傳統支柱的產業。在我們4個傳統支柱的產業中，上海跟我們競爭的金融業，我是談得最多的。當然，施政報告提到這並非一個零和遊戲，我們跟上海可以有一些協作、合作、配合，社會上也有很多討論。不過，我覺得施政報告只提及零和遊戲，卻沒有仔細分析和闡述我們在這形勢下，如何可以實際地有所得益，做一個更大的餅，讓大家都有好處，這是看不到的。社會上的討論有提到要發展我們的債券市場，要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發展人民幣離岸的業務，我們要督促交易所推出更多產品，在產品創新方面多做工夫，但這是否便足夠呢？我們香港人很清楚知道，單憑香港本身，以我們的經濟規模，我們是沒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近的數字顯示，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有四百多間，市值佔聯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六成，如果以交易額而言，每天的成交額有七成以上是屬於內地企業的，所以，在這方面，如果內

地的政策有轉變，說得俗一點，我們是可以很“大鑊”的。在這方面，除了要在經濟和商業策略上作出調整，我覺得政治上也要度過一個很大的難關。我很希望財政司司長稍後回應時，可以在這方面作更多陳述，讓我們香港人對該問題掌握得更透徹，更全面，也更有信心。

在六大產業方面，我之前也提過，單靠施政報告所說的一些土地政策中的一些配合，例如活化工廈，又是否足夠呢？這是遠遠不足的。我認為政府有責任詳細交代六大產業發展的遠景和藍圖，以及一些較具體的步驟。

我以檢測認證產業為例，如果純粹是檢測和認證，其實增值未必一定很高，並要設置entry barrier，而設立這行業的成本亦不會很高。我們的競爭優勢在哪裏呢？為甚麼我們可以做到，而鄰近城市如廣東、深圳或其他地區則做不到呢？我相信香港最大的優勢便是別人對我們的信心。他們對我們的信心便是，如果由香港給予認證，檢測後證明貨品是品質良好，其他人會相信。因此，我覺得我們發展檢測和認證產業時，目標應從這方面出發，如果我們從這方面思考，發展範圍未必會拉得太闊。雖然香港在這方面有一定基礎，但我們仍要聚焦在某些產業。

如果發展檢測和認證產業，我們可能在中醫藥方面較有優勢，這是由於外國人不懂，而內地產品質素卻沒有人相信，或人們不敢相信。在食物安全方面，也無須多說了，一提起大家也皺眉，內地朋友連奶粉和尿片也來港購買。因此，我覺得如果我們要推動檢測和認證產業，便要選取某些行業聚焦，且不單要做認證和檢測，而是要定下標準。以香港的信譽，如果我們定下標準，生產商要將相關產品送來檢測時，便要依據我們的標準進行檢測，在檢測完成後，貨品獲發證書便能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因為人們都相信產品的質素。我覺得施政報告較少談及這角度。我相信新成立的檢測和認證局會關注這方面，亦很希望政府在遠景藍圖和戰略方面多思考和討論，然後才全面推出，免得推動時因目標不明而兜兜轉轉，甚至浪費精力。

主席，另一點我想提出的，也是關於六大產業。我最近看了一間銀行的簡單財經評述，評述內容提及施政報告，意思是發展新產業有時純粹靠土地是不足夠的，純粹靠私人市場亦未必可行，因為當私人市場對新產業未夠信心，或認為風險太大時，它未必敢於投資，如果私人不敢投資，我便很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些大力引導。當中提出了一兩個例子，其實也是香港人耳熟能詳的，但亦值得我們靜下來思考，有甚麼東西我們可以學習或汲取經驗。當大家對這些新產業信心不足，認為創業風險很大時，便要政府幫助和引導，甚至投入一些公共資源。

例如台灣在20年前發展電子產業，建立新竹科學園，我覺得大家就這方面也很熟悉了，尤其是負責財金方面的官員對此一定不會陌生。台灣為何可以成為東方矽谷呢？台灣科學園為何可以如此成功？部分電子產業公司也是執世界這方面生產的牛耳，甚至早幾年台灣發生地震，也嚇得美國電子股下跌，因為擔心供應出現問題。在這方面，政府除了土地之外，人才和資金也投入了很多，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資源的投入不是兩三年可以見效。我們看到台灣新竹科學園也是經過長時間有計劃、有紀律的推動，才有機會成功的。

在報告中，引述了另一例子是與環保產業和創新科技產業有關的，當中提及我們的鄰居新加坡。報告提到政府注資50億元進入創新及科技基金，但新加坡的研究和發展信託基金也有50億元注資，不過是新加坡幣，除了50億元坡幣外，還有在國家科技藍圖所投資的75億元坡幣。在2000年，新加坡決定把生物醫藥作為戰略產業來扶持，投入了12億元坡幣作專門發展基金，興建生物醫藥園，引進國際醫藥企業和人才。當新加坡在2000年推出此行業時，其在GDP的貢獻差不多是零，但直至去年，行業的產值已達190億元坡幣，創造的職位有一萬二千多個。

其實，我剛才引述的例子，是希望政府在考慮發展一些新產業時……當然，我們作為香港人，對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有計劃和分析，且瞭解我們的優勢行業，然後願意作出推動，是一件好事，但很希望政府在推行時能夠考慮得深入和仔細一點，具體一點，以及在引導香港整體發展時，在遠景方面勾劃得清楚一點。最後，我想補充兩句，經濟搞得好，並不表示所有香港人均會得益，所以對於貧富懸殊的問題，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是責無旁貸，一定要認真面對的。

謝謝主席。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會代表民主黨就交通事務發言。然而，在就交通事務發言之前，我也希望就今天的範圍，譬如房屋事務、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特別是有關升降機的問題，談談數點看法。

主席，由昨天開始的辯論，特別談及了政府的土地政策和房屋政策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感覺到自回歸後這麼多年，特別是在“八萬五”出現問題後，政府在房屋政策方面好像受到“八萬五”的魔罩——甚至可以說是魔咒——罩着了。只要說到“八萬五”這個數字，人人都會害怕起來，心想日後的房屋政策不要再亂來了，否則地價便會下跌。香港的經濟最重要的是依靠地產站穩。

主席，我不再強調我們的特首是如何選出來的，因為我不想在此花我的時間來說特首的權力，選舉委員會內有多少財團和地產商，令特首在平衡公眾利益和商界(特別是大財團和地產商)的利益時要維護他們。我也不想再在這兒提出了，因為一旦談到這些，大家便會覺得民主派一定會談及普選，不如多說一點民生。好的，我就談民生。

主席，在這個階段，民意強烈要求興建居屋，但施政報告仍未敢果斷處理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的特首或政府便是所謂的一朝被蛇咬，十年驚怕繩。只要看到繩子，只要聽到“八萬五”，便不敢動了。主席，我其實只記得“一朝被蛇咬”這一句。我今早專誠向一位中文老師查問下一句是甚麼。下一句其實應該是“十年怕井繩”。

現時的香港人和現代人怎會還從井中取水呢？可是，我們想一想，井是水的來源，古人看到井繩便很害怕會看到蛇。我覺得現在的香港人也是一樣，大家也很矛盾。一羣中產人士拿着一些……可能居住在自置單位，他們心想政府又說“八萬五”了，但當他們的子女大學畢業後沒有能力買樓時，他們又說政府要做一點事。在這個矛盾之下，我們的特首和政府便要果斷的做一些事，看看我們的勾地政策和高地價政策，如何能幫助我們的大學生購買比較廉宜的房屋。我相信要平衡並非很困難的。

因此，我希望特首果斷一點。在樓價漸漸失控時，千萬不要以為那些豪宅不會影響新界偏遠的中小型樓宇的價格。因為很多中產以上的人士在換樓時，本來是想購買半山豪宅的，但現在沒有能力購買，於是便走到新界偏遠一點，購買低密度的豪宅。如此一來，這些新界區的低密度豪宅的樓價自然便會影響新界的中價樓宇和下價樓宇。這是土地發展和房屋政策的一個最簡單的需求問題。所以，特首上次前來立法會，說豪宅未必一定影響中小型樓宇，此說法是絕對不正確的。

主席，我也想說說新聞自由和資訊科技的課題，因為在這數天，大家也說特首動氣了。特首動氣，覺得傳媒是有些不妥，在沒有良好的證據便煽風點火。我不希望看到特首作為一個特區政府的首長，這麼容易便與新聞媒體對立。大家知道，媒體很多時候都教從政者又愛又恨：愛它是因為政府要依靠媒體傳播自己的政策；有時候不開心，是因為媒體窮追猛打，為了小小事情便令政府極度難堪和尷尬。

不過，主席，所謂吃得鹹魚抵得渴。從政的人，特別是有權力的特首、局長和政府官員——主席，這當然還包括得到選票的議員——很多時候是要吃得鹹魚抵得渴，要明白這個遊戲的規則。我們當然希望

傳媒要有證據，但傳媒是人民的喉舌，代表人民監察有權有勢的人，看管他們不要行差踏錯。這是沒有辦法的，這也是一條應該遵守的規條。

所以，我希望特首的動氣，不要令我們覺得我們已經日漸褪色的新聞自由受到絲毫影響。我在答問會曾跟特首說，如果我們“一國兩制”要凸顯特區政府能繼續享有新聞自由，我們更應該不亢不卑和理直氣壯地捍衛和尊重我們的新聞和資訊自由。

主席，談到升降機，雖然發展局局長暫時不能出席會議，但從2008年10月至2009年年初發生的一連串升降機事件，確實令我們感到很擔心。首先，我們明白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和發展局在知道事件後便提出了很多改善措施，說會加強巡查及公開紀律行動紀錄等。可是，當申訴專員提交報告時，主席，我便很擔心，因為經申訴專員調查後，我們發覺原來發展局和機電署推行的種種措施未必足夠，包括機電署就升降機檢查和提交安全證明書所訂立的維修標準和時間並不清晰，也沒有備存重要資料和統計數字。如果沒有統計數字和資料，怎可以從歷史學習錯誤的經驗呢？

其次，機電署在跟進逾期個案時，有時候會超逾7星期才發出催辦通知書，這是較法定時間超出了40%。第三，追查延誤提交證明書的責任既未能確定責任誰屬，亦沒有設定時限。第四，在考慮採取紀律行動時，有時候會因工程師沒有向上司報告複檢結果，有時候又會因電腦系統出錯而錯誤發出，甚至沒有發出警告信。凡此種種，皆是當時發展局和署方出席立法會會議解釋時說會採取的措施。可是，申訴專員卻說，對不起，原來沒有那樣做。

主席，這是現時令我們擔心的官僚失控，特別是技術官僚失控的情況。在這些問題上，寫出來的跟進工作是寫得很美好，說亦說得很漂亮，但做出來的工作卻令我們看到仍未解決問題的癥結。所以，我希望政府明白，千萬不能低估升降機的安全問題。香港所有市民每天都會乘搭升降機，所以，安全問題是不容推卸的。

主席，就交通運輸方面，我有數點想與局長探討。第一當然是職業司機的安全問題。主席，最近，人口老化的問題在議會內都有出現。每個職業都有老化的問題，職業司機同樣面對這個問題。可是，職業司機的老化問題令我們擔心，因為如果他們沒有進行身體檢查的習慣，又或工作令他們沒有時間，甚至為了節省金錢而不進行身體檢查，他們的行為或他們的駕駛行為是足以影響道路安全的。由去年11月至今，涉及職業司機開工時病發的交通意外有13宗，當中一半涉及的士司機。從7月

至今，發生了5宗的士司機開工時昏迷的事件，其中3人死亡。今年10月28日，即昨天，亦有1宗小巴司機懷疑開工時病發死亡的意外事件。有鑑於此，我促請局長盡快立法，強制職業司機及當他們申請續牌時，必須提交身體檢查報告，又或是規定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例如3年、5年，便須向運輸署提交由許可機構簽發的身體檢查報告。這是一項為己為人的措施，我相信對任何“打工仔女”，特別是對職業司機的健康，以至道路安全而言，都是有幫助的。

主席，接着是有關倒車安全。主席，大家記得，香港的新聞很奇怪，數年前，有關倒車的新聞，由2006年至2008年，特別在2006年，曾經突然在一兩星期內發生了數宗倒車意外，兼且有人被撞死。我在這裏已說過很多次，而在座的持牌駕駛者也知道，倒車隨時較向前駛危險，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倒車時會以為後面沒有行人，而在後面走過的人亦沒有想到司機倒車是那麼快，但當司機倒車時，他們便被撞倒，捲入車底，很多時候更會引致死亡。長者行動遲緩，司機倒車時把他們捲入車底，一條生命便就此喪失了。主席，我作為負責交通事務的委員，就倒車問題，我早在2006年便提出了私人法案，但大家也明白，現時是極難提出私人法案的，我要取得特首書面同意才可以提交。於是，我等待又等待，希望局長能盡快提交有關倒車的法例，不要再拖延。我們不想看到一宗又一宗意外發生。所以，就倒車問題，我希望在未來一兩年，甚至在今屆任期完結前，有關倒車的法例能夠通過，以保障各方面的安全。

主席，接下來是有關月台幕門的問題。這是另一個令立法會感到很氣憤的問題。如果大家留意新聞，五六年前，如果月台有乘客意外墮軌，無論是自殺抑或被推落路軌，新聞報道最低限度也佔四分之一篇幅，甚至一半，大字標題報道又有意外了。可是最近，主席，大家不說你也可能忽略了這些新聞，因為最近有太多新聞了，既有甘乃威事件，又有慳電膽事件，曾蔭權的兄弟買……這些新聞完全蓋過了另類我覺得是教人心痛的新聞。主席，我們翻查資料，過去一年半以來，發生了30宗墮軌意外，造成13人死亡。主席，只是一年半而已，已有十多人受傷。如果我沒有記錯，在過去兩星期，每星期也發生1宗，1宗在沙田，1宗在粉嶺，一名是老人家，一名是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士，他們都是墮軌死亡的。

因此，我覺得局長真的不可以再等待了，因為在一年半，即18個月內便喪失了13條人命。試想想，我們是人，生命是寶貴的，總不能夠說東鐵、馬鐵或地鐵現在尚有8個車站未安裝月台幕門，而全部均以科技、伸縮板和月台彎角的問題而一拖再拖。主席，我不再多說了，因為時間

有限。我已說了很多遍，但我希望局長明白，月台幕門是不應容許東鐵再以種種技術理由一拖再拖不安裝的，一定要盡快提出時間表。

主席，最後是有關隧道分流。隧道分流，我相信也是令局長極之頭痛的問題。我很明白，但數條過海隧道的情況令我認為不應該再等待了。社會沒有太多社會成本。香港人步伐急速，每每因為隧道塞車而令我們喪失不少時間。時間便是金錢。我們提出了不少建議，認為回購隧道、延長專營權、以股換稅，種種均是辦法，只要提交立法會盡快商談。當然，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如果以股換稅、延長專營權，以及減少西隧和東隧的隧道收費，會否導致紅隧加價呢？這是可以提出來討論的。如果要以紅隧加價一兩元，換取紅隧和東隧減價五六元甚至更多，以換取3條隧道的車流平均一點，我相信社會是可以討論的，只要政府提出方案而已。因此，主席，這個問題希望局長……我感覺到局長的笑容，她應該是有信心的。我希望年底前能夠有一些方案。我剛才提出的倒車、月台和隧道分流不均等種種問題，其中隧道問題其實已研究了多年，我相信是不應該再拖延下去的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第1個辯論環節的議員發言部分結束，接着是由官員發言。按議程所載，這一環節本來有6位官員發言的，但我們今早接獲政府通知，發展局局長因抱恙未能出席會議。我們對發展局局長表示慰問，相信她抱恙並非因為昨天聆聽了議員一整天的辯論所致。我們祝願發展局局長盡快脫恙，“打得如常”。(眾笑)發展局局長的回應內容，會包括在財政司司長的發言中。由於有5位官員發言，他們的總發言時限是75分鐘。我現在先請財政司司長發言。

財政司司長：主席，大家早晨。

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指出，面對全球化競爭的挑戰，我們須走向高增值的知識型經濟，維持領先優勢，以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羣策羣力推動產業發展，是治本之道。作為財政司司長，我會在經濟和財政

管理上作出全面的配合，以盡快落實行政長官所提出的施政目標，令香港可以走出環球金融風暴的陰霾，邁向經濟持續發展之路。

自從去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環球經濟出現了六十多年來最急劇的收縮，牽連全球每一個角落。在各地政府採取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支持下，市場信心和秩序逐漸恢復。環球經濟在近期亦呈現轉機，歐美地區的經濟開始止跌回升。更叫人感到可喜的是，內地的增長動力進一步加快，這對亞洲經濟起重要的定錨作用。事實上，相比歐美地區，亞洲區內的經濟活動已經帶頭復蘇，近期更持續改善。

受惠於外圍情況好轉，加上政府對抗金融海嘯的措施漸見成效，香港經濟在第二季反彈，而在近月亦大致企穩。出口環節雖然在7月及8月仍然大幅下跌，但跌幅在9月明顯收窄，這顯示外圍環境雖然開始復蘇，可是，現時仍然存在大量不穩定性，歐美入口需求依然疲弱。

幸好，內部環節進一步改善，近期的零售數據顯示，隨着經濟漸見曙光，消費信心有所增強。公營的建造活動在政府積極推動下大幅加快，不少企業亦扭轉早前一直對前景看淡的看法，近期轉趨審慎樂觀，並開始增聘人手，就業情況亦稍有好轉。

經歷過去一年多的大風大浪，對所有香港市民來說，最重要的是繼續“有工做”。政府尤其關注這方面的發展，因此於過去1年在保就業上做了不少工夫。自第二季以來，就業市場已穩定下來，第三季失業率更輕微回落至5.3%，是自去年年中以來首次下降，情況令人感到鼓舞。

我有信心明年經濟將會回復正增長，但外圍仍然充滿變數，復蘇過程或會反覆。畢竟環球金融危機尚未完全過去，我們須提防經濟面對的下行風險。故此，在這段期間，政府的首要目標是增強市民的信心，為經濟的穩步復蘇提供有利的條件，直至我們能夠確定經濟已經進一步穩固，失業率有明顯改善為止。

在通脹方面，現時經濟正處於通縮期，通脹在短期內急升的機會是不大的。我估計香港的基本消費物價通脹在未來一段時間仍然會低企。不過，隨着經濟好轉，全球流動資金如果持續處於高水平，通脹在中長期走高的風險是會增加的。我們會一直監察情況，留意通脹急升的風險。

樓市在金融海嘯前已經開始下調，在去年9月後更一度急跌，在短短6個月內劇跌了17%。隨着亞洲經濟率先復蘇，加上國際流動資金充裕，最近數月樓市氣氛轉趨暢旺，帶動樓價回升，9月份整體樓價相比

去年年中的水平稍高約2%。個別豪宅樓價現時已超越1997年高位，中小型單位樓價相比1997年高峰期則還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差距。在過去數月，近九成的成交量均是集中於中小型單位(即70平方米以下的單位)，並仍以用家為主。市民的供樓能力平均來說亦尚算穩健。以購買45平方米實用面積的單位為例，根據第二季數字，一般20年期的按揭供款約佔私人住宅住戶入息中位數約34%，遠較1997年高峰期時的93%為低，亦較過去20年平均水平的53%為佳。

我明白近期豪宅單位樓價的升勢，令市民擔心豪宅樓價急升會扯高中小型單位樓價。社會上也關注樓宇供應、置業困難和樓市可能出現泡沫等問題。一些尚未置業的市民則憂慮樓價一旦持續上升，最終會超越他們的負擔能力。就此，特首已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會密切監察未來數月市況的變化，在有需要時優化土地供應安排，並與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磋商，以加快將準備就緒的住宅用地推出市場。

置業是不少市民的夢想，同時也是不少市民一生最重要的投資。在現時123萬個居住在私人樓宇的住戶中，有86萬個住戶居住在自己的物業中，比例達七成，高於20年前的64%。由此可見，樓市大幅波動，升跌過急，不但會影響市民，也會影響香港的整體經濟和整個社會穩定。

至於現時銀行體系內流動性資金充裕的情況，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監管工作上，是要確保銀行在貸款方面，包括樓宇按揭在內，採取審慎的態度，並作出有效的風險管理。金管局於上周五已經向銀行發出指引，將銀行對2,000萬元或以上樓宇的按揭成數，由七成降至六成。

我想強調，政府的政策方針是保持樓市穩健發展，而過往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亦曾推出多項措施。不過，為免政府政策令樓市出現不必要的波動，尤其是目前經濟環境仍有一定變數，政府在推動穩定樓市措施時，必定要謹慎行事。

要保持樓市平穩發展，土地供應只是政府可以採取的其中之一個方法，而勾地表亦不是供應土地的唯一來源。除了勾地表外，發展商亦可以從其他渠道獲得土地供發展之用，例如參與港鐵公司和市建局的物業發展項目，向地政總署申請將手上用地進行契約修訂或換地安排，或在私人市場購買土地等。自從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後，港鐵公司和市建局均表示會盡量配合，加快把準備就緒的住宅用地推出市場。在計劃建成後，可提供約1萬個單位。

在中期供應方面，我們可以參考已獲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批准作私人住宅發展的申請和正在處理的契約修訂申請。已獲城規會批准的申請現時大約可以提供三萬多個私人住宅單位，這些項目的發展進度及推出時間由市場決定。地政總署正在處理的契約修訂及換地申請合共超過40項，如果最終獲得落實，估計可以提供額外約22 000個住宅單位。不過，大家須注意，補地價的談判過程及推出時間表亦由發展商因應市場決定。政府會在各個程序上盡量配合。

事實上，地政總署於近年亦有推出優化措施，加上政府跟業界的溝通，期望縮窄發展商與政府在估價上的意見分歧，以加快處理契約修訂及換地的工作。

在潛在的供應量方面，未來可預計的私人住宅土地供應(這不包括西九龍文化區及上述已獲城規會批准的申請)約有270公頃，估計可供應接近9萬個單位。這個數字只是代表現階段已經知道有可能會是最高的私人住宅土地供應量，確實供應數目是視乎市場的實際需求、補地價協議或土地交換進度，以及土地平整等因素而定的。

長遠而言，政府着眼於兩個新發展區，即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輦／打鼓嶺)和新界西北洪水橋新發展區，以及低密度鄉郊地區(包括邊境禁區等)，它們均會提供土地作住宅發展用途。

在星期二，我聯同發展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會見地產發展建設商會的成員，表達政府對近期樓市的關注和就樓市的最近發展交換意見。發展局局長會繼續就優化土地供應安排聽取社會各界和業界的意見。土地供應雖然只是保持樓市平穩發展的其中一種方法，但土地和樓市是唇齒相依的。任何改變現行土地供應制度的決定，均會對市場造成深遠影響。因此，我們須小心處理、深思熟慮，在過程中，還要考慮和顧及公眾和社會的利益。

此外，要保持樓市穩健發展，我們也須增加市場透明度，以確保買家獲得正確信息，地產商更不應誤導市場，扭曲市民對市場的看法。對於近日一手住宅市場的銷售手法及成交價格的信息混亂，我是關注的，並一直密切留意情況。我希望發展商能在自律的環境下，提供正確的信息。就市場透明度方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稍後會再作補充。

我要指出，一旦市場在缺乏透明度下，令不公平的情況出現，增加房地產市場的不穩定性，政府在維持宏觀經濟穩定性、保障民生和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便要採取相應行動。

大家均知道，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敏感且複雜的課題，它受到經濟狀況、資金流動、利率走勢和市場心理預期等因素影響。在這方面，在各地央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推行下，市場上充斥了大量流動性，推高了各地股市和樓市，為全球經濟體系均帶來一定的風險。當退市機制啟動時，全球銀行系統的流動資金將會被抽走，屆時資產市場，包括股市和樓市會如何反應，以及會否出現異常波動，大家均要留意。

因此，我提醒所有小投資者，以及所有市場參與者，現時的低息環境是不可能亦不會長期持續的，大家在作出投資決定時，須小心留意風險，量力而為。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亦提出一籃子方案，釋放過千幢舊工業大廈（“工廈”）的潛力，目標是鼓勵合資格的工廈在短期內重新發展或整幢改裝，使珍貴的土地資源得以更有效運用，為高增值的經濟活動，包括經濟機遇委員會選定6項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提供有用的支援。在這些樓宇活化或重建後，會帶來新的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這對於經歷金融海嘯的香港肯定會大有幫助。此外，由於工廈改裝作各類用途的潛力甚高，相信除了經濟活動外，亦可以配合社區不同的需要，提供多種活動空間。

這項計劃下的審批條件，主要是考慮工廈樓齡和各區的現有規劃用途。這些均是公開而客觀的條件，讓各大小業主按商業考慮，自行決定是否申請參加計劃。因此，計劃是公開、公平和公正的。

我想特別提出的另一點，便是現時工廈由於同時用作工業和商業用途，因此帶來令人關注的消防風險，亦使很多工廈不容易轉型作顧客流量高的商業用途。這問題已存在多年，儘管政府先後提出不同的措施，但成效並不理想。我們因此要採取更進取、更有效的解決方法，鼓勵業主透過重建或整幢改裝，把寶貴的土地資源有效、安全地撥作更高增值的用途。我除了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些政策措施外，更希望大家能夠鼓勵有關業界和地區人士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一齊推動現在未能物盡其用的工廈活化轉型，為香港未來的經濟增添動力，為各種社會的需要提供更多空間，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

政府採用“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對抗金融海嘯。自2008年起，我們推出的紓緩及刺激經濟措施約為876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5.2%。這數字還未計及政府在基建項目投資的增幅，以及政府自去年年底為各項中小企業貸款保證計劃新增超過1,000億元的承擔額和有關的

估計壞帳開支。這些措施已經陸續發揮效用，經濟已開始復蘇，就業市場亦有所改善，而有部分措施在未來一段日子會繼續有利於經濟持續回升。

我們會堅持這項策略，直至經濟得以穩健復蘇為止。在這方面，我們的重要指標是要見到失業情況明顯改善，就業重回增長。在非常時期雖然要採用非常措施，但我們要明白，非常的措施不應該，亦不能長期持續，以免對政府財政構成長期壓力，以及對市場的有效運作產生不良影響。

我會緊密監察經濟情況，在籌劃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我會充分考慮經濟穩健復蘇的需要，同時亦要顧及政府財政的長遠穩健性，確保我們能夠應付環球經濟有可能會出現的波動，以及推動經濟的長遠發展。

各國現時正在計劃為退出機制作出準備，我們亦要在適當時候調整有關的非常措施。在支援企業的措施方面，政府於去年推出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至今已批出超過22 000宗申請，涉及的貸款額超過532億元，有關企業僱用超過25萬名僱員。這些措施有效減輕企業在融資和現金流方面的壓力，透過“撐企業”達到保就業的積極作用。

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的申請期將於12月底屆滿。我們清楚聽到業界的聲音，希望政府可以延長計劃，協助企業把握現時經濟開始復蘇的時機，恢復穩步向前。考慮到目前外圍環境仍未全面復蘇，未來數月外貿情況仍會反覆，我們決定將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的申請期延長6個月至2010年6月底。

在金融措施方面，“百分百存款擔保”會維持至2010年年底。我和金管局亦會繼續密切留意其他地方政府的存款保障政策，保持溝通和作出協調，務求共同實施適當的退出政策，確保經濟和銀行體系不受影響。我們正同時着手跟進百分百存款保障計劃的檢討，並會於今個立法年度提交立法建議，推行改善措施，加強對存戶的保障。

政府一向致力投資基建，為未來發展打下基礎，這樣做既能帶動經濟發展，也能夠創造就業，提升香港長遠的競爭力。我們預算在本立法年度提交立法會審議的工程項目總值將超過1,000億元，與上一個立法年度相若。我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已經指出，隨着各項大型基建工程進入建築高峰期，在未來數年，基本工程每年開支將會處於相當高的水平，預計可以平均達500億元，較2008-2009年度開展的198億元的工程合約，有超過一倍半的增長。

建造界的就業情況在過去5個月持續改善。建造界的整體失業率已經由金融海嘯後高峰期的12.7%回落至最新季度的9.4%。隨着更多的大型及小型基建工程進入施工階段，以及“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樓宇維修工程開展，我有信心建造界的整體就業情況會持續改善。

作為亞洲時區首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的驕傲，我們須鞏固和提升這個卓越地位。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闡述了香港金融業發展的兩大政策目標，亦同時勾劃出香港作為亞洲時區首要國際金融中心的5個發展方向。我們要充分利用“一國兩制”下的機遇，把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融資中心、資產管理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在這方面，我們要確保香港能夠繼續配合國家的整體發展，在國家的金融安全前提下，讓內地與香港互惠互利。在部分金融開放措施在全國推行前，可以先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先行先試”，讓香港和珠三角地區成為推動國家金融發展和推行創新措施的試驗場地。為此，我會統籌特區政府和監管機構的力量，與內地有關機構和我們的業界保持密切溝通，制訂和推進具體方案。

在落實上述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我們要抓緊改善市場質素及促進市場發展兩個重點，推動優化金融監管制度下一步的工作。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稍後會就這方面作出補充。

施政報告亦提出要拓展6項優勢產業，這不但肯定了這些經濟領域內的投資者和業界長久以來的堅持和努力，又能為四大經濟支柱注入新的增長動力。這6項產業的展開既能提升香港的軟實力，以至是整體競爭力，亦有助於人才培育，吸引更多世界頂尖級人才來港工作和定居，為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提供更有利的土壤。

在6項產業中，私營企業整體上對本地生產總值的直接貢獻現時大約為7%至8%，僱用約35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約10%。六項優勢產業成功與否，市場的力量始終是最主要的成敗關鍵。我們只是踏出了第一步，未來仍要繼續研究和推出更多配套及政策優化的措施。

主席，香港經濟能夠迅速擺脫衰退，又一次印證香港人堅毅不屈、靈活變通的能力。不過，環球經濟仍然存在不穩定性，香港整個社會，包括市民、商界和政府仍要同心協力，一起為經濟持續復蘇作出努力。政府會堅持“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的政策，直至我們徹底走出這場風暴為止。在未來數年，大型基建會相繼展開，為經濟復蘇注入更多動力。

政府一直放眼於未來，在各方面已投放了不少資源，為香港的長遠發展鋪路，包括加快香港和內地的融合、開展區域合作、投資基建、培育人才、開拓新興市場、並加強環保文化建設工作，打造香港成為優質國際城市。在強化四大支柱產業的同時，協助發展6項優勢產業，會加強香港的競爭力。將香港建設成高增值的知識型經濟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發展策略。

主席，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本年度的施政報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很感謝各位議員就施政報告內有關運輸和房屋方面的政策發表意見。我會就數項課題作出綜合的回應。

不少議員的發言均提及運輸基建項目。過去1年來，有數個主要的運輸基建項目已經動工，而港珠澳大橋主體和中環灣仔繞道工程也會相繼在年底展開。此外，我們正全力推進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規劃，期望在得到立法會撥款支持下，於年底前也可以開始工程。

同時，多個項目已陸續進入法定諮詢程序。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和連接線、南港島線(東段)，以及赤鱲角連接路等，已分別按相關條例刊憲。我們也會抓緊其餘項目的跟進工作，包括設計、諮詢和法律程序等。至於議員提到的一些新建議，是有必要符合鐵路網絡的長遠發展的，亦要具備工程可行性、環保和經濟效益等條件。

在辯論中，多位議員均希望政府能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的國際航空、航運和物流樞紐的地位。李鳳英議員和劉健儀議員提醒我們要繼續支持物流業方面的有關發展；葉偉明議員提出有關航空方面發展的意見。

在航空運輸方面，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擴大我們的民航安排、提升跑道航機升降量、改善機場的基建設施，以及加強機場與珠江三角洲的聯繫。特區政府亦高度重視物流業的持續發展，同時會致力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我們會繼續通過不同的平台，與內地緊密合作及配合發展，以確保香港在環球供應鏈上的領導地位。

很多議員均關心房屋的設施，包括李華明議員提出電梯和扶手電梯等；王國興議員也關心在人口老化的情況下，屋邨會否以改善工程來照顧長者的需要，我們會繼續推進這方面務實的工作。

我們明白近期整體樓價上升，特別是豪宅單位的價格屢創新高，令市民大眾關注樓宇供應和樓市泡沫等問題。

我們最近聽到很多要求復建居屋的聲音，要求的原因主要可分兩點。第一，是遏抑私人住宅物業的樓價；及第二，是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購買一手中下價樓宇的機會，即所謂的“上車盤”。

我想指出，政府目前的房屋政策，是幫助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為他們提供租住公屋，以處理他們的住屋需要。以居屋或其他方法鼓勵市民自置居所，並非政府房屋政策的目標。

私人住宅物業及居屋是兩個不同的市場，以興建居屋作為干預手段來遏抑私人住宅物業的價格並不可行，亦不是我們的政策。樓價應該由市場力量，根據供應和需求來調節。

這數天的輿論和很多學者均提出須非常小心對待復建居屋的問題，並指出復建居屋並非處理當前樓市出現的問題應採用的措施或手段。有數位議員均作出相同的提點。以下的數據將有助我們掌握住宅樓房供應情況：

在一手私人住宅市場方面，市場上仍然有一定的供應。據我們現時所掌握的最新資料估計，未來數年間將約有52 000個一手私人住宅單位供應，當中約33 000個屬實用面積為7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型單位。

除了一手私人住宅外，市場上還有為數不少的二手私人住宅單位供應。事實上，二手私人住宅單位的每年成交量在過去數年來平均約為77 400宗，佔整體私人住宅單位每年成交量的八成。2009年首三季的二手成交量已達約73 000宗，佔整體成交量84%。

此外，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將於2009年10月底推售第5期合共一千三百多個剩餘居屋單位，當中大部分售價低於200萬元。在推出第5期後，房委會會把尚餘四千多個剩餘居屋單位由2010年起有秩序地推出。房委會會參考第5期的銷售結果，並考慮當時的市場情況，制訂銷售計劃。

全港目前有超過30萬個居屋單位，其中包括六萬多個已補價及二十五萬多個未補價的單位，分別可在公開市場及居屋第二市場買賣。這些居屋單位分布於全港不同地區，約75%位於市區及擴展市區。以現時價格當作已補價估算，低於200萬元的單位約佔七成，即約22萬個單位，

當中包括5萬個已補價的單位。這些居屋單位是龐大的中、低價房屋的潛在資源，可供有置業需要的人士購買。我們歡迎議員就如何能進一步活化居屋市場，向我們提供意見。

有意見認為，復建居屋有助於公屋流轉。儘管房委會自2003年起停建居屋，以及於2004年終止置業貸款計劃，公屋居民自願或因購買居屋第二市場的單位而交回的公屋單位數目，是沒有受到影響的。過去數年來，即使沒有居屋計劃，每年仍有不少公屋單位由於住戶遷出而要收回。在2004-2005年度至2008-2009年度期間，平均每年約有8 500個公屋單位收回。

此外，有建議認為我們可以把用作興建公屋的土地轉為興建居屋。公屋輪候冊上現時有超過12萬名申請者，而平均每月新增的申請超過3 500宗。房委會須集中有限的房屋資源，以照顧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以維持公屋申請平均輪候時間在大約3年的時間。為保持這個平均3年上樓的目標，我們要確保舊公屋清拆後的土地是用作公屋發展，並會繼續與有關政策局緊密聯繫，以物色合適發展公屋的土地。把房委會的土地資源轉為居屋或其他用途，會嚴重影響平均3年上樓這政策目標，故此我們將不會予以考慮。

昨天有數位議員建議我們考慮推出首次置業貸款。政府曾於1998年至2002年期間推出首次置業貸款計劃（“首置計劃”）。截至2009年10月中，首置計劃下的三萬三千四百多宗貸款個案當中，已完成還款的有一萬八千七百多宗，但當中約有一半在還款期間曾出現拖欠還款的情況。按時還款的個案現時仍有一萬二千五百多宗，當中約有四成半亦曾出現拖欠還款的情況。政府就首置計劃已經承擔了4.9億元的壞帳額。

剛才亦說過，政府在2002年就資助房屋政策重新定位，政策目標是集中資源，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租住房屋。我們認為市民置業與否，應該根據個人意願和負擔能力來決定。政府不應該擔當貸款機構的角色，影響市民就負擔能力而行使的置業決定。我剛才提出的數據，正正警惕我們考慮首置計劃等這類意見時，須十分小心。

最後，我想談談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手法。有數位議員對此亦十分關心，包括李永達議員在內。政府十分關注近日一手住宅市場的銷售的手法及市場上混亂的信息。我們會正視任何擾亂視聽，令買樓人士混淆的手法。我們正研究具體可行的措施，並會盡早與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探討，以進一步提高一手樓花住宅市場交易的透明度及物業資料的清晰度。

正如我們過去在實用面積的規範、售樓宣傳資料及售樓書要分開處理、售樓書內的特定物業位置圖及分區計劃大綱圖要用指定尺寸說明等，我們均會以務實的態度來改善現時的安排。

主席，運輸及房屋與市民可謂息息相關。我們會在本局旗下的各項議題上，繼續與各位議員保持緊密合作。

多謝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十分感謝各位議員對施政報告的“發展基建，繁榮經濟”環節內，有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範疇所提出的意見。

首先在扶助企業方面，財政司司長剛才已經宣布，會將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延長至2010年6月底，積極地回應了議員和業界的訴求。對於林大輝議員對這項支援計劃的讚許，我想代表政府及工業貿易署的所有同事表示多謝。議員給我們的工作肯定是鼓勵，也是鞭策我們做得更好的動力，我們會繼續努力。特區政府一直與業界及內地部門緊密聯繫，透過積極向內地反映業界的關注和建議，協助在內地經營的港資企業。事實上，從中央政府及廣東省政府對我們提出的意見所作出的積極回應及出台的多項具體紓緩措施，例如暫緩落實勞動合同法、推行“多次內銷、一次申報”、“不作價結轉、不停產轉型”等政策可見一斑。特區政府也多次率領港商到江西、湖南、廣西、武漢等地，考察內地承接加工業轉型和轉移的城市。就開拓內銷市場方面，我們也致力協助香港企業在內地推廣產品和品牌。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在今年6月於北京開設了在內地首間的“香港設計廊”，為有意開拓內銷市場但未建立銷售渠道的港資企業提供平台，推廣品牌；該局亦會繼續在不同省市舉行“香港時尚購物展”，推廣香港產品。這些工作正正顯示政府對本地工業的支持。今後，我們會繼續與內地部門研究及推動所需的配套設施，亦會繼續支持內地有關部門、貿發局或業界舉辦產品內銷對接及展銷活動，為港資企業提供開拓內銷市場的平台。

隨着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我們也會積極開拓香港與台灣的經貿合作。香港貿發局台北辦事處已於去年10月正式掛牌及開展工作，並在香港及台灣舉辦了一系列經貿交流活動，亦協助組織台灣經貿代表團訪港和兩地的工商界交流活動。投資推廣署也會加強在台灣的推廣工作，包括建立在香港、內地及台灣三地設點的台資企業資料庫，以便制訂針對性的市場推廣和宣傳策略。

旅發局亦計劃將在台北的地區代辦升格至正式辦事處，我們現正就此與台灣有關當局跟進。旅發局亦會加強推廣工作，拓展港台的郵輪及其他旅遊商機。

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方面，我們會繼續推動進一步開放及深化落實措施，並會透過定期與不定期的會議，以及各種溝通渠道，聽取業界的意見。為確保CEPA的有效落實，政府會與內地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務實和針對性地跟進問題和具體個案，深化落實工作，以及共同宣傳及推廣CEPA。我們會着力爭取更多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措施，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政策方向。

至於競爭法方面，自去年8月完成第二輪公眾諮詢後，我們在同年9月已就所收集到的意見編製成報告，並已上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網頁。同時，我們亦分別於去年12月及今年3月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了我們對公眾意見的回應及如何解決《競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當中的一些技術、法律和政策方面的建議。當中包括把執行條例草案的民事執法模式改為司法模式。我們計劃把競爭事務審裁處設立為一個司法機構下的正式法庭，負責審理及裁決違法行為及聆訊私人訴訟，而競爭事務委員會就只會負責就反競爭行為作出調查及起訴。除此以外，我們就條例草案的其他細節，如審裁處的運作模式及草擬中的競爭法如何與現行法例下的其他競爭條文配合等問題都已經有了規劃。

在過去1年，我們已完成了條例草案大部分的準備工作，接着會致力在2009-2010立法年度內提交條例草案，並會於稍後時間向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詳細交代條例草案的內容。此外，還會就法例是否適用於法定機構，或哪些機構應予豁免的課題，一併向議員交代政府的想法。

有關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政府十分關注市面上有一小撮不良商人，以不公平的營商手法，欺騙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我們現正積極研究，修改現行法例，以打擊和杜絕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手法。我們希望最快能在本年年底或明年初，提出立法建議諮詢公眾。政府和消費者委員會剛剛展開了新一輪的宣傳及教育工作，透過電視、電台廣播宣傳片，以及報章專欄等渠道，提醒市民在消費時應多作比較、多發問、多警惕，更好地維護及行使自身權益。

在發展旅遊業方面，今年的國慶黃金周所帶來的旅遊收益表現得相當不俗，而黃金周過後，內地及長途市場訪客數字回升趨勢亦得以持續。我們會繼續在內地和有潛質的新興市場如俄羅斯、印度和中東等地

加強推廣，藉着在未來數月舉行的多項大型盛事例如“美酒佳餚節慶活動”、“香港繽紛冬日節2009”和“賀歲巡遊匯演2010”等，吸引更多旅客到訪。我們今年會重點開拓更多綠色旅遊產品，當中首推最近成功被納為國家級的香港地質公園。我深信香港旅遊業界一定不會錯失良機，開拓香港地貌和海岸公園的旅遊產品，豐富旅客的行程，讓他們在享受美食購物之餘，讚歎及不忘欣賞大自然賦予香港的天然景緻。除了增加和加強香港旅遊景點，我們更可以透過更有創意、更體貼的服務，吸引旅客一再來港，享受美好的香港經驗。

主席，預計首個泊位會在2013年年中投入服務的郵輪碼頭，將會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旅遊和經濟收益，我們會全力爭取更多郵輪以香港為母港，提升香港作為區內郵輪中心的地位。此外，我們會繼續和內地及鄰近地區的港口合作，聯線發展一程多站的郵輪旅遊，把握內地旅行團乘坐以香港為母港的郵輪從香港前往台灣的措施，發展兩岸三地一程多站的郵輪旅遊產品，拓展區內的郵輪市場。

會議展覽業和商務旅客也會為我們帶來實質的經濟效益。香港享有獨特優勢，是亞洲區內商務會展及旅遊的首選地，預計今年將有大概300個展覽和大型會議在香港舉行。為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我們要及時策劃配合會展業發展的會展設施。我們正小心規劃，籌劃選址及配套措施。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會忽略提升現有設施的使用率。當有具體擴建方案時，會作公眾諮詢。

在發展公共廣播服務方面，我們現正進行公眾諮詢，我們會仔細聆聽議員和市民就港台如何發展及履行其公共廣播機構使命的意見，並會廣泛諮詢不同組織，透過舉辦地區論壇、進行專題小組討論及公眾意見調查，收集各方的意見。

有很多位議員發言支持政府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我希望指出，推動科技發展是一項需要長時期孕育，並須有持續的信念及工程，不爭朝夕，更不宜期望投資會有快速回報、項項成功。對於窮一生精力、不怕困難、屢敗屢試的科研工作者，即如經歷了數十年努力，剛獲諾貝爾物理獎的“光纖之父”高錕教授，我們應致以最高的敬意。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推出“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就是要帶動企業科研文化，以及鼓勵企業與本港科研機構合作，多作科研投資。我們會為本地公司在科技研發所作的投資，提供10%的現金回贈。所有申領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的項目，均能受惠。至於非“創新科技

基金”資助的研發項目，只要企業夥拍或委聘本地指定科研機構進行研發，亦會受惠。計劃不會對每間公司能夠收取的回贈額或提交的研發項目設定上限。

施政報告宣布後，我很高興聽到不同界別對現金回贈計劃表示歡迎。現金回贈計劃有多項優點，其中包括容易管理，而且現金是最直接的資助方式，公司無論是否須繳納利得稅，均可受惠。再者，公司無論規模大小也可以申請，公司所作的研發投資越大，得到的現金回贈相應亦會越多。我們現正就有關計劃的運作及程序跟有關科研機構商討，包括發放現金回贈的時間，以及應否涵蓋在內地進行研發工作的投資。

我們已為現金回贈計劃預留2億元，若能得到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申請，期望計劃可於明年4月推行。計劃實施後，會適時作出檢討。

至於檢測及認證，香港的檢測及認證行業有非常好的發展前景，香港檢測業的專業水平、誠信和對國際市場的認知均深得用家信任，而且香港鄰近內地，商機處處，加上各地消費者對產品及食物安全和質素日益關注，而香港檢測水平則廣受世界各地認同。

政府於9月成立的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已舉行了兩次會議，定下了工作計劃，要探討的多個課題，包括提升香港檢測和認證行業的競爭力、加大香港認可處提供支持的力度、加強人才培訓、提升專業水平，以及推廣香港的檢測及認證行業在本港、內地和其他地方的服務，並會制訂業界的發展藍圖，在這過程中會諮詢檢測業界、商會及相關團體的意見。政府會全力支持香港的檢測認證服務，希望能透過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的工作，提升香港檢測認證服務水平，打造品牌，加強香港檢測認證服務的國際認受性。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原議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希望藉着今天辯論的機會，向各位議員進一步解釋特區政府的對台工作及我們與內地合作的政策。

在對台工作方面，我們在過去數年是逐步提升的。並且在過去一年多，推出了數方面的措施。剛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經提及，我們去年10月在台北成立了香港貿易發展局駐台北辦事處。除此之外，特區政府亦開展了“港台城市交流論壇”，今年較早時在香港舉辦了第一輪與

台中市的交流。我們亦逐步推出便利台灣居民來港旅遊和經商的措施，例如在4月底決定了往後持有“台胞證”的朋友隨時無須附加簽注，可以來港停留7天。

我們在總結了過去數年的對台工作以後，行政長官在此次的施政報告提出了對台工作的3個發展策略方向：

第一，我們要進一步建立台港合作的框架；

第二，我們要加強香港與台灣在經濟範疇的雙邊合作；及

第三，我們要發揮香港在兩岸三地金融、經貿、旅遊等交往當中的積極角色。

今年6月，我曾到訪台北與陸委會商談，雙方達成共識，要建立雙邊的商貿合作委員會，利用這個新平台加強香港與台灣之間的聯繫。

台方將會成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台方官員亦會以適當身份參與策進會的工作。在香港方面，我們將會在香港貿易發展局下成立“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未來，我們透過這個平台，台港雙方的企業可以互動。現時經過台港雙方繼續努力，我們相信這個雙邊的商貿合作委員會早日可以成立。

但是，為着再進一步推動更長遠台港關係的發展，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港方決定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這是我們與台方於6月商談後更上一層樓的決定。協進會雖然會是非官方組織，但特區政府官員亦會以適當身份參加協進會及全力支持協進會的工作和活動。特區政府亦會向協進會提供資源。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在台港兩方的工作會在兩個層面推動：第一方面，協進會會與台方的策進會互為對口機構，兩地的官員可以透過這策進會與協進會的平台，交流和討論一些雙方都關心的公共政策事宜。第二方面，雙邊的“商貿合作委員會”則會推動企業之間的互動。

因此，譚偉豪議員早前特別提到，希望我們推動台港之間不同行業的互動時要有整體的策略，我們這套新的平台可幫助我們今後做好港台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及容許香港進一步在兩岸關係中有所貢獻。

主席，至於我們與內地合作方面，潘佩璆議員特別提到我們除了要好好利用與內地合作的契機之外，更要記着過去30年來，香港參與內地工業化及改革開放對香港經濟是有影響的。我們對此完全明白，當然亦會細心分析和研究。

現時我們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契機，便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今年1月發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

《規劃綱要》把珠三角地區的未來發展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並把粵港合作明確為國家政策。在這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最着眼及着心的，便是我們明白經過內地30年的改革開放，香港的製造業已大幅遷移至內地。現時香港本土的GDP有90%是以服務業為主，我們便要好好拓展服務業的市場。香港本土的700萬人口是有限的，我們要善加利用與廣東省及內地不同省市的合作，以拓展服務業的市場，先由700萬人口的市場，拓展至大珠三角5 000萬人口的市場，繼而拓展至泛珠地區超過4億人口的市場。所以市場越大，我們希望可以在香港與內地為香港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目前，我們利用《規劃綱要》的契機與廣東省共同制訂一套“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而這個框架協議是把《規劃綱要》的宏觀政策轉化為粵港合作的實質措施。

劉健儀議員強調我們在爭取國家在制訂“十二五”規劃時，要把對香港有利的條件和政策寫進去。其實我們會利用這個與粵方的框架協議，把可以在廣東省和香港之間訂立和實施的政策在省和特區合作的層面來實施。如有需要，我們與廣東省會分別向中央有關部委爭取把更宏觀和對香港有利的政策寫進“十二五”規劃。就這方面的工作，我們亦已經開展了。

劉秀成議員和黃宜弘議員分別提到要繼續照顧專業行業，以及加強香港與深圳之間的合作。現時我們正與深圳方面推動在前海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區政府亦決定加強駐粵辦的編制和人手，設立單位專責與深圳市政府聯繫。

劉慧卿議員和何秀蘭議員分別提到立法會要充分參與和討論與內地的合作事宜。我希望向各位議員解釋，不論是大會或委員會，我們都有做這方面的工作。例如，今年3月立法會曾進行有關《規劃綱要》的議案辯論，並且獲得通過。黃定光議員、譚偉豪議員和葉劉淑儀議員提出很多建議，當中特區政府須就14項建議跟進。我們在5月期間，透過

立法會秘書處向各位議員提交了跟進的進度報告。至於在向事務委員會交代方面，我們一直都有在工商事務委員會交代我們在內地的工作和事務，以及駐內地辦事處在哪些範疇正在推動這些工作。

有議員關注到我們往內地的訪問。主席，你知道立法會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都曾到過深圳考察、參觀過鹽田港，以及視察他們的旅遊設施及規劃。主席，你亦曾帶領立法會訪問團前往四川視察香港的援建工作，這除了不同黨派的議員均有參加外，劉慧卿議員表示特別關心，當然民主黨的議員亦有派代表參加。

主席，陳茂波議員剛才的發言特別提到我們在推動內地事務時要有整全的策略。我可以告訴各位議員，經過回歸之後十多年，我們總結了經驗，相信我們現時的策略可以歸納為3方面。

首先，現時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已面臨關鍵時刻。在若干年前，我們在粵港合作方面推動24小時通關，接着在2003年有了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我們在“零關稅”和在廣東省推動“先行先試”服務業，已經有了相當廣闊的政策基礎。所以今後我們會好好利用這廣闊的政策基礎，惠及香港的經濟發展。

第二方面，在過去十多年，特區政府和中央的部委及省市政府透過粵港合作、泛珠合作等，已經建立了頗深遠的工作關係，我們與這些地方的政府可以很全面地溝通。我們準備充分利用這些已建立的關係，為香港不同的業界在內地拓展市場，以確保內地的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政策大門要開，在當地的政策小門也要繼續開。

第三方面，我們的整體思維是繼續關心香港製造業在內地要升級轉型，要有良好的條件，以及要確保政策方便他們可以拓展內銷市場；這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會繼續努力發展香港在內地的服務業市場。

主席，這些就是我們對內地事務工作的一些重要的元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施政報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議員對特區政府就財經事務方面來年的施政所給予寶貴的意見。

就財政司司長剛才闡述的政策目標，我補充一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來年的工作重點，是涵蓋3方面的：第一，是汲取金融海嘯的經驗，加

強投資者保障；第二，是加強監管金融機構、強化金融安全；及第三，是配合人民幣逐步開放的趨勢，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第一個工作重點而言，即在加強投資者保障方面，我們會循5個方向落實推進。第一個方向，是提高市場的透明度。有關的工作包括建議立法規定上市公司適時披露股價敏感資料，將一些現時上市條例的規定納入法律框架內，這樣做可更有效地執法，目的是讓投資者第一時間掌握該公司最新的、有可能會影響股價的動態，以方便他們作出投資決定。這建議亦回應了市場的擔憂，亦是何俊仁議員較早前提及過在金融海嘯時，有些上市公司有否適時披露它們的損失，以及有否違反市場公開、公平及透明的原則。其他提高市場透明度的建議，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所提出的在產品銷售時應提高風險資料披露的要求，甚至是在銷售後，亦要持續披露這些資料，而證監會一系列的建議亦正在進行諮詢。此外，證監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及證券登記公司總會正制訂無紙化證券市場的運作模式，在落實後亦會有助於提高透明度和促進企業傳訊。

第二個方向，是加大對投資者的保護網。有關的建議包括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主要為投保人在保險公司一旦無力償還時提供保障。此外，為了加強存戶的保障，我們正跟進在這個立法年度把存保額由10萬元提高到50萬元的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

第三個方向，是改善結構性產品（例如雷曼之類的產品）的發售制度。現行認可結構性產品銷售的法例載於《公司條例》，我們正與證監會研究把這些條例移至《證券及期貨條例》下，讓證監會可以就產品性質在有需要時發出適切指引及守則。

第四個方向，是建議設立投資者教育局。投資者教育現時分散在不同的監管機構，就自身的範圍負責。構思中的投資者教育局會有系統地為不同年齡和教育背景的投資者，就跨界別的投資服務進行教育工作。

第五個方向，是建議設立金融糾紛調解機制。我們會參考外國的做法，考慮利用調解與仲裁服務，用“一站式”方法來處理公眾對不同金融產品與服務的投訴，令投訴者投訴有門，得到應有的賠償。

上述的無紙化證券市場、投資者教育局和調解機制預計會在今年年底進行諮詢。

我亦順便在此環節回應甘乃威議員提出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對於處理雷曼投訴“零懲處”的質詢。銀行在從事證券業務時，要符

合《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操守守則，如果有違規銷售的情況，懲處權是由證監會掌握的，而證監會會在諮詢金管局後才作出決定。金管局在現行的《銀行條例》下，是沒有法定權力要求銀行罰款的，它只可把違規的前線工作人員從註冊名冊中剔除，作為處分。所以，金管局表面上是對違規銷售“零懲處”，但銀行如果發生此情況而經轉介至證監會後，銀行亦會受到懲罰。

我接着會談談第二個工作重點，即“加強監管金融機構、強化金融安全”。香港的監管制度向來穩健，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本地的金融體系沒有出現系統性的問題。不過，20國集團及國際監管組織汲取了危機的教訓，並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區政府及有關監管機構會審視本地市場的情況及需要，循數個方向改善規管制度。

第一方面，是加強銀行風險管理。金融海嘯的其中一個起因是金融機構對流動資金、交易帳目和證券化活動的風險管理不足。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最近完成了有關全球流動資金風險要求的建議，金管局會就有關建議諮詢業界。此外，金管局亦因應金融穩定委員會提出的薪酬原則制訂了指引，並會就此諮詢業界，以確保銀行的薪酬制度能貫徹有效的風險管理。

第二方面，是加強保險業監管。我們正着手研究設立獨立的保險業監督，並檢討保險業監管制度。我們計劃於明年上半年諮詢公眾。

第三方面，是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督。除了加強對個別金融機構的監管外，金融市場活動的監督亦十分重要。很多產品現時由於是通過私人配售或在櫃檯買賣，而不是在交易所買賣的，所以難以統計它們的買賣數量。因應20國集團的要求，我們和監管機構正研究對標準化場外衍生工具提供中央結算平台服務的可行性，以增加市場的透明度。

第四方面，是加強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國際間有很多聲音針對低稅收及資金自由進出的地方，認為那些地方是避稅天堂或洗錢天堂。要避免這些標籤，我們須符合國際間稅務資料交換的最低標準。因此，我們已於7月份提出《稅務條例》的修訂，法案委員會正在審議。打擊清洗黑錢的監管制度的諮詢剛剛結束，我們將會整理意見，並於明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第三個工作重點——是昨天很多位議員均提過，亦表示支持的——便是香港要配合人民幣逐步開放的趨勢，鞏固及提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業是我們的支柱行業，有需要進一步鞏固及發

展，在促進市場發展方面，施政報告提出3個中心的定位，便是一個匯聚國內外資金及人才的國際融資中心、資產管理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這數個中心是我們考慮到香港在這個區域內(包括上海)相對有優勢而設定的，具體方案包括進一步提高市場質素、國際化優勢與競爭力。做好上述投資者保障與金融安全工作，其實是提高市場質素的基石。在此基礎上，我們要進一步提高香港作為上市集資中心的吸引力。在這方面，港交所與證監會做了不少工作。我們在重寫《公司條例》及檢討《受託人條例》方面亦配合了這方面的工作。

關乎發展方面的第二個方向，便是進一步推動香港人民幣業務。最近已有多項措施出台，包括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內地港資銀行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以及最近國家財政部在港發行國債。中央政府選擇香港作為國債首次境外發行地，說明中央支持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以推廣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香港對人民幣的需求是市場化的，故此利用香港可以有效地測試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認受性，亦最適合為內地推進資本帳目開放及為人民幣境外流通提供可靠而有效的試驗場地。我們很高興聽到溫家寶總理在上星期五與香港傳媒談話時，主動提到選擇香港作為國家金融改革的試點。我們會繼續與監管機構、市場人士研究，同時向中央爭取引入更多人民幣產品及服務，包括陳鑑林議員及陳健波議員昨天提過很多好的建議，並把人民幣結算服務推介至亞洲周邊地區，從而發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

第三個方向，是加強與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金融合作。通過CEPA，我們今年成功為本地銀行降低了門檻，在珠三角成立更多支行，亦為證券業界邁出了第一步。我們並會繼續利用CEPA的平台，協助香港金融機構和專業人士在內地擴大業務，尤其是爭取以“先行先試”模式，擴大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的合作。

我最後想強調，在落實上述3項工作重點時，我們雖然重視投資者保障和金融機構的穩健，但我們同樣注意不要因此而窒礙了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多謝主席。

主席：第1個辯論環節結束，現在進入第2個辯論環節。辯論主題是“優質城市，優質生活”，當中涵蓋6個政策範疇，分別是：屬發展事務政策範疇的文物保護事宜；屬經濟發展事務政策範疇的能源事宜；環境事

務；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民政事務(在第5個辯論環節才討論的地方行政及公民教育有關事宜除外)，以及屬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政策範疇的創意產業事宜。

在這環節打算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

林健鋒議員：主席，今年施政報告關於改善環境和空氣質素的篇幅比過往多，可見環保是社會發展的重要一環，不容忽視。

在上星期，中環的空氣污染指數曾經達到168，是5年來的高位；其他地區的空氣污染指數亦持續處於甚高水平，情況令人憂慮。政府就空氣質素指標檢討進行的諮詢工作將在下月屆滿，大家均期望政府可以把世衛的標準，作為香港的長遠指標，並且從速制訂有效措施讓香港市民多些看見藍天白雲。

我更希望粵港兩地政府可以盡快訂定2010年後的減排方案，因為粵港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定要彼此合作，才能改善整體空氣質素和實現低碳經濟，共建“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我亦很高興當局會爭取把這策略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

由港府撥款、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負責的“清潔生產伙伴計劃”，實施一年多以來，為不少珠三角港商提供多項環保工序方案，在改善環境之餘，亦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因此，我非常支持將該計劃擴展至處理及減少污水排放。

改善空氣質素，人人有責。今年的施政報告建議由家居做起，向市民派發慳電膽現金券，鼓勵市民以慳電膽取代傳統的鎢絲燈泡。根據政府的資料，在現時一般家居的用電量中，照明用具的耗電量約佔16%，而慳電膽較鎢絲燈泡的耗電量少七成。如果轉用慳電膽可以省電又省錢，大家都會支持這個符合環保原則的世界大趨勢。

不過，就今次派發慳電膽現金券計劃，我相信在推行上仍有一些細節須仔細籌劃。現時，很多市民在購買燈膽時，均喜歡光顧小商店或有“電器街”之稱的鴨寮街，因為它們款式較多，可謂包羅萬有，而且價錢比較便宜。不過，這次慳電膽券計劃是否規定市民要光顧某些指定商戶呢？如果鴨寮街小商戶要成為該計劃的商戶，會否因要負擔行政費而令經營成本上升呢？

因此，我希望政府在慳電膽券計劃的安排上可以簡單一點，容許只要持有商業登記並有售賣燈膽的店鋪均可參與。同時，我亦鼓勵商戶逐步減少出售鎢絲燈泡，並且自發回收市民更換掉的各式舊燈膽，交予政府作妥善安排和銷毀，因為慳電膽含有水銀，一定要小心處理，要確保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其實，除了慳電膽外，大家都知道越來越普及的LED燈是沒有水銀的，而且在壽命和耗電量方面亦比慳電膽優勝，因此，我建議政府把慳電膽券計劃擴展，容許用戶購買各式各樣的環保燈膽。我希望政府除了逐步把交通燈更換為LED燈之外，亦可積極支援香港LED燈的技術研發工作，確保LED燈在質量、供應、價錢、環保等方面均不斷改進，以配合香港邁向成為更優越的綠色都市。

主席，隨着近年越來越多住宅用戶轉用慳電膽，今次派發慳電膽券是有鼓勵性作用，希望市民一起為環保出一分力，而這事應與是否增加電費是兩回事。對於已經使用慳電膽或LED燈的市民，現時再派發慳電膽券，不會令他們的耗電量進一步減少。至於工商業界，因為它們不會因派發慳電膽券而得益，所以，如果增加電費，便會加重它們的負擔。因此，我希望政府在推行計劃時，要顧及當前經濟環境下住宅和工商用戶的重擔。

此外，我留意到香港所有樓宇的後樓梯燈均是長期亮着的，其實這樣會耗費很多能源。政府可否考慮容許在這些梯間安裝感應器，有人經過時燈才亮起，沒有人經過時會自動關上，這樣每年便可節省不少電力。我亦知道在特區政府總部，有些地方已安裝這類感應器。如果可以在法例上作一些調整，我認為在環保和省電兩方面均會有很大幫助。

施政報告的另一環保重點是推廣使用電動車。從減少廢氣排放的角度，電動車當然是首選，但全球的電動車均供不應求，所以我很高興政府與兩家車廠合作，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內可提供約200輛電動車在本港出售。當局亦會與兩間電力公司(“兩電”)合作，在明年年底前推出電動車租賃計劃。

我知道兩電正積極計劃在大型停車場設置充電站，並且會使用最方便的繳費方法，例如八達通。除充電設施外，我認為一定要確保有適當的維修保養服務、維修人員、以至消防員都要接受相關培訓。由於電動車在入口時已獲豁免首次登記稅，我希望租賃計劃下的租車費用，可以大眾化一點，讓香港更多駕駛者可試用這種極為環保的電動車。

港產電動車MyCar上星期開始在港公開發售，雖然現時MyCar只獲准在50公里以下的道路行駛，但這已算是第一步。我希望政府在MyCar的研發和發牌工作上可以幫一把。政府亦應積極考慮購置MyCar，以起示範作用，並支持香港的工業。

在現時電動車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我認為政府應考慮更多措施，鼓勵市民選購混能車。現時混能車已發展到先用電，後用汽油，環保效能比較好。但是，在2007年4月推行的環保車稅務優惠，反應一般，我希望政府可檢討該計劃，吸引更多車主購買環保車。

除私家車外，我們亦不能忽略重型商業車輛的環保工作。在2007年4月，政府推出歐盟前期及歐盟I期柴油商業車輛換車資助計劃，但根據當局的資料顯示，目前已更換的車輛數目只佔合資格車輛的兩成，而計劃將在明年3月結束。

我希望當局明白，歐盟IV期車輛初推出時，曾出現一些技術問題，直到今年4月才得到解決。在這段期間，車主當然不會買一部明知有問題的車輛，而會等到製造商解決所有技術問題後才購買。再加上過去1年全球發生金融海嘯，很多車主也未能負擔換車的開支。因此，我很希望當局可積極考慮延長這項計劃，因為對於歐盟前期及歐盟I期的舊車，的確應該是盡量避免它們再在香港的道路上行駛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健波議員：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多項有關環保的措施，再加上政府目前持續進行的工作，例如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諮詢工作，其實很多環保政策正等待市民參與討論，但市民對這些真正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似乎不太感興趣，只集中討論慳電膽，實在令人感到可惜。

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推動以低耗能、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其中建議包括把本地使用天然氣發電的比例，由現時的28%提升至50%。其實，這項建議對改善空氣污染幫助很大，但在實施時會有不少困難，正如在較早前公布的空氣質素指標檢討諮詢文件中指出，擴大天然氣發電的比例，最終會導致電費上升20%，變相增加了市民的負擔。

我想指出，電力是本港最大的污染排放源，天然氣發電可以大大減低二氧化硫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對改善空氣污染有很大幫助，值得我們投入更多資源。不過，我認為，政府不應將成本全數轉嫁給市民，

因為改善空氣質素後，會有很多無形收益，不容易量化，例如市民的健康、香港的形象，以及更容易吸引更多人來香港投資等。現在，特首在施政報告內指出，環境局已經開始與兩間電力公司探討有關事宜，似乎有一定的進展，我希望很快便會有好消息。

為改善路邊空氣質素，政府在2007年推出一項32億元的資助計劃，鼓勵車主更換歐盟前期和歐盟I期的柴油商業車輛，改為更環保的新車。施政綱領指出，截止今年9月，只用了約5.42億元，換言之，該計劃用剩了二十多億元。政府現在決定如期在明年3月結束計劃，但我們要考慮的是，柴油車輛其實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污染排放源，我認為政府應利用該筆剩餘款項，再提出新的優化換車計劃，甚至可以考慮將這些資源協助巴士公司，更換更環保的巴士。此外，車主不想換車其實有很多原因，例如擔心前景不明朗，所以新的優化計劃，除了資助換車外，還應為不想換車的車主提供買回舊車的計劃，然後將車銷毀，以避免車主將舊車賣給新車主，繼續在路上污染環境。

此外，施政綱領提及，政府目前正草擬有關停車熄匙的條例草案，預計可在本立法年度內提交立法會審議。停車熄匙基本上是一個好建議，亦受到市民歡迎，但運輸業界，特別是職業司機，對這措施有很多意見和不滿，我希望政府在提交條例草案前，會藉協商與運輸業界解決有關問題，不要將矛盾深化。

施政報告亦建議推廣使用電動車輛，並與兩間電力公司合作，在明年底推出電動車輛租賃計劃，讓市民親自體驗駕駛電動車輛的好處。我十分支持上述建議，亦相信這是大勢所趨。香港近日有本地自行研發的電動車上市，很快便成為大眾的焦點。我相信只要電動車的技術越趨成熟，自然會吸引更多市民轉用電動車。

施政報告又建議，邀請學校簽署環保午膳約章，承諾避免使用即棄餐盒和餐具，並減少浪費食物。政府會幫助學校改以即場分份的方式派發午餐，此舉可避免使用即棄餐盒和餐具，並可按學生的食量分發食物。這計劃更可以透過親身體驗，向下一代灌輸環保的信念，以便他們從小養成環保的習慣。其實，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生活細節，只要肯多走一步，就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而由政府帶頭去做，得到的成績肯定會更好。

我謹此陳辭。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今天代表民主黨就施政報告中有關環保政策和中環保育兩方面表達我們的意見。

當然，今天討論環保政策，我認為不能不先提慳電膽的政策，因為這最近已成為了城中熱話。推出這項政策，很明顯可以看見政府是未經深思熟慮，亦令人感到……即使我們不問是否有利益輸送，但就推行這項政策而言，政府究竟願意承擔多少，也令市民有很大存疑。這種說法，跟最近討論有關空氣污染諮詢文件內所提及，如果要改善空氣污染便要增加電費、巴士車費的整個概念，其實如出一轍。

政府經常說的環保責任，予市民的感覺是全部推向普羅市民，政府好像完全無須有所承擔。由於有這個感覺，導致原本是一項好的政策，原意期望推動市民關心關注，身體力行保護環境，卻因此令人望而卻步，這一點令我們感到非常可惜。

有關慳電膽的政策，最近有很多討論。很多市民都指出，例如他們選用光管，怎麼辦才好，因為要增加電費；如果想買LED燈泡，它卻又不包括在慳電膽券內。商界的朋友表示，他們沒有慳電膽券，卻要增加電費。我昨天提出一項書面質詢是關於港燈未來的電費；明年電費一定會調高，換言之，是加上加。這原本是一項好政策，但整個討論的焦點轉移了，令我們感到非常可惜。所以，民主黨希望政府能夠……政府用的字眼是微調、優化，將這項好的政策微調或優化，我相信是有機會獲得市民支持的。

所以，民主黨建議如果要推廣環保措施，第一是不能增加電費；第二，如果派發100元環保券，有關費用應全數由政府支付。根據我們計算，以全港有二百多萬個household計算，每戶100元，涉及約2.4億元至2.5億元，我相信這個數目政府是能夠承擔的。大家知道，剛才有同事說過，早前立法會推行柴油商用車的資助計劃，我們也資助三十多億元，雖然未必會全數耗盡，但已有前科。我認為在推動這項工作方面，政府也是可以作如此考慮的。第三，100元環保券是否只可用於購買慳電膽？民主黨認為不一定，可以考慮包括LED燈泡。關於LED燈泡，數天前提及添馬艦政府總部會否全部採用慳電膽。政府現在已“轉軛”，表示會採用LED燈泡。為何這些環保券不可用以購買LED燈泡或其他節能用品？我希望政府能微調這項政策，民主黨也希望這項政策得以落實。

除了慳電膽的政策，我當然要討論空氣污染。我們一直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一些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我們其實無須等待甚麼諮詢，因為我們……如果根據港大達理指數顯示，去年有八百多人因為空氣污染

而提早死亡，因此，保障市民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有同事剛才指出，中環路邊監測站最近錄得的污染指數達160以上，又破了紀錄，每次都破紀錄，這是非常恐怖的。我認為如果我們不盡快推行這項措施，情況便會越益惡化。

當然，民主黨認為首要處理的是排放黑煙的巴士。有關如何處理這些巴士，我們已提出了多次，希望政府能夠資助巴士公司盡快更換。早前在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如果我沒有記錯，副秘書長說要等待至2019年，屬歐盟II期的排放黑煙的巴士才可全部更換，這真的是死了數次也還未能解決問題了。

在商言商，由於巴士公司也不知道自己的經營前景如何，如果政府現在貿然要求它們更換巴士，又不提供資助，我認為它們未必願意。我希望在不久將來，政府能夠盡快落實資助巴士公司更換巴士。我認為此舉可大大改善路面的空氣污染情況。有關空氣污染指標，我們已說了很多遍，不再在這裏重複，只希望空氣質素能盡快達至世衛標準。

今天的熱門話題，是討論如何減排溫室氣體。我知道環境事務的panel將會有討論，而年底在哥本哈根其實也會舉行會議，但究竟會訂出甚麼減排標準？我們現時看見行政長官或局長均有所強調，但所說的只是減少能源的強度，而非討論總排放量，這一點令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我們作為地球村一份子，大家其實都看見，很多國家，例如美國已定下目標，將2020年總排放量減至1990年的水平，東京也將2020年……較2000年減排25%，澳洲亦提出了減排數目，英國也有。我不逐一提出數字了，因為我相信局長會較我掌握得更清楚。

所以，我們民主黨認為，政府應定出一個很實質的減排目標，讓我們可朝着目標進行這項工作。將來，我們參加……我相信我們與中國代表團一起時，我們都說出香港應訂出一個明確的減排目標，這樣我們才能有一個清晰的目標作為依據，來進行未來的工作。

在環保方面，我最後要提的是停車熄匙。有些同事剛才說……大家知道，這項政策應該是受歡迎的，但究竟如何落實呢？大家這兩天聽到了一些有關膠袋的報道，指出超級市場已減少了85%的人使用膠袋，這對於推行環保政策來說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一個好開始。然而，最近談及的慳電膽卻弄致滿城風雨。我十分擔心局長會“褪軛”，特別是在停車熄匙方面。究竟如何令這項政策既能落實，業界又不會反對呢？這便要考考局長的智慧了。事實上，如果……但局長也要想一想，如果他

為了滿足業界的要求而提出很多豁免，例如很多車輛都無須停車熄匙，這項政策便很難以落實和執行了。

我想，停車熄匙對路邊的排放是會有些影響的。在這方面，我希望局長盡快……雖然這是一項具爭議性的政策，但我覺得他應該盡快把政策提交立法會，讓大家討論。我覺得立法會可以有一個很清楚的辯論，表達不同的聲音。如果在立法會進行辯論，我相信這項政策的推行便能……好像早前的膠袋稅，業界當時的反對聲音頗大，但有關政策提交了立法會和經大家討論後，得出了一個體諒對方的看法，令政策得以盡早落實。我們民主黨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推行整體的環保措施。

說過環保措施後，我要說有關今天的議題，便是發展事務議題下的文物保育，因為這其實是今次施政報告中政府要推銷的一個頗重要部分，即如何保育中環。

我今天特地帶了一張我於2008年選舉時採用的單張來，有一張是題為“打造歷史城區”的。在“打造歷史城區”中，其中有兩個……我們建議應該保留很多建築物，包括中環街市和政府山。早在2006年，我們其實已經在政府總部外面舉辦論壇，希望政府能夠保留政府山。我們當然很歡迎政府吸納了我們民主黨的建議，把中環街市和政府山都保留了下來。然而，很多時候便是這樣，政府採納了一些卻又不採納另一些。政府吸納了我們的意見，卻不表示謝意，轉頭便把我們的意見改頭換面，最後變作了它自己的東西。在我們的“打造歷史城區”中，民主黨其實提出了數項建議，希望政府能夠成立一個歷史城區管理局，管轄整個區域。這不止是說數幢建築物，因為除了政府的建築物外，如果那個城區本身是在不斷發展，不能配合整個社區……因為城區內其實是有人居住的，如何把這些建築物保留下來，融入社區，同時又令社區不會出現交通擠塞和環境等問題，這是要對整個城區作出整體管理，不能看見一塊磚頭便救一塊磚頭，看見一間屋便救一間屋的。要觀察整個區的發展，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因此，民主黨建議並希望政府能夠設立一個歷史城區。當然，如果政府在今次的計劃中……當然會令我們有其他方面的擔心，譬如中環街市，如果政府把中環街市交予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處理，我們便又會有另外的擔心了。

我比較熟悉上環街市。大家看到，它現在變成了西港城。大家知道西港城的管理模式乏善足陳，經常被人批評。如果以這種方式管理，這便不是我們所想看到的了。當然，政府是會有一些新思維，譬如我們最

近在灣仔便看到了另一種管理方法，好像和昌大押般。現在，和昌大押變成了一間很高檔次的食肆，並非一般市民可以進入，這又是另一種管理模式。然而，無論是西港城的模式，抑或和昌大押的模式，均並非我們所希望看見的。

我們當然希望看到普羅市民能夠無須申請成為會員或付出很高的費用，也能進入這些地方，因為這些地方都是香港市民的地方。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在與市建局商討時，能夠想清楚究竟應以甚麼方法發展，不要屆時又變成了另一個西港城或和昌大押。我想整個區域的發展.....就我剛才提及的歷史城區，希望政府能夠詳加考慮。

最後，我想說的是.....當然，今天在有關發展事務的議題下包括了文物保育，但主席，我也希望順帶一提保護樹木，儘管局長稍後未必回應。有關保護樹木，我希望政府能夠訂立樹木法。民主黨正就有關法例進行研究，因為現時是有8項法例.....政府覺得已經可以處理保護樹木的工作。可是，我們覺得由規管修剪樹木、向修剪商發牌，以至懲罰那些胡亂修剪樹木的承建商或人士，都應該有一項完整的法例。因此，我希望政府能重新考慮制定樹木保育法，否則，民主黨會提出相關的私人法案。我希望政府重新考慮。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首先，我很高興聽到財政司司長剛才回應自由黨的要求，把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延長6個月。

我想先談談活化舊工業大廈(“工廈”)的措施。我和自由黨早在數年前已倡議利用空置率高的工廈，發展創意事業及改裝成為葡萄酒倉庫。尤其是隨着免收葡萄酒稅，葡萄酒業有很大的商機，更有人建議於適合的工廈裏，集酒倉、品酒室、酒吧及餐室於一身，塑造為葡萄酒綜合業務地標。然而，於一幢工廈發展“混合用途”，會引申許多地契及消防的問題，發展局也明白這點，故此建議改裝整幢工廈較為實際。不過，我想指出，這樣做卻要處理複雜的業權及籌集較多的資金，對業界來說並不容易。

當局雖然推出優惠措施，包括“按實補價”在內，以大大降低補地價的金額，但從發展商近日的舉動來看，卻令人擔心，有關措施最後只會幫助發展商收購及改裝工廈來發展他們的賺錢項目。

我提醒當局，活化工廈的目的，是為了配合及推動優勢產業的發展。除了當局所提出的6項優勢產業外，葡萄酒業亦不容忽視。當局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遇，利用工廈來提供完善的硬件配套，以進一步鞏固香港成為葡萄酒中心。

然而，這並非只是發展局的責任，其他部門，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食物及衛生局，也應積極配合，並應研究具體措施，以協助更多葡萄酒業進駐工廈。

香港的發牌審批制度僵化繁複，一直為人所詬病，各部門又各自為政，改裝或重建工廈須過五關斬六將，隨時要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衛生署、消防處、機電工程署、民政事務總署及環境保護署等多個部門審批，由申請至開業往往有需要花很長時間，資金不足的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很難承擔這麼大的風險。

所以，對於地政總署計劃成立特別小組來處理工廈重組或改裝申請，業界便建議當局採取一些，以提供“一站式”服務，並協調各部門的安檢及發牌工作，以簡化及加快審批程序。這樣做才可針對性地為中小企拆牆鬆綁，讓業界盡快利用工廈來開拓更多業務及就業機會。

主席，第二章的標題是“優質城市，優質生活”，我對此當然是支持的。不過，我擔心當局借這個目標為名，將責任推卸給業界，要業界一力承擔。其實，政府在1995年推出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時便令飲食業要承擔八成多的責任。此外，去年通過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十年加費計劃，以“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要業界承擔不斷上漲的排污成本，最為明顯。當局如今又重施故技，說道為了推動環保，讓兩間電力公司向住宅用戶派發100元的慳電膽消費券，但計劃所涉及的2.5億元開支，卻原來會由每家用戶的電費攤分支付。在管制計劃協議下，隨時要用戶承擔增加電費的後果。表面上是給你少許甜頭，但其實卻是“糖衣毒藥”，為增加電費作前奏。

自由黨就此剛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發現，接近六成市民認為，以強制增加電費來強迫他們領用慳電膽消費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比認為合理的多出超過一倍。被問及商界未能受惠於慳電膽消費券，但卻要承擔住戶在該方面大部分的開支時，更有高達66%的人認為不恰當。

事實上，要用電量高的用戶津貼用電量少的用戶來購買慳電膽，是不公道的做法，飲食業對此是一定不會支持的。我和自由黨奉勸當局，

既然計劃未能得到市民的支持，當局便應從善如流，優化計劃，排除由上而下的“強制”元素，並應積極考慮其他鼓勵性高而爭議較少的方案，例如向電力節能達某一標準的用戶提供電費回贈。這樣做既可幫助市民養成節能習慣，又可達到推動低碳經濟的原意。

主席，當大家熱烈討論保育中環時，我反而想大家留意一宗在中區發生的個案。甘乃威議員對該宗個案很熟悉，但他剛巧不在席。

中西區區議會去年推翻了前兩屆中西區區議會的決定，要求地政總署停止准許新紀元廣場地下一間意大利餐廳加設置露天茶座。不過，地政總署其實是在2003年因應當時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認為該間意大利餐廳設置露天茶座會有助促進本土經濟及旅遊業，才大開綠燈的，誰料5年後，過了兩屆的中西區區議會卻指該露天茶座由於位處私人發展項目的公眾休憩空間，因此不應用作商業用途，要求地政總署停止續牌。然而，停牌決定在反對聲音下雖然已暫時擱置，但仍要等待發展局提供私人發展項目公眾休憩空間的使用指引後，才有定案。

主席，當局近年將許多地區事宜下放予區議會管理，我對此其實是沒有大意見的。除了每個露天茶座的申請個案外，近日亦決定將重發大牌檔或雪糕小販牌照的申請，還有公園的禁煙範圍等，均交由各區區議會自行決定，這是眾所周知的。

對於這個趨勢，我感到很擔心。如果政府所制訂的政策關乎地區層面的個別個案，而該等個案又要區議會投票決定，這樣是否便要因應部分議員的不同取態，即使投票結果有違政策原意也要接受呢？如此，一項政策豈不是可以按每次投票的結果而朝令夕改嗎？這樣，政府的政策又怎能夠確保持續發展呢？這教任何一個業界如何可以適從呢？

須知道，有些牌照，例如露天茶座的牌照，每季皆要續領1次，而食肆因為要符合許多發牌條件，裝修成本亦較高，因此區議會如果出爾反爾，把牌照收回，或業界對前景有憂慮時，這些事情所帶來的損失，經營者是難以接受的。

事實上，露天茶座給人休閒的感覺，而大牌檔更是香港的傳統飲食文化，兩者均與保育的理念相當配合。我深切盼望當局及各區區議會貫徹推廣露天茶座或大牌檔的政策。在審批有關申請時，地區上的反對聲音如果只是來自少數，便應盡量取得平衡，也應顧及經營者的生存空間及社會發展。

主席，我最近收到很多酒吧業界的投訴，指酒牌局審批酒牌申請和續牌時越來越“辣”，附加的發牌條件比以前更苛刻，例如規定在凌晨2時後不可賣酒或不可用音響播放音樂等。

業界如果不服，便要提出上訴，以致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近日所接獲的上訴個案大幅增加，而上訴排期時間最低限度要等數個月，部分個案在上訴人的酒牌逾期後仍未獲安排聆訊。那麼，提出上訴的作用何在呢？

主席，酒吧業界近年因為室內全面禁煙，加上金融海嘯的衝擊，經營已經非常艱難。如果動輒便因為少數市民投訴而對它們的經營模式實施諸多限制，生意便會很難做，長遠而言，只會嚇怕經營者。

我理解當局很難控制居民的意見，但簡化並完善酒牌審批及上訴機制，當局是有責任及能力做到的。當務之急，是當局應該盡快增加人手及資源來加快上訴程序。此外，政務司轄下的效率促進組早前便就酒牌提交了檢討報告，亦已向食物及衛生局提出了修例建議，業界對此引頸以待。我希望當局盡快提交立法會討論，以落實有關簡化措施。

我亦想順帶一提，食物及衛生局將於本年度就引入即食食物的綜合食物商店牌照把有關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我對此當然是歡迎的。但是，據我瞭解，當局決定參考食物製造廠牌照的現行收費表，按照市區及新界費用的平均金額來釐定牌照費，我對此很有意見。大家均知道，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因為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令食物業界的新界牌照費較市區牌照費高，這對新界的業界一直很不公平，所以食物業界一直建議，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一刀切”，按市區收費表收取牌照費，這樣做便皆大歡喜。不過，當局卻一直不願意這樣做。

當局如今竟然在發出新類別牌照時，以市區及新界牌照費的平均數來收取費用。我可以預期，港九的業界一定會感到很不滿意。我奉勸當局事前須做好諮詢。

主席，我最後想談一談飲食業近年所面對與日俱增的監管條例及發牌條件，包括食物安全條例、室內禁煙條例及為防酒後駕駛的隨機呼氣測試計劃等，這已令不同的業界有很大經營的困難。

如今租金高企，業界又要面對最低工資立法後工資最低限度會有兩位數字的百分比升幅，而金融海嘯第二波會有多兇狠及會為時多長久，大家也不知道。財政司司長雖然說高通脹仍未來臨，但大家也瞭解，在

金融海嘯完結後，高通脹是會重臨的。即使近來好像沒有通脹壓力，但糖、咖啡及茶葉近期已經加價，罐頭食品又說會在下星期加價。在這艱難的處境中，飲食業從來未敢奢望當局會“派糖”。

在施政報告公布前，當局亦“吹風”，說今年不會“派糖”。豈料當局確實是沒有“派糖”，但原來是要業界、中小企，特別是用電量最高的用戶之一的飲食業在這麼惡劣的經營環境下，當大家還在掙扎求存時，代替政府“派糖”，資助電力公司派發慳電膽消費券，即“你請客，但要業界付鈔”。這跟趁火打劫有甚麼分別呢？這真的是荒天下之大謬，豈有此理！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君彥議員：主席，我首先談談環保採購。

要發展產業，便要有需求來作支撐。特首承諾會致力推動環保採購，便是支持環保產業重要的第一步。政府是全港最大的買手，政府購買還是不購買、購買多少，以及用量多少，將會成為環保可否升格成為環保產業的關鍵元素。我自2005年開始便已多次要求政府為環保採購多做工夫，要推動產業發展，政府便要做好倡導者的角色，做好榜樣，帶領市場向環保採購方向邁進。

政府擁有最多辦公大樓、僱用最多員工，亦是全港公屋的大業主。只要當局在政策上作出調整，要求各部門在採購時加入環保作為考慮因素，便可以為綠色產品和節能儀器等帶來很大的商機。政府早前向立法會申請在添馬艦政府總部大樓的燈槽要以發光二極管(即“LED”)燈具來取代較低效能的慳電膽和鎢絲燈泡，加上太陽能光伏板等設施，這便表示要立法會額外批出八千四百多萬元。政府如果宣布於未來一兩年內，在全部政府物業均換上LED燈具，並加裝太陽能光伏板，便會為環保產業在香港建立龐大市場，屆時公營及私營機構均會爭相仿效。不少從事環保產業的企業亦會把握時機，計劃擴大生產線，加大力度進行科研，從而推動本地環保工業發展。

針對環保節能，LED是一項新技術。市面現時有售的LED價格仍然偏貴，但在燈膽壽命及耗電量方面均較慳電膽優勝。這項技術現時正處於快速發展期，預期在一年半載內便可以大幅提升產品的穩定性，價格亦有望回落。

政府應該以前瞻的態度鼓勵使用LED燈具。正如立法會新大樓般，我在規劃初期便已向立法會秘書處提出引入更環保的LED照明，雖然最初的一筆錢有可能會大一點，但長遠可以節省用電，減少碳排放，為環保出力，當然也會發揮一個帶頭作用。我希望政府其他物業未來亦會引入更多環保照明系統。

對於近期鬧得滿城風雨的慳電膽消費券，我認為局方的用意是好的，可以推動更多市民知道節省電力，而長遠而言，住戶亦可少交些電費。收取慳電膽消費券的商戶因為要承諾負責慳電膽回收工作，但現時只有約60個回收站，是不敷應用的，故此我希望可以增加至3 000個。不過，政府在整個醞釀過程只與兩電商討，政策一宣布，社會便議論紛紛。政府現時說細節仍未落實，我希望局方多聽市民、有分參與的零售商、工商界及議員的意見，並能吸納可取之處，令政策落實得宜，真正惠及香港。

第二項是清潔生產。我與香港工業總會(“工總”)很歡迎政府擴大清潔生產伙伴計劃(“伙伴計劃”),以協助港商處理及減少污水排放。現時在廣東省內經營和設廠的港商不少是從事印刷、電子、玩具或成衣製造行業的，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或多或少均會涉及電鍍和漂染等工序。隨着內地對企業減排及環保裝置的要求不斷提高，港商面對內地升級轉型的政策，亟需政府在環保技術上對他們加以支援。

為配合廣東省工業園區化的政策，工總正與江門市政府合作，在江門市月山鎮興建“香港環保電鍍工業園”計劃，協助香港電鍍廠商進入園區，目標是園區能達到高標準的污水處理，成為內地環保工業園區的示範項目。我相信在伙伴計劃擴大後，園區內港商的中央污水處理設施將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所需支援。不過，我亦留意到特區政府未有確實提到會否為9,300萬元的伙伴計劃加碼，我也問過負責該計劃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知道現時清潔生產經費還有少許用於設計上的款額仍未用上，因此可以用於污水處理。我期望政府可以在伙伴計劃正式擴大後盡快審視計劃，並視乎企業所需及對伙伴計劃擴大後的反應，適時增加支援。

隨着全球各地均鼓吹使用具有環保元素的產品，消費者對產品有需求，而需求亦越來越大，政府只須讓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的港資廠商早點取得先進技術，便可以攻佔更多市場，產品亦會有非常可觀的增值額。港商的產品如果受歡迎，除輸往歐美等對環保產品有需求的先進市場外，亦可面向香港，令本地消費者受惠。

此外，局長應該明白，協助港商進入環保工業園區，不單能幫助港資企業，更可以藉着提升廠商的生產及減排技術，改善整個區域的環境。清潔生產更可保存珠三角完整的生產鏈。以電鍍為例，它便是很多生產線中不可或缺的下游部分，電子儀器、鐘表、拉鏈等全部也要用上電鍍的技術，趕走電鍍，便等於毀了區內的電子產品、手表、製衣、手袋，甚至玩具等的生產基地。

主席，我留意到這份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回收及循環再造行業。在我加入立法會後第一項議案是“環保回收工業政策”，當時是2005年2月。過了四年半，香港市民的環保意識加強了，外出會帶購物袋，但我們的回收行業仍處於收買“爛銅爛鐵”的階段，欠缺規管。我認為有需要加強管理，以提升本地環保回收產品的質量，將回收物件進行分類及篩選。

經篩選和處理的回收物件可以變成製造業所需的原料，塑膠樽可以拉成塑膠粒，廢紙可以循環再造成環保紙。此外，以電子產品為例，篩選出沒有損毀或損壞輕微的產品，進行簡單維修及檢查後，亦可向運作良好的回收產品發出認證，讓業界可於本地進行二手貨買賣，從而惠及基層市民。我希望當局確切考慮引入鼓勵性措施，同時從教育入手，鼓勵全港市民一起過更環保的生活。

主席，我亦想談談碳排放交易。談到環保產業，我們不能只着眼於香港市場。內地是全球最大的環保產業市場，單在協調發達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減排6種導致全球暖化氣體的清潔發展機制(即“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簡單來說，便是碳排放交易。在內地，相關的業務便涉及約800億元的生意額，是全球最大的市場。我們應抓緊機會。

我知道現時已有個別香港企業參與內地的CDM市場，亦知道有一間小型能源公司為內地水泥廠提供工業鍋爐節能控制系統。該系統除了在設計上減少生產過程所需的電力外，亦為水泥廠節省電力，更能收回生產過程產生的餘熱，將餘熱轉變成能源，達到發電的效果。由“廢”轉為有能電力，更可以再用於水泥廠，而這間香港公司還可收取額外電費。這做法由於可以直接節省燃料消耗及減少碳排放，故此便可以賺取碳信用額，交到碳排放交易所進行買賣。

正如我先前所說般，內地是全球最大的CDM市場，香港有專業人才從事節能減排系統的設計，更有適當的獨立單位及專才可以出任核實工作，加上香港本身已是一個國際級的交易平台，如果可以盡快發展一個與內地有密切關係的碳排放交易平台，將可以帶動香港不同的專業服務，讓銀行及金融貿易場可以進一步發展。

主席，環保產業不單可以為香港創富，更重要的是可以惠及香港，以至是整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香港過去的發展未及得上其他已發展地區，我期望政府可以用政策支持，帶領市民和企業走上綠色經濟道路。

我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譯文)：主席，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和未來發展，我們必須與廣東省合作，共建“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我很高興這項合作建議已納入《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列為重點發展策略。我亦知道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這項發展策略，並會爭取將之納入國家的“十二五”規劃，這是令人十分鼓舞的。

現在，越來越多國家，包括中國，對保護環境的工作給予高度重視。環保不單成為一種生活趨勢，亦逐漸發展成為一項過千億元的產業。兩年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通過了節約能源法。去年8月，我作為港區人大代表，出席了人大常委委員會會議，席上通過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決議，並就可再生能源法案修正案草案進行討論。

雖然祖國已採取各項措施應對氣候變化，但香港卻仍未制訂相應策略和措施處理相關問題，因為當局進行的顧問研究要待明年才能完成。中國現正積極推動使用可再生能源，目標是爭取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佔供電總量的15%。這項積極進取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與已發展國家所訂的有關目標不遑多讓。但是，反觀香港，當局所訂的目標實在過低，只是希望在2022年，可再生能源的每年電力供應佔有率達到3%而已。

中國國家領導人對於即將在今年12月於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給予高度重視。預料在大會上，發展中國家與工業國陣營將在多項主要議題上出現重大分歧。我在今年3月出席北京的人大會議時曾經表示，中國絕對不能接受工業國家所提出任何不公平、不合理的條款。

與中國相比，香港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的進度實在十分緩慢。港府至今仍只是探討如何增加天然氣在本地發電量所佔的比率，以減少碳排放。然而，我不主張過分依賴單一種燃料，因為若香港以外地方的天然氣供應出現問題，便會嚴重影響本港的供電情況。

其實，香港應探討由國內增加輸入核能的可行性。就此，當局應鼓勵更多本港公司投資國內的核能發展項目。事實上，大陸現時希望能夠在2020年，將核能發電的總容量提升到4萬兆瓦特，相當於全國發電量的4%。

車輛的廢氣排放是香港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政府現時提出推廣電動車輛的建議雖則起步較遲，但總算是朝着正確方向邁進了一步。但是，這方面的工作存在不少困難，例如電動車輛車速緩慢、一次充電後的行車哩數有限，以及車價昂貴等，均可能導致這個環保車種不能在香港廣泛使用，而充電設施不足亦會造成阻礙。因此，政府應與各有關方面合作，增設更多配套的充電設施。

另一方面，政府應考慮立法限制舊型號並造成嚴重污染的車輛在路上行駛，以及提供一次性的資助計劃，協助業界提早更換歐盟I及II型的商業柴油車輛。

另一項公眾日益關注的課題，便是香港日趨惡化的空氣質素。為解決這問題，政府必須拿出決心，盡快全面修訂早已過時的空氣質素指標，因為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是早在1987年已經訂立的。香港必須全面更新空氣質素指標，以符合最新的國際標準。此外，政府應積極與廣東省當局攜手合作，在檢討空氣質素指標之餘，實施控制排放的措施。政府亦應加快進行有關區域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的各項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公開予企業和市民參考。若然政府高層的決策官員缺乏遠見，並對其他各地的最新發展一無所知，有關工作便難以取得進展。

關於固體廢物的處理，政府實有迫切需要引進更先進的焚化技術。自香港在1970年代將大部分焚化爐關閉後，便一直主力依賴堆填區處理固體廢物。然而，由於土地供應有限，不斷擴建堆填區顯然並非一個可持續的方案。為了減輕當區居民對在區內設置堆填區的反對意見，政府應更努力宣傳現代焚化技術的優點，以便加深公眾瞭解。

過往的焚化技術有欠成熟，在焚化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包含二噁英及灰渣，造成極嚴重的環境問題。鑑於有關技術近期取得新發展，熱處理設施比過往的焚化爐更能符合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現時，不少先進國家已採用焚化方式處理固體廢物。在2001年，我曾參加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海外職務訪問，聯同其他3名委員考察歐洲的焚化設施，獲得很多有用的第一手資料。當地的焚化爐設施圍牆外建有民居，而居民並

不認為隔鄰的設施會危害他們的健康。事實上，這類設施很多都變成該國的旅遊熱點，吸引不少旅客前往參觀。如果其他國家能夠做到，我們亦應有信心香港能夠同樣做得到。

謝謝主席。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會先說一說有關周一嶽局長的部分，然後再說邱騰華局長的部分。

今年，豪宅樓價節節上升，我們先人住的地方亦不遑多讓，在靈位短缺的情況下，私人骨灰位的售價也不斷上升。他們佔的地方其實很少，但一個安放骨灰的靈位的售價卻可以是5萬元至20萬元，兼且要輪候很久。所以，一般小市民即使有心供奉先人，但面對這麼昂貴的靈位也只好望門輕嘆。此外，輪候公營骨灰位又不像輪候公屋般，房屋署會作出3年一定可以上樓的承諾。每次出售骨灰位都是抽籤，市民抽不到便是運氣不好，當局亦沒有作出承諾。有些街坊告訴我抽了數次也未能抽到，覺得很不開心。

大家都知道，而周局長亦曾在這裏回答湯家驛議員的質詢，就公營骨灰位來說，未來10年，我們最少欠缺20萬至25萬個，究竟如何解決呢？政府可以做甚麼？我們答應在地區上鼓勵多些人支持這項重要的工作。三十年前，先人大多數是土葬的，很少火葬，但政府一直推廣、鼓勵不要土葬，因為地方不夠，所以將之改為火葬。這項政策很成功，現在有八九成人選擇火葬，但卻出現了沒有地方放置骨灰龕的問題。我不知道政府還可以推廣甚麼了。現在，政府是推廣海葬，或把骨灰撒在一些紀念公園內。

我覺得海葬是可以再考慮的，政府可以推出更多活動，鼓勵市民把先人火葬，然後把骨灰海葬。目前，海葬要在數個指定地方進行，但我認為可以再行研究，物色多些地方供進行海葬，以方便市民。

說完我們的先人，我現在要說一說動物。我想這個議會內很少人會說動物，但民主黨一直有接觸動物團體，他們有很多怨言、很多苦水，因為政府 —— 漁護署說會實施動物售賣商牌照附加條件已弄了兩年多，但弄到一塌糊塗，然後又再進行諮詢，但仍是一塌糊塗。後來換了另一位負責的獸醫，情況好了一些。現在負責的獸醫是楊女士，但問題始終未解決，而最多爭議的是興趣繁殖者(hobby breeders)，這是最大的

問題。政府建議他們在同一時間只可以飼養兩隻屬同一品種、沒有絕育的母狗，這便是，然後，所繁殖出來的動物可任由他們自行售賣，不加規管。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因為政府要界定何謂興趣繁殖者已經很複雜，亦不可能監管他們，而且他們是在家中飼養，漁護署不可能進行巡視，以確定他們是否只飼養兩隻母狗或生產了多少胎。

所以，這個真空、漏洞很容易被人濫用，然後藉此謀利。此外，有些人立心不良，更把在內地出生的狗隻非法偷運來港。現在的確存在這種情況，以興趣繁殖者作為中轉站，偷龍轉鳳，把他們所謂因興趣而繁殖出來的小狗轉賣給寵物店，神不知，鬼不覺的。這些狗隻可能患有瘋狗症或其他疾病，但他們都不理會。所以，興趣繁殖者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規管過於寬鬆、執法亦太艱難。我希望局長……趁着漁護署更換了新署長，我覺得新人事新作風，應讓愛護動物的團體有信心與政府合作，做好監管的工作。

局長，另一個令人很頭痛的問題是，現在仍然出現蔬菜的真標籤假產地問題。民主黨完全不參與商業機構之間的利益糾紛，亦不參與要壟斷市場、必須進入批發市場等這些糾紛，我們只關心一件事，便是究竟內地是否有人非法把真的菜場標籤，張貼在產於其他非註冊菜場的蔬菜上，然後輸入香港呢？民主黨的區議員及助理最近曾進行跟蹤，發覺仍出現這種情況。當然，內地方面說這是無中生有，惡意中傷，或好像特首所說般是誣衊等，但我們的確有人跟蹤過，證實問題存在，幕後甚至涉及很大規模的貪污也不足為奇。然而，我們關心的不是商業利益；我們所關心的是市民進食的蔬菜的確來自香港註冊、容許其產品入境的菜場。

最後一點是中央屠宰。局長，談了這麼多年，到了今天，憑我的判斷，中央屠宰是不可行的。如果只有一個中央屠宰場，設在上水、粉嶺或其他偏遠地方，然後全港所有活雞、大陸的活雞都在那裏屠宰，只售賣冰鮮雞和所謂的鮮宰雞，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我們曾參觀馬來西亞、新加坡的中央屠宰場，它們並沒有鮮宰雞的概念，我根本不知道這是否可行。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每天要屠宰萬多隻活雞，是無法做得到的，根本無法生存、運作。我們現在已實施了“日日清”，全香港街市有售賣活雞的檔鋪其實很少，而實施了“日日清”後，基本上已經沒有病毒，我認為只要進一步監管、不放鬆，現在的模式是可以繼續下去，無須實行中央屠宰的。

現在轉轉話題，我想跟邱騰華局長討論一下。我希望邱局長可以很認真、小心地監察家用石油氣的滯後問題，尤其是入口價格便宜了，但卻無法令人獲益，這是我們所憂慮的。燃油已經說了很多。車用燃油的價格經常被指責加快減慢，家用石油氣雖然少人關注，但其實存在更大的問題，因為其透明度更低。目前還有21萬個住戶使用中央石油氣，他們大部分居住在公共屋邨。他們不能更換供應商，也不能轉為燒煤氣，更不能燒火水，因為他們被規定使用中央石油氣，是無法選擇的。家用石油氣的定價方式相當複雜，很不透明，我們很難監察，只能靠政府監察。在從外國入口時，如果石油氣價格下降，油公司究竟會否很遲很遲也不降價，仍然保持價格高企？這等於我們的豬隻，如果批發價每擔是800元至900元，而零售價卻仍然是三十多元一斤，那就不對了，但這情況仍然出現。石油氣亦然。所以，我希望邱局長監察家用石油氣，留意我們21萬個住戶有否被油公司欺騙。

我舉行了6場諮詢大會，亦出席了4場粵曲、嘉年華會，有很多阿婆、阿伯出席。我問了他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便是有多少人家中是正在使用光管的？每一次開會，最少有達30%至40%出席者表示他們正在使用光管——他們家中只使用光管，另有部分人是在廁所使用光管，客廳則使用電燈膽，即混合使用。他們有些是只用光管，即一支直身的那一種，最便宜的是每支十多元。他們使用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省電、耐用，一兩年也無須更換。OK，他們其實是以省電和省錢作為原則。他們說如果要以100元更換電燈膽，他們是不可以那樣做的，因為家中使用的是光管。

局長，我詢問了一些電燈師傅，得悉如果要上門替居住在屋邨的阿婆、阿伯，或在領匯轄下商場經營的小商店更換，他們要收取150元至200元，以便把光管座拆掉，換上電燈膽座。他們有些收取150元，另一些則收取200元，電燈膽的價錢還未計算在內，須另外購買。於是，那些阿婆、阿伯說，儘管政府給他們100元，他們卻先要付出百多二百元更換電座，才能用得上那100元的消費券，然後又要被加電費，似乎沒有甚麼得益。局長，他們都是領取綜援，十分窮困的，怎麼辦呢？他們說打死也不會用，還請我跟局長說這項計劃行不通，因為他們用的是光管。局長，你有否關顧這羣人呢？

局長，拜託你，社會上有一羣窮困的、低收入的人，他們大部分屬於我九龍東的選區的市民，區內最多的是窮困長者。KK應該很清楚，他也有份出席居民大會的。請勿說我騙你，我相信KK可以證實。那些

阿婆、阿伯很動氣，指慳電膽券對他們沒有用。我認為政府推行這項政策是好的，但請局長真的要優化、改善政策，讓他們可以接受這項政策，不要令一項環保政策在推出後，落得慘淡收場。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皇發議員：主席，為了促進香港採用清潔能源，減少碳排放，政府現正研究推廣電動車輛的策略和具體措施。環境局亦已與多家電動車輛製造商合作，為本港市場供應電動車輛。與此同時，政府當局考慮了資助專營巴士公司提前淘汰車隊中的歐盟I期及II期型號巴士，改用歐盟V期巴士，以降低廢氣排放量，這些無疑都是值得支持的舉措。

為了進一步更徹底地在這方面推動環保，我認為政府可考慮在九龍半島空氣污染較嚴重的地區，例如在九龍荔枝角美孚新村以南至尖沙咀的路面，建立使用架空電纜的無軌電車系統，以逐步取代巴士的服務，而現有的專營巴士公司則可獲准承辦有關的電車服務。眾所周知，無軌電車的技術成熟穩定，而且全無廢氣排放，應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市區的空氣質素。此外，電車沒有使用燃油引擎，其排出的熱量遠較使用燃油的車輛為低，對於改善本港的熱島效應問題肯定有幫助。

此外，凌晨至清晨時份是耗用電力的低潮期，但電廠仍要讓發電機運作。這些無法避免的運作既浪費資源，又必然排放廢氣。現時一些地方，例如北京，已經使用蓄電池的巴士，所以港府可以考慮規定建議的無軌電車加裝蓄電池，讓電車可以晚上回廠充電，在日間則先行使用蓄電行走，然後才轉用架空電纜的電力，這樣就可以利用晚上原來浪費的電力，變為日間有用的能源。

主席，本港現時廣泛使用的冷氣機排放大量廢熱，增加香港市區的溫度，政府應該考慮要求本港大學的科研體系，全面研究如何收集這些廢熱，特別是使用中央系統空調設備的工商業樓宇、酒店和政府大樓所排放的廢熱，將之變為有用的能源，例如用來提供熱水等。

此外，本港的日照充足，當局可考慮規定商業大廈受陽光照射部分的外牆，在每一樓層的下半部分均加裝太陽能電池，發電供給自身使用，這樣既可減低對燃料發電的需求，減低空氣污染，又不會阻礙大廈內人士觀望外面的景觀。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今天在這個環節裏，我會特別談數項議題，首先是關於保育中環。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保育中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但我則有數點意見，希望局長——雖然她今天抱恙，但我希望她盡快康復——可以細心聆聽。

首先，是關於中環的中央街市。這次交由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負責，而我也是市建局的非執行董事。很多朋友都不想計劃交由市建局負責，因為同事剛才也說過，市建局過往的紀錄真的是不太良好，希望它這次會洗心革面，可以“洗底”。我認為有數項是可以作為“洗底”行動的，例如我希望可以參考保育政府山的做法，進行一項詳細的文物歷史評估。雖然中央街市屬於三級文物，但始終也有其歷史意義。最近，有朋友有機會進入中央街市，發覺裏面仍然保留着一道很美麗的樓梯，但此樓梯大有可能會被拆掉，此外還有些很美麗的肉檔。有些檔位的編排其實相當不俗，而且保存得宜，並非一如外界所說般出現石屎剝落的情況，而如果真的出現石屎剝落的情況，我們也可以修補，但我覺得有些位置是應該予以保留的。最好的當然是可以引發大家對這個項目的注意，無論是在香港或全世界，所以我很希望可以舉辦一個公開的設計比賽，這樣不單其外殼，甚至連其內容也可以成為富地標色彩的樓宇。

此外，便是關於政府山了。在公民黨初成立時，最積極進行的要算是保護政府山的工作。我們現時大有可能會失去政府山的西座，而由於很多朋友現時的辦公室均在西座，所以很希望可以予以保留。很難得，這次也找來了負責整個警署羣的專家，進行了十分詳細的歷史及建築價值審評，當中詳列了整個政府山內每一座樓宇的歷史意義以至建築特色等，並有很詳盡的分析。他們在第5部詳述了有關的評語，特別是其中一項，我希望政府不要只跟從其中某些部分，但又不跟從其他部分，即只按建議拆卸西翼，因為他們特別在這裏表示希望可以保留多幢樓宇之餘，更希望可以將之變成一個“特別保護範圍”，當中包括甚麼樓宇呢？計有香港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香港禮賓府花園、中區政府合署用地、聖約翰座堂與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之間的花園、砲台里一帶和聖公會用地。這裏表明很希望把這一帶劃為“特別保護範圍”。這只不過是開始而已，因為整個中環舊城區的歷史其實相當悠久。我很希望政府最低限度先行這一步，有某些做法會參考這份報告的建議，而不要只跟從其中某些部分行事。

此外，我昨天也提過五號用地，但可能由於局長抱恙，所以仍未作出回覆。我們很幸運，最後可以壓低中環海濱的發展面積和高度，讓我們仍擁有一個海濱。不過，聽說政府會把發展地積轉移至灣仔北的五號用地，希望政府可以盡快交代一下，因為該地帶本來是劃作社區用途的。

說罷保育中環，我接着會談談藝術範疇。大家都知道西九的，我昨天也提過，我對西九感到非常憂慮，因為現時的領導人政務司司長連中小型藝團的名稱也說不出來、也弄不清楚。他提過我們的進念，幸好進念屬於九大藝團，仍然獲得一些資助。可是，就着整個西九項目，我對有些事情是不吐不快的。我在最近一次召開的西九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說過，政府的諮詢文件的內容，特別是在小組委員會進行討論時發現其中一些是不着邊際的，連廁所要有哪些設施也納入其中。經提出後，我看到最近提交的新文件已刪去那一段，但互聯網上卻連原本在會議上討論的議題和問題也一併消失了，原因是時限已過，故此已被取代。如果西九項目是要公開諮詢，並可以從互聯網取得資料的話，那麼諮詢委員會曾經公開討論的文件既然曾經上載互聯網，為何又被移除呢？我至今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說回西九資源方面，我們得悉差不多全部皆投放在硬件上，那麼軟件的培訓，便真的要倚靠曾德成局長的政策局，即民政事務局的努力了。在進行諮詢之餘，我知道民政事務局其實也在進行一項研究，是關於藝術教育的。據知，數年前亦曾就同一主題進行研究，但該報告發表後卻被擱置一旁，其後並沒有據之進行任何政策研究。現在相隔數年，又重新開始。我很希望這次真的可以跟教育局一起好好研究，因為藝術教育是根，我們的價值觀、對藝術的看法、美感，甚至我們的包容、一個人民的素質，便是從藝術教育開始的。我很希望不單是中學，連小學也有機會接受藝術教育，從而一代一代地培育一些可以參與藝術表演和管理人才之餘，也可以培養我們的觀眾。

此外，我想恭賀香港政府成功爭取粵劇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過，聯合國教科文有一項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約，很清楚地列出在一個締約國的遺產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後所應遵守的責任。其實，單是保護的層面已有很清晰的說法，便是要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特別是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早前，我在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聽過有關局長的看法，便是可能會就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立法。我很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就粵劇的承傳進行一項詳細的研究報告，因為我以往也看過類似的研究，但那是由私人提供的資金邀請一位大學教授進行的詳細研究。在這一刻，我認為一項詳細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粵劇一直面對永久場地的問題。我明白最近政府已經很努力，但由於油麻地等地方本身已有其局限，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可以就着永久場地、培育人才(因為現時很多大老倌已一把年紀)，以及研究是否有成立一個香港粵劇團的需要和所涉的資助模式，可否做得更有規律、更有規範及更有規模。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一方面多加研究，這是我們如何長遠保存粵劇，並繼續與外國甚至中國其他地方交流的一個良好平台。

關於體育政策，聽說我們的同事霍議員最近建議不單舉辦東亞運動會，還要舉辦亞運會。老實說，我聽了之後真的是又驚又喜，驚的是早前舉行的亞運會有很多不同的新聞，包括跑步場地變了阻礙賽場地，跑道凹凸不平，還有游泳池的天花塌了下來。我知道將軍澳運動場最近重新開放，雖然跑道鋪平了，但又輪到起跑的計時鐘壞了，累得運動員要曝曬半小時才可以起跑。比賽尚未正式開始便已弄成這樣子，我很擔心在正式比賽時是否仍會出現這些“蝦碌”情況。我們現已進入超級倒數階段，尚餘不足100天，希望政府可以盡快研究所有場地，確保所有場地皆可以應付東亞運動會的比賽。因為大家都在期待劉翔駕臨我們的田徑場地，對嗎？由於大家的期望甚殷，因此對政府的要求也會較高，還望不要介意。

對於體育政策，我相信香港人仍有一顆心。上星期，我的辦事處內差不多所有同事均往觀看南華足球隊的比賽，全場爆滿，一片紅海，他們都非常興奮，而鄰近商戶的生意更飆升三成。我希望政府會有長遠的體育研究，雖然我以往也有觀看足球比賽，現在已不常看，但我也有參與政府早前所進行有關香港長遠足球發展的研究。我希望可以盡快看到有關的報告，也希望香港金牌選手的人數會越來越多，可以繼續在世界各地的運動場上發亮發光。

謝謝主席。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建聯就施政報告的環境政策發言。

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可說是在特首眾多份施政報告中，環保議題最引起公眾關注的一份，全靠一個電燈膽。平情而論，更換慳電膽計劃是施政報告中，派給市民的一小粒糖果，方向是正確的，但卻鬧出如此大的風波，轉移了大家對環保和節能的視線，這確實非常可惜。

在推動節能和減排的大前提下，民建聯不會反對更換慳電膽計劃，但認為計劃有很多地方需要優化。首先，雖然這項計劃是由電力公司派發慳電膽現金券，但原來電力公司可透過增加電費，收回有關成本。一些有環保意識的市民，好像我一樣，家中早已經全部轉用慳電膽；而一些低收入家庭或公屋住戶，他們在家中並非使用慳電膽，而是使用光管的。剛才也有議員說過，如果這些市民要改用慳電膽，便要花數百元來更換慳電膽系統。因此，他們是不會更換的。慳電膽現金券對我們這些更換了慳電膽的人，或對於公屋住戶來說，可謂“得物無所用”，但大家卻要承擔更換慳電膽後電費增加的後果。

因此，主席，令市民很不滿的是，政府在整個計劃上好像不用分文，但又沒有向市民清楚解釋增加電費的理據。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在推出計劃之前，考慮有欠周詳。民建聯認為，政府不應只限制市民把現金券換慳電膽，而可以考慮購買其他節能產品。更重要的是，我們覺得有關成本不應由市民負擔。政府經常呼籲市民做多一點來節能和參與環保，但每件事卻要市民自掏腰包。為何政府不能多拿一些誠意出來，例如這100元由政府或電力公司來支付，這是否可行呢？不要每次都是由政府請客，卻由市民付錢，慷市民之慨。

此外，市民使用現金券購買慳電膽後，更換出來的鎢絲燈泡和光管應如何處置呢？政府有否訂下詳細的回收方案，還是任由市民隨意丟棄那些鎢絲燈泡呢？其實，這也會造成一種浪費和污染。所以，我希望局長在未來1至2個月內，多聽取市民對更換慳電膽計劃的意見和具體想法，並加以接納。

主席，更換慳電膽，其實只是家居節能中一個小部分。市民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民建聯在施政報告諮詢期間，亦曾向局長提出推行“碳積分計劃”，只要市民的用電量按月減少，就可以得到“碳積分”。這些“碳積分”可以用來繳交政府費用、電費、水費、差餉，甚至用以租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場地和設施等，形式與我們現時使用的超級市場積分卡相似：慳得多，優惠越多。這樣才可從根本上提供誘因鼓勵市民，持續落實家居節能。

民建聯積極提倡家居節能，是希望市民可以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盡一分力。其實，早在施政報告公布前，政府已就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展開諮詢，並提出19項具體建議和措施。

當時大家都擔心，單憑邱騰華局長一人，在落實起來會否有困難，其他部門在協調上又會否有困難呢？然而，施政報告現在提出，將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有關工作，我們表示歡迎，因為這樣顯示政府對解決空氣問題的決心，並將工作提升到一個較高層次。

雖然政府現時提出本港空氣質素的新指標，與世衛的標準仍有一段距離，但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有決心告訴市民，它能夠帶領香港市民邁向世衛標準的最終目標，並訂出時間表，讓市民知道。

至於諮詢報告提出的19項措施，當中涉及不少成本，巴士公司和電力公司更可能因此要加價。民建聯認為，改善空氣質素不只對市民健康

有利，亦可創造更佳的投資環境，減少醫療開支。所以，有關的成本開支，不應全部轉嫁予消費者，即市民身上，而是應該由政府、企業和市民三者共同攤分。

主席，在19項措施之中，其中1項較具爭議性的，涉及巴士路線的重組。在過去數年，這事在地區上一直遇到很大阻力。巴士提供點對點服務，吸引不少市民乘搭，亦方便市民上學和上班。如果局方真的要重組巴士路線，我們認為必須先作出深入研究，包括統計乘客量和上下車的位置，提供足夠數據說服當區的區議員和區議會，接納有關建議。

當然，在採取削減路線這個如此極端的手段前，其實還有其他較好或是中間路線的方案，局長可以考慮，例如現時成效不錯的轉乘計劃。在城門隧道的轉車站為例，市民可免費轉乘其他巴士線，到達他們的目的地。此外，我們經常提及的低排放區，以至更換環保巴士的資助計劃等，均可考慮。當局實在無須一開始便去到極端，經常對區議員或地區的市民說要削減巴士線，這是難以接受的。

主席，我想用少許時間說說地質公園這項議題。我們很高興知道香港的地質公園，能夠升格為國家級地質公園。事實上，民建聯早在2005年已經與個別地區團體倡議在本港設立地質公園，其間曾邀請內地很多地質專家來港考察，亦提出多份建議書，又曾在立法會由張學明議員提出議案辯論。雖然政府最終沒有全盤聽取民建聯的所有方案，但我們的方案確已融入政府現時地質公園的建議之中，這是有目共睹的。

本港可以擁有國家級的地質公園，標誌着我們在自然保育方面的成就獲得肯定。政府在現階段應着手設計導賞路線圖，以及制訂旅遊管理計劃，協助旅客瞭解及認識這些獨特的地理地貌。當局同時亦要作好準備，藉着中央政府的協助，積極考慮向聯合國申報香港地質公園成為世界級的地質公園。

此外，主席，我也注意到最近中電在西貢對出的海域，計劃興建一座大型風力發電場，這事引起了區議會的關注，它擔心這項計劃影響附近一帶的景觀，亦可能影響香港申報地質公園成為世界級地質公園。我們當然會支持發展可再生能源，但在選址方面，希望局長小心進行審批，特別是這個風力發電場計劃，不要令我們本可擁有世界級的地質公園，但因為興建風力場而白白浪費了機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政府預先張揚施政報告的主力是六大產業，主席也會記得，經機會推出這項建議後，政府表示細節會在施政報告中發表。他邀請所有不同黨派議員跟他會晤，介紹施政報告時，亦要求我們就六大產業提供意見。所以，主席，大家的期望很大，因為雷聲隆隆，以為有很多政策會出籠。公民黨尤其支持環保產業，因為早前討論綠色經濟時指出，在金融海嘯下，有很多人失業，所以要製造就業，要處理環保污染，最好是一箭多鵠，便可以推出環保產業，製造很多綠領工作，又可幫助改善香港環境。

所以，我在今天的環節，特別想討論這個雷聲很大的環保產業。如果大家有施政報告在手邊，可跟着我翻到第10頁的環保產業，看看政府有何措施。在討論環保產業轄下的3項措施前，我特別想提到陳淑莊昨天發言指出，六大產業變為六大地產業，事實上，我們看見很多產業都涉及政府撥地，即使把工業大廈活化，也是討論土地。

在今天或昨天，聽到很多同事發言時表示，只討論土地是沒有用的，不能只說硬件，也要談談軟件，要有很多配套。即使很多平時支持政府的同事，看見政府討論關於六大產業的細節時，也在這個問題上感到失望。

翻到施政報告第10頁，可看見環保產業下有3個項目，第一項是清潔生產伙伴計劃。同事都記得，這計劃其實在2007年開始討論，在提出六大產業前，於2008年4月獲立法會批准撥款9,300萬港元，目的不是討論環保產業，是因為一些港商在內地生產時，要配合內地方面的環保措施，政府便從基金撥款9,300萬元，協助於內地營商的港商符合一些內地法規，符合內地的環保法規要求。所以，這是舊料，在金融海嘯前已討論過，絕對不是因為六大產業而有新措施推出。

第二項是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其內容是甚麼呢？該段指出，全球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中，三分之一在內地展開，接着指出，最近政府成功爭取讓符合資格的港資企業到內地開發。我經常以為只有政黨才說成功爭取，但政府也說成功爭取，成功爭取甚麼？是協助港商在內地找商機，這絕對不是在香港發展一些環保產業。

第三項是甚麼呢？主席，第三項是政府環保採購。這也是很早前已討論的，對不起，不是當局指六大產業內有環保產業，所以說到考慮如何協助發展，所指的又是一些舊料。還有，主席，很諷刺的是，環保採購這項之下的第39段指出，政府率先在今年採購10輛電動車。主席，我不是反對電動車，我知道邱局長很努力發展和推動電動車，但政府一方

面向我們說推動環保產業，而另一方面，卻是局長到日本或到別處購買電動車。我剛剛前兩天看見報章報道，香港產品MyCar的發言人很酸溜溜地說，香港政府表示推動環保產業，但說到購買電動車，則不是購買本地的設計或發展產品。

討論環保產業下的這3段文字是很短的，究竟政府有何措施發展本地環保產業呢？如果說環保產業，我會想起推動環保園，這是很重要的。但是，主席，我想告訴大家，我手邊拿着一份10月23日的報道，指施政報告發表後，環保園租戶“嘆無得做，缺回收人手”，即沒有人手工作和場地，兼且沒有補助。這份報道是指，政府提出大力推動六大產業，但接受訪問的環保園內的租戶，則表示看罷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及環保園。

我想告訴報章內環保園的被訪者，我看過整份施政報告，甚至連施政綱領也看過，報告內是怎樣提及環保園的呢？主席，施政綱領第37頁提到“監察環保園第一期及第二期的發展”。怎樣謂之“監察”它的發展？首先，如果看過有關報道，便知道它根本沒有發展。環保園在2006年時計劃投入服務，但至今仍未有租戶正式運作，環保園第一期由於支援不足，有不少租戶離場。接受訪問的一位環保園租戶表示，特首的施政報告沒有提及他們，令他覺得很灰心。他覺得香港廢膠回收量低，欠缺回收場地，又沒有中轉站處理，那麼，如何運往環保園循環再造？唯一做法是全部運往堆填區。另一位租戶亦指出看不見前景，如果政府再不推出政策，只會是迫人離開這行業，商人完全無法參與。他建議政府成立部門積極跟進，給予實際的答覆，如果情況持續，他說不排除會終止環保園的合約。

我知道政府亦有協助回收業，聖雅各福群會和仁愛堂便是例子，它們一個是回收電器，另一個是回收塑膠的。然而，它們根本未能收回成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資助，這些志願團體便不能做到回收工作。

主席，如果要在香港發展環保產業，我相信大部分人覺得香港的廢物處理有很大問題，有需要由政府看看能如何發展回收行業。但是，政府真的完全沒有提到。以前，我在這個議事堂亦曾多次提出，如果要認真處理這問題，便要考慮發牌，而不是讓一些老人在街上拾荒，這樣實在難以發展環保的回收行業的。

此外，政府亦要發展生產者責任制。立法會每次討論這些事情時，主席，都是沒有進展的，但我感到很奇怪，當政府說要推動環保產業，而我們又很支持的時候，我們便期望施政報告是有“料”的，能有措施和配套協助。可是，很可惜，施政報告卻完全沒有。

主席，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到固體廢物處理方面有新猷。第71段和72段提到，由於廚餘的數量繼續上升，所以特首建議興建回收中心處理工商業廚餘，並進一步減少廚餘和減少即棄飯盒。環境局會聯同教育局邀請全港學校簽署環保午膳約章，這是我們提出已久的建議，主席，但規模卻很小。施政報告提到的廚餘回收中心，據我理解，也許局長稍後可以告訴我，每天只可處理200公噸廚餘。可是，香港每天出產的廚餘有3 310公噸，究竟這問題可如何處理？對於這個雷聲大的環保產業，我們是否對政府期望越大，失望便越大呢？

此外，就環保方面，施政報告第18頁及第19頁還有提述，第18頁開始時提到低碳經濟，第一句是“政府十分關注氣候變化”。我們看到後感到很開心，因為年底將舉行哥本哈根會議，究竟政府會怎樣做呢？其實，我們在環境事務委員會亦詢問過很多次，就哥本哈根會議，究竟政府會推出甚麼措施。我們在11月2日將舉行事務委員會會議，雖然議程上有提及，但政府仍然沒有告訴我們其立場。翻閱施政報告，得悉年底將舉行哥本哈根會議，但政府會如何關注氣候變化呢？施政報告指政府“去年展開了顧問研究，制訂全面的策略及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顧問研究預計可於明年初完成”。然而，年底便要開會，報告要明年才完成，才會發表其立場。主席，這是令人十分失望的。

主席，同一段亦提到減低碳排放的目標，所提的措施真的令自己也感到沉悶。政府在提到減排問題時，永遠都是以能源強度作為指標，但這個指標其實是假的。政府經常指已減低了能源強度，但亞太經合組織的指標跟《京都議定書》的世界指標完全不同，是另一回事。就《京都議定書》提出的世界指標，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已發展的地區，所說的應是總排放量，因為經濟一直增長，總排放量便一直上升。香港在2003年的碳排放量是4 380萬噸，2004年是4 410萬噸，2005年是4 450萬噸，2006年是4 590萬噸，2007年是4 670萬噸，所以，可見是逐年增加的。由於我們的經濟有所增長，所以碳排放量亦隨之增加。然而，政府從來不會這樣說，施政報告第62段沒有提及這資料，只一直說是降低，但所說的是能源強度，以一個假指標說明做得很好，卻不告訴香港市民碳排放量一直在增加。

主席，第63段提及的是一些舊資料，例如去年跟國家能源局簽訂了合作諒解備忘錄，把天然氣發電比例由現時28%提升至50%。其實，這些資料已多次提出，但施政報告仍然未有時間表，究竟何時才做得到？我們曾詢問多次，但至今還是未有時間表。

主席，第64段及第65段亦是舊資料，第66段才是新資料，便是提出慳電膽措施。主席，第66段及施政綱領提到派發100元現金券，但從來

沒有提過會加電費，只是在翌日，即在星期三發表施政報告後，星期四的報章才鋪天蓋地引述政府消息指會加電費，四人家庭會增加24元。主席，問題便立即出現，很多人問，為何送100元現金券卻要加電費？我在隨後一天(星期五)立即寫信給特首，指出這做法是不行的。雖然公民黨的確曾建議推廣採用慳電膽，我們不單建議政府這樣做，甚至公民黨的朋友都在地區派發慳電膽或交換慳電膽，但政府不能因此而容許加電費的。

我作為環境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亦邀請秘書致函局長及將副本抄送兩間電力公司(“兩電”)，指出兩電不能因此而加電費，因為根據利潤協議，就加電費是要提出申請的，不能預先“打同通”而批准，有需要向行政會議申請和批准，而且這是經常性的開支，而不是一次過的“派糖”措施。況且，這做法亦不公平，剛才很多議員都有提及，尤其是商界的朋友，指政府如果要“派糖”，但為何付款的是商界，要由商界資助派發100元的慳電膽券？其次，電費是一律調升的，但100元慳電膽券只向住宅用戶派發，這是不公平亦說不通的做法。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問題，例如很多同事提及的，如果家裏採用的是光管，情況又怎樣呢？我們亦收到很多類似的投訴，政府所派的慳電膽可以送給別人使用，但所加的電費卻不能轉為由其他人繳付，所以，問題是由政府引發的，也不能說這是公民黨或其他綠色團體提議的，因為沒有人提議推出使用慳電膽是要加收電費的。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主席，這種做法是對“三無”人士不公平的。有些人沒有領取綜援，沒有公屋，亦沒有自己的電錶，部分人有支付電費，但沒有自己的電錶，因為他們是租客或住在板間房。可是，他們均須繳付增加的電費，這對他們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施政報告在星期三宣讀後，我在星期五已經寫信給特首，我建議特首一定要優化，現金券應該由政府派發，不可以由電力公司派發，不應該任由電力公司加電費。此外，亦應提供一些彈性，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慳電膽的。市面上其實有很多節能產品，包括LED射燈，但LED射燈不是人人都能使用。還有很多智能插蘇，局長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也用智能插蘇，還給了我一個插蘇。此外，智能拖板一click即可。順便提一提，那些使用綠色產品的朋友經常向我投訴，這類產品在外銷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但要政府購買則很困難。我不知道政府的綠色採購可否多購入本地生產的環保產品。這幾天 ——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 在機場展館有一個環保的綠色產品的展覽，我不知道局長會否前往參觀以作鼓勵。我呼籲局長在我們的施政報告會議結束後，星期六到機場的展覽館看看這個綠色產品展覽。我看到局長點頭，局長，你應該鼓勵他們，因為他們經常投訴政府的綠色採購不讓本地產品受益。這不表示這些產品不好用，因為它們大部分的外銷情況的確很好。

主席，施政報告第67段談到推廣電動車輛。同樣地，我不是反對政府推廣電動車輛，但他們的推行手法，不知道是否真的在每次政府“派糖”或落實措施時，往往會引起問題。例如電動車是跟電力公司合作，由它們購買後，再租出來。不知道這又會否給予電力公司一個加電費的藉口，表示公司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局長是要留意這點的。

此外，第68段有關空氣質素指標。主席，這又是令人失望的，因為這段說，所訂定的新空氣質素指標，與其他先進國家如歐盟和美國等相若。但是，如果看看二氧化硫和懸浮粒子，這是有關目前政府建議的中期目標，而這個中期目標一是給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使用的，所以這是令人失望的。我們公民黨其實是建議設立一個60億元的路邊清新空氣的基金，幫助不單是商營的車輛。政府撥出32億元幫助營業車，把歐盟前期、歐盟I期的車輛轉換，但到目前為止(計劃於明年3月到期)，只用了5億元而已，其實還剩餘很多撥款。我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現時還有很多歐盟前期、I期、II期的巴士。如果歐盟II期的巴士要到2019年才更換，那實在太遲了。因此，我們公民黨建議，政府要設立一個60億元的路邊清新空氣基金，以幫助更換巴士。對於那32億元的計劃，如果很多人也不感吸引的話，政府應考慮以市價購入一些舊的車輛，斷絕路上有這類舊而產生污染的車輛行駛。

主席，總的來說，我們公民黨曾提出很多環保方面的建議。我知道局長是吸收了部分建議，但仍呼籲局長在落實時要小心。同時，我留意到一點，我希望局長稍後能給我們答覆，因為我們在公民黨的綠色經濟中提議採用堆填區的沼氣。當我在兩星期前從報章上看到，局長跟煤氣公司商討建廠，利用沼氣造再生能源時，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但我看到這份施政報告卻完全沒有提及。我把施政綱領從頭到尾讀過3遍，主席，但亦看不到有提及跟煤氣公司商討利用沼氣造再生能源的資料。我不知道這建議是否無法落實，還是它其實是可行的，只是被遺漏了而已。我希望局長稍後給我們回應，為何報章有報道這建議似乎是可行的，但報告中卻完全沒有提及。

主席，我希望在這問題上，政府真真正正能落實這項環保產業，並希望在配套、發牌，尤其是回收方面，能多下工夫，也可以參考我們在綠色經濟方面的意見，但要真真正正參考，而不是抄一些、不抄一些，就正如慳電膽的建議一樣。

黃容根議員：主席，對於施政報告，我原則上是支持的，原因是甚麼呢？因為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數大產業，它提出總比沒有提出好，有做總

比不做好，如果事事都不做，我會覺得很悲哀。所以，我希望政府要在行動上落實，認真地研究怎樣做。

主席，最近馬爾代夫這個被稱為全球暖化最大的犧牲者，舉行了全球首個水底內閣會議，藉此向各國反映暖化對全球各地的威脅。雖然不少科學家及環保人士都指出現代農業是全球暖化的施害者之一。其產生的碳排化佔總量超過一成，原因是現代農業使用大量由石化燃料生產的肥料，禽畜所產生的排泄物沒有適當處理，以及新鮮食物長距離運送時，交通工具所產生的廢氣排放等，但農業也是全球暖化的受害者，氣候變化引起的水災、旱災，以及颶風等肆意摧毀農作物，令農業產量劇減，推高糧食價格，也引至饑荒問題日趨嚴重。

然而，全球農業已進行自救，開始步向低碳發展的新趨勢，重點是減輕化肥、化學除草劑的使用量，採用有機種植方式生產。聯合國環境計劃署所倡議的“全球綠色新政”中指出，有機農業藉由減少使用石化製品並增加土壤的碳固定量，每公頃會較現行農法減少48%至6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況且每公頃的土壤，還可多封存3至8噸的碳；而美國羅德島學院的研究則指出，如果將美國1萬個中型農場轉變為有機種植，光是土壤中所增加的碳固定量，便相等於120萬輛汽車使用年限內所排放的碳。

當然，以香港的農業規模絕對不可與美國相比，但並不表示香港有機農業種植沒有市場。香港市民日益要求“食得健康、食得環保”，因此來自本地、省卻長途運輸的有機農產品是有很大的需求。以往我曾在本會提出，香港有不少有心人士想將香港農業再植根，但政府的政策未能配合，也未配套得上，又缺乏專門的人才，沒有完善的銷售渠道及產品標籤機制，所以如果政府真的想香港再“綠多一點”，政府必須制訂更多政策幫助有機農業。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同時，農地的保護對環保的功能也是十分重要的，歐盟在4月發表的農業調適白皮書中認為，應強化農地身為“綠色公共建設”的功能，以發揮農業在集水區管理、棲地復育、多元化景觀的角色。香港在真正的農地保護極為不足，往往被人利用作非法傾倒建築物廢料，因此要發展具環保元素的農業，香港也須完善相應的法例和加強執法力度，才可令農地恢復生機。

代理主席，除了農業外，我也想談談禽畜業。現時本地只剩下20至30個雞場及四十多個豬場，這是本港禽畜業僅有的財產，也是最後一個須予保護的部分。政府現時卻計劃連這剩餘的部分也封殺，我相信如果將來香港發生禽畜疾病和疫病變種，我們是無法適應的。因此，政府在保護市民健康時，亦要考慮禽畜業對市民健康所起的作用。此外，政府一方面常常說環保，但另一方面，卻讓很多汽車不斷把活雞、活豬運送到港，如果本地有生產，而發展又不俗，為何不可取代這些入口禽畜呢？所以，我希望政府重新考慮農業及禽畜業的政策，並應作出改變。

代理主席，我想談談漁業的發展，隨着全球對海洋資源的管理不斷收緊，捕撈業經營越來越困難；香港也不斷以保育海洋資源為借口，收緊捕魚範圍，但政府永遠只談收緊，從不就漁民的生計考慮，提供一些轉型的選擇。我想借此機會再向政府提出兩項建議，首先是有關發展水產養殖業。政府應如何分析水產養殖業現時逐步超越捕撈業這個全球發展趨勢呢？香港應如何自處呢？我日前與漁護署剛聘請的專家開會的時候，聆聽了一個從不察覺的道理，由於現在所有魚類均由外地輸入，香港的海洋生態日後遭受破壞的程度會比現時更嚴重，原因是無人捕魚，無人知道海洋變化的巨大，連海洋是生是死也不知道。所以，將來的後遺症會很嚴重。以我所見，政府多年來都沒有眷顧香港的海洋，以環境局為例，對海洋污染和變化又做過甚麼呢？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重新檢討。我早前親自與該專家出海考察，證明他的想法與我的理念有很多相同之處。

第一，偌大的海洋擺在眼前不加善用，又不可以養殖水產。至於養殖水產，該專家提出多重養殖方法，這是政府從來沒有提及，也完全不認識的。所謂多重養殖，舉例而言，經過貝類調養後可淨化海水。我日前與邱騰華局長談論一件事，布袋澳有一位漁民，為了要養殖海膽，在香港水域與內地漁民爭奪海膽苗。取得海膽苗後，便放在自己屋前面的小灣中養殖。我也看過那個小灣，那裏原本沒有海藻，甚麼也沒有，但當養殖的數萬隻海膽苗長大後，海藻多了。局長，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帶你去看看，連小魚也多了。我曾經建議在塔門及西貢水域搞養殖業，那麼如果我們要吃海膽，香港也可生產，而且魚類及海藻也會增加，屆時，曾經馳名香港及東南亞多時的塔門鮑魚也會再次出現。但是，政府竟然對這些產業視而不見。其實，海魚養殖業是多元化的，並非只是養數條魚以維持的生計問題，所以我覺得政府應重新考慮。

不過，我很高興漁護署及局方真的聘請內地專家來港進行研究，希望政府不要中斷這些計劃，而且這些專家也不單進行考察，更會教導漁民防治魚病及如何用藥。我希望漁護署或局方在這方面多做工夫，使養

殖業有多元化的發展。此外，我想談談元朗的一個奇景，便是西部通道下面的養蠔業。我覺得政府應該重新規劃這地區的養蠔業，使市民可以在這地區吃蠔，而且會吃得開心，吃得健康。這便是我其中一個要求。

第二，便是政府常說的休閒漁業，我已談了多時，政府從來可做可不做，包括國家將香港地質公園申請為首個國家級地質公園。但是，我想與邱局長再次討論一些事情。一個數萬年的海床擺在面前，最近一些環保團體竟然提出漁民不可以在這範圍內釣魚，連在岸邊也不可以。在這個地質公園裏，我們既沒有炸石，也沒有破壞它，我們比他們保護得更好，他們竟將漁民趕盡殺絕，這是甚麼道理呢？政府只聽取一部分人的意見，為何不聽取千萬年來在此從事捕撈業及以此養活了許多人的人的意見呢？說得難聽一點，政府不可偏看，理應多看各方面，才能令社會進步及促進和諧。如果只聽一部分人的意見，我們這羣人便會遭趕盡殺絕，屆時我的回響會比任何人都大，所以香港政府要檢討這做法是否適當。

代理主席，由1999年開始，每年都有休漁期，政府也知道南海今年實施了兩個半月的休漁期。但是，我想指出，中國黃渤海的休漁期是三個半月，東海是3個月，比我們還要長。為何我要提及南海這部分呢？因為南海的漁業資源較多，魚的種類比黃渤海和東海還要多，所以漁民支持政府就休漁期提出的建議，特別是中央政府提出休漁期，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既然政府想做那麼多工夫，它也應為在這兩個半月留在香港水域的漁民，考慮如何能提升他們在保育及休閒漁業等各方面的知識，我覺得這才是最好的辦法。如果只讓他們閒坐家中，無事可做，他們也會感到很痛苦，他們既不可以出海，又不可以從事其他行業，他們不能轉行，因為他們只懂得出海捕魚。我希望局長考慮我上次提出的建議，令業界接受培訓，提升他們在捕魚或保育方面的知識，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代理主席，我現在想談談食物安全。最近有關供港運菜車走私夾帶的問題引起爭議，香港部分業界指出內地有所謂“真標籤、假來源”的走私菜，而深圳當局經調查後，指事件是自編自導的個案，又列舉數據證明供港蔬菜的安全。同時，我知道有些政黨舉行了記者發布會，但到目前為止，我不知道拍攝所得的錄影帶會否交予政府，業界不知道，所有人也不知道。不過，我想指出，質檢當局告訴我，從11月1日開始，已進一步完善和規範供港蔬菜檢驗檢疫監督管理辦法，從而對原材料的生產加工及檢驗檢疫等環節提出明確要求，落實企業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

的主要責任，督促企業建立健全食品品質保障體系和產品追溯體系，強化對供港蔬菜的檢驗檢疫監管。供港蔬菜安全事件已擾攘了多時，民建聯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代表在本年年初兩會期間也作出了提案，而我亦多次走訪內地當局討論此事件。現時內地已嚴肅調查及處理此事，也相應提高供港蔬菜的標準。下一步，香港政府亦應多做工作，包括在文錦渡加強檢查運菜車輛，組織及加強與業界和內地當局的三方溝通，方便情報交流，以便在官員與業界的合作下，致力保障香港的食品安全。我希望大家明白，當時有關蔬菜供港的要求，是我們業界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提出的，如有不善之處，我覺得應該作出完善，而並非自編自導一些事情，令事件看來嚴重得多，並且應指出是誰不對。事實上，我們的對口只是一兩個人，我覺得事件的處理方法已變得不理性，所以希望政府、業界與內地3方面加強溝通。

此外，我想談談肉類的供應。大家都知道新鮮豬肉，即活豬的供應已漸趨穩定，而且批發價亦有所下調。我前天與業界的老前輩傾談，獲知現時活豬的批發價約為每擔800至900元，但市民在零售市場買到的豬肉仍然很昂貴，所以我希望周局長在這方面多做工夫，研究如何令豬肉價格適當地下調。

另一方面，近日我看到報章報道政府所作的一些調查，發現部分肉檔利用保鮮粉保持肉類新鮮。我希望政府能調查這些肉類的來源，以辨明這些是新鮮豬肉，還是以冰鮮豬肉假冒新鮮豬肉出售予市民。政府真的要認真調查，不可隨便將此事當作普通個案來處理，更希望政府會跟進。

代理主席，我還想談談骨灰龕不足的問題。傳統中國人堅持“死有安身之所”，但對於陰宅位於民居附近又甚為抗拒，因此政府一直難以覓得合適地方建設墓園或殮葬設施。隨着香港人口老化及市民普遍使用火葬，對靈灰安置所需求甚殷。據政府最新估計，政府未來10年提供的靈灰龕數目與需求相差近30萬個。正正由於現在及將來靈灰龕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少人看到了商機，並利用現時的空間及沒有發牌規管的條例，在一些舊大廈或農地建設骨灰場。更大的問題是不少私營骨灰場管理有問題，常常引起市民投訴。

其實，在某些國家，包括日本，同樣面對土地不足，以致墓園需求越來越緊張。所以，正如陳克勤所說，日本出現一些多層大廈，採用一條龍方式，提供殯葬和相關儀式服務外，更提供骨灰安置設施。市民透過電腦卡可將先人的靈位運送到大樓內參拜處。從該大廈的外貌來看，這些靈灰龕與普通樓房毫無分別。不過，問題會產生於大廈的位置，儘

管大廈的外觀令人看不出分別，而香港市民也未必知道。所以，我認為政府應選擇一些較偏遠的地方，或考慮將有關設施設於離島，而不應認為必須設於某些地區。我覺得政府可作多方面的研究。當市民拜祭先人時，他們可以乘船前往，為何一定要設在某些地區呢？有些島嶼基本上是沒有人居住的，政府可否多研究這些方法來解決問題呢？

如果政府推廣海葬或把骨灰撒於花園，我會表示支持的，但此舉卻似乎缺乏誘因。政府有何方法可鼓勵市民這樣做，或令這些方法更具效益呢？很多中國領導人，包括已故的周恩來、鄧小平等，他們的骨灰亦是撒進海中，當然不是用飛機撒，但在內地(包括上海)，很多人已採用這方式來向先人致敬。因此，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亦多作研究。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公眾街市的問題，食環署因簽署新租約的問題，引起街市販商的很多意見，結果政府順應要求延遲1年才簽新租約。公眾街市存在很多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尤其是食環署從兩個市政局接手管理後，因經濟下滑問題而持續凍租，令問題從來未有機會妥善處理。我認為公眾街市問題十分複雜，而且涉及的檔戶數目十分多，所以當局要先行解決問題，採取寬鬆的原則，抱着“特事特辦”的心態，先解決“助手”、“合夥人”的正名問題，考慮在原檔主同意的情況下，讓助手或合夥人轉為承租人，以便順利整理租戶的資料及地位。

至於租金方面，我們正與政府商討及聆聽業界意見。政府當然會提出一些建議，而我亦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多做工夫，研究如何調整租金。

代理主席，我想談談海洋保育的問題。本星期二早上，我與路政署的同事前往機場視察，但昨天有位同事告訴我，政府會在那裏再增設兩個有毒污泥坑。前天視察所得與昨天聽取的消息不同，竟多了這兩個東西。大小磨刀小島外將來會劃為海岸公園，但事前業界毫不知情，我真的希望政府認真研究。

根據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報告，該項工程對漁民影響不大。那天我用汽車載路政署的人員前往視察後，令他們大吃一驚。因為當天有數十艘漁船開往機場對出海面作業，他們觀察了由大小磨刀至機場對開的海面，並親自查詢漁民當天早上的漁獲，所獲答覆是每天可捕數十斤魚。可是，根據漁護署的環評報告，竟說該處一點漁獲也沒有，工程對漁民影響不大。究竟誰是誰非呢？各位官員不如親身前往視察，邱局長，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用汽車載你去看看。政府聘請的環評公司進行的評估結果，令從業者不能獲得政府的補償。

業界經常向我表示希望與政府商討，並問政府會否與他們商談，如果可以的話，他們便想聯絡路政署的人員，但後者表示此事應由周局長處理，我們應找他商議有關修訂特惠津貼機制的問題。但是，我們與他的商談不成功，在上次向他提出的一項口頭質詢中，他說該機制不可以更改。在機制不可更改的情況下，後果便要大家一起承擔。事實上，機制並非不可以更改的，局長所獲知的環評報告結果，與事實完全不符，但他卻不欲清楚瞭解這些問題，即使業界受影響，他卻依然視而不見，這樣行嗎？當然是不行的。

因此，我希望局長重新修訂建議及認真研究。現時由顧問公司進行環評報告的制度是存在很大的漏洞，業界從來不獲諮詢，這是否合理呢？業界在當地作業數十年，經歷數代人，但竟然無人問問他們有否在當地捕魚，或從事其他甚麼工作。沒有人詢問過業界。然而，提交立法會或其他政府部門的環評報告竟說工程對我們業界完全沒有影響，這對我們是否合理？邱局長，我希望你認真研究一下。正如我剛才提及的地質公園，為何不可以讓我們入內釣魚？既然我們的行為是不會造成破壞，這些決定是不公道的。雖然我支持政府推行地質公園及海岸公園，但政府也要讓我們業界可以糊口，令我們有轉型的機會，那麼我才可以支持。然而，現在甚麼措施也沒有，我們怎樣維生呢？我又怎能支持呢？這樣的情況便造成了對抗局面。所以，我希望政府不要只聽單方面的意見，應多聽取其他意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行政長官銳意發展6項優勢產業，其中一項是文化及創意產業。民建聯對於政府今年決心推動這項創意產業甚表支持，並希望政府在軟件和硬件方面加大力度，積極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區內的重要文化樞紐。要達致這項目標，政府除了活化工廈和保育歷史建築物之外，還要為文化藝術團體創造有利的發展條件，推動具本土文化特色的品牌項目，例如特色的博物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期為文化及創意產業營造有利的發展空間。

代理主席，當局在發展6項優勢產業的同時，提出了一籃子方案，釋放過千幢舊工業大廈（“工廈”）的潛力，鼓勵業主重建或改建舊工廈。過往，政府改變了石硶尾舊工廠大廈的用途，使它搖身一變成創意藝術中心，成功增加文化藝術創作及活動場地。在新公布的活化工廈政策之下，只要改變工廈用途的申請，符合樓齡要求和得到規劃許可，業主

便可免交更改土地用途的豁免費用。我們相信此舉將釋放更多土地予藝術創作工作者，讓他們有更多創作和活動空間，長遠將有利促進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現時年輕人如果想租用工廈作為“band房”，作打band之用，須向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待城規會批核後，又要經地政署、屋宇署和消防處等部門審批，手續非常繁複，令不少人望而卻步。據瞭解，地政署已經成立特別小組，負責處理有關重建或將整幢工廈改裝的申請。我們期望特別小組能提供一站式的服務，簡化改變工廈用途的申請程序。

代理主席，除了增加文化藝術團體的活動場地之外，我們希望當局也會考慮支援文化藝術團體，特別是中小型藝團。在26億元公共文化藝術的開支中，有8.8億元是直接投放在藝團、節目和藝術教育方面。當中有三成是直接資助九大旗艦藝團，其他中小型藝團只佔約13%的資源。由於中小型藝團缺乏資源，創作人和表演者只能以業餘性質參與，這也無形中限制了中小型藝團的發展空間。今年5月，表演藝術委員會宣布將撥款1,000萬元，以紓緩中小型藝團的困難情況。然而，這只屬臨時措施，我們希望當局在資源、節目宣傳和建立觀眾羣方面，能夠持續撥出資源，以支持中小型藝團的發展。

在剛過去的亞洲文化合作論壇上，主辦機構在其中一個公眾討論環節中，邀請了來自日本、韓國和資深的動畫工作者，共同探討推動亞洲動畫的發展。其實，香港人一直有積極參與動畫和漫畫的製作，例如最近在全球同步上映的動畫“阿童木”，據說就是由四百多名香港動畫師在柴灣的工廠內，日以繼夜趕工製作而成。香港有很多深入民心的動漫作品，包括有“龍虎門”、“風雲”、“黑俠”和“中華英雄”等。這些作品除了孕育出一羣高素質的創作人和畫師之外，還培養了一羣觀眾和消費者。行政長官表示要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我很希望他能夠注意到，這個市場在香港已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以創新的思維，結合香港動漫、武俠小說、動作電影和電視製作，並建設一個“武俠文化館”呢？

其實，以武俠和功夫為題材的文化創作產品，一直以來都以文字、漫畫、電視和電影的形式，融入在香港人的文化生活當中。今年年中，財政司司長在“2009年香港國際功夫節”上也承認，功夫是讓香港人尋求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認同感的一個來源。中國功夫更透過李小龍、成龍、李連杰和甄子丹等人士，從香港帶到西方世界，讓外國人也得以認識。所以，如果香港能夠設立一所“武俠文化館”，相信除了能夠引起香港市民的共鳴之外，還可以成為旅遊熱點，吸引海外人士來香港參觀。我相

信，除了大家都關注的西九文娛藝術區之外，“武俠文化館”絕對可以成為香港博物館的另一個品牌。

我本人身為前博物館委員會的成員，十分關注博物館的長遠發展。自從博物館委員會在2007年向政府提交了報告書後，委員會便解散。報告書內的多項建議至今仍石沉大海，當中包括建議政府在3年內，把16間博物館公司化，並成立管理委員會，集中管理博物館，以提升服務質素和問責性。如果政府再不積極跟進這些建議，恐怕在博物館政策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博物館的人員將會出現大量的流失，影響博物館的質素，我亦希望曾局長也能關注此事。

代理主席，早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粵劇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再次令人關注香港保存文化遺產的情況。早前我與數位議員出訪東歐，其中一個國家是匈牙利。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多瑙河兩岸景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內。除此之外，當地的莫哈其鎮每年一度的節慶“面具嘉年華”，也剛被聯合國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這次出訪，令我對其他國家在保護文物遺產方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其實，民建聯的議員早在兩年前，便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議題帶進議會討論。當時民建聯建議當局把“港式茶餐廳文化”，向國家申報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關注。除了茶餐廳文化之外，香港其實留存了很多珍貴的本土文化遺產。9月下旬，當局便從30項傳統文化項目中，選出了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遊涌、大坑舞火龍和盂蘭勝會，準備向國家獨立申請成為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此，民建聯是非常支持的。這些節慶習俗均在地方傳承了過百年，當中並未經過大幅度的改造和演化，完全符合“文化遺產”的精神，也反映港人的社區活動和宗教儀式，完全體現了本土文化。如果這4個項目成功列入國家級文化遺產名錄，我們還可以藉此向海外推廣香港的節慶傳統文化，從而吸引遊客來港體驗節慶活動，長遠亦可推動香港的文化旅遊。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籃子“保育中環”的措施，意味着中環將會“大變身”。相對於即時見效的“派糖”措施，政府保育中環的計劃，顯得比較抽象，普羅市民未必有切身受惠的感覺。

事實上，政府保育中環的措施可視為另一種形式的“派糖”。透過降低發展密度及活化歷史建築，為市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空間，回應了社會訴求，民建聯表示支持。

中環作為本港的金融商業中心，寸金尺土，高樓大廈林立，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嚴重。特區政府現在決定活化中央街市成為城市綠洲、政府總部西座拆卸後部分會興建公園，而國際金融中心對出的兩幅地皮，也將限制發展高度，由30層減至15層。這些措施相信可以紓緩中環日益惡化的空氣污染問題。

有專業人士估計，政府在中環保育方面的支出及賣地方面的損失將達數以百億元計，但保育工作是一種長遠投資。雖然沒有立竿見影的即時回報，但長遠來說，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優化我們的生活質素，這些無形的回報是無法以金錢來衡量的。

我們認為今次施政報告只提及保育中環是並未足夠，在中環以外的地區，例如灣仔、銅鑼灣或觀塘等，同樣有很多類似的歷史建築，也同樣飽受空氣污染。特區政府應具體訂立整個香港長遠的環境保育策略，讓保育活化成為香港的一項重要產業。我期待今次施政報告提出的保育措施能夠全面落實，以中環作為範例，再將保育工作擴展至全港，全力把香港打造成優質的生活城市。

代理主席，在上周三晚的亞洲足協盃四強次回合，南華對科威特的一場比賽是全場爆滿，近4萬名球迷坐滿香港大球場，有些未能入場的球迷更不捨得離去。這些情況再一次證明足球在香港市民心目中，是有着不可取替的地位。早前在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多位議員都對足球的發展非常關心，我亦很希望曾局長能把握現有的機遇，推動本地足球發展，協助建立團隊品牌，加強培訓有潛質的青少年球員，這定能為熱愛體育的青年人提供多一條出路。

東亞運動會將於12月舉行，究竟東亞運動會能否像這場亞洲足協比賽一樣，得到市民踴躍支持呢？現時看來仍屬未知之數。據悉，當局目前只售出約六成的門票。康文署署長也公開承認，目前市民對東亞運動會的注視程度並未足夠。因此，民建聯期望，政府在這未來一個半月內，加緊宣傳工作，特別是盡快公布隊際賽的抽籤結果，使比賽內容讓市民知悉，從而鼓勵公眾盡早購買門票，積極參與這項盛事。如果東亞運動會的盛事能夠辦得好，必會對香港的經濟及旅遊業作出很大的推動。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譚偉豪議員：特首去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創意產業，最終設立了3億元專項基金，業界覺得這項政策初步是受歡迎的。但是，如果政府

只將這3億元作宣傳、推廣，實在未盡其用。我希望政府明白推動創意產業，不單香港正在進行，全世界都參與競爭。我希望政府明白我們正面臨兩大挑戰。

第一大挑戰是來自國內各城市的競爭。最近從報章報道得悉，深圳的“設計之都”吸引了本港的名設計師靳埭強及其他10位本地設計師在該區開設工作室。蘇州、上海及北京等地更提供免租3年的優惠，以吸引香港的設計師北上。到了最近，特首才說要釋放土地，活化本港的工業大廈，其實國內早已實行多年。如果政府不想出更有力的誘因，令這些創意產業的企業留在香港，他們日後便會移民北上，就業機會也不會留在香港，所以，我很希望政府能考慮如何運用這些基金，令香港的創意產業留在香港，也令就業機會留在香港。

第二個挑戰是，如果政府提出了一項新政策，但卻沒有市民的認同，絕對是一種浪費，而且沒有市民的認同和參與，也絕對是會事倍功半的。

我最近乘坐的士時與的士司機閒談，獲知他有一名剛中五畢業的兒子，但他的兒子經常躲在家裡玩遊戲機。我問他的兒子為何不找工作？他說，他的兒子只懂得玩遊戲機和畫漫畫，不知道有甚麼好工作可做，並覺得他的兒子沒出色。其實，如果家長普遍覺得玩遊戲機或創作漫畫是沒出色的話，試問年青一代又怎會有信心投身到這些崗位上呢？為何普遍市民覺得“畫公仔”沒出色呢？因為香港政府或業界未能製造普遍的輿論，以致人們覺得只有從事專業或唸書才有出路。其實，從歐美國家的例子可見，事實並非如此。即使在美國，有很多大企業，例如夢工場和荷李活，很多創作動畫的公司已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年青人投身這些工作。所以，如果政府真的能吸引這些國際企業在香港落戶，我相信人人都會爭相入行，屆時家長便會更安心，如果他們的子女未能好好唸書，也會有一些很好的出路。

面對這些挑戰，我向政府提出兩項建議：第一，優化現有的3億元創意基金，令它協助更多不同的行業。其實，早在數年前，政府已設立了電影發展基金，向電影業注資3億元，為業界提供更多流動資金，以便它打開市場。最近，我們看見一套本地製作的“麥兜響噹噹”也是由政府注資的，這製作在國內的票房很成功，可見政府這樣做是有回報的。我希望政府考慮把這3億元的基金不單資助電影，更資助網上遊戲或音樂創作，令本地創作人可獲得政府的資助，增強他們的流動資金，而且有了政府的資助，可以打響名堂，進入國內市場時更事半功倍。

第二，希望政府利用創意基金，幫助香港的年青人就業。特首在施政報告第89段中提出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為對正規教育缺乏興趣或學業成績不理想的青少年提供另類機會，使他們可以創一番事業。根據統計數字，由今年7月至9月，香港15歲至19歲人士的失業率高達25.7%，失業人口大約有15 300人。我可以肯定，在這些青年人當中，大部分都很具創意，然而，他們未必能接受正規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又只留在家中，把精力放在互聯網或網絡遊戲上，便會荒廢時間。因此，我覺得政府應該幫助他們，尋找第一份工作。

政府去年推出的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便是幫助大學生尋找工作。然而，政府為何不幫助一些未必可以入讀大學的年青人呢？我希望政府在現有的3億元創意產業基金中，撥出一定的款項，成立一個創意青年就業計劃，在這一萬多名失業的青年人中挑選一两千人，如果他們對創意產業有興趣，政府便資助他們，例如月薪6,000元，政府便出資一半，好讓他們能更快地投入創意產業。如果每人津貼3,000元，共資助2 000人，政府每年約只耗資七千多萬元。我覺得這項計劃絕對較現時的青見計劃更有吸引力，因為青年人不單希望找一份工作，他們更希望找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並在工作中發揮所能。與其任由這羣找不到工作及經常躲在家上網的年青人把精力放在玩遊戲機上，不如鼓勵他們把精力從事創意產業，貢獻社會。我相信他們一旦順利進入社會，日後絕對有很大的發揮，可以繼續留在行業內發展。

總括而言，我很高興看到政府在推動創意產業方面作出承擔，但我更希望看到政府能善用這些基金，吸引更多企業來港，令香港的青年人有更多就業機會，以改善香港青年整體的失業問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潘佩璆議員：代理主席，對於施政報告提出保育中環的建議，我是非常認同的。

過去50年，香港經歷了急速的工業、商業發展。無數凝聚着香港市民集體回憶的事物，都在城市發展的急速步伐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如今，香港人驀然回首，才驚覺所失去的已無法挽回，因而近年保育之風急速冒起，很快成為社會主流的聲音。

保育中環的建議回應了社會大眾保護古蹟文物的訴求，尤其是今次的建議，把中環作為一個“面”來保育，使中環區成為一個新舊文化、古

蹟與現代建築、時空交錯的金融地帶。這種模式遠較過往以“點”(即以個別古蹟)作為保育對象的做法，實在是一大突破。

我們檢討過往的保育工作，其實是有得有失。首先，政府的保育工作是盡量將古蹟活化，然後注入現代用途，並在保育之中尋求商業利益，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這情況把原來屬於普羅市民的、本土民生的歷史及建築，變得商業化、士紳化，令普羅市民感到高不可攀。今早，甘乃威議員亦提到這一點，我是心有同感的。其實，這種做法會令古蹟與羣眾分隔，灣仔和昌大押便是一個例子。我多次經過那裏，該處已變為很高級的餐廳，所以也曾猶豫是否應該入內，因為我知道食物的價格很昂貴。因此，我希望未來的活化工作，可以在商業利益與基層需要之間取得平衡，讓市民大眾可以盡情享受活化的空間。

施政報告集中討論中環“面貌”的保育，卻沒有提及其他地區。可是，香港其他地區其實也有很多值得保育的古蹟和歷史。遠的不說，就以港島區為例，上環、灣仔、北角等地區均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與古蹟，而且正面臨被改變的情況。因此，政府除了在中環這個“面貌”以外，應把保育的工作擴展至其他地區，包括九龍、新界等不同地區。

最近，我跟議員辦事處的同事花了半年時間，策劃一條以電車路串連港島各區的古蹟與人文歷史的旅遊路線，透過一連串的旅遊點和古蹟，道出了香港“打工仔”百年來生活和工作的故事。其實，以文化為主題的旅遊近年相當盛行，在世界各地也有出現。以這種方式來保育古蹟，一方面可以增強旅遊業這產業支柱，同時也可以配合新的文化創意產業，推廣本土文化。

在結合保育與旅遊方面，我們的鄰居澳門其實是先行者，它有很多成功經驗可供我們借鑒。我們可以透過學習澳門的經驗，開拓更多元化的經濟元素，創造更多工作職位。

其實，香港有很多繽紛多彩的歷史，可以透過保育和旅遊，將這些繽紛多彩的歷史再次呈現眼前的。

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施政報告提出“進步發展觀”，強調要以優質生活環境來匯聚全球人才，透過保育中環來展示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育之間的平衡。原則上我支持這個想法，但很多人和很多同事批評這個政策偏

祖有嫌，為何只保育中環而忽視其他地區？我認為如果好一點，應該說“優質生活由中環開始”；當局應要說清楚，中環是個試點，若成功的話，便會擴展至全港各區，這樣才不會令其他區內的居民感到不公平。

事實上，我同意其他同事的意見，例如潘議員剛才指出，在深水埗、九龍城、上環等地區，還有很多值得保育的歷史建築。重點是如何在舊區重建和新區發展的同時，確保新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和諧共存。這個設計概念是很重要的，但很可惜，特區政府似乎一直都欠缺好的設計構思。幸好當局現時漸漸認識到我經常建議的建築比賽的重要性。我希望市區重建局可在此事上負起相當的責任。現在的問題是欠缺一個包括各項配套的全面規劃，不單保育某些部分，而是要討論如何對中區作出整體規劃。

施政報告只提及要保育和拆卸哪些建築物，或不拆卸它們，卻沒清楚說明如何跟進中環的整體規劃，尤其是活化周邊舊區方面，更沒提及全港各區的全面規劃。我想強調，全面規劃必須考慮整區與其他地區的連接，包括行人和交通網絡、綠化區覆蓋，以及新舊建築融合等，好像我們討論中的海濱規劃亦要有連貫性，這樣才可確保城市有可持續發展。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就保育中環的問題，有人擔心減低中環碼頭的發展密度、保留中環街市及中區政府合署，會如何影響甲級寫字樓的供應。我是支持政府的建議的。隨着政府總部遷往添馬艦，金融中心的心臟地帶發展，亦可移向金鐘及灣仔一帶，以降低中環過高的發展密度。我相信當局應該研究過中環、金鐘、灣仔一帶的寫字樓供應、市值及呎價，計算過地積轉移會否影響政府收益，才提出這項建議。所以，我很希望當局公開這方面的數據，讓市民知道保育和發展可同時並進，而非一定帶來經濟損失。

主席，我認為一個城市一定要保留一些舊建築，容許新舊並存，才能展現城市的特色，特別是高樓大廈集中的中區，能夠保存中環街市這類有特色的建築，可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古建築一般是低密度的，是一個城市的空間，這個空間很重要，好像立法會大樓，它不單是文化和歷史，其實亦是一個空間，讓周圍的高建築物有生存的機會。

我最近有機會參觀中環街市，我不理解為何它要長期關閉而不加以利用。中環街市的樓底其實很高，剛才陳淑莊議員也展示過一些圖片，

這點是頗具特色的。我們經常說會展中心地方不敷應用，中環街市其實也很適合作展覽等用途。我很希望政府將它開放，稍作修葺便可即時開放，讓市民也有機會參觀這個地方，因為大家知道中環街市已是集體回憶，市民已沒有很多機會再次回顧這類具特色的地方了。

中環街市亦可作其他臨時用途，因為當局也沒法在短時間內進行具體的保育計劃。在這段時間，可以舉行展覽會，也可在這裏舉辦年宵，是嗎？現時年宵攤位的投標價這樣高。如果可以作這些臨時用途，便可讓市民認識中環街市的空間，感受當年街市的環境。關於政府山的保育……希望局長剛才聽到，我希望中環街市可作臨時用途，開放給公眾，舉辦一些文化活動等。我也聽過有很多意見指文化表演場地不足，中環街市其實是值得政府考慮如何藉臨時用途而加以好好利用的。

關於政府山方面，拆卸政府合署西座後的發展，應配合終審法院將來的用途，並盡量保留原來政府山的特色。特色不單是建築物本身，能夠充分利用其多處的綠化，例如門前的大樹等，便可將整個中環的整體規劃，例如保育項目和金融中心，和諧地連接起來。

主席，要提升優質生活環境，吸引海外人才，美化環境和保育海濱，是政策的大方向，我很高興聽到特首在施政報告承諾逐步落實各區的海濱美化工作。我希望在發展局的協調下，各政策局和部門通力合作，盡快清除一切障礙，完成海濱規劃的工作，將香港海濱連接起來，為各區居民提供一個可達的海濱休憩空間。

為了讓市民真正享用海濱的設施，完善的行人網絡是十分重要，所以，除了支持銅鑼灣行人隧道及旺角行人天橋網絡外，我很希望當局可盡快完成全香港行人道路的改善工程。很多計劃其實是有待實行的，因為香港多山，當局應加設更多自動電梯、自動行人電梯，好像蘇豪區，使整個舊區活化起來。配合全面規劃，將區與區之間連接起來，讓市民不用乘車，這是十分環保的做法。局長，中區的行人電梯，實際上是香港的一項德政，既方便市民，亦吸引不少遊客特別前來試搭這條電梯。設置行人電梯將有關地段變成行人區，減少行車，這實在是很成功的例子。此外，還可活化周邊地區，這點很特別，所以我不理解為何當局仍未開展其他相類的計劃呢？當然，如果能令市民減少乘車，多使用這些天橋，便會減少汽車排放的廢氣，使空氣清新；能做到優質城市，便會有優質生活。

主席，說到這裏，我很欣賞特首上次提及的開心家庭生活。要有開心家庭生活，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市民有健康，所以運動十分重要。以運

動而言，很多活動如果可以整體家庭一起參與的話，便可提升市民對體育的興趣，從而得到較為健康的生活。還有，開心家庭的概念亦可延展至藝術文化的發展。如果能夠讓整個家庭增加發展這方面的興趣，我想可以為香港帶來優質生活。

最後，我想提一提，優質城市的生活，其實便是要令市民覺得住得開心。我希望環境局局長考慮是否真的有需要加電費？我認為如果不加電費，當局無論送甚麼環保設施，市民也是會十分歡迎的。

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這一節的主題是“優質生活、優質城市”，但我要問，究竟是哪些人的優質生活、哪些人的優質城市？是全香港700萬名市民共同擁有、共同生活的城市？還是一小撮權貴、800人的小圈子中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小眾的生活和城市呢？

這一節涉及數個政策範圍，包括發展、經濟、環境、食物安全、民政和資訊等。簡單來看，現時貧富懸殊加劇；貧窮家庭不斷增加和膨脹；樓價不斷創新高，並且高企；言論自由被打壓；廣播政策繼續被壓縮，令小市民不能享有廣播自由；再加上民政事務局以和諧壓倒一切，連社工也要趕絕，這樣的生活，這樣的城市，主席，試問怎可以稱為優質城市，怎可以創造優質生活呢？

在城規方面，主席，我在過去多年來批評過很多次，而在政府連續兩次就2030年的規劃進行諮詢時，我亦曾多次提出，但卻未見有改善。香港整個城市規劃是以行政管理方便為依歸的，方便政府管理才是最重要的。市民的需求完全被拋諸腦後，以及被剝奪和剝削。以天水圍為例，這個擁有30萬人的城區只有一個機鐵站，而且最近才興建了一個硬地足球場。整個觀塘有二十多個足球場，但天水圍則只有1個。由此可見，很多城市設施都是完全傾斜的，在政府過去多年均出現赤字的情況下，這些設施不斷被壓縮、被刪除，可是，有盈餘時又不見其加速興建設施。因此，民政事務局在提供康樂文化設施方面，可說是絕對失職的。

主席，至於環保和慳電膽的問題，不是單純提供慳電膽，這個城市便會有優質生活的，對嗎？這涉及整體環保的問題、空氣的問題和環保車輛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跟局長談論了很多年，但進度十分緩慢。我想警告局長並希望局長澄清，現在說慳電膽的支出會由電費支付，而我已多次向局長作出預告，當政府落實此措施時，社民連必定會

提出司法覆核，禁制政府以送慳電膽作為加價的理由，因為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協議明確列明，是絕對不可能把送慳電膽作為日常營運開支的，這絕對違反了協議的內容。如果今天可以在送慳電膽後加價，那麼明天也可以送電動車吧！如果兩電可以在送禮後加價，何不每戶也送電爐、電飯煲、電熱水爐，甚麼也可以送的了。所以，這邏輯十分荒謬。

更荒謬的是，在我致函要求局長向事務委員會解釋增加電費的法律理據，局長只是簡單的輕輕帶過，完全沒有從法律角度解答這個問題。對於這種避重就輕、龜縮的做法，必須加以譴責。作為問責局長或有責任的政府，對於如此重大的政策問題，是沒有理由輕輕帶過而不作正面回應的。如果沒有考慮或不知道便說不知道，怎可以將其計入日常營運開支之內呢？

因此，主席，第一，我要強烈譴責關乎慳電膽的所謂環保政策，其制訂過程粗疏且缺乏諮詢，把環保的責任加在小市民身上，增加電費，更絕對是錯誤的做法。所以，我希望局長痛定思痛，在這個多星期內感受到市民憤怒的熱潮、憤怒的力量，早日宣布取消這項措施，尤其是不可以增加電費。我亦希望局長澄清，強迫兩電購買電動車，是否會再次把電動車的開支計入成本之內，並在電費中反映出來呢？這是局長下一步必須交代和解釋的。如果購買電動車也計入成本之內並須增加電費的話，我一定會再次反對的。

主席，有關貧窮的問題，政府完全沒有回應，整份施政報告對此問題是完全沒有回應的。主席，我希望政府的官員要清醒，曾德成局長作為共產黨黨員，應該很清楚共產黨的立場和調子。我想向他讀出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所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其中一段，其他官員也應該聆聽一下。這是中國共產黨剛於上月作出的重大決定，從中看看他們的施政，特別是曾蔭權應該清醒一下。我不知道廖暉有否向他訓話，他公布的施政報告一塌糊塗，是完全漠視羣眾的需要。以下是共產黨的立場，主席，政府的官員不可以說這立場不正確。“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關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以民為本，堅持馬克斯主義羣眾觀點和黨的羣眾路線……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擴大黨的羣眾基礎，使黨始終得到人民羣眾的支持和擁護。”主席，最末的一段是：“堅持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作決策、定政策，充分考慮羣眾利益和承受能力，統籌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切實辦好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實事。”

主席，這是共產黨最新的政策決定。可是，且看看我們政府的施政，在制訂政策時完全漠視市民的知情權和需要。慳電膽的政策一拍板，便要市民付鈔，是完全漠視市民對這問題的感覺和反應。

主席，我們看罷整份施政報告，對於其中所謂六大工業的發展，我存有很多疑問。我們社民連的主席黃毓民界定這是六大“冚家”行業，因為它們令很多家庭受壓，無論是財政上或生活上也面對苦困。究竟政府如何定出這六�行業？是如何挑選出來的？我曾致函特首，要求他告訴我在選取這六�行業時曾進行甚麼研究，是甚麼研究報告和建基於甚麼報告和分析。今天終於收到了，但不知道此份文件有沒有30頁紙。特首辦的覆函表示曾諮詢經濟機遇委員（“經機會”），並把經機會的文件給我看。我是問他究竟做過甚麼研究報告，而不是要求取得經機會的討論文件。他在選取這六行行業時，是應該有一些基礎、準則、範圍和長遠的分析的。其中應涉獵有些甚麼短暫的影響？創造甚麼就業機會？要投資多少，以及在現時的政治和經濟氣候情況下，要在香港這獨特地區發展這6個行業的原因為何？他必須備有完整的分析和資料。難道連一本報告也未做過？是否從未就六行行業的任何1個行業進行過較完整的分析？他根本交不出來，是完全欠奉。

主席：陳偉業議員，我想提醒你，你現在所說的內容，應該屬於第1個辯論環節下的議題。

陳偉業議員：我明白，主席。

主席：你現在當然可以發言，但不能期望局長稍後會回應。

陳偉業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對這個政府和各局長也沒有甚麼期望的了。正如曾德成局長，我在上星期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兩次向他提出問題，但他完全沒有回答，完全不作答，這便是所謂和諧了，是無須回答問題的。我們向他提出質詢，他甚麼也不回答，這便是和諧了嗎？最和諧便是不作回應，這便是和諧的定義了。不過，這情況可能已較內地稍好，因為內地的和諧是要把人關進秦城監獄或拉去打靶的，因此，對於和諧的處理，香港可能已算是較為溫文的了。

主席，我覺得那些行業的重要性是，它們決定了香港政府各個政策局和經濟發展的政策方向。可是，在制訂政策時，很多資料和研究均未曾考慮清楚，有欠成熟，而且粗疏，好像慳電膽的措施般。其實，這六行行業的選取，跟慳電膽政策的制訂過程十分相似，對嗎？這制訂過程在7月份才開始進行諮詢，同樣地，早前才諮詢經機會。但是，經機會

的成員提供了一些意見後，便立即成為施政報告的一部分措施，即時影響香港700萬名市民往後不知道多少年的生計。這又等同麥理浩於1973年公布香港政府的重大政策，當年是四大支柱，即教育、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自1973年開始，這四大支柱便影響着隨後二三十年市民的生活。政府大量興建公屋和開辦學校、提供綜援和發展青年服務。在訂出政策後，當年的殖民地政府便是如此推動的。

特首定出這六大行業，也不知道會否帶領香港走向死胡同，或由於這六大行業的制訂錯誤，會否令香港步向沉淪。經濟政策的決定可帶來致命性的災難，所以關於那些研究，即使今天未能作答，我也希望政府稍後可以進一步回答，而我也會再次致函特首辦，查詢究竟有沒有任何報告可循。如果連一份報告也沒有，那便絕對是錯誤的做法。

主席，在眾多政策局中，我再次呼籲環境局局長在慳電膽問題上浪子回頭、回頭是岸。他最好是在今天發言時公告天下，說出政府為了優化這項措施，第一，最重要的是不收錢，不向市民收錢。不要在“乞兒兜內擲飯食”了。這些電力公司已經胖得連襪子也穿不上，而肚皮也大得連腳趾也看不到，所以請他不要再在小市民身上打主意。

至於民政事務局方面，希望曾局長解答一下，是否為了一個團體的和諧，便可以打壓其他專業團體的存在價值？怎可以因為一個團體的投訴，便濫用局長的職權和聲威，跟董事局成員說些話致令別人連工作也失掉的？主席，這種行為必須記錄在案，並加以譴責，因為這是很危險的先例。某局長今天可以基於一間機構的投訴，令一名社工失去工作；明天也同樣可以基於和諧的理由，令一所學校關閉、令一間醫院倒閉甚至令一個行業結束的。這是很危險的先例。怎麼可以因為某一間機構感到不滿或不和諧，便令一位局長在沒有進行調查和完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單方面高壓地利用局長的權威，令一名社工失去工作的呢？主席，這種所謂達致和諧的行為和概念，絕對不應在香港如此肆無忌憚地欺壓小市民的。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相信無論是特首抑或各位司長、局長，做夢也沒想過今年施政報告出台後，最受爭議的政策竟然是環境政策。

其實，今次由慳電膽事件引發的問題，不單是特首被批評有利益輸送的問題，更離譜的是政府在未經諮詢的情況下，強迫市民接受加電費來換取慳電膽，這樣做不但違反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兩電”）所簽訂的管制協議的規定，更是向市民大眾“搶錢”。在未經廣泛的社會討論以至

社會共識，政府便強行制訂這項影響民生的政策，主席，我實在難以接受，我對此必須反對並加以譴責。

事實上，今次慳電膽事件亦暴露了政府對環境保護是一知半解的。主席，為何我會這樣說呢？政府在推出現金券政策前，完全沒有充分考慮慳電膽在製造以至回收過程中所引致的環境污染問題。由此可見環境局所推動的環保政策，只是着重要做一些表面工夫，做一些“政績工程”，而忽略了政策可能引申的其他問題。

除了今次慳電膽的鬧劇外，政府在兩年前設立環境局給市民的印象，亦是眼高手低、急於求成。今年落實的推行的膠袋徵費以至即將要立法的強制停車熄匙，給人的感覺都是所謂要建立“政績工程”的例子。當然，政府方面對此是否定的。

政府最新公布有關零售業開始徵收的膠袋費後，膠袋派發量下跌八成之多。但是，很可惜，政府一直以來的做法都是對自己有利的漂亮數字便作公布，對自己不利的數字則掩蓋或不發表。其實，政府有否透露過其他例如小型膠袋、垃圾袋以至其他物料購物袋的棄置和使用的數量是否亦下跌八成，還是反而大量增加？可惜政府並沒有交代。明顯地，這種做法只是一種吹噓，而不能為社會帶來實際益處，這亦反映了政府在實施政策前未有充分考慮，以及進行足夠諮詢所產生的結果。顯然整個政策是思考不足，真正成效亦仍舊大有疑問。

此外，停車熄匙的建議亦引起很大的爭議。事實上，不少業界都向我表示，政府提出計劃時完全沒有全面考慮運輸業的司機所面對的實際困難。例如在天氣炎熱的日子，的士司機或其他職業司機仍要停車熄匙，他們在車內十分悶熱，唯一的方法便是打開窗門。但是，大家也知道，路邊的空氣污濁——我們從公布的數字看到，路邊的污染情況非常嚴重——司機被迫吸入這些廢氣，對身體健康有何保障呢？主席，非單如此，我覺得最慘的是(我去年曾詢問政府)，如果在下雨天，他們可以怎麼辦？下雨天可否獲得豁免？政府回應不可豁免，同樣要熄匙，否則便要受罰。主席，這情況有困難，不知道局長有沒有這經驗，在下雨天熄匙等候而不開窗，但開窗會有甚麼結果呢？局長，你有經驗嗎？如果是下微雨可能還可以，但下大雨時，該怎麼辦？究竟要穿起雨衣擋雨，還是怎樣呢？政府對這些實際情況曾否考慮過呢？

由此可見，政府只是一廂情願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沒有考慮執行時所遇到的困難而加以理會，也沒有重視或尋求解決方法。我認為推廣環保而強行實施有關政策不一定不好，但不一定能真正解決問題。事實

上，推廣環保時最重要的是改變市民的意識，尤其是希望大家能從實際的生活開始，建立環保意識，這才是最重要的。我認為環境保護，最重要的是由生活開始——從簡樸的生活開始——而不是一方面鼓勵高消費或消費，而另一方面則說要環保的。其實，這是互相矛盾，根本不可行的。在鼓勵消費的同時，一定會產生大量的污染物，這是沒有意思的，當我們不鼓勵要簡樸生活，問題始終也未能解決。

因此，我希望局長在推動環保時一定要細心，並且要深入分析和進行詳細諮詢，不要強行建功立業或好大喜功，因為這做法對社會不能帶來太大幫助。

主席，除了環保問題外，我亦想談談毒蔬菜的問題。事實上，我們近期與一些團體、一些同事及職員曾在國內拍攝到有真標籤假產地來源的情況，但很可惜，我們雖然曾多次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問題，但政府不知道是否因害怕或是其他原因，從不親自派員瞭解情況，只聽取國內的說法，指事件是由香港人或傳媒自編自導自演便算了。我覺得這說法真的是不負責任。

事實上，問題不單是一次、兩次地提出來，也不止一間傳媒，而是多間傳媒分別在國內拍攝和訪問所得出的結果。局長竟然仍無視這情況，視若無睹，還說沒有其事。他究竟有沒有尊重過香港市民呢？尤其是這是關乎市民的健康問題，他究竟有沒有重視呢？我們不斷把問題提出來，但他仍是聽而不聞。新聞報道也提過，有300公斤蔬菜被農藥污染，並流入我們的蔬菜市場，市民亦已購買了。這些問題雖然被揭露了，但政府仍不加理會，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政府怎可以這樣做的？

我要在這裏重申，我希望政府認真處理這問題，不要害怕國內政府，而要真真正正為香港市民的健康着想，竭力查明真相，清楚瞭解情況，確保整個產地來源制度是受到監管，而非容許不法之徒以假產證蒙混過關，魚目混珠，輸港出售。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如果政府今天仍然不加處理，業界將發起更大的行動。我希望這不是威脅，而是提醒政府，一定要真正面對問題，不能再坐視不理。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施政報告提及要為港人構建優質城市、優質生活。但是，近日本港經常煙霞彌漫，空氣污染指數持續高企。上周六，中環的污染指數更高達174，位列歷年第二高的紀錄。這麼差的空氣質素，肯定與上述的美好願景背道而馳。

天文台經常說，改吹強風時，空氣污染的情況就可以有改善。然而，我認為政府不可以常常望天打卦，等待轉吹強風來吹散污染物，而是真的要拿出魄力，制訂一套全面、可行，並且得到社會接受的環保政策，落實推行才是。

針對污染嚴重的舊型號商業柴油車，政府於2007年4月，推出更換歐盟前期(“歐前”)及歐盟I期柴油商業車輛的資助計劃，以鼓勵這類車主更換歐盟IV型的車輛，但至今成效差強人意。截至今年7月，只有21%、即12 000輛歐前及歐I車輛透過此計劃被淘汰，此計劃還會於明年3月底結束。

雖然政府為歐前型號提供了12%及歐盟I型18%應課稅值的資助，但由於換車費用昂貴，即使政府給予資助，業界動輒要花上數十萬至過百萬元才可以換車，對貨運業來說，在經營環境困難、前景又不明朗的情況下，政府只出“豉油”而要他們出“雞”，實在不可行。如果無新的誘因，實在看不到如何可以令業界有動力把這批舊車加快淘汰。

對客運業(包括公共巴士及公共小巴)來說，他們遇上的是歐盟IV型的客運車出現技術問題，過去兩年多以來，業界都不斷糾纏在這些問題上，加上歐盟IV型車輛零件很容易壞，車輛經常要入廠維修和更換零件，而且維修費高昂，令很多業界對歐盟IV型車輛望而卻步，不敢換車，雖然最近歐IV的技術問題似乎可以解決，但仍在試驗當中，業界仍不敢肯定問題是否徹底解決，所以仍存觀望態度。不過，有關的資助計劃數月後便會結束，儘管局長呼籲大家趕快換車，大家卻仍未能對歐盟IV型車輛有任何信心。

故此，我認為政府應該優化資助計劃，首先將資助期延長，讓業界有多些時間觀察歐IV車輛的表現，恢復業界對歐IV車輛的信心，放心換車。其次是增加資助金額，協助有財政困難的車主換車，例如可考慮以車輛剩餘的壽命來計算資助額，吸引更多舊車車主提早注銷他們舊的“搵食車”。這建議與剛才陳健波議員所建議的是同出一轍的。事實上，提供32億元資助金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淘汰舊車，改善空氣質素。政府應合理地充分利用資助計劃以達致這目的，而不是在資助期一旦屆滿，便說：“雖然沒有很多人換車，不過，你不更換便隨便你，我自有辦法對付你。”這是不正確的態度。

當然，除了上述的營業車輛外，提早更換舊型號專營巴士也是十分關鍵的問題。因為現時仍有四千五百多輛歐前至歐II型號專營巴士，行走於本港街道上，佔整體巴士車隊七成半有多。政府早前就改善空氣質

素提出的19項環保措施諮詢公眾時，便提出於2014年年底前，淘汰全港所有歐盟II期及前期的專營巴士，並且預計巴士車費單年要提高約15%。

我相信這麼大的加幅，要由市民全數承擔是沒有可能的。自由黨上月就此進行了一項民調，共訪問了近1 500名市民。結果顯示，接近四成市民贊成由政府、巴士公司及市民三方共同承擔增加的費用；贊成由巴士公司承擔所有費用的有四分之一人；贊成由政府全數負擔的，則有近22%。至於贊成由乘客負擔所有費用最少，只有3%不到。至於贊成三方共同承擔的受訪者中，有六成表示可以接受車費調升的幅度是5%或以下。我想，以上這個結果很有參考價值，值得政府和巴士公司商討，如何提早更換舊型號的巴士。

此外，我想談談停車熄匙。根據立法議程，相關法例將會於本立法年度的上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但具體的建議事實上仍未與所有運輸業界達成共識。自由黨差不多可說是最先站出來明言支持政府這項政策措施的，但自由黨同時希望清楚表示，我們瞭解運輸車、營業車是面臨實際的困難，因此就運輸業界合理營運的需要而言，政府是應當給予合理的豁免，這是自由黨開宗明義清楚表明了的一點。其實，業界已經相當合作，並盡量作出讓步，以配合政府這一項政策，但直至現在，大家差不多商討了超過1年，但仍然有少許分歧。最近在8月，我的議員辦事處與業界進行了一項實地試驗，在兩個的士站進行試驗，試驗結果亦向局長作出了報告。試驗結果顯示，如果這項停車熄匙政策，按現在政府向的士業界的要求實施的話，結果是對的士司機相當不人道的，他們在的士站等候時，會有需要承受40°C或以上的高溫，在這情況下運作。當然，梁耀忠議員剛才還提到，如果打開車窗又要承受路面的污染或其他的污染，這也是其中一個問題。

結果亦顯示，這計劃是很不環保，因為這樣做是不斷地停車熄匙，熄車或重新啟動車輛十多二十次之後，車輛周邊的溫度會上升至四十多度。這個試驗是在8月進行的，當天最高氣溫是32°C，所得出的便是這個結果。此外，車輛更會排出許多廢氣，而且有兩輛車在試驗之後，電池便立刻壞了。換句話說，這種做法是會損害相關車輛，車輛亦有需要換零件及換車，這些零件是相當不環保的。因此，從各方面看，這計劃也值得局長作出進一步的努力，以求真正照顧到業界的實際需要。

其實，業界一直希望能支持政府，但我很希望政府明白，如果有關計劃真的是影響到業界合理營運情況，業界事實上是難以支持的。我很期望在問題已經收得很窄的時候，大家盡量、真正能把餘下的問題解決，致令不論市民、業界及政府均可萬眾一心，共同努力攜手推動此計

劃。雖然許多人批評此計劃對環保沒有甚麼實際幫助，但不論是意識形態也好，或有少許實質效用也好，我們仍十分希望政府會覺得既然有這項政策，便予以推動，千萬不要因為有這些實際的困難，令計劃即使推出來後均受大家唾罵，或最少遭業界唾罵，我不想有這種情況出現。

除了空氣質素，本港的廢物處理政策亦是亟待改善的。雖然政府近年致力廢物回收，卻未能遏止廢物上升的趨勢。2008年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總量，便高達346萬公噸，比2007年上升0.5%，工業廢物更上升11%至123萬公噸。至於現有的堆填區最遲到2015年便會填滿，當局的確有需要另覓新的方法、新的出路來處理廢物。

對於政府屬意在屯門興建超級焚化爐，以處理都市廢物，自由黨是支持的。其實，自由黨原則上是支持政府長遠採用焚化模式解決固體廢物問題，但前提是必須引入最先進的焚化技術，確保可以做到像外國般那麼成功，做到無臭無污染，還要美化外觀，又可以令焚化過程產生的熱能造福附近居民，發電供應給社區的游泳池、植物和公園等公共設施。

當然，環保的根本之道，便是要做好3R，即是reduce(減廢)、reuse(循環再用)，以及recycle(循環再造)。但是，現時整體廢物回收率只是48%，家居廢物更只有三分之一，即仍有頗大的改善空間。當局不但要加強減廢及廢物回收，還須提供完善的配套政策措施，包括設立廢料中轉設施等，以降低回收循環再造物料的採集成本，令回收再造鏈各個環節均能運作順暢。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家傑議員：主席，本會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即將處理的一項議程，便是如何處理公共街市的租金、冷氣費和差餉等問題。

主席可能也記得，今年6月，政府倉卒地在沒有預先諮詢的情況下，試圖要求食環署轄下街市的商販接受新的租約，結果引起全港公共街市的商販羣起反對，當局最終表示順延一年，以換取時間看看應該如何處理。我亦知道在這段時間內，當局曾進行一些諮詢。

但是，主席，現時公共街市的問題，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先定出公共街市的角色，究竟政府應對公共街市採取甚麼配合的措施。如果在一兩個星期後提交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只談在哪一段時間內，把公共街市的檔位租金加至市值租金的某個百分比，我相信這會有負公眾的期望，也不是檔主所能接受的處理手法。

在6月的時候，主席可能仍記得，我們也曾討論政府帳目委員會（“帳委會”）第五十一號報告書內關於這方面的一些建議。當時的建議其實說得很清楚，便是我們必須正視歷史，妥善處理在公共街市源起時，明白當時可能是基於衛生角度的考慮，邀請一些原本在街頭擺賣的小販遷入，這些歷史因素是不能夠抹煞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究竟這些公共街市未來是為誰服務的呢？將來的顧客有些甚麼要求和期許呢？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先行理順這部分，便直接談租金的話，我恐怕這只是政府為了要向審計署署長或本會交代，便加租以做好盤數。我認為這並不能徹底處理公共街市的定位政策及方向問題，我很希望周局長可以對這方面多加留意。

主席，政府要重新檢視整套公共街市政策，除了要妥善處理我剛才提及的歷史因素外，還要靈活地向當年被遷徙的商販，作出合理和妥善的安排。

由於領匯在2005年上市後，令基層市民的消費空間出現了重大的改變，領匯轄下的街市租金已交由市場主導，間接導致物價上升，損害了公屋居民的利益，因此，政府應從更高的層次協調鄭汝樺局長和周一嶽局長轄下的兩個政策局，在領匯上市後所扮演的角色，並思考如何透過公共街市，讓基層市民分享價廉物美的消費空間。

現時不少公共街市的空置率仍然偏高，即使是地理環境或位置相當優越的街市，依然是無人問津。如果食環署的官僚思維只是正如我剛才所說般要做好盤數，藉加租向帳委會或審計署署長交代，那麼真的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樣，可以妥善處理這個問題的機會便會白白錯過了。

我在兩天前曾與一羣公共街市的商販會面，他們提出了一項建議，希望周局長願意考慮。如果我們未能一步到位地提出一套高瞻遠矚的新公共街市政策，主席，我們大可嘗試（好像政府現時很喜歡說的）摸着石頭過河。有些商販向我建議，可否跟周局長說，先揀選數個街市作為試點，並找來一些已營運二三十年的商販參與及給予意見，作為一項先導計劃，透過這計劃收集一些數據和結果，然後才為未來路向拍板。也許周局長可以考慮採納這過程，以徹底處理公共街市的問題。

我剛才聽到數位同事提到真標籤假產地的供港菜蔬問題，我也是非常重視的，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市民進食蔬菜後的健康問題。如果經常進食這些有問題的農藥，主席，將來可能後患無窮。

此外，我想花數分鐘時間談一談曾德成局長所屬政策範疇下的西九文化區問題。主席，最近我們正討論高鐵總站(即香港總站)佔用西九文化區3至4公頃土地的問題。公民黨認為這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在高鐵總站落成(即2015年)之前，當局是不可動用那3至4公頃土地的。直至目前為止，政府當局仍未有很好的解釋可令我們安心。當然，日後財務委員會仍會繼續討論和跟進這問題。

可是，更令我關注及感到憂心忡忡的是，政府花了現金216億元和數以千億元計的土地資源打造西九文化區，我們當然希望它可以幫助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因為公民黨認為一個好的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催生一個多元文化、包容和人本的文化氛圍，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不過，令人憂心的是，當局似乎仍是以表演項目帶動西九文化區的思維，推動西九項目。如果要舉一個比擬，政府現時建構西九文化區的辦法、方式和思維，便猶如是建構一個文化藝術主題公園般。我和公民黨最想看到的是，香港的西九文化區在世界文化藝術的版圖上找到一個位置。究竟我們的文化藍圖是怎樣的呢？主席，最好當然是我們先天下之憂而憂，挺身負起接受現時世界文化藝術範疇所面對的最大挑戰的責任，並利用西九文化區處理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最理想的，因為這樣便可為香港定立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可惜的是，直至目前為止，我也看不到這方面的論述，這是令人非常憂慮的。藝術發展局已營運多年，我們可否從其檔案中找到相關的數據，讓我們知道面對內地甚至世界，香港可以在哪個位置切入。可是，我從未聽過有這方面的研究。舉例說，我們會否補送大學生往外地留學或工作，以便將來西九文化區有足夠的人才營運，但我們也看不到有這樣的構思。即使是軟件方面要投放多少資金，也引起了不少爭拗。我聽過有官員說立法會的撥款並不是花在軟件上的，只是用於興建硬件。至於軟件方面，可能曾德成局長日後要從他的封套抽調資源來推行也說不定。我也不知道這種說法有多真確，但如果是真的話，便會令人十分憂慮了。公民黨的看法是，政府要興建一個世界級的文化藝術都會，投放在軟件的資源應較硬件為多才對。

我們有一籃子的憂慮，但由於今天時間有限，只能把輪廓勾劃出來。我很希望局長日後會在本會的西九小組委員會和其他場合，跟我們多作交流，好讓我們更安心。

謹此陳辭。

黃國健議員：主席，環保是近年來一個非常流行且討好的詞彙，所以對於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推行環保政策，我當然要表示贊成和支持。這次施政報告提議派發慳電膽券所引發的風波，我相信也是政府始料不及的。我想在此問問邱局長，你是否覺得很窩囊呢？局長本想向某些政黨示好，但出事後卻沒有人站出來為他說句公道話，我也替局長感到冤屈。

主席，我想引述一段文章送給局長。這段文章是由一位政治傾向非常明顯的學者蔡子強所寫的。我現在開始引述其中一段，內容是：“今次慳電膽事件另一有趣現象是，正如多份報章早已提過，翻查過去資料，推廣使用慳電膽是不少議員及環保團體的共識。公民黨早已建議推出慳電膽換領券，與今次施政報告的建議如出一轍，而綠色力量、地球之友等環保組織，亦倡議過類似的建議。如今有人建議政府撤回有關政策，我不是一個環保專家，希望有更多擁有環保知識的人士，告訴我們從政策層面和專業知識來看，究竟慳電膽是不是值得以政策推動的設施？但卻發現事後(不是事發前)，直至此刻為止，他們卻統統缺席，在一個環保團體原本最有資格發表意見的場合，統統缺席。我想，如果環保真是他們的信念，而不是純粹一種時尚、討好的行徑，即使面對壓力，他們也應該出來道出一兩句公道話的。”我繼續引述：“今天，踩政府是毋須成本的，無論有理無理，都能輕易贏得掌聲；但相反，為政府政策說一句公道話，無論有幾堅實的理由，都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氣。”(引述完畢)

局長，我可以告訴你，我到社區參加了多場諮詢會，街坊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部分羣眾均接受慳電膽，也願意轉用慳電膽，但卻反對增加電費，因為他們認為不應以加電費來強迫他們轉用環保的慳電膽。有些人認為不單是電燈需耗電，洗衣機、雪櫃、電視機和冷氣機等也要用電，故此不能單純為了慳電膽而增加電費。因此，我在此強烈要求局長修改這項政策，順應民意，取消增加電費的措施，但我們對於派送慳電膽當然盛惠。

其實，推動環保政策應以引導、教育為主，對於會影響很多人的政策便要耐心溝通，與受影響的人一起想辦法解決，而不是動輒便搬出環保這頂高帽壓人。例如強制停車熄匙的措施，對營業車輛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業界現時的反彈情緒很大。我想再次提醒局長，應該深思熟慮。如果強行推動這項停車熄匙措施而不跟業界磋商，也不解決他們所反映的種種困難和困境，便會激起很大的民憤。

主席，推動環保當然還有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六大產業之一的環保經濟。我認為要推動環保經濟，必須落實執行，而不是空談的。政府談環

保經濟已經很久，但在扶助環保產業方面卻做得很少。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觀塘區的廢紙回收出口碼頭共有12個回收商，他們現正面對迫遷的問題，但為了社區的和諧安定，也願意遷走。很可惜，政府一直沒有關心他們，為他們物色一個合適的地方，讓他們繼續目前的聯合經營模式。這種聯合經營模式是有實際需要的，因為可以互換碼頭、互用設施和互相支援，藉此減低成本，對於他們繼續營運起着很大的作用。他們表示願意遷走，但希望仍然可以聯合經營，以達致減低成本之效。對於如此卑微的要求，很可惜，政府至今仍未有切實的答覆，我希望在特首現時提出以環保經濟作為我們六大產業的重點時，局長會對這問題多加關注。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主席，有關慳電膽的問題，我們數位同事在社區上曾進行不下數十次居民大會，與居民進行討論。對於增加電費，市民表示很強烈反對。市民的着眼點不是政府只想着那24元的問題，而是他們覺得是否甘心付出的問題。因此，我希望邱騰華局長能多聽取市民大眾在這方面的意見。

主席，施政報告中提及要推動電器和電子產品的生產責任制，我們對此表示歡迎。現時香港的廢物數量越來越多，固體廢品的數量也是不斷上升，當局表示會分期興建回收中心，處理工商業廢物或廚餘，特別在廚餘方面，會作更多用途的使用，例如製成堆肥和生物氣等有用資源，工聯會是支持上述的方案。

現時本港每年有超過600萬噸都市固體廢物須運往堆填區棄置，以前年為例，香港製造了136萬噸容易腐爛的廢物，當中超過七成是來自一般家庭。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盡快制訂可持續的廢物管理策略，以應付將來堆填區面臨飽和的局面。

現時，香港鄰近一些國家和地區早已推行廚餘回收，而且頗具成效。以台灣地區為例，當地廚餘的回收率達35%，成績應該尚算理想。廚餘經過回收和分類之後，又可以培植真菌，之後成為肥料，我們覺得這是符合廢物利用的原則。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着眼，雖然在投資興建與營運有關設施的初期，可能要投入很多資金，但此舉在處理廚餘的同時，也可節省市民在購買肥料與運送廢物往堆填區的成本，亦可創造更多與環保有關的職位，我們覺得這對增加就業是有幫助的。

事實上，現時我們有很多有用的物料，因為沒有分類回收政策而被棄置在堆填區，例如玻璃樽、木筷子和電燈膽。工聯會強烈建議推動一項整全的回收分類政策，以減輕堆填區的負荷，避免擴大堆填區，我們亦認為此舉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我們認為，如果廢物分類做得好，便可以無須考慮一定要興建焚化爐這類厭惡性設施。以台北為例，據我們瞭解，它的堆填區已改建為公園，而原有的焚化爐亦有餘額燃燒其他城市的廢物。因此，我們覺得其他地方既然可以做到，為何香港卻做不到呢？我認為政府應考慮制訂一個整全的廢物回收分類計劃，並用更多時間和精神來推動。

最後，在環保方面，我們要再次提及停車熄匙的問題，因為這事已迫在眉睫。我希望有關政府部門認真考慮汽車及運輸從業員的心聲，也考慮他們的實際困難，在草擬這項法例時，更要多考慮他們的意見。我們不希望政府每次把這些法例提交立法會時，都形容相關從業員的利益與整體社會的利益存在衝突。我們希望政府知道，相關從業員與整體社會其實並沒有利益衝突，而我們更希望在立法的同時，政府會多考慮一些實際因素，協助業界在符合新規定之餘，也可讓大家在環保方面出一分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

林大輝議員：主席，曾局長，今年政府的施政報告在體育政策方面可謂“慳水慳力”，整份報告的有關內容只有短短3段。這短短3段又欠缺新政策，全部都只是談及東亞運動會，在我角度看來，這嚴格而言是交白卷。

局長，我想重複再重複表達，我十分支持東亞運動會，你知我知，我是很支持的。我當然很希望東亞運動會可以辦得有聲有色，有板有眼，成為國際盛事，以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但東亞運動會在12月便會結束。其實，政府不應這麼短視，整份施政報告只提及東亞運動會。政府應趁着這個勢頭，制訂一個周詳的全年或多年計劃，利用市民熱愛體育的精神和情懷，推動運動和體育發展，當然亦可以藉此引進更多商機。

其實，香港可將體育發展成為一種產業。體育可以為香港創造商機和製造就業機會；舉辦更多國際賽事和會議，絕對可以帶動飲食、餐飲、運輸、零售等各行各業，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計劃將體育以產業的目標發展，制訂和推行相關政策。通過舉辦國際賽事和會議，不單可以提升香港在國際體壇的地位，亦可喚醒和刺激全港市民對體育的關注，從而幫

助推動發展本地精英體育和全民運動。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袁偉民也指出，“靠多拿金牌證明中國人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體育要實現更高的目標，為增強全民體質……服務”。所以，特區政府應有效地投放更多資源，在基層推動體育發展，推行全民運動計劃，將體育活動辦得更具地區性和普及化，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體育活動。

事實上，將體育發展地區化和普及化，可促進社會和諧。如果有機會，我很希望可以和局長分享一下如何發展地區足球，箇中是有很多苦況，而且缺乏資源。我希望當局可關注這問題。此外，我也希望局長關心每年的體育節，投放更多資源。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相信大家都希望香港體壇能有更多像黃金寶、李麗珊、趙詠賢、蔡曉慧、傅家俊等的傑出運動員。所以，政府必須制訂針對性的政策，加強資源培訓體育人才，包括運動員、教練、訓練員、運動心理學家，甚至體育行政人才。對這些精英運動員一定要有針對性的支援政策，安排他們的學業、就業，甚至置業及退休生活，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可以全程投入訓練，為香港爭光。

現時香港社會有很多青少年和學生問題，包括吸菸、援交、高買、失業、失學，我大膽的說，間接都是因為香港沒做好體育發展，原因是體育運動不僅令青少年和學生強身健體，其實藉着參與體育活動，可以訓練、刺激和啟發青少年學生，使其堅忍、努力求進步、有紀律、有勇氣、有目標、有毅力、注重合作和團隊精神，以及發揮互助互愛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辦好體育，有好的政策推動，可間接幫助政府解決很多教育、治安、醫療和就業等問題。

政府應增加向學界提供資源，大力推廣體育運動；多撥經費予學校，幫助學生和青少年學習運動、參與運動、參觀比賽；多撥款項獎勵有優秀表現的學生，以及多撥資源讓學校聘請有質素的教練和訓練員，以提升學界水平。

主席，國家的體育發展至今取得驕人的成就，特別在奧運會後，更是一日千里。究其原因，就是國家體育總局以內行人領導內行人，專業運作。現時國家體育總局內副局長級的領導，全部都是運動員或從事運動工作者出身。在這方面，香港政府可引以為鑒。政府應邀請更多運動員，包括現役或退休的運動員，以及在體育圈子有經驗、熱誠和抱負的人，加入政府的體育委員會，為政府出謀獻計，制訂政策，以及推動和落實有關計劃。

長遠而言，政府可考慮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常設體育總局，以便專注和專業地制訂體育政策，長期推動精英體育及全民運動。我相信香港在這兩方面都會有大突破和成績，屆時香港社會也會少了很多青少年和學生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看到大家討論慳電膽談得如此高興，所以我也想加入討論，雖然我餘下的發言時間有限，但我也覺得值得談一談。

有人說慳電膽事件是邱局長沒有想清楚的舉措，結果連累特首。我相信這政策出台之前，邱局長也想不到會有這效果。一個本來看似挺好的計劃，一般市民每年可能只須多付24元，便可以領取100元贈券。如果不是購買特首親家代理品牌的慳電膽，100元應可購買4個慳電膽，以前甚至可以買5個，這是我太太告訴我的——我們買的雖然不是甚麼大牌子，但也是用得過的——現時100元也可以買4個。本來這計劃挺不錯，但局長可能沒有想深一層，原來很多人不止要付24元，可能還要多付很多倍，有些人可能在領取贈券後，還要補貼很多錢才能更換燈膽，因為要付安裝費，或更換燈座等配件。

一個原本以為會受到歡迎的政策，想清楚之後，原來會引發這麼大的問題。因此，我們覺得當局在推出環保政策前，真的要很小心，因為很容易引起爭議，所以要多聽意見，特別是受影響人士的意見，避免閉門造車，因為閉門造車往往會碰釘。現時遇上如此大問題，便引發社會上提出了這麼多意見，不過，解鈴還須繫鈴人，請局長運用你的聰明才智來收拾此局面。

至於加電費，那便真的不要推行了，這點大家也說得很清楚。你想想，那些贈券從何而來？此外，贈券的用途也不要這麼狹窄，只可用作購買慳電膽，因為現時有很多環保新產品，例如LED燈等，政府可能要擴大贈券的使用範圍了。我知道有些新產品很昂貴，100元可能不足以購買半個燈膽，但最少要能給市民多一個選擇。

此外，我想藉此機會說一說，為何市民最近對加電費有如此大反應呢？原來最近燃油附加費上升得很厲害，我不知道局長是否掌握有關資料。有人不明白，油價已下降了，為何電費內的燃油附加費仍是這麼貴的呢？原因為何？因此，政府再說要加電費，市民的反應便會更大。局長真的要留意，最近兩電的燃油附加費已大幅增加。原因何在？政府有否監察？我希望局長解釋一下，讓大家知道。

還有一點我想說的是，現時市面上有很多新的環保設施和產品。最近有朋友告訴我一些資訊，但我不大掌握詳細內容，亦不知道他的資料是否準確。他說有一種海草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令空氣清新；如果到處廣植這些海草，可能比推動甚麼環保巴士、停車熄匙等政策還要好。有些工作可能較易做，更容易獲得讚賞，因此，局長要不斷留意有何新科技。我不知這是否可行，我只是聽到其他人這麼說，便告知局長，我未曾對此作出查證的。我的發言就是這麼多了。

方剛議員：主席，我對這一節的辯論主題“優質城市、優質生活”感到有點恐懼，原因為何呢？因為近年的施政報告為了達到這個主題的目標，採取的措施均是一面倒的，例如說空氣質素欠佳，便規管消費品釋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說垃圾增加，便要徵稅，一句“用者自付”，便嚇怕了市民大眾，令他們不敢隨便更換電器產品；慳電當然是好事，於是又強迫市民收取慳電膽券，如果市民不用便吃虧，因為無論如何，電費也是會提高的；香煙可以致癌，政府便修例全面禁煙，令煙民只可在街邊或回家關上門來吸煙；發生了禽流感、孔雀石綠、蘇丹紅，於是全部有關食物都被禁止；香港人的性命特別矜貴，所以要有一套特別適合香港人的預先包裝食物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然而，事實又是如何的呢？

香港規管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措施，全部較珠三角的嚴厲，但內地只取締了小型水泥廠，成效便超過香港禁止所有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的措施。持有兩地車牌的車輛，日後只得在內地進行維修；當局一招水溶性漆料，便可能令香港的汽車維修業大幅度萎縮了。

環境局局長之前說過，實施膠袋稅後，每年可減少使用8億至10億個背心購物袋，大家於是絕對贊成。可是，昨天公布的數字顯示，每年只可減少僅僅多於1億個背心購物袋，但卻因此多用了多少個垃圾袋呢？我相信局長是心中有數。現時，政府向電器產品“埋手”，要消費者交接金，又要經銷商收集廢棄的電器。但是，政府除了以法例、指令、口術來迫使業界和市民承擔責任外，政府本身又承擔了甚麼責任呢？

就慳電膽消費券，我昨天也說過了，這根本就是“諗縮數”的典範。在審議能源效益產品標籤的有關法例時，我們說過，如果高能源效益產品能幫助市民節省金錢，根本無須立法，市民亦會揀選高節能的電器。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第一期的涵蓋範圍包括慳電燈膽、冷氣機和雪櫃，但局長在立法會休會期間，宣布擴大至涵蓋抽濕機和洗衣機。如果政府真的想透過派發消費購物券來鼓勵市民節約能源，沒有理由只傾斜於單一產品，而應該全面應用在高節能的產品上，尤其是長時間使用的雪櫃或

高耗能的抽濕機，而不是每天只用數小時的慳電膽。政府應採用誘因鼓勵市民環保；如果市民可以節省金錢，便會逐漸改變習慣。試問政府怎麼可以因為電力公司可能因此收入減少，而要市民向電力公司支付更高的電費？我想問問政府，除了電力公司因受保障而使其生意額永遠只升不跌之外，還有哪個行業會有這樣的得益；如有，也讓我來分一杯羹好了！

我們要確保公帑用得其所，而用在改善環境污染方面的開支，我相信大家亦會支持。其實，剛才很多同事都表達了相近的意見，再者，全球哪個發達國家的環保工作、發展環保再造的產業是沒有政府參與的呢？行政長官把環保產業定為未來六大產業之一，但除了一些環保措施、推廣清潔生產夥伴計劃和擴大政府環保採購外，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具體計劃。其實，這是一種很有前景的產業。

主席，自由黨絕對支持環保，亦支持環保產業。但是，我們希望政府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及訂出完整的發展藍圖，尤其是3R(減少、回收、循環再造)供應鏈的後兩項。工商界絕對不會置環保於不顧，我們很願意跟政府、社會和市民一同攜手合作。

儘管另一項議題已經塵埃落定，但我仍想在此稍為提及的，便是禁煙。政府推行全面禁煙的最大考慮，是醫療開支增加及市民因吸食二手煙而引致的健康問題。至於營商者的困難，根本不在政府考慮之列。可是，政府在打壓銷售完稅香煙經營者的同時，卻為走私煙帶來越來越大的市場空間，有醫生已明確指出，絕大部分走私煙是含有不良物質的假煙，對吸食者的健康遺害更大。然而，政府不單沒有正視假煙的害處，最近更有業內人士透露，食物及衛生局更向執法部門表示，希望他們不要跟煙草公司攜手打擊假煙。

如果消息屬實，我真的感到很震驚，香港究竟變成了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呢？對於持牌守法的經營者，政府實施大量規管，但卻容許不守法者有很多賺錢的機會。報章也曾報道，持牌酒吧一天晚上可被查牌3次，還可能在凌晨2時後不准賣酒，但無牌酒吧卻全無顧忌，無須申請酒牌、無須禁煙、無須查牌，因為它們是無牌經營的，政府根本無權入內搜查。

同樣地，水貨客由深圳拖着一箱箱沒有出口許可證的雞蛋和水果入境，因為邊境沒有管制，政府不可以禁止入境。可是，這些食物一旦流入零售市場引起問題時，後果會由誰承擔呢？又是持牌的入口批發商。既然目前人人也可以攜帶食物入口，我想請問局長，明年將推出的食品安全條例，究竟目的何在？是否能夠達到立法的美好願望？

難道有關預先包裝食物營養資料標籤的經驗，還不足以令政府醒覺？官員可能以為把一個列表放在食品標籤上，讓市民看到一些資料便足夠，卻完全不知道食品的製造方法不同，化驗方法便會不同，得出的營養資料亦可以有很大差異。業界以認真負責態度配合立法工作，卻一而再被政府官員指業界有心拖延。

我在這裏事先張揚，在明年7月1日法例實施後，我會邀請一些國際傳媒來港採訪，讓他們看看貨架上外國著名的健康食品，如何為了要符合香港法例而被塗得一些黑，一些白，讓他們看看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法例是多麼“懶居”、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優質”城市、國際人士可以在港如何過“優質”生活。

主席，我認為一個優質城市應該以人為本，優質生活要由一個以市民為本的政府來施政和管理。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黃成智議員：主席，優質城市，優質生活是好的，但有個“憂質”政府便不好了，這“憂質”是擔憂被人質疑的政府的意思，這樣便真的沒命了。

局長很擔心，即周局長很擔心菜販會“質疑”他，指入境的蔬菜之中，很多是屬於真標籤假產地的，於是他便聯同眾多人，指他們虛構作假。我在這裏坦白對局長說，進入內地調查及跟進此事件的，是我自己的一位同事和身旁的一位相熟的區議員，他們絕對不會說謊。最令菜販感到非常失望的是，黃容根議員居然在議事堂上在沒有證據，亦沒有經過調查的情況下，大聲地指稱有人虛構作假——即自編自導。就這個情況，我剛才收到一些菜農打電話給我，要求我立即回來，站出來發言……

(黃容根議員舉手示意)

主席：黃容根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黃容根議員：主席，黃成智議員指我沒有證據，他說我虛構作假。

主席：如果你想就黃成智議員對你的發言內容的指稱作出澄清，你便要先讓黃成智議員發言完畢，然後才可澄清。

黃成智議員：菜農打電話給我，要求我立即在議事堂內提出抗議，對黃容根議員剛才的發言表示不滿，也希望局長盡快作出安排，好讓他們向局長提供證據，並進行詳細商討，以瞭解究竟整個流程是怎麼樣，出了甚麼問題。他們甚至邀請局長和海關的人員，可以約定在某一個晚上，在某一個地方，視察車輛過關時，並立即進行檢控及逮捕他們，這樣便完全可以找出這些問題了。所以，希望局長正視香港是提供優質食品的地方，而不要成為要擔憂別人質疑的政府。

此外，就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方面，我今天仍要談論賭博問題，因為我知道去年推出了很多賭博政策，突然要增加數天的賽事。然而，現時有很多投注站設立在學校附近——我翻查過很多資料而得知，它們其實是不應設在該處的。我想提出一個例子，我今早靜悄悄前往東涌逸東邨，發現該處在3間幼稚園樓下興建了一間投注站，毗鄰有2所小學、3所中學，即有很多學校包圍着這間投注站，當局居然容許這間投注站繼續經營，這樣做已違反了《賭博條例》。希望局長在未來會關心一下年輕人，不要讓他們陷入賭博之途，要在賭博政策上把好關，以求真真正正推行不鼓勵賭博的政策。多謝主席。

黃容根議員：主席，黃成智議員剛才指我說謊……

主席：黃容根議員，我們不能將澄清變成辯論的延續。你只須簡單說出你剛才的發言內容便可以了。

黃容根議員：剛才我的講稿裏說有人自編、自導、自演這場戲，是關於入口走私菜的問題，事情便是這樣。我又指出由下月1日開始內地政府會加強堵截等，我沒有在甚麼地方開罪你吧，黃成智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正想說，這句“自編、自導、自演”的話是有多個含意，民建聯的同事稍後可以……或許黃容根議員也可以再澄清。因為剛才聽到其他同事說，有人自編、自導、自演，你們是否說黃成智的職員自編，接着自導，找一些入口的“無牌菜”，然後自己做“大龍鳳”般說發現這些情況？如果說有人這樣自編、自導、自演，主席，便意味着要質疑某些同事做“大龍鳳”。ICAC廉政公署以往說的“假數王”，其實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有關同事所謂的自編、自導、自演的意思不是這樣的話，則請你澄清，因為這是一項很嚴重的指控。

主席，讓我說回這一節的另一項議題，剛才是說關於食物安全，現在我要說的是環保慳電膽的問題。主席，我不是民主黨的環保發言人，但我實在收到太多市民對此發表的意見，所以我希望從其他同事未說過的角度跟局長和政府研究一下此問題。

我曾在報章上說過，現時的做法類似環保稅的徵收，而如果真的要徵收環保稅或作出強制的行動，那便有需要把做法提交立法會通過。為何我指現時的做法是變相的環保稅呢？因為所派發的贈券或名為百元券的贈券，事實上令我甚有理由相信這做法最後可成為電力公司按照原本規管架構，將來額外考慮的一個增加電費的因素。若然如此，政府等於變相強制市民換取100元慳電環保的設施，另一方面，就政府代表市民與電力公司簽署的協議而言，這項措施可成為政府准許電力公司考慮一個增加某數額電費的相關額外因素，令“羊毛出自羊身上”的情況可能發生在市民身上。

這樣的邏輯如果極有可能發生的話，政府即是變相強制市民更換燈泡。我沒有說其他政府、其他國家或其他司法管轄區不曾為了環保、為了拯救地球而強制市民做一些事，它們甚至可能共同藉訂立一些協議取締某些產品和化學物品，而市民可能要付出更多的金錢。但是，若然如此，便很可能有需要透過立法來強制執行，而不是像現時般偷天換日，偷換概念地變相“使橫手”，致令電力公司好像是派慳電膽券，但倒過來卻是向市民收回金錢，這做法等於從某人的口袋裏拿錢要求他換燈泡，所以這做法便有問題了。

剛才，譚耀宗議員說“解鈴還須繫鈴人”，其實應改為“解‘膽’還須繫‘膽’人”。政府現時應考慮改弦易轍，我尤其覺得如果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政府可能會蒙上一個很大的污點。政府在某程度上是繞過了立法會來行事，當然，繞過立法會行事的事例其實不少，有很多可能尚未被挑戰，但我相信以現時的風頭火勢，加上對關於特首姻親的資料的報道，我相信政府有機會輸官司，而如果政府輸了這場官司，我相信政治後果是相當嚴重的。

我們民主黨支持政府用政府公帑或其他誘因來進行此事，而不是叫市民用自己口袋裏的錢來購買。當然，你可以說“過往的收入累積在庫房，政府付錢也等於市民付錢而已”，可是，最低限度在概念上，政府出資行事，不足以構成市民可以進行司法覆核的理由，因為這樣做是行之已久。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小心聆聽市民的意見。

方剛議員剛才提出了所謂打擊走私煙的問題，我個人對此亦有聽聞。當然，我是從保安的角度來看此事，我還聽聞有“暗盤”，表示要放

輕手腳，不要打擊這些活動太多。這是一項頗嚴重的指控。但我真的與方剛議員……即不止一位議員聽到，是兩位議員都聽到，如果事情屬實的話，便希望政府在海關執法或其他範圍內小心處理此事。

最後，主席，我想說關於民政事務局局長處理有關某位社工在大澳的事件。我覺得這事件影響相當深遠。其深遠之處，在於即使我接受政府或民政事務局局長所述的最好版本(即較早前，我們在口頭質詢時，政府所說的最好版本)，即使採用他最好的版本來演繹，他其實已負上一個最後的重要政治責任。因為當他感到有些問題，有人向他投訴某處出現不和諧或有值得關注的地方，他自己便應該前去調查清楚，或搜尋足夠的資料，令自己信服某個機構或某名社工或某一隊人，真的產生了一個政府或局長認為已影響了社會或該地區的和諧的問題。如果他經過調查清楚後，真的認為該事件已影響和諧，挑動仇怨，甚至引起種族衝突，他提出關注便是應該的。

但是，這得要確定在政府或局長的心目中何謂和諧。例如，有些前線社工恆常按照其機構跟一些受資助團體(如社署或其他如市建局也可以)所簽署的備忘錄，履行一般的工作。這樣，這些所謂社區隊(包括某位社工或整隊人)為市民爭取權益、爭取改善設施而表達意見的過程中，有否做出了一些遠遠超乎他們作為社工應做的行為，或曾否推動某些政府不能接受的價值觀念，又或挑起某些種族衝突或對抗的事件致令社會不能接受的？抑或是該社工或該隊人的行為純粹從居民的角度，為了較好地表達意見，使政府在某程度上受壓，但實際上是對政府施政的一個當頭棒喝，一個善意的提醒，甚至可以說形成一個出氣的管道？如果事情是如此的話，我認為一個成熟的政府或局長便應該有一種量度、有這個價值觀、有這個視野來看清楚情況究竟是否這樣，是否應該如此介入事件了。

我希望局長甚至其他政府的官員真的要很小心處理此事件，否則，以後是無法幹下去的。試想想，那些社區隊伍自從十多二十年前以來，他們之中，有些前輩在數十年前已開始這樣工作，所針對的是所謂山邊木屋以至十多年的天台屋，甚至是目前所說受市區重建影響的樓宇，他們無時無刻都接觸到很多在社會底層、受剝削的弱勢社羣。他們會替這些人做事，包括協助表達最好的論據，或替他們找適當時機來進行抗議、請願、示威、以至到立法會作證，甚至引導傳媒聚焦報道他們認為不公平的事。其實，在成熟的社會裏、在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之中，這些行為是絕對容許的。政府甚至要感謝這羣人，政府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便必須做，否則也應資助這樣的一些隊伍來這樣做。政府只有如此才能使社會有機會達到很高層次的和諧，而並非把所有事都壓在地氈底便算，如果只是這樣的話，社會是不能健康地發展的。

我希望局長可以深切反省這件事，而其他的政府官員也應如此做。因為我可以告訴你，我自己看這件事已達至嚴重程度。如果有人真的想殺一儆百，想藉這事件令前線某些社工、代人爭取權益(不論在人權、社區環境的改善或任何方面)的人騰騰震，失失慌，甚至要令有關機構以後凡向政府 bid 撥款或求取政府合約時都會感到惶恐，以致覺得要小心選擇僱用的隊伍，甚至要叮囑那些主任級的人員看着幹，即如果政府真的想達到這目標的話，今次可能是成功了。但是，我希望政府最高層想清楚，如果真的達到了以上目標的話，各方面不會因此而變得和諧，反而會令政府逐漸失卻很多提醒政府的機制，以及一些能夠令政府反省、改革和改善的途徑。

劉江華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回應一下，剛才黃容根議員的演辭中提及那個自編、自導的個案，其實並沒有指明是誰。所以，如果同事自己對號入座，那便沒有辦法了。

最近似乎特別多杯弓蛇影的事情，剛才涂謹申議員所說的甚麼和諧事件，也是杯弓蛇影的。我認為對人不對事是不理想的，為了小事而大吵大鬧，也是不太好，真的會不大和諧。我認為香港社會不應內耗，太多杯弓蛇影的事情會弄致人人自危、互相指責，這對香港並沒有好處。香港現時其實處於一個十字街頭，如要繼續發展和進步，便得摒棄一些陋習，向前發展。但是，很可惜，今天的香港社會令很多香港朋友也感到很擔心。

主席，我想說回施政報告的一些政策。在施政報告發表後，雖然很多市民也認為有不足之處，但我本人卻認為是務實的工作，讓市民可以看到有些甚麼發展前景和新產業，令不止我們這一代，甚至下一代，在就業和經濟發展方面也有前景，這是相當重要的。當然，這不是說說便成，關鍵在於如何落實。

關於環保的問題，今天很多同事也提過環保慳電膽，所以我不想多談了，不過，我相信局長是會聆聽各位的意見的。事實上，過往很環保措施，包括環保袋的推行便相當成功。其實，在推行環保袋前，當局做了很多搜集和論證的工作，也聆聽了很多市民的意見，議會亦有共識推行。我相信這次慳電膽的措施同樣可以優化和微調，能夠集思廣益，從而達到局長或特首所希望達致的環保目標。

電動車是一種世界潮流，而這種新能源將來也一定會繼續發展。最近，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研發的MyCar正式開售，很多局長均有到場

支持，包括Rita在內。我覺得它的外形也不俗，但聽那裏的負責人所說，政府並沒有選用這部車，儘管很多機構例如機管局和港鐵公司均有選用。當他說政府沒有選用時，我想我和很多香港人的心一樣感到有點難過，原因是這部由香港人研發和製造的電動車，的而且確令我們感到十分自豪的。

我們先後引入了日本和內地的電動車，但為何對於香港的電動車，我們卻不給予支持和鼓勵呢？當中可能存在很多不為我們所知的困難和限制條件，但在有限的條件下，我們可否給予適當的支持和鼓勵呢？這對支持香港繼續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我其後接觸過理大的教授，我覺得他是很有熱誠的人，他會把車改良，甚至會把這部車“升呢”，由兩座位改為4座位。現時的車速可能較慢，但將來可能會加快；現時的行車時間可能較短，但將來的行車時間會較長。他會再繼續研發。政府可否在研發方面給他更多支持呢，特別是他很希望香港的有心人士或廠家，可以在香港設廠？

他會碰到些甚麼問題呢？土地又如何呢？我們現在說六大產業和開放活化廠廈，可是，主席，汽車是不可以在工廠大廈內生產的。故此，我們的環保園可否提供一些協助呢？雖然環保園原來的用途不是這樣的，但在有新項目時，我們的政府能否作出迅速的回應——特別是這個是多麼好兼且香港人引以自豪的項目？在研發和生產方面，尤其是它有意打入內地市場，我們又應該給予甚麼支持和鼓勵呢？我認為在這方面，政府是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保育的問題，施政報告提出保育中環，不少市民表示讚賞。然而，當我們前往中環以外的地區時，當地的居民便會問為何沒有他們的份，以及為何該區沒需要保育。我特別到過北區早前發生水浸的地方，當地居民問我，為何政府可以錦上添花，卻不可以雪中送炭？這些聲音我們是聽到的，我當然也很明白。不過，全港18區要保育，包括譚主席提到屯門、沙田也要保育。又例如我聽聞在大埔區，文天祥的後人有一座寺廟，由其鄉村負責打理，而且亦打理得很好，惟獨是廁所的衛生卻非常有問題。他們跟政府討論了很久，但甚麼也做不到，所涉者單是一個廁所而已。

因此，關於政府的資源，這次當然可以集中在中環的保育方面，但其他地區——我們現時談論開發邊境，但卻不能總是談在哪裏建樓宇或洋房，正如今天的報章也報道——更有需要考慮整項保育的設計。

所以，如果政府認為人手或資源不足的話，我想提出一項建議。我認為，現時民間的智慧和公民的力量是相當重要的，而18區的區議會絕對可以成為政府的好幫手。如果給它們一筆基金或款項，由它們負責區內的設計和保育，它們一定熟知哪裏要進行保育、哪個廁所要進行維修或某些地方的樹木應怎樣栽種等。所以，曾局長其實可以跟發展局合作，盡早讓18區區議會參與其中。我相信四百多位區議員的腦袋，必定勝過一位局長的腦袋。如果能夠及早讓市民參與保育政策，我相信必定勝過我們臨時拍打腦袋來進行這些工作。

所以，我期望曾局長會鼓勵區議會，給予它們一些資源，聘請專家進行規劃的工作。民建聯過往亦曾做過數份相當成功的報告，當然有時候在交給政府之後，便一如譚主席所說般，石沉大海，沒有下文。但是，我認為是必須作出跟進的。民間是有專家的，民間也是有智慧的。

關於創意產業方面，政府已成立創意辦公室，我們對此期望甚殷。事實上，民建聯最近走訪了珠三角十多個城市。在我們到過的那些城市，它們仍認為香港的創意相對於內地，是擁有領先的地位的。因此，它們十分希望跟香港合作。我認為，從市場和產業基地的角度來說，單看香港的創意產業是不足夠的。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為誰服務？我們是提供優質服務的城市，包括創意產業，但為誰服務呢？單是700萬名市民的市場是不足夠的。

我們在中山看到古鎮的燈飾，我不知道局長有否到過那裏，它的產品佔了全世界七成的市場。但是，他們表示很想有香港的創意人才協助其提升質量。我們也到過東莞，那裏的人也有相同的看法。

可是，如何充當促成雙方合作的媒人呢？最近，香港科技園舉辦了一個展覽，展示了很多學生的創意，傳媒的報道也相當吸引。然而，有了創意之後，在哪裏生產呢？賣給誰呢？如何成為產業呢？我認為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建議局長應與一些內地城市合作，甚至跟一些專業服務地點或機構保持緊密的聯繫，瞭解他們的需要是甚麼，香港可以提供些甚麼，然後在中間提供一個接合點。我認為局長應該可以擔當這個角色。

其實，香港是一個優質服務的超級市場。如果任何內地產業要在香港找優質的服務，隨時可以找得到，只是現時包括創意產業的機制有所欠缺或是不足而已。

主席，我想談一談文化和體育。其實，曾局長有很多好消息，包括關於黃金寶的，而我們這次在全運會的成績亦是相當理想的。當然，這

是不足夠的。大家也很擔心，黃金寶是否後繼有人呢？我們從政的人其實亦一樣，經常也會問有沒有接班人，道理是一樣的。如果我們不做工夫的話，是很難培養接班人的。體育的情況也一樣，最重要的是令他無後顧之憂。我們看到黃金寶的師弟均十分年輕，他們在往後十多二十年獻身給單車，之後怎麼辦呢？所以，必須令他們無後顧之憂。剛才我寫了一張便條給林大輝，這陣子的足球相當活躍，但不少行家對我說，單是香港是不足以支持一個較繁榮的足球市場的。有些人問香港究竟是否可以參加中超聯，如果可以的話，那麼將可大大刺激其商業元素。未知局長有否就這方面進行探討呢？

西九計劃現時正值諮詢期，其硬件當然有很多人設計，但我們完全認同，如果現在仍不開始設計軟件的話，屆時便會出現問題。我在最近一兩年也有欣賞藝術節的節目，我認為是十分成功的。我曾查詢相關的紀錄，這數年藝術節的觀眾入座率達到九成以上，我相信這是世界罕見的。最近由康文署舉辦的“絲綢之路藝術節”，入座率同樣達到九成以上，這其實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我在20年前也曾帶領一些話劇團，參與有關的工作。二十年前的話劇真的很少人欣賞，十分辛苦，我們要探討如何培養觀眾和走進學校。二十年後的今天，可以看到不少話劇的入座率非常高，所以，由現在開始培養觀眾是非常重要的。局長是否應在眾多培養觀眾的方法中擇優而取呢？我認為有些是不大可行的，但有些諸如藝術節等的培訓 —— 我曾詢問為何藝術節只在春季舉行而在秋季舉行，原來是關乎資源問題 —— 政府可否提供資助，俾能累積更多觀眾呢？大學為大學生提供了一些資助計劃，大學生其實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他們畢業後便擁有購買門票的實力。因此，可否恢復大學生的資助計劃，吸引他們參加文化藝術活動，這種培養觀眾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我對於博物館亦甚有興趣，西九內的博物館應採用甚麼主題呢？如果純粹是香港的主題，其實現在也有，但我認為不足以承受整個西九博物館的觀眾。如果興建一個中國博物館的話，人們便會問，外國人為何不到中國去看呢？如果興建西洋博物館，人們又會問，何不逕往外國去看。香港本身的特點便是東西碰撞、文化交流，事實上，康文署近期舉辦的“絲綢之路藝術節”正是這個主題。我認為絲綢之路是十分合適的主題，原因是在這數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波斯、印度、希臘和羅馬等地方數千年來不斷交流。到了今年，我認為中西文化交流匯合在香港，亦是一個很好的賣點。因此，局長或負責西九計劃的同事可否考慮其主題，因為只有在訂定主題後，才能展開設計工作。

主席，最後，我想談一談中醫中藥。我認為不可以單單就二百多種中藥訂定標準，便使之成為一項產業，不是這樣的。除了每一種中藥有

其標準之外，中藥與西藥的分別在於中藥是混合而成的，是一種綜合藥物。再者，香港並沒有臨床的地方，所以在醫院推行中西醫結合是非常重要的。施政報告鼓勵這方面的工作，但在4幅私人土地中，是否可以有一幅土地可讓一間中西醫院得以成功興建呢？我希望局長可以在這方面多加促進。中醫藥是一條產業鏈，而不是單方面的，因此並不能一蹴即就。我也很認同六大產業又是起步而已，必定要點滴積累，不能夠一哄而起，以致一哄而散的。不過，我認為這6項產業是有必要的，所以大家必須共同努力。因此，我很期望6項產業有以下兩項跟進工作。第一，我認為應有全盤發展策略，令到每一個環節——剛才我提過中藥和創意產業——均與內地結合，並與珠三角工業先行先試的政策結合。整個發展策略不是從天而降的，可以找一些行內專家組成。第二，我認為應有一個督導委員會，單是提出方向是不行的，必須落實、落實、再落實。督導委員會可以成立6個專家小組，由政府促進，並每年向立法會作出匯報。我認為這才是落實的決心。

這數個產業是否用來拯救香港的呢？我看不到這情況。過往議會中有不少人批評政府只着重金融和地產，所以今天發展更多行業，我們認為是值得支持的，不要將它一棍打死。當然，我亦聽到和看到，本會的同事並沒有反對或抗拒，但很重要的是，大家均抱有懷疑或存有疑問，便是究竟有否落實的決心。這種態度其實是好的，因為這代表有期望。因此，我希望政府能聯同——我接觸過很多業界人士，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但他們有時候向我們抱怨，說曾向政府提交了很多很可行的意見，有時候卻石沉大海。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落實跟進，對可行的建議提供協助，包括協助我剛才提到的數個行業。我希望這6個產業能夠做出成績，為我們的下一代打好基礎。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剛返回議事廳，聽到劉江華議員的發言，真的感到很可笑。他說香港的足球隊可以參加中超聯，難道他不知道中超聯有“假波”的情況嗎？連國內的網民也在熱烈地討論，難道他想我們的足球隊也加入一起“打假波”嗎？因此，不懂的話，便不要亂說了。

第二，關於區議會方面，他向曾德成局長提出的意見是給予區議會一些資助。以往香港也有區域市政局，不少民建聯的議員也有參與其中。它擁有獨立的財政資源，但卻被“殺局”。當時，董建華說在“殺局”後會給予區議會一些補償，於是所有人都贊成，民建聯也很贊成。可是，卻

是甚麼也沒有的。他現在又再次提出，說甚麼文天祥的後人——不知道他是否民建聯的議員——我也十分關心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原來那裏的洗手間竟然是一個旱廁。如果是以往獨立民選的市政局，擁有獨立的財政，便早已做了工夫。所以，請不要再提了，當年他也有份“殺局”的，現在卻乞求想要回一些東西。

第三，有關電燈膽的事與他無關。我現在警告曾蔭權，他等着接受司法覆核吧；如果他不收回那項建議，他等着接受司法覆核吧。他將要再次在司法覆核中敗訴，這些話不是對你說，而是對曾蔭權說的。他是一定會敗訴的，希望他盡快“收皮”。

接着便是電動車的問題。電動車在香港當然不能成功推行，是因為中國已經有了此產品，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所有創新產業都要先看中國或香港的有錢人會不會發展。民建聯真厲害，它應該贊成普選。我很留意他們的發言，內容全部也較曾蔭權為具體，是在教導政府怎麼做。我不知道他們背後有否財團或中國高人的指點，而中資機構更是當然的了，它們現已接收香港了。單是在我們的恒生指數，已佔了超過一半成份股的，還不是招商局？

奇怪的是，它又不贊成2012年實行雙普選。如果說得像劉江華那麼精采或像譚耀宗議員那麼動聽(而陳鑑林議員更儼如是曾俊華)，我便投你們一票吧。可是，我也沒法子，“老兄”，不好意思。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面向主席發言，不要面向“老兄”發言。(眾笑)

梁國雄議員：主席，你也是民建聯的黨員，你也是“老兄”。其實，我不想浪費時間，我是想談政制的。

這個議會是在做些甚麼的呢？我真的很佩服民建聯，洋洋灑灑發表萬言，但卻無法執政，正如你所說的“有辱無榮”，這樣怎麼行呢？應該盡快贊成推行雙普選。我是很公道的，民建聯說得對的，我也會贊成。正如毛主席說，“精兵簡政”是李鼎銘提出的，他說得好，所以便跟着做，因為也是為人民服務的。現在民建聯真的是很可憐，它說得那麼動聽，不但上天下地，連潛水也可以，卻原來不是執政的，也不贊成自己執政，這是甚麼意思呢？還是留待下次再說吧，現在無謂多說了，這個世界已變得亂七八糟……唉！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第2個辯論環節的議員發言部分結束，現在是獲委派官員發言的時間。一如大家所知道，發展局局長未能出席會議，因此，環境局局長會一併處理發展局局長的回應。由於有4位官員會發言，所以他們合共發言的時限最多為60分鐘。我現在先請環境局局長發言。

環境局局長：主席，各位議員。很多謝多位議員剛才就施政報告中有關環境政策的發言。

今年的施政報告約有20個段落提及環境政策，不少於以往兩年，而公眾的焦點則集中於第66段內的慳電膽現金券派發計劃(“現金券計劃”)。這項計劃在社會上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而我亦同意一如多位議員所說般，這是我意料之外的。在施政報告發表時，這項計劃畢竟仍有不少細節尚待落實。作為政策的制訂者，在面對公眾的意見時，我會用心聆聽、認真思考，務求將工作做得更好。我想借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有關政策的始末，同時交代一下我們的想法。

取締鎢絲燈泡以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政策方案，其實並非是香港獨有的。當我在過去數年間進行外訪，並與外地主管環保的官員的交流時，這是時有談及的話題。原因很簡單，鎢絲燈泡雖然細小，但室內照明卻佔家居用電的一定份額——在香港，照明佔我們的家居用電量達16%。鎢絲燈泡比慳電膽耗能高出70%，而由於鎢絲燈泡的大部分能源均用於發熱，使用鎢絲燈泡因此會同時令室內溫度上升，導致室內的空調耗電同時提高。有見及此，在去年的施政報告第101段中，我們便首次提出政府將研究限制銷售鎢絲燈泡。今年的施政報告所提出的現金券計劃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醞釀產生的。

自施政報告發表以來的短短兩個星期內，社會上就鎢絲燈泡和慳電膽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討論。我以網上的資料作了粗略的統計，發現自10月15日至今，本港的報章及雜誌提到關於慳電膽的文章及報道，可能已將近1 000篇。涉及的層面由鎢絲燈泡的能源效益，以至是慳電膽的水銀對環境的影響及LED燈的能源效益和產品是否成熟等問題，均有提及。電台、電視，以至是網上的留言區亦有很多的討論。的而且確，市民在這段日子裏，就鎢絲燈泡及其他節能照明裝置和它們對氣候變化所

造成的影響，均曾進行非常廣泛和深入討論。我們如果正面一點來看，這兩個星期的討論在某程度上可能會對我們就節能減排的認知有所提高。

不過，我當然不希望見到的，是社會因為現時的現金券計劃未盡完善之處而否定香港在逐步取締鎢絲燈泡，以至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又或是為了這項爭論而令社會對改善環境的決心有所減退，甚或是影響大家在應對整體環境問題上前進的方向。

以取締鎢絲燈泡而言，背後更大的課題是處理日益迫切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要應付這個問題，我們清楚明白香港的情況。以我們整體的碳排放而言，有55%來自與建築物相關的用電。所以，減少建築物的能源耗用或提升建築物內的能源效益，是減低香港的碳排放最有效的方式。我相信市民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會循兩方面來進行工作，一方面是生產電力時趨於使用更清潔的能源，而我們去年透過西氣東輸來增加天然氣的供應便是一個方法。另一方面，很多人皆察覺到，在每一家企業、每一座大廈及每一個家庭中其實均有很多實踐節能的空間，從而達致雙贏互利的局面，一方面對環境好，另一方面個別用戶亦能節省電費。

在今年年初的財政預算案內，我們撥出4.5億元來資助大部分的樓宇參與節能的行列。自計劃推行以來，已收到約900份申請，反應熱烈。此外，立法會今年年初已撥款在啟德興建區域供冷系統，以減少這個新區域將來的碳排放。我們亦會在不久的將來向立法會提交《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草案》，為香港所有建築物制訂最低限度的能源效益標準。如果可以實行的話，在未來10年內便可以減少200萬噸的碳排放。這些政策均逐步開展了在香港所進行的一些具體減排工作，亦逐步得到立法會，以至是市民的廣泛支持。

除上述措施外，我們亦考慮如何令每一位市民、每一個住戶均可以加入低碳的行列。正如我剛才所說般，很多國家或政府，包括澳洲、美國、南韓、加拿大及歐洲聯盟等，均正透過立法方式來限制銷售未能達到最低能源標準的鎢絲燈泡。為此，特區政府在2008年進行了一些研究，探討如何以較具能源效益的照明產品逐步取代鎢絲燈泡，以及應否立法限制銷售鎢絲燈泡。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在立法之前，我們應否多走一步，引入措施，好讓慳電的照明裝置能夠更為市民所接受，讓入口和零售商提前適應有關的立法安排呢？

我們在構思時，考量了多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在過去數年間，特區政府已透過公帑或電力公司的能源效益推動計劃，開展了為商業或住

宅物業公用地方，以至是部分商業電力用戶的節能減排工作，而當中包括剛才所提及的4.5億元配對基金。下一步的策略，自然是這些工作如果已進入大廈大堂等公眾地方，有甚麼方面可將工作引入家居，令住戶可以分享慳電所得的好處，以及加入減排的行列呢？

第二，我們亦考慮到轉用慳電膽既然能為每位用戶帶來電費上的減省，那麼有沒有方法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使住宅用戶能及早和及時地把不符合能源效益的鎢絲燈泡轉為慳電裝置，並由一個電燈膽開始，引申至其他家具的節能裝置呢？

第三，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現時每年均會通過不同類型的活動、計劃及措施，提倡善用和節約能源。我們的考慮是，能否在兩電現時的節約能源計劃的基礎上，利用兩電的客戶網絡，接觸全港二百多萬的住宅用戶，以提高計劃的滲透率，從而達到更佳的成效呢？

最後，我們也考慮到現時已就慳電膽的回收建立起初步的網絡。長遠來說，我們在加強鎢絲燈泡的管制後，對慳電膽的回收需求必將隨之而增加。我們的考慮是，能否利用本港約3 000個燈膽銷售點，以拓展慳電膽回收網絡呢？

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我們留意到市民大眾對現金券計劃非常關心，亦提出了許多意見。讓我在此稍作回應。

關於經費的來源，在設計現金券計劃的時候，我們的構思是透過兩電的節能活動推行。有關的安排雖然或會在一段短時間內，譬如在1年內，對電費構成有限的影響，但相對於使用慳電膽所帶來的長遠和持續的電費減省，以及慳電膽現金券本身的價值，我們覺得應該是一個划算的做法。自施政報告公布以來，市民對這一部分的構思表達了強烈的信息，這些意見有的涉及應否在這項計劃中涉及電費的影響，又或應否有自由的選擇。這些是比較原則性的問題，我們均一一聽到，並必定會在釐定計劃的細節時加以詳細考慮。所以，主席，我們會積極考慮如何回應市民對電費的關注，包括可否用一些方法而無須透過加電費落實這項措施。

許多市民提及這計劃應否將所能換領的產品局限於慳電膽上。自計劃推出後，有人提到可否將其他能源效益高的照明設備包括在所能換領的產品之中。我們可以解釋一下這一點。我們之所以在初步建議中建議使用慳電膽，是因為慳電膽現時開始普及，品種有十四大類，產品型號有761種，而由11月9日開始，透過我們的標籤計劃，每個貨種均須具備

能源效益標籤註明。不過，我們要重申，政府一直樂意見到更多具節能效益的產品投入市場。事實上，政府在未來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大樓的設計上，率先採用LED燈作照明。然而，作為一種比較新的產品，當市場上的產品規範尚未完備時，我們應否將其他一籃子的產品放進現金券計劃中，我們就具體情況確實要加以研究。因此，我們會進一步檢視市場上的各種節能產品的供應情況、規管情況及標準情況，然後在現金券計劃落實時加以考慮。

另一方面，很多人提及關於慳電膽有可能會帶來的污染問題。主席，這其實正正是現金券計劃可以對症下藥的地方。慳電膽現時可以透過回收計劃回收，再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為配合現金券計劃，政府將要求參與現金券計劃的登記零售商設置慳電膽回收設備，以方便市民交回須棄置的慳電膽。換言之，現金券計劃一經實施，我們的回收點便會由現在單單透過屋苑或數十個回收點回收，即時擴展至這數以千計的零售點。我們亦可提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慳電膽的能力，以改善棄置的問題。

關於公平參與的問題，構思中的計劃是讓全港現時所知約3 000間慳電膽零售點的商戶可根據公開及公平的原則，並符合我們剛才開列的兩項條件下，自願登記參與現金券計劃。現金券計劃對現金券持有人所換領的慳電膽的數量、種類、牌子和組合由於均不設有限制，不同牌子的慳電膽因此將可公平參與，同享商機。

主席，我希望以上的發言能回應立法會及公眾對現金券計劃的疑問。這項計劃的細節及具體執行的情況，當然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但在大方向上，透過減用能源效益低的鎢絲燈泡，以達致減排的目的，仍然是我們的政策目標，我希望，亦相信社會整體是認同這一點的，我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主席，今天所進行的是本年度的施政報告辯論，我原本應該藉此機會向各位多說一點其他範疇。我希望在回應中簡略地交代香港在環境政策中的大圖畫。

回顧自第三屆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我想，我們在環境方面的工作整體上是向前走的。在過去3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已清楚表明香港須以可持續、均衡和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把香港建設成為優質的城市。施政報告特別提到要與鄰近區域並肩合作，共同打造“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的地區、要發展包括環保產業在內的6項優勢產業、把清潔生產計劃推展至水質項目，以及為港資企業在中國境內開展清潔發展

機制項目。政府本身亦會以身作則，擴大綠色採購，這些工作全部均會帶來一些新商機。這些商機不止出現在工業方面或行業方面，亦可能會遍及一些新興的服務業，目的是希望把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結合。在眾多建議中，不少是回應了各商會、企業，以至是在座一些議員的訴求和建議的。

此外，為使香港空氣質素得到改善，我們目前正着手就香港空氣質素指標進行諮詢。為了引入較環保的交通運輸模式，我們正引入電動車輛和有關的配套設施。同時，在自然及生態保育工作上，我亦很高興得到國家國土資源部批准，將香港地質公園定為國家地質公園。

主席，過去兩年多以來，我感到慶幸的，是在得到立法會和社會的支持下，多項環保政策、立法和基建項目均得以逐一展開。在我和各界人士的接觸中，我明白環保是一項跨階層、跨界別皆共同關心的議題。許多時候，我在議會內外均聽到市民叮囑我們要趨步向前改善環境的聲音。當然，有時候，在具體落實措施時，受影響的界別難免會有保留的聲音，要求政府在工作上作出一些調整。

在面對我們這個多元化社會的種種討論時，有時候，我會問自己，究竟香港的環境政策是走得太前，還是仍然落後呢？我們在改善環境的工作方面，是做得太多太急，還是太少太慢呢？無論如何，我清楚知道，我們在環保方面仍有許多工作要繼續推行。假如沒有社會上深入而廣泛的支持，這些政策或措施事實上會是舉步維艱的。我們只可以盡力將每一個環節的政策做得更好，我亦不希望讓環保工作因此而停步。

主席，就大家對於發展局的問題，我現代表發展局局長作出回應。我聽到很多議員對文物保育工作的關注及支持，我相信發展局局長亦會很高興得悉大家所給予的意見。林局長由於今天抱恙而未能出席會議，所以我在此讀出她已準備好的回應。

在過去兩年，發展局在文物保育的多個範疇，例如推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落實文物影響評估機制、為保存私人歷史建築提供經濟誘因、擴大私人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等。這些計劃及政策大體上獲得比較好的進展。

行政長官在2009-2010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整個保育計劃的構想，是以尊重中區的歷史作為大前提，希望在市民日益關心的環保、優質空間和有限的商業中心用地之間求取平衡。透過全盤審視中環的未來發展，發展局以嶄新概念提出一系列活化項目，為中環增添新

色彩。這些計劃希望可以保育中區內不少社會、歷史及建築特色，同時為這地區注入新生命和活力。

我在此代表發展局多謝各位議員，以及社會上對“保育中環”的概念和項目自公布後所給予的正面回應。發展局會盡快開展有關項目的籌備工作，並繼續保持與各持份者的聯絡。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議員對施政報告中的“優質城市，優質生活”環節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推動創意產業的工作所提出的意見。

創意產業是經濟機遇委員會選定作進一步發展的6項優勢產業之一。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其實已提出要推動創意產業，亦提出成立專責辦公室，以加快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名為“創意香港”的專責辦公室已於本年6月正式成立，為創意產業界提供“一站式”服務，並與業界攜手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經諮詢業界及立法會後，創意香港已迅速制訂關於未來工作的7項發展策略，以期全面及多方位推動及支援本地創意產業。這7項策略與多位議員就這方面的工作所提出的意見相當融合。

新設立為數3億元的創意智優計劃亦已於6月正式開始運作，至今已收到超過30項申請，而當中有9項已獲批撥款，所涉及的撥款額約1,500萬元。獲得撥款的用途包括支持香港舉辦區域性的機械人設計大賽、支持本港設計界於明年世界博覽會(“世博”)期間在上海舉辦展覽及舉行論壇等活動，目的是要展示香港設計的成就，以及支援本港廣告獎項的得獎者參加海外廣告比賽等。我們會繼續鼓勵業界申請撥款，以創新的精神、嶄新的意念來提升企業的價值，從而開拓更多、更大的商機。企業的成功不但能帶動整個行業發展成為產業，更能為香港創造就業及經濟收益。

我們的廣告界最近在國際舞台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於康城國際廣告節中奪得設計類別的最高榮譽獎，亦於名為Spikes Asia的亞洲廣告大獎中勇奪多項大獎，這足見香港創意人才輩出。我們會支持這些具創意的人才走出香港，發揮和展示他們超凡的才能，於發展個人事業的同時，亦有助於提升香港創意產業在國際的聲譽。

除向外發展外，我們的創意產業界也十分重視拓展龐大的內地市場。我們一直與國家商務部及有關部門就“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有關創意產業的開放措施進行商討，以協助本港創意產業開拓在內地的商機。以在今年簽署，並剛於10月實施的CEPA補充協議六為例，我們成功爭取內地開放放在視聽服務、電影後期製作、網路遊戲、印刷和出版服務等多個範疇的措施，讓香港業界進軍內地市場。按該份協議，國產電影經有關部門批准後，可以在香港進行後期製作，而內地部門亦為香港網絡遊戲產品內容的審批時間設定服務承諾，承諾會於兩個月內完成審批。這些開放措施會逐步為業界打開在內地尋找商機的方便之門。我們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以爭取在創意產業方面進一步的開放措施。

在電影方面，本地電影業在CEPA的開放措施下，在過去數年間，無論在產量、規模及票房方面均有突破的表現。由電影發展基金(“發展基金”)資助的“麥兜響噹噹”在內地的票房取得令人感到驚喜的成績，而在最近數年內地最高票房的電影中，主要均是中港合拍的電影。我們會繼續為業界開拓內地及東南亞的市場。香港電影發展局在去年12月展開了一項名為“香港電影New Action”的大型推廣計劃，不單在內地，更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市場進行推廣，向當地推介本港新世代導演，以推動香港電影業的長遠發展。

為增強及延續“香港電影New Action”的成效，電影發展局於本年7月在北京舉辦了一次招商會，以協助香港新世代導演推介他們的電影計劃，並計劃於未來在廣州及本港再次舉辦類似的招商會，以協助香港新世代導演向內地及其他地區的投資者推介他們的電影計劃。此項措施有助於培育香港電影人才，以及提高香港電影的產量及整體票房，有利於香港電影業的長遠發展。

此外，為配合未來數碼電影的發展，政府將透過香港數碼港數碼媒體中心推出一項試驗計劃，建立一個高速電訊網絡傳輸系統平台，為電影業提供一個高效率和安全可靠的方法，使電影拷貝可以從海外電影供應商直接以數碼方式傳送到媒體中心，再分別傳送到本地的電影院及後期製作公司。

發展基金至今已批出15項電影製作計劃及35個與發展電影業有關的項目，資助金額分別為4,170萬元及5,230萬元。後者包括資助舉辦香港影視娛樂博覽、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亞洲電影大獎，以及資助香港電影參加國際電影節。

截至2009年9月30日，發展基金的結餘為2.139億元。我們已就發展基金的運作作出檢討，並已徵詢業界意見。我們在未來數月會向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及提出改善建議，令發展基金更能適切照顧業界需要。

發展創意產業，關鍵在於人才。要培育創意人才，便要從他們年少時做起。我們得到香港動漫畫聯會有限公司、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以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協助，製作了一套給高中使用的教材，讓我們的學生從青少年時期開始認識電影及動畫文化，並培養他們對電影及動畫藝術的興趣和欣賞能力。長遠而言，這項計劃可以為創意產業培育人才，從而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

為應付電影業界對人才的需求，香港浸會大學已成立電影學院，並於今年9月起開辦4項兼顧理論與實習訓練的高級文憑課程。

此外，為鼓勵我們的年青一代發揮創意，勇於創新，政府會支持舉辦一項大型的區域性論壇。論壇將於明年1月底在港舉行，名為“Make A Difference (MAD)”，並以“變則通，創不同”作為口號，刺激年青人的創意和企業思維。

在去年及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我們留意到對於政府活化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內的兩座宿舍大樓作為推廣創意產業之用，市民均十分感興趣。我們構思的創意產業用途會包括展示及銷售本地創意產業物品，而為了讓該計劃能持續發展，我們會考慮引入例如餐飲等商業服務，以吸引及匯聚人流。我們會保存宿舍的中央書院遺蹟，以配合推廣創意產業和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政策目標。

我最後想談談於上海舉辦的世博。世博將於明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假上海舉行，並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作為主題。這項盛事已吸引超過240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確認參加，而大會則預計會有超過7 000萬人次參觀。這項盛事將會是展示香港創意產業成就的大好良機，我們會全力參與展覽。在世博的6個月展期內，我們會以電訊科技作為連繫，而在上海及本港的創意產業則會分頭及聯手舉辦一系列活動，以展示香港創意產業的活動，並展示香港優質城市，以及優質生活的特質。

主席，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原議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主席，有數位議員剛才就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問題發言。確保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清潔，的確是推動“優質城市、優質生

活”不可或缺的工作，這亦是食物及衛生局一項重要的工作。我首先談談來年我們繼續要進行的工作的重點，然後回應議員剛才提出的一些建議。

我先談一談食物安全及食物安全法。自今年5月份起，即在上一個立法年度通過食物回收法後，我們對食物安全有加強了的保障，而我們亦會在本年度向立法會提交《食物安全條例草案》。要成功落實整項《食物安全條例》，業界的支特至為重要。我們因此一直與業界、市民和其他持份者進行諮詢，並委聘顧問來評估對有關營商環境的影響。我們會聽取更多業界的意見，務求使新的食物安全管制方法切實可行。

此外，有關營養標籤制度的規例亦會按法例於明年7月1日生效。我最近有機會與方剛議員一起跟業界的代表見面，得知他們作了大量準備工作，以配合新營養標籤規例的實施。他們雖然在一些細節上遇到困難，但他們均表示會作好準備，以配合新例的實施。所以，我在此要特別向業界表示讚賞。事實上，市面有很多受歡迎的品牌，包括本地名牌食品在內，均已陸續換上符合規例的營養標籤。

為配合業界適應新規例的實施，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食物安全中心向業界發出了技術指引和提供電話查詢服務，亦舉辦了十多場工作坊，而為協助業界而訂立的小量豁免制度亦已按業界的建議提早開始接受申請。食物安全中心現時一共收到超過6 000份申請，其中接近4 000份已獲批准，約有140份因涉及營養標籤上的聲稱不符合法例要求而被拒絕，而其餘的則正在處理中。

主席，我們會繼續和業界保持緊密聯繫，聆聽他們的意見及一同解決這些問題。

議員亦提到家禽屠宰中心(“屠宰中心”)將來的路向。自從在去年7月活家禽行業自願退牌計劃推出後，有關行業已出現了一定的轉變，屠宰中心的規模已因而大為縮減。對於部分議員最近表示對興建屠宰中心有所保留，我們會加倍小心行事，並已聘用顧問公司進行研究，以重新評估市場對營運屠宰中心的興趣，以及估量市場對活雞需求的趨勢等。在研究完成後，我們會在諮詢立法會後才作出決定。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評估市場對活雞需求的趨勢，以及禽流感的風險及對業界和市民的影響。

至於靈灰安置所，我在上星期已回答議員很多的提問，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會持開放的態度，希望盡量找尋多些地方來建立靈灰龕，

無論是郊區還是地區裏一些適當的地方，亦是值得考慮的。不過，最重要的是得到各界和市民接受，這方面是最重要的。

除了靈灰安置所外，我們亦一直積極推廣在紀念花園或香港指定海域撒放骨灰。例如，我們拍製了宣傳光碟和舉辦講座，並印製了宣傳小冊子，放置於醫院、火葬預訂辦事處及許可證辦事處等地點，方便市民索取。我們亦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共同推廣在紀念花園或指定海域撒灰。此外，為進一步推動骨灰撒海和簡化程序，我們會研究如何方便市民出海撒灰的渡輪服務。

有議員提及公眾街市的問題。大家均知道，我們已在7月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介紹了當局就公眾街市定位、功能和角色，以及租金調整機制等事項的初步構思。應事務委員會要求，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最近就這些初步構思諮詢街市販商組織和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收集了街市販商不同的意見。我們知道公眾街市是廣大基層市民購買新鮮糧食的好去處，亦提供了就業和生計。對於有部分商戶抗拒租金調整機制和租務上的一些改善措施，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一如審計報告及政府帳目委員會所指出的，問題的確確有需要解決。所以，我們在下月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所收集到的意見。在聽取議員的意見後，我們會確定下一步的方向。

我以下會回答一些議員在今天所提出的數項問題，那些問題均是值得我談談的。黃容根議員一直很關心漁農界各方面的發展，我亦很欣賞他每年也花上30分鐘來談論這項議題。我要強調，對於漁農業的發展，政府當局一直採取以下5項策略，務求致力推廣本地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第一，是要協助本地漁農業邁向可持續發展；第二，是與內地及海外的政府溝通合作；第三，是為業界的技術提升及專業培訓提供支援；第四，是協助業界建立優質品牌；及第五，是為業界提供財政支援及緊急救援。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用於支援漁農業發展的金額，每年不少於1億元。就黃容根議員所關注的水產養殖業，我們會在未來1年推行較大規模的魚苗孵化場的試驗計劃，以推動本港水產養殖業的進一步發展。我們亦建議在今年的稍後時間，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我們在支援及推動本地漁農產品的工作。

第二方面是關於李華明議員所提到的一些寵物店的問題。政府在這方面準備修訂涉及狗隻買賣的動物售賣商牌照條款的目的，與李議員的看法一致。我們現時有180個持牌動物售賣商經營及涉及狗隻買賣的寵

物店，而我們在諮詢動物福利組織及寵物業界有關的團體後，建議修訂寵物店的動物售賣商牌照的條款。這樣做旨在進一步規管寵物店狗隻的來源，以及打擊非法的寵物繁殖業務。

此外，漁護署亦會加強巡查持牌寵物店，以及調查寵物店及寵物繁殖者遵守規例的情況。當接獲市民舉報有關懷疑非法售賣狗隻的活動，或藉着互聯網廣告進行非法活動時，我們會作出調查。一旦有充分證據，我們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我亦要談談張宇人議員所提出關於露天茶座方面的問題。大家均知道，露天茶座越來越流行，截至2009年6月底，我們批出的露天茶座已超過200個。食肆經營的露天茶座由於涉及食物安全、環境衛生及土地使用，亦有可能會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食環署因此在收到申請後會根據既定程序，徵詢各相關部門，以確保申請符合包括土地使用、樓宇安全、消防安全、規劃、交通及衛生等方面的準則。此外，民政事務總署亦會在區內就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進行公眾諮詢，諮詢對象通常包括擬設露天茶座處所的當區區議員、分區委員會的委員及附近的居民代表。透過上述嚴謹的申請和審批機制，獲批准經營露天茶座的食肆均能符合各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並獲得當區居民的普遍接受。

食環署亦重視食肆在獲得露天茶座批准後是否依足當局要求來經營。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如果接到投訴，便會從速處理。假如發現有人違規，我們便會採取食環署的《食物業規例》予以檢控。有關食物業的處所一經定罪，便會被記下指定分數。當該處所在指定時限內被記下足夠的分數，亦有可能會遭暫時吊銷或永久吊銷牌照。所以，我希望業界與當地居民可以就他們的營業與環境衛生方面做足工作，並能夠維持營業。

至於張宇人議員提出有關酒牌局的申請與處理上訴方面的事宜，我知道張議員已將該問題交給政府，而政務司司長將會回答這項問題。

我最後想提一提，有不少議員均提及關於蔬菜的問題。大家均知道，我們很關注食物的安全及來源，而同時，內地的食物如果有問題，我們會盡快通知內地有關當局。就最近指有“假產地、真標籤”的問題，我們已立即將有關問題向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及廣東省與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反映，他們亦盡快進行了這方面的調查。最可惜的是，我們雖然透過香港海關(“海關”)要求作出指控的人士交出證據，但據我所知，截至上星期底，他們仍未交出有關證據。

大家均明白，我們要打擊任何非法活動，一定要盡快行事，同時亦要保密；“大鑼大鼓”地捉賊，是不會捉到的。我們也明白，如果政黨與我一起“大鑼大鼓”地捉賊，亦是不會捉到的。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或真正會執法的政府會這樣做。所以，大家如果收到業界或市民在這方面的投訴，而投訴如果有關內地的，我希望大家盡快把詳情交予內地當局或交予我們，由我們轉交內地當局，讓他們盡快調查。這樣做反而更有建設性，同時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大家如果透過這渠道來處理這些問題，我們相信有關問題是不會繼續惡化的。

事實上，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已訂於由11月1日開始，在蔬菜方面加強監管，令業界本身負有一定的責任。業界是不會貿然做一些非法的行為，令自己的生意受到影響的，我們亦要特別注視這方面的情況。香港的食環署及海關每天會在文錦渡進行調查及突發行動，以打擊這些非法活動。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要保障香港的食物安全，特別是蔬菜的安全，無論是本地政府或是內地政府，均投放了很多努力和資源。在過去數年，有99%以上的香港蔬菜之所以能夠保持安全，是因為得到很多業界與我們有關部門的合作，才得以達到這個成果的。

我在此再次多謝大家今天就這方面的發言，我知道對於你們提出的眾多問題，我們稍後會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繼續跟進。

謝謝主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議員在發言中談及關於文化藝術和體育發展這兩方面的情況，我會在剩餘的時間作出回應。

促進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不僅有助於推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而首要的目的，更是為了豐富香港市民的優質生活。在這方面，民政事務局會繼續積極維護自由創作的環境、壯大香港的文化創意資源，以及開拓本地和外地的文化市場。

我們會採取措施來保護和弘揚傳統文化，以及鼓勵創作和吸納當代新文化。我們很高興獲悉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已將粵劇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我們將支持更多關乎推廣和承傳粵劇的工作，並會提供表演場地的配套。

政府在來年會繼續投放大量資源，以持續對本港主要表演藝術團體（“藝團”）的資助，以及支援中小型藝團和新進藝術工作者。我們一直非常重視中小型藝團的發展，因為這些藝團對確保香港藝壇健康及蓬勃發展均十分重要。

民政事務局和香港藝術發展局現時設立了多項資助計劃，以迎合演藝人才，以及不同規模、性質和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藝團的需要。在這方面，2008-2009年度的資助達到1.14億元。我們會繼續透過這些資助計劃和基金，加大力度來支援中小型藝團的發展。

此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亦舉辦及贊助中小型藝團的演出，包括讓藝團以優惠租金使用康文署場地，以及為藝團提供節目推出及其他行政支援。在2008-2009年度，這項支持總值約1.61億元，包括9,100萬元的現金資助，以及7,000萬元用以減免場租及提供票務支援等非現金的形式資助在內。我們亦在今年5月底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緩解中小型表演藝團在當前經濟逆境下所遇到的困難，當中所涉及的政府撥款接近1,000萬元。

我們同時亦會進一步支持將香港藝術節等主題活動加以提升及發展，包括邀約高水平的國際表演者和委託本地藝術家創作新作品，以發展優質品牌藝術節目，從而吸引本地、內地和海外更多觀眾的參與。

康文署會聯同教育局，加強推動年輕人參與文化藝術活動，並將透過新高中課程，加強在學校內推廣藝術。我們亦會提供更多實習機會，以培育藝術行政人員和策展人。我們還會與文化藝術界和社區組織合作，在全港各區普及文化藝術活動，以培育和拓展觀眾羣。

在西九龍文化區發展方面，為期3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已於10月8日展開。我希望公眾及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今次的公眾參與活動，而各界的意見將有助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進一步明確西九發展的基本方向，以及顧問在明年年中所準備的3個不同概念圖則方案，以更切合社會的期望。

至於葉國謙議員所提到的博物館委員會一系列的建議，我們已經逐步落實，稍後會向民政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在體育發展方面，香港會在12月舉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東亞運”），這是香港歷來第一次舉辦的國際大型綜合性運動會，無論對香港的體育發展，或是作為盛事之都的地位，均非常重要。在未來個多月間，我們會繼續進行演練及測試賽，並會加強宣傳及推廣活動，務求將東亞運辦好。我們會抓緊餘下的時間，不斷完善各項安排。

香港運動員剛於山東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中勇奪兩金、1銀、4銅，共7面獎牌，成績相當不俗，這表現出香港運動員積極的努力。

我們會繼續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體育活動，並會加強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以提高他們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機會，以及促使更多大型體育盛事在香港舉行，從而強化我們體育盛事之都的地位。

我贊成林大輝議員的意見，東亞運將會是香港發展體育的一個里程碑，我們確實有條件在舉辦東亞運後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我們會加強向市民宣傳參與體能活動的益處，並會研究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康體活動及設施，以增加市民的參與為目標。為令社區體育推廣工作更收效，我們資助體育總會及地區體育團體增建設施及添置器材。我們亦會繼續邀請商業機構贊助弱勢社羣觀賞大型體育賽事。

我們會繼續與持份者合作，詳細瞭解精英運動員的需要，以及從多方面提供支援，包括直接財政資助、運動培訓、學業輔導、就業輔導及轉職培訓，讓精英運動員無後顧之憂，在退役後有充分的安排。

此外，就各大型運動會的備戰及參戰，我們會提供資助，以及頒發現金獎勵予在大型運動會中表現出色的香港運動員等。我們亦支持相關的體育總會建立更有效的運動員梯隊培訓系統，以鼓勵更多有潛質的青少年投身體育事業。

主席，我的回應到此為止。謝謝。

主席：第2個辯論環節結束。現在進入第3個辯論環節，辯論主題是“關懷社會，投資社會”。本環節涵蓋3個政策範疇，分別是：人力事務；福利事務，其中包括社會企業及家庭事務，以及屬保安事務政策範疇的抗毒政策事宜。

要在這環節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

劉慧卿議員：主席，這一節辯論是關於人力、福利及保安等事務，還談及抗毒政策。我是被迫要在這一節內發言的，因為我想談的是婦女權益，而按照我向秘書處查詢所得，這議題是沒有單獨討論的，因為議題是跟隨負責的局長，而婦女權益是跟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主席，你說這議題是多麼有面子。沒辦法了，其實這議題是最應該由林瑞麟局長負責的，因為他是負責人權的範疇，不過，也不知道他負責到哪裏去了。

秘書處翻查過各方面後，說我只能在這一節內提出此議題，否則，主席，稍後你又會指我犯規了。不過，無論如何，哪一位局長在此也沒所謂，但我一定要提出抗議，為何婦女權益屬於福利的範疇？真的可謂多得你不少。

主席，我於9月曾去信張建宗局長，他在出席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發言時表示，當局對於香港的婦女發展已做了很多工作，他還舉出了一個例子——由於他要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所以他舉出很多例子來證明當局做了很多工作。那些是甚麼工作呢？主席，你做夢也猜不到的，那工作便是改良女警避彈衣的設計，這便是當局認為做得最棒的工作。

主席，他連廁格的問題也不敢提，為甚麼？其實，當局就廁格的問題也跟進了很多年，我也曾寫過一封信給他，向他反映女廁廁格現時的情況是很有問題的。主席，如果你到商場逛街時也會知道，每次輪用女廁廁格也要排長龍，即使是政府建築物的女廁，使用時亦要排長龍。張建宗局長已回信答覆我，後來他亦在報章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女廁廁格與男廁廁格的比例已由1.5比1增加至2比1。主席，我不知道你明白與否，你唯一明白的便是你和女朋友或未來太太逛街時，你經常要等她排隊去廁所，所以，女士們要這樣排隊，男士其實也沒甚麼得益的。

問題是，香港談論兩性平等已很多年了，局長亦在他的回信中提到，在1995年和1996年，英國人仍在管治香港時，已訂立了《性別歧視條例》，並引入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於2001年，更成立了婦委會，而婦委會的工作是甚麼呢？主席，便是就宏觀的策略向政府提出建議，訂立長遠目標，確保婦女可以盡展所長。

婦委會向當局提出了甚麼建議呢？大家真的要閱讀他撰寫的文章才知道了，說出來真的是把人嚇壞。究竟婦委會建議了甚麼政策？這是局長自己親口說的——便是要檢討與婦女有關的主要政策，包括甚麼，主席？就是包括健康護理服務、福利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暴力及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服務。

主席，我們這3天會辯論甚麼議題？議題包括教育、房屋、資訊科技、經濟發展及人力等各式各樣，但卻沒有婦委會建議檢討的範疇，無怪乎那是屬於福利範疇了。我相信婦委會的決策者也是被政府的政策框死了，為甚麼？因為這是屬於福利的，即是說，關於健康、被人虐打、被人接濟等，便是福利了。我不禁要問，有沒有弄錯？

主席，其實，聯合國亦曾提出，要訂立一個中央機制審視政策、撥款、法律，這稱為性別預算，而局長的答覆是，全世界也有很多人正進行相關的研究，政府亦會繼續監察。他又說性別定型問題現時已改善了不少，大家可看看在大學修讀工程、科技、醫學、會計及律師等學科的女性人數已增加了不少。可是，大家有否留意今年3月，科技大學發出的校方新聞稿？當中有一段說：“在8歲至11歲學生當中，男生是精於邏輯思維，女生則善於組織和表達。”他卻不說我們善於烹飪！那當然不是我吧，所以他便不說了。

主席：你也擅長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原來你也知道我在說甚麼，真的很多謝你，你有聆聽我發言，因為很多時候，大家也只是在瞌睡，所以我在發言時，有時候會故意說一些話來試探大家有否在聆聽。正如我到科大演講時說到單車手“洪”金寶，有些人便整個人彈起，問道，她說甚麼“洪”金寶？我便帶笑地說，原來他們也在聆聽我演講。

主席，你知道嗎？那篇文章發表後，科大的女教授提出抗議，還揭發了科大電子及計算工程系的40名教授當中，只有兩名是女性。她們還指出，科大教職員男性極為偏多，女性則只佔23%。這又顯示了甚麼呢？

此外，聯合國很關注女性參與公共服務，當局表示其中一點是有指標的，便是參加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女性比例。局長便自以為很棒，說10年前，在香港，女性所佔比例只有16.8%，到今年6月已升至27.6%。怎料聯合國的要求是50%，因為兩性應該是各佔一半的，但香港只達27.6%。我們便說，局長也算做得不錯吧，數年前的目標只是25%，現在已超標達成。不過，最合理的要求是多於此數，不如再提升目標吧！可是，他卻不肯。其實，現時亦已達27%了，為何不把目標寫成40%或50%呢？

我們覺得當局對於很多事情是完全漠視的。在我們立法會內也不用說吧，60位議員之中，只有11位是女性。聯合國婦女公約委員會就此說過甚麼？它說，由於功能界別的選舉很多時候選出的都是男性，所以在比例上，太多男性會引起間接歧視女性的情況。當局就此又做了甚麼工作呢？甚麼也沒有做，還當功能界別是寶，要它千秋萬世地存在。

此外，我看了一份報告，這是香港特許秘書公會作出的。他們於2006年做了一個調查，訪問了百多間上市公司。主席，他們發現這些公司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當中，只有6%是女性，而87%的受訪公司是沒有女性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局長可能也知道，在北歐的國家中，即使現時在商界的公司董事局，別人也有一項40%或50%比例的規定。因此，我們便要多做一點事，才能令女性可在政界、在商界等各方面發展，我們並非要超越男性，主席，而是要得到平等的發展機會，但這個婦委會卻做不到這點。我們民主黨在9月找過婦委會，向他們要求取得一些資料參考，包括對於性別觀點主流化的進展如何？有哪些檢視清單？達致哪些成效？我們向他們諮詢，但他們卻說沒有甚麼可以提供給我們，因為這個範圍太廣泛，沒法提供了。數天前，我碰見婦委會的高主席。她對我說政府很離譜，政府作出了這樣的回覆她還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們為何無端端回覆了我們。我便表示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正在做些甚麼，不知道他們是互相推讓還是甚麼的。我唯一知道的，是婦委會沒有成效。他們除了說說避彈衣外，廁格也不敢提了。主席，我認為要在現時這個環節內提出此事項是很悲哀的，不過，既然提出了，我便希望局長能代表整個特區政府作回應，向一半的人口作回應。

張宇人議員：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在社會民生的議題上着墨不多，但並不代表這些問題不重要，尤其是青少年的問題，的確很值得我們關注的。

首先，我想說說社會很關注的青少年毒禍問題。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去年共有2 398名21歲以下的青年，因涉及販運危害精神毒品罪行而被捕，較2005年上升了接近三倍。呈報“索K”的人數，由1999年至2008年10年間，瘋狂飆升了二百一十八倍。毒禍這麼嚴重，政府與社會都有共識，就是必須採取果斷而有效的措施，以嚴厲的手段打擊毒禍。

目前，在大埔區試行的校園自願驗毒計劃，已經籌備得七七八八，12月便會開始為學生驗毒，之後當局還打算在其他區份的學校廣泛推行。大家當然都想見到這個校園驗毒計劃能夠收到理想的效果，及早幫助吸食毒品的學生戒毒。然而，社會上仍有不少人士對計劃成效抱有很大疑問的。

事實上，自由黨認為要建立無毒校園，政府不應該“獨步單方”，只依靠推行校園自願驗毒計劃。要杜絕青少年毒禍，政府必須多管齊下，包括加強跨境合作、打擊毒品源頭和提高有關罪行的刑罰來提高阻嚇力。

根據量刑指引，販運600至1 000克K仔，量刑為12至14年監禁。但是，販運同等重量的海洛英，則可被判監20至23年，兩者相差的幅度可高逾一倍，難免令人產生錯覺，誤以為販賣非傳統毒品的嚴重性較低，從而以身試法。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研究修例，收窄或統一販賣K仔和海洛英的刑罰。

此外，政府亦應該加強支援禁毒的工作，其中必須研究優化禁毒基金的批款制度。好像本年度(2009-2010年度)毒禍問題嚴重前所未有的境況，但批出的款項只得22,869,000元，比上年度的3,294萬元還要少三成。據瞭解，原因很可能是今年度因金融海嘯令投資不如理想，所以撥款減少了。但是，自由黨認為與“投資回報”掛鈎的撥款政策，是大有問題的，應改為與毒品問題的嚴重程度掛鈎才對。

此外，為加強校園的禁毒宣傳，自由黨亦期望禁毒基金能夠鼓勵更多學校申請，並對學校所作出的申請作優先考慮。其實，自由黨早已關注到清貧家庭兒童的學習需要，並建議政府應在綜援增設特別津貼，支付在學兒童家庭上網月費，讓他們透過網絡，可以享受與其他學生均等的學習機會，提高競爭力，避免造成跨代貧窮。

可惜，施政報告中並沒有提及如何解決清貧學童的上網問題，在這問題上交了白卷。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拖延，快些為清貧家庭的學童提供上網學習支援。

除了照顧青少年及學童之外，我們也很關注一個“老問題”，也就是長者的安老服務需要。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建議，政府會在3年之內，新增5所資助安老院舍以應付需求，本來這是值得支持的，可惜即使這些新院舍全部落成後，亦只能增加500個宿位，相對於現時逾25 000個的整體輪候人數，不過是杯水車薪，難以滿足需求。

此外，施政報告亦提出，將安老院舍內的護養院舍宿位比率由五成增加至九成。這樣做或許可以稍為紓緩現時逾6 300名身體嚴重缺損，而不能自我照顧的長者對護養宿位的需求，但原來政府是採取“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並不是在一般宿位以外增加護養宿位，而是由一般宿位中騰出一些名額來改做護養宿位，這反而令逾19 000名輪候一般宿位的長者要等候更長的時間，這樣做便有“玩弄數字遊戲”之嫌。

正如施政報告所指，人口老化會令資助安老院宿位的需求大增，我們希望政府盡快就安老服務，作出實質而全面的措施，來滿足長者的需要才是。

主席，趁着教育局局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席，我亦想談談學前教育。有關這項內容，我已經說了多年，然而，我也沒法子，還要繼續說下去。我重申，我們推行教育，是應該尊重家長的選擇權利。市場上有不同的家長，對於為子女提供的教育自有不同的期望。本來香港學前教育是按商業運作，做得十分好，體現靈活、多元化及市場主導的模式，幼稚園及幼兒中心都是百花齊放，正正符合家長不同的需求。

然而，當局卻以學券制扭曲了市場的發展，劃了一條死線，規定家長只可選擇非牟利和學費不過上限的幼稚園，才可享受學券制。除了迫使私立獨立幼稚園被拒於門外，亦使在私立獨立幼稚園任職的幼師，所得的培訓津貼，不及其他任職於獲學券資助的非牟利幼稚園的幼師。在不公平的制度下，迫使他們歸邊到非牟利幼稚園工作。

這樣下去，恐怕香港只有非牟利幼稚園，而且每所的學費都將會劃一定額，難以按家長不同的需求發展不同的辦學特色，重蹈以前香港中小學教育未引入直資學校時期的覆轍，因為沒有競爭而變為一潭死水。

我懇請當局不要再錯下去，這並非局長所訂的政策，而只是他所接到的皮球，應該趁今年檢討學前教育學券制，評估一下私立獨立幼稚園自學券計劃以來的萎縮情況，以及學券計劃擴展至私立獨立幼稚園的可行性等，從而盡快糾正過來，以達致學券制的原意，真正做到“錢跟家長走”。

主席，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今天會先分析整體社會和經濟形勢，隨之會就施政報告的相關內容作評價，並會集中討論相關民生和福利等事宜，以期闡述民協的具體建議。

主席，容許我先慨歎一番，可以說，無論金融海嘯的教訓是如何深刻，全球各國對自由市場如何積極干預、反思和改革、以至公眾對企業高層的貪婪如何痛罵，我們的特區政府卻是完全無動於中，繼續沉醉於“大市場、小政府”的魔咒下，“重”商“輕”民的理念一直牢牢緊扣管治班子整體的思維，背地裏選擇“少做少錯”，苟且偷安，享受撒手不管的安逸。

誰知特區政府一直自詡成功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正是社會不公平與不和諧的罪魁禍首。香港社會極度貧富懸殊、社會制度嚴重傾斜、

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社會階層深層矛盾激化、向上流動的階梯嚴重閉塞等，皆源自特區政府施政理念的偏頗，對自由市場的膜拜迷信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可惜，特區管治班子卻未有借金融海嘯這百年一遇的契機，對整體施政理念作全面檢討。反之，這兩年的施政報告，當權者只選擇簫規曹隨，完全落後世界經濟和政治趨勢，錯過解決社會結構深層矛盾的大好時機，實在令人非常失望和感嘆。

主席，就香港經濟和社會整體形勢而言，2008年由美國次按危機而引發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嚴重衝擊環球經濟，迫使各國運用非常手段，以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金融體系，香港在此背景下，經濟無可避免受外圍環境嚴重影響，本地的生產總值自2008年第二季開始連續多季出現收縮，到今年第一季更出現大幅倒退達7.8%。

隨着各國的刺激經濟措施逐步發揮效用，外圍經濟逐漸穩定，本港經濟亦似乎出現由衰退走向萌芽復蘇。根據最新統計數字，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經過第一季錄得大幅倒退後，第二季已有所紓緩，跌幅收窄至3.8%，結束連續4個季度向下的趨勢，而股市和物業市場更出現顯著反彈。

但是，另一組數字卻反映出可能的隱憂，本港8月份出口貨值按年跌13.9%，雖然較7月份跌幅有所收窄，但已經是連續10個月下跌，反映先進經濟體系的進口需求仍然非常呆滯。此外，本港最新7月至9月的失業率為5.3%，預計會持續高企在5%以上，其中尤以青少年失業情況令我們憂慮，15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高達25.7%。

此外，香港本地物價仍然高企，雖然通脹率較早前有所回落，但隨着政府的紓緩措施結束，最新上月消費物價指數開始轉跌為升，升幅為0.5%。有學者更估計租金及食物開支將主導通脹重臨，特別是受內地通脹及人民幣升值影響，香港通脹會更明顯，低下階層生活會更見吃力。

中長期來說，因應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後遺症，美元持續疲弱，反映美元兌一籃子貨幣匯率，以及用來衡量美元匯價變化的美匯指數屢創新低，而基於港元與美元掛鈎，美元走弱的趨勢不僅帶來資產價格的上升，以進口為主的本港市場，更必然會引來輸入性通脹，導致惡性通脹，屆時基層生活更苦不堪言。

主席，我想談談家庭收入的情況。家庭的收入是持續下跌，最新家庭入息中位數下降2.3%，至17,000元，是2007年第三季以來最低，入息不足4,000元的貧窮家庭則激增至197 700個，上升4.1%。數字不但反映

低收入家庭數目趨升，而中產和高薪家庭更有向下流動的趨勢，第二季月入少於1萬元家庭為64.92萬戶，比首季多出2.76萬，月入4萬元以上則減少達10.5%。上述數字均反映出經濟衰退的滯後性影響正陸續浮現，因此，不要以為香港經濟穩步復蘇，致令我們過於樂觀。

與此同時，社會亦長期呈兩極化的趨勢發展，貧富懸殊不斷惡化，香港堅尼系數由1996年的0.518，升至最新2006年的0.533，這亦是自1971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數字上升反映貧富懸殊情況在這10年間不斷惡化，基層住戶收入持續維持在低水平，基層收入佔整體比重不斷下跌。換言之，基層市民既在經濟衰退時候首當其衝，而經濟復蘇時又未能受惠，相反不斷承受持續高企物價之苦。

特區政府在管治方面，似乎未能擺脫弱勢的困局，前事諒不盡錄，較早前公務員減薪事件、紀律部隊薪酬爭拗、校園驗毒、行政會議議員倒戈相向等、及至最近慳電膽事件，都可以小事化大，在反映當局施政出現透明度不足、思慮不周、錯估形勢、甚至出現令有不行的情況。誠然，推行各項政策和計劃有其不同難度和致敗的原因，但本質上卻源於政治制度的封閉，導致認受性不足，令施政舉步為艱。

主席，面對上述總體形勢，今年施政報告理應對症下藥。可惜，特首卻選擇近乎無為而治的手法來處理重要問題，對市民當前面對困難視若無睹，採取“等運到”策略。施政報告應有的鴻圖大計和施政大綱，卻變成只交代瑣碎計劃，一些計劃的細節竟可如此鉅細無遺，好像中環保育計劃，竟可以喧賓奪主，成為宣傳重點，甚至乎微細至100元慳電膽券也要大肆鋪張，我當然不反對這些保育及環保計劃，但這亦是反映施政報告已到了“無料到”的地步、是否連“廖化也要當先鋒”？

或許當局會辯稱，施政報告不是已提出了6項優勢產業作為香港發展的新方向嗎？我和民協當然支持香港產業多元化的發展建議，這亦完全符合民協一向提倡發展多元經濟的論調，希望藉多元產業減輕對固有經濟支柱的過分倚賴、分散風險、同時提供更全面就業機會。但是說到底，發展新產業難以“一蹴即就”，這涉及當局中長期資源投放和規劃。

每年的施政報告主要是對來年施政為藍本，涵蓋各項範疇，包括經濟、社會、民生和政制等的關注。可是，政府打從諮詢第一天開始，就處心積慮以發展六大產業作為諮詢的主軸，過分主導傳媒和諮詢對象發表意見，企圖駕御市民期望和操控輿論，目的旨在轉移和遏抑公眾強烈要求政府紓緩當前困難的期望，我和民協對此操控手法是非常有保留的。

事實上，施政報告所謂發展6項優勢產業，也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施政報告的措施不僅只着眼於產業入場的便利和短期資源投放，還要煞有介事地強調政府會緊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主席，我再一次重提這過時“天條”，實在令公眾對新產業發展不敢樂觀，政府投入程度成疑，總是選擇置身事外，說到底，又是要靠自由市場來自我發揮。

主席，試問一些一向唯利是圖、重視眼前利益的商家，又哪會肯投資於這些低回報、高風險、回報期又長的新興產業呢？加上新興產業規劃和目標，例如未來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分量和開拓職位數目，特別是對基層勞工就業機會的評估，皆一一欠奉，可想而知，當局對新產業承擔，仍停留於紙上談兵階段。

說穿了，當局依然停留在以往市場主導、甚至全靠市場的思維。如果繼續用以往方式去推動新產業的發展，包括因循地成立基金、些微政策調節作出配合、甚或只投入非常初期的資本性投資，骨子裏依然是價高者得和投標等市場原則，可以說，新產業的發展前景絕不樂觀，過去環保園便是一個活生生的失敗例子。

其實，根據各國實際經驗，單靠市場主導的模式，並不是發展新產業的可行出路，政府主導，甚至直接參與，可以是相當有效模式。因此，我和民協希望當局在推動發展新產業時候，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思維。特別在自由市場無法發揮效用的情況下，當局應該重新思考和訂定政府的角色和切入點，哪怕最終政府可能要在短中期，直接參與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和運作，甚至作出干預。

主席，或許今年施政報告值得丁點兒的欣慰，是當局終於肯正視存在已久的單一化經濟問題，趨向發展多元化。然而，可悲的是，另一個纏擾香港社會更久的貧富懸殊問題，當局卻束之高閣、愛理不理。整份施政報告連貧窮兩個字都沒提及，特首是否有意效法當年董先生般，不再提“八萬五”，便等於沒有呢？不說貧窮，便是沒有貧窮呢？或許政府還是抱殘守缺，依舊守住老一套想法，認為只要經濟發展，把餅造大一點，窮人便自然分享到經濟成果，主席，歷史告訴我們，此做法只是一廂情願，兼且完全是荒謬的想法。

當權者常言道“只要經濟復蘇和持續增長，貧窮問題便自然解決”，這“立論”根本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實際上，正確來說應該是“經濟增長與紓緩貧窮並沒有必然關係”，我們查考2006年人口普查數據，如果把全港住戶按每月家庭收入分為10個等級，最低組別的每月收入中位數(以2006年市價計算)、由1996年的2,952元，跌至2001年的2,888元，以

及至2006年竟低至2,400元，其間香港經濟經歷高低起伏，但最低組別住戶入息中位數，卻一直向下滑，沒有向上，而是一直向下。試問經濟增長，如何幫助貧窮家庭解決經濟問題呢？

主席，還記得每當一些海外機構和組織出來，宣布香港經濟自由度或營商環境排名，排甚麼第一、第二、第三的時候，司長或局長總愛走出來回應和自誇。但是，剛剛美國《商業周刊》引述聯合國開發組織最新公布的中美洲人類發展報告，當中指香港是全球各先進經濟體系中，貧富懸殊是最嚴重的地方。主席，我們再次排第一了，但我們的司長、局長卻沒有出來說話，到現在仍沒有回應，是默認、知醜，還是認為外國勢力企圖製造事端？

主席，正如我剛才說過，香港堅尼系數由1996年的0.518，升至最新2006年的0.533，是鐵一般事實，是不可掩飾及抹去的。政府過去多番狡辯，既要質疑堅尼系數有其局限性，更指出系數未有考慮到稅收和福利轉移的影響。主席，即使退一步來說，若計算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原本2006年的0.533可以調至0.475，數字仍然大大高於國際慣用的警戒線0.4，反映政府的補救措施未能達到改善財富懸殊的效果。相反，我們看看其他國家，加拿大和英國同樣以稅收和福利轉移計算，卻令原本高於0.5的系數，壓縮至警戒線0.4以下。為何人家可以做得到而我們卻不可以呢？為何人家下了工夫，而我也下過工夫，卻仍做不到呢？究竟我們所做的是否足夠呢？所施加的力度是否足以改善貧富懸殊的現象呢？數字一次又一次告訴我，我們的特區政府是做不到的。為何政府要強詞奪理，不願正視貧富懸殊的問題呢？

主席，貧富懸殊不斷加劇、低收入家庭的數目不斷上升，根據社聯較早前公布，以全港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推算香港貧窮人口達123萬人，情況實在刻不容緩。可悲的是，施政報告完全視若無睹，特首其後更為爭拗而爭拗，堅持應以綜援金額作為貧窮線標準，懶得理會這一堆冰冷數字的背後，有很多人其實生活在水深火熱、受盡貧窮煎熬的現實，這些人是我們的基層市民。這類人不單住在深水埗、九龍西，而是在觀塘、舊紅磡區、灣仔區、舊的荃灣區和天水圍也有。

主席，環顧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貧窮問題反而越趨嚴重，一方面掌握知識和技術的主流勞工，會因經濟發展，而享受較優越地位，變得越來越富裕。相反，基層勞工因缺乏競爭力和機會，而被社會主流所排斥，無力在市場上生存。

其實，世界各國政府已經主動提出很多的補救和紓緩措施，解決低技術勞工的競爭力和缺乏發展機會的問題。可是，香港情況是，經濟轉

型和走高增值路線，與基層勞工市場間形成越來越大的鴻溝，政府不但未有接合當中差距，反而以所謂自由市場作擋箭牌，拒絕投放資源發展基層相關產業。說甚麼指望自由市場去解決，完全忽視自由市場存在漠視基層的盲點，有一些我相信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由市場並非不會做，而是不肯做。加上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往往着眼向既得利益的商界靠攏，忽視低技術勞工的發展機會，令基層“往上爬、向上流”的渠道被徹底收窄；而我擔心政府所想要往上爬的社會上不同階層，都是指中產人士要往上爬，其心中是沒有基層的。

因此，我和民協認為短期紓緩措施，如開放交通津貼計劃、開拓基層就業職位和代繳公屋租金等可解燃眉之急。從長遠紓緩貧富懸殊的策略而言，政府須以更積極態度擔當資源分配的角色，重新檢視以往的放任自由經濟政策對貧富懸殊的影響，並主動改善嚴重傾斜的經濟結構。有鑑於此，我和民協都認為必須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和相關政策局官員及社會人士組成，從宏觀角度及經濟結構等着手，從制度和問題作出根本性的改革，並訂立明確的扶貧目標，推動和協調各個政策局進行扶貧的工作。此外，亦要建立一套評審機制，以評估出台前的政策可能對貧富懸殊是否造成壞的影響。在目前經濟不穩的背景下，當局更應利用扶貧委員會這個平台，研究及提出針對性的措施，以協助基層市民面對當前的經濟困難。

主席，此外，在就業方面，我和民協支持政府以推動基建等提供就業機會，但希望當局能增加公屋單位的建屋量至每年2萬個，幫助沒有能力租住私樓的低收入家庭改善生活，同時增加就業機會。此外，民協認為發展社會企業及改善放寬現時的《合作社條例》，另外在社區層面直接創造就業機會，為社會較弱勢一羣提供其他的發展機會，正可彌補自由市場無視基層的存在缺點。

主席，真的很可惜，施政報告提及社會企業時，只說要成立一個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就進一步推動社企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我擔心這個諮詢委員會力度不足，流於“講多過做”。我和民協認為有鑑於社會企業在本地發展，包括起動資金缺乏，以及營商管理經驗不足等困難，不能夠發揮應有的社會目的。我和民協建議政府應成立社會企業總公司，以更具規模效益方式推動社會企業及合作社的發展。

我們立法會的減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剛剛到過南韓和台灣訪問，我們看到這兩個地方都有推動社會企業。人家的社會企業不單是由政府撥出基金以資助一些企業，讓社會企業開拓他們的工作和經營生意，更重要

的，是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目標，便是只要社會企業能夠協助某些社會人士解決問題，縱使這個社會企業最後未必能夠百分之一百達致自負盈虧，政府甚至商界也仍會支持這些企業的存在。因為這些社會企業的失敗，其實會令他們所服務的對象受損的。舉例來說，某個社會企業聘請了50名失業工人，如果他們不再營運下去的話，這50名失業工人可能要反過來向政府領取失業援助金。因此，政府寧願資助他們10%至20%的資金，使社會企業繼續存在。

我們看到的另一個社會企業的例子，是在南韓的美麗商店。由商界撥出低租金的商鋪，在十多二十個大型商場中劃出位置讓他們開業。售賣的是甚麼呢？不是售賣高檔貨品，而是出售二手貨，店鋪的數量有十多二十多間。韓國辦得到、台灣也辦得到，為何我們還只能每一次提供大概100萬元至300萬元的資助，然後便不加理會呢？他們能夠生存的便生存下去，否則，在兩年後仍幹不起來的話便得結業。這完全不是辦社會企業的做法。

我希望我們負責的官員曾局長和未來成立的諮詢委員會——我希望那不是一個諮詢委員會，而是有實權的委員會——能加以推動，並參考全球有社會企業的國家的做法。西班牙的社會企業聘請了全國24%的人力人口，佔西班牙全國7%GDP。英國辦了社會企業5年，他們也有1%的GDP。韓國最近才開始，去年已達250家，他們聘請了1萬名工人。我們香港大概有250家，但我們只能聘請1 500名工人，企業數目是相同，但聘請的工人只有十分之一。我認為這樣的形式是無法有效地達到推動社會企業所起的作用的。

主席，我希望在社區層面、社會企業層面上，政府能夠更主動地協助中下階層人士，我並不是要你提供金錢，而是提供就業機會給他們。主席，在我們訪問韓國時，韓國勞工部長跟我們說，對於一名工人，他的福利是一份工作，不是一筆錢。

謝謝主席。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會就人力事務部分代表民建聯發言。近期本港失業率在經濟略為喘定下有所紓緩，當中建造業失業率持續下跌，顯示政府推動大小型工程，特別是樓宇更新大行動，已逐步取得效果。但是，現時經濟仍存在不明朗因素下，經濟復蘇未必能惠及本港各行各業。我認為這點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據資料顯示，15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有顯著下跌，但20至24歲的就業情況則無起色，相信15至19歲青少年組別的失業率顯著下跌，是與他們選擇持續進修以逃避失業有關，故此，青少年失業的情況是未容樂觀。

其實，青少年失業率一般高於整體失業率，可說是眾所周知的事。民建聯曾搜集了一些世界各地為失業、失學青少年推出的就業培訓計劃的資料，發現香港與外國無大分別，這說明國際社會對於強化新一代的受僱能力，儘管一直投入不少資源，但成效仍是不大。

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是施政報告的主調，故此，未來的人才培訓應把過去為服務工業發展而建立的“去個人化”教育制度，轉型為服務知識型經濟而塑造的因材施教教學環境。

主席，我們亦看見香港建造業失業情況，在過去10年一直是嚴重的。在缺乏前景、欠薪問題嚴重，加上是在體力勞動工作下，近年加入建造行業的生力軍人數一直偏低。面對未來一系列大型基建項目展開，本港建造業人手出現明顯壓力下，當局除了透過各種措施招攬人才外，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實在應參考海外國家經驗，研究如何提升本港建造業工人的專業地位，以吸引年輕一輩加入。

主席，立法會現正就《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展開審議。民建聯認為最低工資的立法，應要確保不會嚴重影響香港競爭力及弱勢勞工的就業機會。

根據海外地區做法，在訂立標準最低工資水平之外，許多國家均有為青少年設立額外的最低工資。民建聯認為應就青年勞工另設最低工資水平，就這方面，我們很希望政府加以研究，並相信如果可以如此設立，將可提供誘因予僱主聘請年輕人，以及可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機會。

李國麟議員：主席，今天施政報告的辯論中，這個環節談到“關懷社會”及“投資社會”。我想就長者政策、精神健康和殘障人士的復康等議題，談一談究竟現時的情況如何，以及政府是否做得足夠。

我們先看看長者的問題。其實，這麼多年以來，我覺得香港特區政府都把長者的問題簡單地視作一個福利問題。我在不同場合也曾表示，長者的問題不能單從福利角度來解決。正因為長者的問題被政府視作福利問題，很多其他關於健康和社交等問題都被忽略了。我稍後會再說這個問題。

然而，今次施政報告中提到在長者問題上，他們都希望能夠安居樂業。透過施政報告，居住問題是否真的可以令長者安居樂業呢？政府提出與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積極合作，在天水圍或一些市區地方發展名為長者住屋計劃。對此，我希望真的能得到成效。

然而，在天水圍這麼遙遠的地方，如果政府真的想長者安居樂業的話，在如此偏遠的地區推行這些特別的長者住屋計劃時，我也希望政府可以認真地看看，究竟長者居於那個地方的各項配套，包括醫療、社區設施和交通是否方便易達。否則，長者入住該區後，那個地方便變為只有長者居住，年青人、家人或朋友都不會前往探望。我想，這樣便未必可以達致長者安居樂業。

這個例子便正正指出了在香港，安老政策不單是福利問題，不單是政府投放一些資源與房協合作興建一些樓宇，便可以令長者安居樂業的。這正正是配套的問題，會牽涉到不同的政策層面，希望政府能正視。

說到住屋問題，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亦推出了一項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希望長者與家人和年青人同住。這是非常好的，但現時在這項計劃推出之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現時不在席……當然，這項計劃與長者是有關係的。如果我是年青人，想與長者同住，我會選擇一些相近的公屋。然而，我卻不可以選擇市區的單位，一定不可在市區裏，而必須是在非市區內的。對年青人來說，他們可能會因為工作環境的改變，而未必願意接受如此的安排。政府提出希望長者可以安居樂業，與年青人一起居住，如何才可以做得到呢？我們因此看到，在政策上是不能只看福利，其他環節也是要考慮的。

然而，今次施政報告也有好的消息。我們談論多年，有否可能在現時不同的安老院舍內，處理藥物的問題呢？我想主席也會看到，過去的藥物醫療事故經常發生，如何解決呢？今次政府做得很好，我非常開心，因為政府真的投放資源在政策上，支持在院舍增設藥劑師，這是非常好的。我們業界已談論了很久，這為我們帶來了喜訊。

當然，在這項政策的方向之下，我相信政府要落實這項政策時，也要小心處理配套的問題。藥劑師在院舍工作，是否也有任何監管權力？如果他們看到院舍（無論是私人院舍或一些資助院舍）怎樣處理藥物，他們的權力將會是如何的呢？所有有關方法的制訂，是否都可以確保在院舍裏，現時的派藥或藥物的處理制度是否有質素保證？否則，如果仍然停留在儘管有這項政策，但在政策落實時卻沒有一項對策，便難以令計劃達致目標。

對於這項計劃，我會看看財政司司長在宣讀財政預算案時會如何處理。無論是由社區的藥劑師或現時醫院管理局的藥劑師來擔當院舍藥劑師，他們也可以幫助現時的私人或資助院舍來處理藥物方面的問題，大大減低一些不必要的風險，讓長者在吃藥時可以安心。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對此表示非常歡迎。

談及院舍，有一點不得不提，我們的同事也有提及。今次政府推出了一些新措施，我們稱之為“提高效率”的措施。當發覺有一些可能空置了的私人院舍或一些護老院的宿位不適合時，我們便把比率提高，希望減少輪候時間，以及在未來的3年內，多建5間安老院舍。

其實，談到安老院舍，有一點也要提及。宿位的數字可能是提高了數百個，然而，政府或局長到了現時，仍未能正面回應一個問題，其實，他們是否有一項指標，就像房委會的3年“上樓”指標般？政府能否確保長者可於3年，甚至是2年內入住護養院或安老院舍？如果沒有這樣的一項指標的話，便很難令長者看到他們要輪候多久。有關來不及入住院舍的長者，相信在坊間也有不少有關的報道，這是悲劇。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如何相信政府現時的安老政策，是可以幫助長者安享晚年的呢？

因此，我希望局長對此不要再迴避，而要認真的回答我們，究竟在這麼多年來，他有否覺得今次的做法，將會是一個令我們完全歡迎的做法？關於長者輪候資助老人院或4級不同的安老院舍，其實有否指標顯示何時才可以讓長者入住呢？這便是我們期望聽到的。

談到安老院舍的數量，我們收到了一項好消息，便是政府說宿位的數量增加了五百多個。我亦期望局長告訴我們，長者須輪候多久才能入住。可是，今次的施政報告也有一點是令我們感到失望的。我們談到宿位數量的問題，但宿位質素的問題又如何？這是很重要的。有一定數量的安老院舍可以讓長者入住，但居住的質素如何？不是單有一位駐院的藥劑師，便能把院舍內的質量辦得好的。

我們現時看到，政府所區分的4種級別的安老院舍，其實已經是過時的了。在2000年政策改變後，很多長者入住安老院舍時，已經不像以往般所謂“會行會走”；很多長者的依靠程度非常高，健康狀況並不太理想。這即是說，以我們粗略的統計，在院舍居住的，大約超過七成以上的長者都要得到別人的照顧。他們行動有所不便，加上有不同的慢性疾病或生理障礙，在入住安老院時，要獲得照顧的程度非常高。然而，我們回顧現時的發牌或監管制度，可見1名護士可照顧60名長者的比例，我曾就此向局長查詢，局長回應說此比例在他上場以前，應該說，在十

多年前，已經存在了。所以，我認為應對此制度檢討一次，在檢討後，亦要查看現時社署或衛生署有否盡力監管。很多時候，我們看見有院舍走法律罅，我相信局長也知道，有些私人院舍在質素上會走法律罅，指本身有58或59張床位，所以無須聘請合資格護士。不善之處何在？不善之處是以前長者會行會走，便沒有問題，但倘若他們依靠性高和健康狀況差時，未合資格的護士是否真的可以照顧長者呢？在質素保證方面，今次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及。

我希望無論是資助院舍或私人院舍都可在質素上有保證，政府是責無旁貸，有需要監管的，尤其今時今日，條例已過時——也許是我認為過時，局長認為不過時——但不要緊，我們可提上立法會討論怎樣可進行檢討。這樣也保障我們的長者無論入住任何院舍，不管將來有否指標，還是可以加快輪候時間，能入住有質素的院舍，而不是入住一個是有瓦遮頭但內裏質素無保證的地方，這樣的話，我們便會很擔心。作為業界、專業人士，我認為長者所入住的安老院舍應該是個好地方，除了有宿位外，還應有一定的質素保證，讓長者可以安身，這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對於這點，我們暫時感到失望。

我剛才說過，安老院舍是個重要環節，但回顧整體的安老政策，我希望讓局長知道，有一項調查指出，在千多名受訪長者中，有八成長者對入住私人院舍感到不大安心。這項調查正好反映現時長者對私人院舍缺乏信心，認為質素不大好。為何會有這情況？因此，在監管和發牌條例上，是有需要檢討和改動的，我希望局長多做工夫。雖然施政報告今次沒提及這方面，但當局可否多做工夫以解決這個對長者尤其重要的問題？當香港整體人口老化時，我與局長或主席都可能入住安老院，我們也希望院舍最低限度有質素保證，不會在入住安老院後，不明白情況為何會這麼差勁的。又或雖然很快便輪候到獲得入住，但質素卻原來是如此差的，這樣便令人有點擔心了。

當然，是有一些質素佳的私人安老院。我最近有朋友入住安老院，每月大約要繳交38,000元。他入住單人房，全部有人照顧。不過，試問香港有多少人可以長期負擔每月38,000元的費用，來入住這種甲級的院舍呢？當然，我們不是要求每一位長者也入住這種院舍，但最低限度我們要看到一些有質素保證的院舍，對長者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局長可正視這個問題。雖然施政報告沒提及這點，但局長也應正視這個問題。

另一項調查也顯示，政府的政策是將關乎長者或安老的政策視作一項福利政策，只着重於照顧他們的身體需要，即令他們有地方住便行。

我剛才指出，如果院舍質素好，當然是好事，入住了便沒有問題。但是，有一項調查顯示，根據2007年的統計，60歲以上的長者自殺個案，增加了很多，現時整體而言，長者的自殺比率有三成五。有多項原因會令長者想自殺，包括身患慢性病、抑鬱，甚至乏人照顧等，這正正反映現時安老政策缺乏了整體性的看法，我們不要光是以為有屋、有院舍供他們住，有地方供他們棲身，便能令他們安享晚年。

長者有需要獲得全面的照顧，包括身心社靈的照顧。在社交方面，政府有否照顧他們？他們是否安健，是否安康呢？我們有否留意這一點？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想長者有豐盛的晚年，能安享晚年，整體而言，在安老政策方面，並非只是施政報告中提到的提高宿位量數便可做得到的。

我以上所說的，都是重要的問題，希望局長詳加考慮，在政策上可多撥資源來加以跟進。

特首在施政報告內表明，要推行一個開心家庭的運動，希望在推行此運動後，可令長者開懷一點，全家都開心一點，做到很久也沒有人提及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但是，我們回顧過去，要有健康家庭、開心家庭，不是單有安老院舍或就此交給家庭議會便可以做得到的。在2007年成立的家庭議會，到目前為止，最主要只做了一些宣傳教育的工作，沒有真真正正探討長者在核心家庭的角色方面問題。我希望今次透過特首提及的家庭議會、開心家庭運動，能真真正正探討長者如何在家庭作為一份子、在開心家庭中安享晚年，這是一個重要課題，希望可幫助他們正面地度過他們的晚年。

最後，關於長者問題，當中可能有一項忌諱。很多時候，長者本身患有很多不同的病症，未必喜歡入住安老院舍，但現時礙於居住環境問題，家人的經濟問題，避免不了要入住安老院舍，但有部分長者卻是很希望在家中安享晚年，甚至善終。

香港現時的善寧服務非常不足夠，即如有長者長期病患，在家人同意下，可以安排他在家中離世，這種服務十分少，就以新界東為例，整個新界東只有兩名善寧服務護士，進行外展善寧服務。在這情況下，即使長者想在家中離世，而家人亦支持他在家中安享晚年，但由於沒有足夠的資源或專業人士提供時，所以便要回到醫院裏，這樣會無形中加重了公營體系醫療系統的壓力。在這方面，政府如果想老者能安享晚年、有豐盛的晚年，我們同意老人家有權選擇在家中住至離世，如果家人亦

同意，則對於善寧服務或善終服務，政府要考慮增加資源以支持這方面的工作。關於老人家的服務，是談來談去也談不完的，不過，今天便談到這裏。

接着，我會討論精神病患者的問題，在施政報告中亦有提到，當局對不論精神病患者或殘障人士的復康服務，增加了相關資源，這方面我們是十分歡迎的。因為在增加了宿位，縮短了整個輪候過程之餘，亦可以提高服務質素，還有局長亦表示考慮發牌監管，這亦是相當好的安排，令現時不論殘障人士或精神病康復者，在這些院舍所接受的服務有一定的保證。因為過往我們亦知道一些不愉快的消息，這一類弱勢社群，基於本身有殘障、智障甚至精神有問題，在這些院舍中被虐待的機會可能很高，因為他們本身是不懂得如何告訴家人，又或是沒有能力告訴別人他們被虐待或感到身體不適的情況。我認為局方在這方面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不要忘記，我不厭其煩再說，整個康復過程不是提供一個地方給他們居住便算，是要有跨專業的團隊來照顧這羣人的。施政報告只提到量的問題，關於質方面並沒有提及。我們是否要加大力度，不論對殘障人士或精神病康復者，在社區中提供整個配套，增加資源予他們？例如當中要有更多不同的專業人士，包括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護士、社工等，使他們組成一個團隊，來幫助這羣人，除了可以很快入住這些院舍之外，亦可以加強他們的照顧能力，特別是精神病患者。我們相信的一件事，是他們可以回饋社會，我們是否應該增加更多資源，令他們更快可以適應，以及融入社會？所以簡單來說，政府應該增加資源，明確地培訓或聘請一羣專業人士組成一個團隊，來照顧這羣人，不論他們是精神病康復者或是殘障人士也好，令他們可以更容易地融入社會，以及在院舍中適應得更好。

提到精神病康復者 —— 對不起，我要仿效特首喝一口水，不過，我不會說那個動詞應否有“s”的 —— 政府亦提到會投放資源，希望能幫助他們。我們看到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到會聘請社工，當然，我們歡迎聘請社工。業界的聲音是，聘請社工有一個好處，會令更多有問題的精神病康復者的個案浮現出來，但問題是，當個案多了，其他的配套又欠奉，換言之，發掘了更多問題出來後，醫生、護士、職業治療等又沒有增加人手，或不清楚有沒有增加人手，那怎麼辦呢？

在一個社區裏，不要忘記 —— 可能局長不是太熟悉，周局長剛巧不在席 —— 精神病人的社區康復成本是非常昂貴的，政府要投放足夠資源，並非單提供一間屋給他們住，找一個社工安撫他們便可以的。很多時候，一個跨專業的團隊是非常重要的。現時全香港只有133名精神科的社康護士，但要照顧10萬名在社區的精神病康復者，怎樣做得到

呢？我當然希望可以做得到，但如果政府只增加社工人手，便不可能做得到了，因為個案有可能增加至15萬宗，但只有133名社康護士，怎麼處理呢？所涉的風險相當高，我不希望因為政府在施政上有某些傾斜，而令某些方面遭到忽略，以致將來這些精神病患者或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風險增加了，這方面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政府應該加大力度處理這問題。

另一個關於精神病康復者的問題，是有調查或研究顯示，並非他們能盡快離開醫院，進入社區，便是最好的做法。以前曾設有中途宿舍，現時青山醫院有一項特別的計劃，名為“EXITER”，表示那些人未可以獨自回到社區生活，但他們可以有一個中間的地方，有一羣專業人士照顧他們，讓他們日間外出工作，夜晚回來休息，運作與醫院不同。這是一項很好的計劃，但我知道這不是由政府資助的計劃，而計劃快要因為沒有資金而不能繼續下去。如果政府要推行此類計劃，我認為第一步未必是要把全數的精神病康復者放進社區，可能先安排入住類似“EXITER”的中途宿舍中，讓他們慢慢適應及康復，再加上有足夠資源予不同的專業團隊，幫助他們更容易融入社會，亦減低社會與這羣精神病康復者有可能出現的衝突面。政府要正視這方面的問題。

最後，我看到在施政報告中，我們認為較過往好的，便是政府施政的方向，是加大了力度來照顧老人家、精神病患者及殘障人士。但是，我亦希望當我們可以獲得配套設施時，或有財政預算案撥款時，能夠有足夠資源把正確的政策方向釋放出來，否則，便只會停留在空談階段而不能實行了。多謝。

陳偉業議員：這環節是關於關懷社會、投資社會。主席，政府多年來說關懷和投資，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口惠而實不至。

在這份施政報告發表時，先後公布了3項重要資料，如果在任何一個民選國家，這個政府必定會因這些資料而被選民拖落台。這3項資料都是不光彩及顯示政府施政有嚴重失誤的。

第一項便是社聯公布的香港貧窮人口，已由1997年我們回歸祖國時的六七十萬貧窮人口，增加至123萬，大幅上升超過50%。這些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他們生活在赤貧之中，生活相當苦困。市民被迫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水平，是政府施政失誤而導致。貧窮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飆升，這明顯是政府施政嚴重失誤而引致，是必須加以譴責的，這亦顯示出這個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態度是無良、無耻。

主席，第二個數字，便是在發展地區中的貧富懸殊情況，香港排行第一位。香港政府經常很光榮地表示自己排第一，我記得，1990年代我當議員初期，政府經常說香港的貨櫃港是全世界排行第一位，我們超越了新加坡，香港的航運業、貨運業也是全世界排第一，說了很多這些數字。每年的施政報告，特別是公布財政預算案的時候，都會說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排名第一位，還經常吹噓自己如何厲害。現在果真厲害了，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在發展地區中，是全世界排名第一，但這是不光彩的事，這是香港人的耻辱。在施政上，如果作為一位制訂政策的人，當看到這個數字時，是應該感到羞耻，無地自容的。這是基於香港的稅制、香港政府的施政方針、香港政府的經濟政策，而出現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現象。連何鴻燊也看不過眼，他說有些人是胖得連襪子也穿不上，連這位香港富豪也作出了這樣的評論。

第三個數字，主席，便是昨天剛公布的香港繁榮指數大跌，現在排行第十八位，也好不是第十九位，否則更難聽了。我們原本是排行第八位，但現在一下子下跌了10位，排行第十八位。這同樣是由於香港政府的施政，因為施政失誤而導致，香港的繁榮指數不斷倒退，反觀其他地區正不斷前進。香港政府是“敗家仔”，我很多年前已說過了，主席，差不多10年前，我已經指出，香港政府的確是一名“敗家仔”。在管治方面，以前是董建華，現在是曾蔭權，再加上一批司局長，把家財散盡，令香港的繁榮指數大跌。作為司局長看到這些數字，他們不覺得羞耻的嗎？行政會議成員在打盹嗎？他們不是應該向政府提供意見的嗎？他們提出的意見政府不聆聽，他們應否引咎辭職？就他們本身負責的政策，所提出的意見特首不聆聽，看到所負責的政策不斷倒退，而有關市民又不斷受苦，他們應否引咎辭職呢？他們的良知也會說話，也會驅使他們不要眷戀這些權位、不要眷戀數百萬元年薪吧。他們應該引咎求去，這是良知的呼喚，他們是應該這樣做的。

然而，情況並不是這樣，他們繼續在鬥吹噓，局長稍後作回應時，同樣會說香港怎樣好，他們做過甚麼工作的。但是，回看客觀事實、客觀數據，便知道香港市民在這批高薪厚祿的高官管治下，生活質素正不斷倒退，香港現時有123萬名市民生活在苦困赤貧之中。

所以，主席，在這種客觀情況和環境之下，如果議員仍然要表決贊成通過這份施政報告的話，他們的良知可能已經是完全泯滅了。

主席，有數項個別政策是我想跟局長再說一說，首先是關於天水圍的問題。我記得在2000年，我重返議會時，已多次在不同場合，包括在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中，以及在有關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不斷

提出天水圍的問題。但是，政府好像聾了一樣，完全沒有聆聽，直至有母女3人一起自殺，政府才好像如夢初醒般。我亦跟張建宗局長討論過多次，反映現時天水圍除了已經公開知道的問題外，其實亦有一個已存在多年，而我多年前已提及的天水圍青少年問題，將會爆發得很厲害，天水圍亦將會是香港有史以來青少年問題爆發得最嚴重的一個地區，這是一個危機。

理由很簡單，天水圍有很多破碎家庭，該區的青少年人口突然暴升，而該區的設施又特別不足夠。我簡單將天水圍跟九龍城比較，天水圍的青少年人口是44 000人，九龍城是40 000人；九龍城有3個草地足球場，天水圍只有1個；九龍城有7個籃球場，天水圍只有4個；九龍城有3個泳池，天水圍只有1個；九龍城有11個自修室，天水圍只有8個。我已沒有將它跟觀塘相比，觀塘合共有22個足球場(包括草場和石場)，但在天水圍，這些設施是甚少的。這要“多謝”王倩儀之前出任康文署署長時，在2000年進行斬、斬、斬，當時因為財赤，所有設施也不興建，部分是兩個前市政局的計劃，也全部被取消，以致天水圍居民沒有消閒地方。天水圍缺乏社區設施，加上天水圍遠離市區，青少年找工作困難，即使找到工作，交通費亦特別昂貴，而且很多天水圍青年也出身於破碎家庭，父母教育水平不高，因而導致該區的教育水平相對其他地區是偏低的。

很多原因導致天水圍青少年的個人和家庭問題特別多，再加上社區支援和社區設施不足，他們想參加活動卻沒有活動可以參加，或是沒有錢參加，當問題發生時，社羣的支援更少。這新市鎮的問題已討論了十多二十年，市民從市區搬進一個新市鎮，很多時候也要斷六親，便是因為交通費昂貴和用於交通上的時間長的問題。

今天如果政府仍然正如我之前所說的繼續睡覺、繼續做夢的話，天水圍的青年惟有自求多福，但這對社會的影響是很嚴重的。在港英政府年代，由於1970年代發生青少年騷亂，政府很快發表報告書，立即訂定青少年政策。可是，很不幸地，現在的青少年政策由“河蟹”局長負責，即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負責。劉慧卿議員剛才批評說，不知為何婦女政策會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其實我卻很希望青少年政策是由該局負責的。青年政策現時是由民政事務局負責，但民政事務局性質類似統戰機構，專門推動康樂活動，一片歌舞昇平，不會真的協助青少年處理問題，度過難關，所以我很希望……最多與劉慧卿議員倒轉吧，她不喜歡婦女事務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那麼，麻煩把青年政策交予張建宗局長，讓他跟社會福利署推行更多與青年有關的服務，令天水圍青少年可以有更多支援和發展機會，得到更多協助。這樣做，雖然未必可以安然度過這危機，但最低限度令這個炸彈不致爆發得太嚴重。

我其實已提出這意見年多兩年了，也有向當局提交一份正式文件，建議可否找一位青年專員負責統籌青少年問題。現在天水圍真的發生很多事情，不少政策局和機構都有為天水圍做工夫。可是，各方欠缺協調和統籌，出現了互相競爭、資源浪費的情況，大家也不知道它們在做甚麼，未能真正幫助有需要的青少年，很多時候更出現服務斷層，溝通有問題以致影響服務。政府就菜園村問題也特事特辦，就整個賠償問題作出了特別處理，為甚麼天水圍青少年問題不可以特事特辦？就着這問題，當局進行試驗計劃也好，成立政府聯合委員會也好，就是要就危機問題盡快推行一些工作，令問題不致於不斷惡化。

另一項福利問題是關於一筆過撥款，局長也很清楚我的態度了。我由甫開始已指出問題所在，事實亦證明我當年指出社福界一筆過撥款的一些問題，其後的確出現。政府再繼續這樣下去，只會令問題不斷惡化，雖然大家知道政府成立的小組提出了36項改善建議，但我覺得“三十六着”不如真的“走為上着”，最好便是取消，只作技術性調整是沒有用的。例如一個人先天性已四肢殘廢，怎可能培訓他成為出色的運動員？這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取消一筆過撥款，令社福界可以重新上路，服務才會得以改善。

主席，有關精神病人面對的問題，福利事務委員會在過去1年其實也討論了不少。大家很擔心香港的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支援不足，這是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及服務機構之間溝通和資源不足的問題，引致精神病康復者面對很大的苦困，而精神病康復者的問題亦會影響社區和其他家庭。因此，這項服務要早日獲得全面改革，訂定一個大家也接受的服務模式，令精神病康復者在社區得到合適的照顧和服務，亦令社區可以接受精神病康復者，變成雙贏方案，否則，所產生的問題是極為嚴重的。

另一點是有關老人問題，很多議員也提過。政府說要投資，又說要關懷，但在香港，很悲慘的情況是，很多老人家因為其子女有經濟問題而未能獲得照顧，基於社區支援不足，很多老人家便要入住安老院，但每年也有數以千計的老人家，在輪候入住安老院期間去世。政府作為提供服務的機構，作為政策制訂者，不覺得慚愧的嗎？一年、兩年、3年也如是，已明顯證明服務不足。政府當時有千億元盈餘，有這麼多空置土地，也不把土地潛能釋放出來，運用餘下的盈餘興建安老院讓老人家入住，政府沒有感到慚愧和羞耻的嗎？不是沒有錢，也不是沒有地，亦不是沒有人才，卻把資源派給大財團，寧願退稅、退差餉，也不願意為老人家提供一個臨終前的安樂窩，這些高官還是人嗎？這個政府還有沒有人性？寧願要老人家等到死，連這些基本服務也不願意提供，這是否還是一個有人性的政府？

主席，政府再如此下去，貧富懸殊只會不斷惡化，生活在赤貧的人數不斷增加，香港的繁榮指數不斷倒退，官員的薪金卻不斷上升，這是甚麼社會，甚麼制度？這是一個小圈子政府，特首只由800人投票產生，將來可能是1 600人，他們互相支持，互相吹捧。他們的關係很好，大家相約用膳，用膳時又飲靚紅酒，特別是唐英年局長便最喜歡了，還很自豪地推廣紅酒中心，一支紅酒售價過百萬元，報章又大肆報道這是繁榮景象——所以這便是香港的繁榮景象。但是，不好意思，香港的繁榮指數是在下跌中的。富豪繼續錢多得不知往哪裏花，政府高官退休後替富豪工作繼續賺錢，這是利益輸送，互相包庇權益，這便是香港的景象。

因此，香港一天沒有民主，香港市民，特別是貧窮的市民，只能依靠這些官員、這些政黨幫助他們的話，他們真的要自求多福。我希望市民要醒覺，一定要抗爭、反對和反抗。

湯家驛議員：主席，很多高官對陳偉業議員剛才的講辭可能聽不入耳，但其他人其實是可以理解他的憤怒的。我相信坐在這裏的官員亦能理解。

我們上一節的議題是優質生活，主席，對於一些每天都是挑戰，每天都是一個難題的香港市民，施政報告談及優質生活，其實是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主席，上星期聯合國再次公布，香港在已發展地區中仍維持是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年復一年，香港繼續是榜首，今年的數字是0.434，已超逾了警戒線。主席，施政報告內卻找不到貧窮兩個字。有時候，我真的懷疑我們跟曾特首是否活在兩個不同的城市，是否生存在不同的空間。為何他未能感覺到我們的無奈和憤怒？主席，整份施政報告沒有提及貧窮問題，唯一是施政綱領第54頁，曾提到維持食物銀行和透過扶貧專責小組繼續統籌政府各部門的扶貧工作，並監察落實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各項建議進度。主席，是前扶貧委員會，連這委員會也沒有了。

在政府眼中、特首眼中，香港是沒有貧窮的。兩星期前，特首在答問會說了一句話，令所有人也掉了眼鏡——潮語是“O嘴”。他說收入低於綜援金額的，才算是貧窮戶。因此，他當天跟同事舌戰了很久，爭論香港究竟有多少貧窮戶。主席，社聯採用的定義是仿效其他國家對於其他貧窮線的界定，即收入低於中位數的50%或60%，歐盟和世界經濟組織(OECD)有兩種不同的計算方法，但兩者相距不大。根據社聯計算，

中位數應該是1萬元，即收入低於5,000元的，便落入貧窮線之下。主席，按這個計算方法，樂施會在2007年發出的報告指出，月入5,000元的就業人士，由10年前的222 800人增加至去年418 600人。主席，是雙倍，10年內增加了一倍，增幅達87%，平均每7至8名在職人士，便有一位屬於在職貧窮。在職貧窮不再停留於技術工人的層面，而已擴散至文職和零售業。陳偉業議員剛才問官員是否知道羞耻，主席，我自己則感到非常羞耻。

為何香港的貧窮問題周而復始，不單不得以解決，還每天在加深，而貧窮的人還每天在增加？這是因為政府由始至終也不肯清晰地界定貧窮的定義。沒有這個定義，如何提出針對性的策略改善情況？我們如何能洗脫全世界貧富懸殊最嚴重地方的惡名？主席，這份施政報告沒有任何段落提到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也沒有任何建議指出我們應如何面對這重要的議題，但這是影響香港很多人的議題。主席，我昨天說，特首指傳媒無中生有，請他看看他眼前的大梁木，我們的特首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

主席，除了在職貧窮外，我們還說要關懷社會，而這一節便是關於關懷社會的。特區政府有多關懷呢？昨天、今天，有很多香港市民在外面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訂立全民退休保障的“慘業”，有同事還說阻擋了他的視線，令他看不見其他同事，這是多大的侮辱。多年來，我們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學者亦提出了很多計算方法，但政府仍然聽不入耳。主席，施政報告仍然沒有提過我們如何做到中國人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何做到關懷社會。如果關懷社會不是從尊敬和維護長者尊嚴做起，我們應從何做起呢？

主席，我感到羞耻，我不會問在這裏的高官是否感到羞耻。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長者宿位是唯一在施政報告內有提及的，在第97段和第98段有寥寥不足150字。可是，實際情況是怎樣呢？過去數年，我們差不多每年開會時都提及長者宿位嚴重不足的問題。我給你看一些數字，主席。全港現時有74 500個安老宿位，相等於全港65歲以上人口的8.2%。目前有57 200名長者已入住這些安老宿位，其中26 000個是政府資助的宿位。換言之，大約31 500名長者正居住在私營安老院的宿位，而仍然有大概2萬個私營安老宿位乏人問津。為甚麼呢？因為很多長者對私院的服務質素感到擔心，所以寧願輪候資助宿位。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安老宿位一直是供不應求的。直至2009年3月底，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達17 948人，平均輪候時間是32個月，而資助護理院的輪候人數是6 220人。代理主席，這些聽起來似乎很冰冷的數字，但背後其實是活生生的人。我們每年有23 000名長者輪候宿位。在過去5年就有19 000位長者在輪候期間離世，真的有如俗語所說的“等死”般，是等到死。平均每年等到死的人達2 200名。代理主席，這些似乎都是很冰冷的數字，但卻全部是活生生的人，他們背後有着活生生的家庭。

政府說甚麼呢？它表示要把資助的宿位大幅提升50%至90%。不錯，是改善了質素，但對於增加宿位來說卻沒有大幫助。至於在未來3年會興建5所政府資助的安老院，如果以一所安老院的宿位平均約80個來說，未年3年，5所安老院只會帶來400個宿位，跟我剛才所說的數字，仍然有相當大的距離。換言之，在香港等死的長者，每年仍然會有。那已是皇恩大赦，以這兩個段落便完全履行了所謂關懷社會的責任。

代理主席，我也不想說太多。我還要留一點時間談政改，但我必須要說，除了這樣的措施，我們每次在事務委員會開會時，也提供了很多建議，例如讓能力未致衰退的長者留在社區照顧其他長者，以減輕公帑的壓力和製造社區就業的機會。為何不做呢？為何不以一個合作社形式組成服務團隊，以鄰里照顧的方式來幫助區內體弱的長者，使他們身心和心靈都得到照顧？為何不從這方面考慮呢？這些建議並不是來自我們，而是來自民間團體的，包括專業人士。為何政府仍然聽不入耳？

代理主席，我上次說過，施政報告在從經濟層面來說，是完全不合格的，在這一節也是完全不合格。

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在過去20分鐘，我看見局長被人大肆侮辱，罵得一錢不值、體無完膚，我也替他感到可憐，儘管“可憐”這個詞語似乎不大恰當，但無論如何，我也希望政府能夠做得更好，因為我不想用這些語言批評政府。

就着特首的施政報告，我也想提出兩點，以表達民建聯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理據和分析，並希望局長能加以考慮。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在數碼年代，青少年使用互聯網和電子工具學習越來越普遍。政府將會研究為有需要學生提供更方便合宜的互聯網學習機會，以減少數碼鴻溝造成學習質素差異。這種說法很正確，也差不多是社會的共識，但可惜仍沒有進一步的落實。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盡快向貧困及綜援家庭兒童提供上網學習的資助，特別是把困難學生的上網費納入書簿津貼。這

是一個最直接的方法，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機會使用互聯網，以配合現今社會的學習需要。

此外，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重視家庭價值，並嘗試從家庭層面着眼，研究緩解不同社會問題的方向。民建聯十分認同重視家庭價值的方向，特別是香港作為華人社會，推廣家庭的核心價值和文化對我們的社會仍有很大的作用。面對香港社會由過去的大家庭演變為現代的核心小家庭，生活模式和家庭組合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產生變化，各種生活負擔使人人為口奔馳等，這些現象都不斷衝擊家庭的凝聚力。所以，政府在考慮提倡發揮家庭對其成員的支援作用時，應該從制訂不同政策的角度考慮促進家庭凝聚力的因素。

近年，民建聯除了鼓勵政府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外，亦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辯論；近期更啟動“愛自己、愛生命、愛地球”運動，這些與政府重視家庭價值的理念是如出一轍的。我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政策方向，是要積極創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例如要求及支持公私營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務及推行彈性上下班制，加強向僱主推廣實施5天工作制，讓僱員有較長的休息時間，以及積極推行設立男性侍產假，從而讓在職父親能有更多時間照顧妻兒。我們亦希望政府從稅制(例如增加父母及子女的免稅額)、公屋政策、福利、教育等範疇，從凝聚和支援家庭的角度重新檢視政策，為家人之間的互相支持和共同生活提供更多誘因。我相信，在實踐這些前提下，推行各種宣揚家庭價值的社會活動才能得到好效果。多謝代理主席。

陳健波議員：代理主席，今年施政報告的施政綱領，在關懷及投資社會方面的措施其實不少，總共提出了27項新措施，並有46項持續進行的措施。

政府在這方面提出的工作，在數量上的確不少，但如果細心一看，便會發現不少的建議都是屬於一些小項目或一次性的措施，未能夠徹底解決問題的核心，對症下藥，例如，政府在解決貧富懸殊方面，仍須有更前瞻性的措施。以下我會就個別項目逐一討論：

第一項是跨區交通津貼。我明白政府會按原來的計劃進行檢討，預計於年底前完成。不過，由2007年計劃展開至今，由於計劃旨在鼓勵居於4個指定偏遠而就業機會較少地區的人士積極尋找就業機會，所以未有將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

然而，事實上，有很多住在不同地區的基層市民，都同樣面對着跨區工作，以及交通費高昂的問題，以致影響他們尋找工作的意欲。雖然他們所面對的問題，與住在這4個指定地區的基層人士所面對的問題，是一模一樣，但卻不獲資助，就是因為他們不是住該4個指定地區。這一點，正反映政策本身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舉例而言，有一名基層人士家住小西灣，雖然東涌及元朗分別有兩份工作可供他選擇，工資也有五六千元，但把車資及來回時間計算在內及七除八扣之後，工資所餘無幾。對他來說，高昂的交通費同樣令他卻步，因為他不是住在該4個指定地區，令他沒資格申請資助，結果他還是把工作推掉了。

所以，我認為計劃應擴展至全港各區，只要符合資格，便可申請。政府可能回應，措施的出發點是鼓勵住在偏遠地區人士到市區工作，如果將計劃推展至全港各區，便會令計劃失去原意。

大家都知道，政策的實際推行情況，跟預期的結果會有一些距離，所以我們要不時檢討政策。我希望由這點帶出一個信息，便是政府提出的政策，原意雖佳，但因為缺乏通盤的考慮及周詳的計劃，最終在執行時才發現問題，以致未能做得“到位”，因而備受批評。

政府在扶貧的工作上固然可以做得更有效，但我留意到，今年的施政報告用上不少篇幅，提到打擊青少年吸毒的工作，當中的措施我是非常支持的。

施政報告另一點提到的，便是家庭核心價值和家庭教育的重要，並特別提到從家庭角度研究及處理問題，創造對家庭有利的環境，以及促進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我個人非常認同這一點，因此，我除了支持設立最低工資(因為最低工資可令僱員過着有尊嚴的生活)之外，我亦非常希望政府能夠帶頭研究，甚至與企業合作，共同研究在香港推動更多改善工作環境的措施。

香港經濟發展蓬勃，許多行業都已成熟發展，加上醫藥發達，退休年齡正不斷延長，高層職位供不應求，年青人向上游的機會越來越少，難度越來越高，一方面令不少在職人士(特別是年青人)透不過氣，感到很大壓力；另一方面，很多年青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氣餒，最終造成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一羣“打工仔”為了工作，常常連休息甚至吃飯的時間也沒有，又怎能創造對家庭有利的環境，促進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呢？

我認為，政府應該盡早正視香港“打工仔”生活壓力越來越大，以及所引申的一連串社會問題。

我一直認為，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不應該是對立，而是互相扶持與合作，和諧共處。政府可以帶頭，甚至與國際企業合作，研究改善香港工作壓力的情況，例如參考外國的做法，進一步推行更多不同形式的彈性上班時間，讓僱員可以靈活運用時間，陪伴自己的父母、配偶以至子女，亦可持續進修，提高工作質素。

最後，我想討論一下全民退休保障的問題。大家都明白，強積金雖有其可取之處，但依然有很多缺陷。以最近一場金融風暴為例，許多選擇了高風險基金的人，在強積金的投資中均遭受損失。另一個缺陷是，香港的低收入人士非常多，他們在低收入的環境下，即使加上僱主的供款，所累積的款額還是很有限，肯定不足其退休之用。

因此，我覺得有關全民退休保障的研究是刻不容緩的，政府一定要研究這件事。政府在這裏推出一些措施，在那裏推出一些措施，又或提供一些津貼，其實絕對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香港絕對有需要研究設立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令每一個人皆能安心安享晚年。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我相信主要是金錢的問題，但我覺得政府不必太擔心，亦不應該迴避，因為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問題，大家已有共識，立法會內也有共識，亦明白其嚴重性。

社會與個人一樣，是一定要趁年青及有能力的時候開始儲蓄，就好像這個計劃一樣。我們要趁有盈餘、工作人口依然很多的時候便要儲蓄，不能自欺欺人。我們一定要有適當的計算，把整盤數目計算出來，然後把這些數據攤出來由整個社會討論，大家便可決定做還是不做、採用哪些方法做及如何取得所需金錢。大家作正面的討論，總勝於迴避這些問題。

我相信十多二十年後當香港人口進一步老化時，可能會有更多人須依靠政府養活，如果政府屆時才開始研究，便會太遲。我希望政府真的下定決心，繼醫療融資方案後，就全民保障盡快展開研究。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代理主席，“抗毒、抗毒、抗毒”，大家聽到這3句口號會想起甚麼呢？可能你會想起董太，但其實是曾於何時聽到的呢？是早前特首到學校談論“無毒校園”的時候。“無毒校園”，顧名思義是針對學生，現在政府已開始預備激烈地實行自願性驗毒，當中存在的憂慮，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首先是標籤效應，政府已盡力避免標籤效應，但就學生是否參與這個計劃的保密程度，我認為亦非常重要，因為不參加，便好像告訴別人自己有問題似的。

此外，有關下游服務，亦談過很多次，一旦發現有學生吸毒之後，究竟會怎樣處理呢？在社工方面，他們須有大量資源，而學生、學校，以及他們的同學及家長，也須接受輔導，我們更不希望看到學生被逐出學校。然而，最重要的，必定是源頭問題，所以，我希望在打擊源頭方面能加重力度，因為我們不單希望看到無毒校園，更希望看到無毒社會。

此外，我也想就戒毒模式討論一下，難得孫局長及多位局長亦在座。其實正生書院(“正生”)已就新的戒毒模式作了很好的示範。它不是純粹的戒毒所，而是讓同學在那裏讀書和生活。我們也知道，正生的寄宿模式，令它成為一所戒毒學校，所涉及的範疇包括教育局及負責社福的張建宗局長，因為學生要寄宿，當中涉及資助；至於保安範疇，則涉及戒毒。我很希望就着這幾方面，政府能真真正正讓我們看到學生或年輕人獲提供另一種戒毒方式，令他們可以真的融入社會及重納正軌。多謝代理主席。

葉偉明議員：代理主席，我最近就施政報告出席居民大會，居民往往問我，施政報告推動六大產業，會對我們有甚麼作用？會不會增加就業機會？對我們的生活有甚麼改善？其實，當居民提出這些問題，我會向他們表示，我對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抱着相同的疑問，因為自1990年代以來，基本上我們的製造業大部分已外移，以致基層市民謀生艱難，即使找到工作，工資亦不高。時至今天，香港更榮登所謂世界貧富懸殊最嚴重地區的榜首，換言之，香港又多了一個“世界第一”了。

工聯會一直建議為基層創造就業機會，這應是政府經濟政策的主導。然而，特區政府多年以來，推推搪搪，經常強調只要有經濟增長，便會產生所謂“滴漏效應”。我認為政府官員對這些經濟學的名詞的認識，永遠比我們懂得多。但是，我們看不到有甚麼效應。甚麼是“滴漏效應”呢？難道是要等有錢人或社會上層賺到盤滿砵滿的時候，他們從口袋中漏少許出來，這些便是“滴漏效應”？政府到現在仍未清楚告訴我們如何界定這個定義，總是說有經濟增長，便會有就業。事實是否如此呢？

說到貧富懸殊，我相信是現今社會所關心的問題。在今年施政報告出台之前，我與許多市民一樣，希望政府就貧富懸殊這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改善措施。但是，施政報告發表之後，相信不少人，包括我在內，總會有點失望。或許我們不能感到失望，因為政府根本一直沒有回應這方面的問題。對於貧窮問題，以我們所見，整份施政報告只有第123段提及，當中特首說：“要解決就業及貧窮問題，仍要依靠經濟增長，共同創富。若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必須大幅調整稅制，提高稅率”。他再用這數句話來推搪我們，而我更認為他恐嚇我們、分化我們，似乎要告訴我們，要解決貧窮，要令更多基層人士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便要加稅。他便是用這點來恐嚇香港市民及分化我們。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第123段中表示要解決就業及貧窮問題，便要依靠經濟增長。換言之，即使到了今天，政府似乎仍不願承認，單靠經濟增長，是解決不了貧富懸殊的問題。以我們所見，所謂“滴漏效應”是不能為我們的基層勞工帶來足夠的就業機會，這也是直接導致貧富懸殊的主因。最近，社聯分析統計處的資料後，推算出在今年上半年，本港有123萬貧窮人口，較去年上半年多了2萬人，較10年前多了兩成，反映了貧富懸殊是越來越嚴重，而且貧窮問題最嚴重的，是65歲以上的長者。2009年上半年，我們的貧窮率達到32.1%，有近27萬名長者生活於低收入家庭；而青年的貧窮率上升幅度亦十分驚人，由15.4%上升至20%。因此，當政府表示要致力發展六大產業時，它要顧及六大產業能否真的惠及這些人。否則，政府應採取更多有效措施，減低貧富差距。

要解決貧窮問題，必須花一定的工夫，不能單靠經濟增長便可以解決問題。從1980年代起，香港經濟快速增長，但貧窮人口亦同樣增加。198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是0.451，但到了2009年便達到0.533。如果經濟增長真的能解決貧窮問題，為何反映香港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不斷上升，而與此同時，本地生產總值也是不斷上升？回歸之後，香港雖然經歷金融風暴、SARS及金融海嘯等的衝擊，但十多年來，我們的經濟都是有一定的增長，如果行政長官認為經濟增長會改善就業及貧窮問題，請問經濟每增長1%，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又能夠減少多少貧窮人口？

在處理貧窮問題方面，政府經常以前扶貧委員會報告的建議來作為解決貧窮問題的靈丹妙藥。然而，我認為這些並非有效的解決方法，更何況扶貧委員會結束工作至今已有兩年多，社會上的貧窮問題亦不斷加劇，我認為政府應該要再因應新的情況，制訂新的改善措施。

在施政報告發表翌日，當行政長官出席本會的答問會時，我曾經向行政長官提問有關政府對貧窮的看法，提問之後，我才發現行政長官所理解的貧窮，與我及這裏許多同事的理解，包括坊間的理解，實際上有天壤之別，對此我感到非常失望。我亦相信，香港作為亞洲或國際先進大城市，貧窮水平絕不應以收入低於綜援金額為界線，因為如果一個家庭的收入低於綜援金額，即月入約2,000元，在香港這個生活指數這樣高的城市，月入2,000元又如何生活呢？如果真的要低於此數才算是貧窮的話，我便要恭喜香港政府了，因為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已經消滅了貧窮問題。再以近期社會所關注的高樓價問題及豪宅呎價達七萬多元來比較，我們可以看到貧富懸殊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這實在是政府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我們認為政府不應再就貧窮的定義，與我們糾纏不清；即使再按局長所說的24項指標，我們也希望政府不要再與本會糾纏不清，而是實實在在提出一些解決方法。雖然香港在很多領域成為全球之冠，但我們不希望貧富懸殊問題繼續令香港成為全球第一。

其實，說到尋找工作，當中的困難是交通費高昂。很多工友由於交通費過於高昂而放棄跨區工作。我們希望政府能繼續提供跨區交通津貼，資助一些須跨區工作的工友，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也令他們較易就業。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除了進行檢討之外，更應該延續交通津貼，補貼基層工友的交通費，而不希望政府以進行檢討便把問題輕輕帶過，最終不了了之。

至於交通費支援計劃中的600元求職津貼，我們認為也應延續下去，而且有上調的空間。在求職津貼以外，我們希望政府設立求職輔導，為求職者提供見工技巧、貼士，對於每次求職均失敗的人，提供個別輔導，以協助他們就業。

最後，我想就社會企業(“社企”)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施政報告用了一段的篇幅來交代社企的發展。猶記得政府在2007年年底曾舉行社企高峰會，但事隔兩年，我們看不到這個社企高峰會為社企的營運帶來甚麼契機，社企的營運仍然面對荊棘滿途的挑戰。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成立社企諮詢委員會，但諮詢委員會由甚麼人組成？政府所委任的成員能否真正明白社企所面對的困難？我們希望政府能提供較詳細的解釋。

另一方面，施政報告又提出鼓勵大專院校培育社會企業家。但是，有關的培訓計劃是怎樣？如何能令大專生願意放棄尋求高薪厚祿的機

會，投身營運社企的艱難道路？我們希望政府實實在在地考慮這些問題，以免流於空談，為我們培養更多願意投身社會、為社會公益事業獻身的社會企業家。

我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是特首向市民表述他管治香港的理念和策略，理念是反映特首對社會存在問題的看法，策略是特首如何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並為社會未來發展作好準備。在這份施政報告，我和行政長官有很大分歧，我不同意特首意圖以所謂的六大優勢產業解決香港與經濟有關的一切問題，例如貧窮和失業的問題。六大優勢產業解決不了的，則提出家庭價值，要求家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卻沒有任何的措施，紓緩香港家庭現時已承受的重大生活壓力。我對政府把採取紓解民困措施的行動稱為“派糖”，感到極大反感。“派糖”是自上而下的一種獎賞，是一項可有可無的措施。扶助弱勢社群，從來都是政府的責任，並不是政府的恩賜。在這一節，我會就施政報告的社會福利事宜表達我的意見。

代理主席，特首在施政報告裏說，家庭關係良好，各種社會問題也會相應減少。因此，特首要求家庭議會就青少年吸毒、賣淫、照顧老人及幼童等問題作重點討論和研究，從家庭層面着眼，建議緩解問題的新政策方案。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生活健康，社會問題便會減少，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特首既然希望用家庭來紓解社會問題，最低限度要瞭解現時香港市民的家庭生活是否健康、要有措施幫助家庭解決他們面對的沉重壓力，這才談得上施政報告所說的“從家庭層面着眼，建議緩解問題的新政策方案”。

施政報告提出的，是由家庭議會在全港開展“開心家庭運動”，彷彿家庭是否開心，是可以藉運動來達致的。我在施政綱領內便看到，所謂“開心家庭運動”，綱領是這樣寫的：“宣揚家庭核心價值，鼓勵社會大眾共建富有香港特色的家庭(即歡欣、仁愛、互助互勉及有責任感的家庭)”。代理主席，各位局長，綱領說的是普世追求的家庭價值，並不是香港特色的家庭。當下香港的家庭是有特色的，便一如我在本月15日在施政報告答問會質詢特首引述1封函件時所說：“政府近幾年過於強調經濟發展、節省成本、市場競爭和生產力，無論是資方和市民都要增加工作時數，減少休息時間，工作壓力有增無減，投訴及不滿與日俱增。家庭的生活質量較個人生活質量惡化得更加嚴重。”這便是現時香港家庭的特色，這個特色不改變，無論政府再搞多少個“開心家庭運動”，香

港家庭也快樂不了；這個特色不改變，特首希望以家庭來紓解社會問題，只是緣木求魚；這個特色不改變，香港社會問題不但無法紓解，還會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

據統計處今年第二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現時共有超過13萬的家庭月入在4,000至6,000元之間，涉及超過24萬人，施政報告說的“開心家庭運動”又能否對這些在綜援線上掙扎求存的家庭有實質幫助呢？

施政報告的第90段談到青少年問題，要求家長與子女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瞭解他們的興趣、能力和需要，鼓勵他們多元化發展，幫助青年人面對學制轉變和知識型經濟的發展。在第96段談及長者服務，稱家是我們最熟悉和最有感情的地方，政府的政策是鼓勵長者居家安老。第102段談及殘疾人士，說政府的康復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各種康復服務，讓殘疾人士與家人和照顧者共享愉快和諧的社區生活。但是，當香港家庭生活質量不斷惡化這個特色不改變之前，當香港貧窮家庭的生活得不到改善之前，施政報告所說的青少年政策、安老、殘疾人士的政策，即使說得更天花亂墜，也是無濟於事的。

要改變香港家庭生活質量的惡化，要改善香港貧窮家庭的生活，當中不能避免的，便是要改善現時勞動市場的環境，這包括要有合理的工資和工時，完善勞工法例和失業保障等。儘管勞工界多年來所爭取的最低工資終於可以進入立法議程，但法例最終能否一如我們期望般，可以保障工友的基本生活呢？仍然是未知數。但是，不論結果如何，只有最低工資立法，是遠遠未能改善家庭生活的。特首在施政報告答問會上回應我的問題時，認為現時要去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將面對很大阻力，甚至會阻礙最低工資的立法進度。但是，我要指出的是，阻力不應該成為政府不願訂立合理工時政策的借口，更不應該以會阻礙最低工資的立法進度來自我開脫。

代理主席，在失業保障方面，我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基金的立場和理由在本會已說了多年，立法會內其他同事近年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失業援助方案。但是，政府仍然無動於中，至今仍然只在一些枝節上做工夫。施政報告提出在天水圍成立一站式的就業及培訓中心，利用資訊科技改善職位空缺資料的發布及成立飲食招聘中心。幫助失業市民尋找工作的措施當然是越多越好，我支持施政報告的這些措施。但是，幫助失業市民尋找工作，不等同於解決了市民面對他們在失業問題上的困境，只有經濟上的支援政策才能夠幫助這些失業人士，可以穩定社會民心，只有經濟上的支援政策，才能夠解決失業市民的燃眉之急。

在完善勞工法例方面，我十分關注施政綱領內提及的檢討《僱傭條例》中連續性僱傭的定義。現時不少兼職工人或時薪僱員，實際上便好像施政報告所說般，他們在家庭內擔當照顧長者、照顧子女的角色。但是，這些既要照顧家庭，又在職場上工作的僱員卻完全得不到勞工法例的保障，我希望能夠盡快完成這個檢討，把兼職僱員納入勞工法例的保障。與此問題相關的，便是政府必須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使擔起照顧長者，照顧子女的家庭婦女，她們晚年的生活能夠得到保障。當我的上述建議都能夠得到落實的時候，普世社會追求的家庭價值便能真正在社會落地生根。

代理主席，在施政報告第123段特首提到，若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必須大幅調整稅制，提高稅率，特首相信市民不會認同這個做法。我對特首刻意地把紓解民困和大幅加稅放在一起，感到極大遺憾。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公平合理地調整我們的稅制，讓香港不單是一個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經濟城市，還是一個充滿關懷仁愛的國際都會的話，是會得到廣泛市民的認同的。

謝謝代理主席。

林大輝議員：各位局長，一直以來，我都很關心青少年的發展問題。最近，政府公布15歲至19歲青少年的失業率是25.7%。雖然數字已較上月回落，但始終屬於一個高水平，即每4名青年人便有1人失業。我有點失望的是，政府對此似乎束手無策。事實上，今次施政報告沒有提出一些針對性的解決方法，但這問題實在很嚴重。

當然，我絕對沒有懷疑張建宗局長對“保就業”的決心。我們相識多年，我知道局長一直是勞心勞力地處理這件事，他亦很盡力及試圖解決問題。可是，青少年失業的真正原因，其實不單是勞動市場出現問題，根源是我們的教育制度亦出現了根本性的問題。所以，要張局長處理和解決這問題，他亦是很無辜的。事實上，15歲至19歲的年青人根本不應該過早出來社會做事，他們應該留在學校過校園生活，讀書增值。他們為何要出來社會做事，而不留在學校求學問，原因可能是他們未能追上課程，以致無心向學。為何他們未能追上課程呢？原來很多青少年未能適應傳統文法中學的課程，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特別愚蠢。

作為一個重視人才培訓、重視教育的政府，絕對不應該容許這麼多15歲至19歲的青少年過早投入社會工作，而是應該想盡辦法，令這羣青少年能繼續留在校園讀書。因此，我很希望政府能大力和大膽推行更多特色教育，開辦更多專科課程和學校。天生我才必有用，其實，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學習潛能和興趣。作為政府，如果重視教育，一定要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和學科，讓他們有更多選擇，能夠增值和學習。當他們有選擇，自然會繼續學業，不會太早出來社會工作，也無須面對求職的問題，失業問題自會減少，失業率亦會下降。

事實上，一個邁向知識型經濟的社會，不會有太多低技術的職位提供給這羣低學歷的學生。因此，我們一定要停止製造青少年過早在社會工作的情況。我剛看到孫局長離開，我很希望張局長能跟孫局長好好討論，制訂一些政策和措施，幫助這羣未能在傳統文法中學升學的15歲至19歲青少年，讓他們可以有其他途徑繼續學習，過校園生活，讓他們可以增值，無須過早在社會工作。

我還想談談青少年的吸毒問題。毫無疑問，這問題越來越嚴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可是，我亦知道政府不可能一時三刻解決這問題，當然，大家也想有一些很好、很快的方法能夠立刻徹底解決問題。我在製造業經營廠務已二十多年，在生產上碰過不少大大小小的問題，亦處理過很多棘手問題。總結過去多年的經驗，解決問題時一定要從源頭着手，一定要由根源出發，才能切實解決問題。有賣才有買，如果吸毒者沒有途徑購買毒品，又或是不容易購買毒品，他們想吸毒也沒有辦法。這是市場的供求問題，如果市場上供應少，毒品價格自然提高，青年人亦未必能負擔吸毒的費用。所以，我覺得政府解決毒品問題，一定要從源頭着手，一定要雷厲風行，加大刑罰，懲處毒販，加大警方和海關掃毒的執行力度，斬草除根，務求趕盡殺絕，這才是治本之道，才可使毒品不能橫行，不會泛濫，青少年才沒有機會接觸。

提到校園驗毒計劃，我刻意不提“自願”兩字，只說是校園驗毒計劃。大埔將會在12月實施這計劃，現時，我不想就這計劃的成效妄下判斷，猜測其結果，但我很希望政府一定要把計劃的進度和結果，徹底透明地告知其他中學。如果有成效，我相信其他中學，包括林大輝中學亦會支持這項計劃。然而，如果計劃沒有成效，便千萬不要再包裝這計劃，而是要實事求是，作出修改。政府亦不要勉強其他地區的學校跟隨，因為後果是可大可小的。

此外，推出驗毒計劃，一定要抓緊時機，備有完善的配套。對於吸毒問題，一定要醫治，所以醫療、輔導和社工方面，一定要有很好的配套才能推出計劃。否則，即使找到吸毒者，也未能提供幫助，令他們沒有機會重獲新生，也不可以過正常的生活，那便更可悲了。我希望政府在驗毒計劃方面能全面考慮，有深度地推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成智議員：代理主席，我覺得要向行政長官今年的施政報告致謝，實在有點為難，雖然我的修正案仍保留致謝的部分，但我認為另一部分是要作出批評。從福利角度而言，這份施政報告不止不合格，更只可獲超低分。特首用時下潮語指“香港經濟需要‘升呢’”，但在福利方面，我相信很多市民會“O嘴”，不知是否特首因為“hea底”而忽視福利。局長亦很本事，提出天花龍鳳的解釋，不知是否在“屈機”。

剛才很多同事討論貧富懸殊、貧窮人口激增的問題，這些固然是事實。特首不單沒有談及貧窮和貧富懸殊問題，更沒有就殘疾人士本身、其照顧者及長期病患者的福利，以至整體的長遠福利政策，還有單親家庭等問題，提出任何具體紓緩措施。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已是世界知名。美國《商業周刊》引述聯合國開發組織的報告指出，因為本港的富豪數目眾多，但基層工人並沒有最低工資保障——當然我希望可以盡快有這保障——令貧富差距大大拉闊。這份報告更指出香港在已發展經濟體系中，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最高，反映我們的貧富懸殊問題最令人擔憂。該報告又指出，香港最有錢的一成人的收入，是最窮的一成人的十八倍。我估計最有錢的一成人的收入，可能等於餘下九成人的收入也說不定；目前的情況實在非常嚴重。但是，特首在發表施政報告的演辭當中，無論對長者貧窮、在職貧窮以至婦女貧窮等，均隻字不提。

特首認為要解決貧窮問題，首先要發展經濟，帶動社會繁榮，投資教育來促進社會流動。剛才李鳳英議員亦提到，特首的論點是如果要維持福利措施幫助窮人，便要大幅加稅。這說法完全違背了政府現在強調的社會和諧，這是一種社會分化。為甚麼幫助貧窮人，便恐嚇市民有需要加稅呢？這不單是分化，更是歧視窮人。我想指出，貧窮問題其實已迫在眉睫，當局制訂解決方法實在刻不容緩。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無論是根據特首的定義，還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的定義，貧窮人士所面對的困難並不會因為不同定義而改變。一家四口一個月的使費不足1萬元，還未計及租金或其他開支，作為一個有良心的政府，絕對不能視而不見。政府在這事上的表現十分冷漠。

當局可能會以綜援制度作為辯解。我知道在福利事務委員會有關施政報告的簡報會上，局長作出解釋時提到現時的綜援制度，期望綜援可

以包底，解決低下層面對的困境。但是，社聯曾就特首的定義作出計算，在2008年時，貧窮人口有96萬，以當時約50萬的綜援受助人來說，接近一半貧窮人口並沒有領取綜援，也得不到租金或診金等的援助。所以，我們是不可能單純以綜援作為界限。

很多住在板間房的人支付的租金，真的可以用“天價”來形容。他們要用數千元租住數十呎地方，在居住方面的困難和負擔相當大。有錢人可動用數千萬或數億元購買呎價7萬元的豪宅——當然孰真孰假，仍有待定奪——但窮人要擔心要付醫藥費，即使生病亦不敢看醫生；我之後會舉些例子讓局長知道。這些貧窮人的一味餓甚至要分幾餐來食。如果等發展經濟才解決貧窮問題，香港真的可能會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了。

貧窮問題同樣深深影響殘疾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很多照顧者須全職照顧殘疾人士，根據相關團體的調查，四成受訪者每天用超過6小時照顧患者，當中更有超過四分之一每天用上多於10小時照顧患者，照顧工作比一份全職的工作更艱難，因為患者無論在心理或生理上，均完全依賴照顧者。由於殘疾人士的起居飲食和個人衛生均有需要照顧者打點，所以照顧殘疾人士比照顧一般病人要有更多心機和特別技能。如果要全時間照顧，照顧者根本全無收入，但政府對這些照顧者可說絕無支援，令照顧者的日常生活大受影響，亦令他們受到很大精神壓力和困擾。其實，很多時候，他們會認為自己是社會上被忽略的一羣，但很可惜他們仍要在家中擔任照顧家人的角色。

現時的社會保障，很多都忽略了對殘疾人士照顧者的保障，例如強積金、高齡津貼、傷殘津貼等，照顧者都不能受惠。由於沒有時間工作，照顧患者須作很多體力勞動，加上沒有時間進行社交活動，他們往往要面對貧窮、身體機能勞損、被社會孤立等問題。曾經有照顧者在照顧患有精神病的女兒時，因要面對上述種種問題，又缺乏政府支援，以致感到彷徨無助，最終自己亦患上精神病。

我認為政府應要肯定照顧者對社會的貢獻，並盡快提供直接資助予照顧者，不要再用綜援包底的說法來推搪；我覺得這是很冷漠的。我希望政府可以按月發放殘疾人士照顧者津貼，甚至提供情緒方面的支援，讓照顧者可以更有尊嚴地進行他們的工作。

我曾經跟一些照顧者和自助組織的朋友傾談。他們表示，現時自發組成這些自助組織，其實是因為政府的資助絕無僅有。政府還要他們每一、兩年重新申請經費，令他們難以作出長遠的策劃。不過，他們仍然

將全部心血，放在有需要照顧的病患者身上。他們最大的希望是病患者可以得到更多支援。我希望局長可以在這方面想多一點，不單支援病患者，同時亦照顧他們的家人和照顧者的需要。

我想跟局長分享一下，我最近曾探訪一羣肌肉萎縮症病患者，他們患有一種名為“運動神經細胞疾病”。這種疾病是無法醫治的。我以前有一位同事亦患有這種病，只可以透過藥物減慢病情惡化和使病患者不要過早出現全身肌肉萎縮的情況。然而，由於肌肉萎縮影響肺功能，他們會變得難以呼吸，須插喉和接駁維生機器。這些呼吸機的租借費用，加上他們要喝一種維生奶以攝取所須營養，單是這兩項支出，每月便要花三千多元。這並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得來的。

我們收到3位病患者求助，他們由於收入超出申領綜援的上限，無法申請綜援，但卻找不到基金幫助；因此，他們在11月初呼吸機租約期滿後，便不能繼續租用機器。他們考慮屆時慢慢地讓自己離開世界。這是一種很可悲的處境。為何我們的政府要讓這些病患者等待死亡？為何不可以支援他們呢？我希望局長日後能夠真正關心他們的情況。

我亦收到另外7位病患者家屬的求助，他們因為缺乏經濟援助，正考慮不替病患者開喉。如果不開喉，這些人便將面對死亡。為何有些人會因為沒有錢便喪失生命？我們是絕不能見死不救的。

政府一直強調“家庭友善”政策，希望社會和家庭和諧。然而，由於現時的綜援制度十分僵化，令很多家庭的情況根本與“家庭友善”的目標背道而馳。現時綜援制度是以家庭為申請單位。我知道有一個家庭，其成員患有多發性硬化症——這是一個很清晰的例子——每月需要八千多元購買第三類藥物才可令病情不會惡化。然而，由於藥費太貴，這名病人要與丈夫離婚才可領取綜援，以幫補醫藥費。因為政府這項制度，最終把這個家庭拆散了。這個家庭還是否“友善”呢？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在特首領導下，單親家庭所面對的問題，也不比上述一些需要照顧的家庭為好。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在2005年所做的調查顯示，在單親家長中，從未入學或只有幼稚園程度佔13.2%，小學程度佔48.3%，初中(中一至中三)程度佔24.6%，這3類教育程度的人數合共81.6%，所以，他們大部分均從事非技術人員的工作。由於他們是單親，要照顧孩子，故此只能做一些兼職工作，只能由星期一至五早上8時至下午4時這段時間內上班。

我曾經諮詢過一些要照顧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媽媽的意見。她們說找工作時，所找到的工作往往時間長和工資低，在工作時不能照顧孩子。無論在上班時或回到家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她們找工作的過程可謂困難重重，而合適的工作亦少之又少。據她們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其實也很想做義工，因為害怕自己與社會脫節。她們實在不懂如何處理這個情況。我覺得我們須為她們提供更多支援。

此外，她們亦要面對歧視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她們是福利的依賴者，只靠領取綜援。然而，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和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曾在2007年就欣曉計劃進行研究。有受訪者表示她們經常被別人諷刺，說她們只靠領取綜援而不用工作，也有很好的收入。這樣根本是把綜援人士醜化，甚至是歧視。這羣單親媽媽其實很有自信，但很可惜社會人士對她們有很多歧視。在這情況下，我擔心她們連僅有的自信也會因為被標籤或受到歧視而逐漸失去。

單親家長須面對家庭變遷，要努力重整家庭功能，也要面對照顧子女的壓力。我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情緒上或就業上的支援。我覺得當局可考慮在政府的辦事處開設服務大使的職位，讓她們可在合適的時間工作，向她們提供訓練，以及讓她們帶動政府部門提供真正“以民為本”的服務。這些工作為何不做呢？民主黨在早前公布財政預算案時已提出此建議，但政府直到今天仍沒有作出回應。

還有，我們在昨天，即星期三收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所送的一片葉，這片葉就在此，上面有一個“慘”字。他們想表達一個很簡單的意願，就是無論是長者、家庭主婦、殘疾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均須受到保障，尤其是當他們沒有工作能力時。在現時申領綜援的48萬人中，長者、貧窮佔四成，很多婦女是家庭主婦。在2007年，非從事經濟活動的料理家務者，女性人數為652 000人，男性為12 500人，女性佔了大多數；另有數萬名殘疾人士，他們年老時亦沒有保障，他們沒有強積金，只可選擇限制多多而且僵化的綜援，以及在65歲時得到每月1,000元的“生果金”。民主黨認為，政府應改善長者、失業人士、殘疾人士及家庭主婦沒有退休保障的情況。他們個人儲蓄有限，又沒有強積金保障，在缺乏家庭支援時會十分彷徨。因此，全民退休保障對他們來說是“救星”，令他們的生活更穩定。

福利是政府一項很重要的施政方針。透過福利，社會資源可以重新分配，幫助社會上被忽略的一羣。本港的福利政策一直被指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希望政府在制訂措施解決上述問題之餘，亦能作出長遠的福利規劃，包括訂出有效的機制反映社會的發展和共識。政府須

更深入瞭解當今社會的問題，及早提出處理方法，界定機構、政府、家庭及個人的角色，互相合作，而不再是臨渴掘井，手忙腳亂。

現時，很多現代化社會均認為接受福利是公民權利，是人權。這亦成為社會進步的其中一個指標。我希望政府能夠真正負責任，照顧這羣弱勢市民，不要將他們置諸不理。

主席，我亦想討論勞工問題。施政報告不單漠視貧窮，亦忽略了勞工就業問題。施政報告只有數行文字關於勞工和就業，我把標點符號也計算在內，亦只有177個字。因此，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全港譁然。市民熱切期望施政報告會提出協助他們的措施，但當中只有177個字提及就業問題。很多市民現在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希望政府能夠伸出援手，但他們卻很失望，怨聲載道。在上星期四，張建宗局長到立法會嘗試替“老闆”解畫。張局長果然功力深厚，用了十多分鐘來解說這177個字，提出了很多工作。我特別記得他提到，當中有很多新思維，大家不應只注意這些範疇，另一些範疇也是要考慮的。換言之，施政報告根本沒有任何具體措施來解決失業和就業問題。

在施政報告公布前，有民意調查機構對市民進行訪問，92%市民認為政府應具體解決勞工就業問題。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最新的民調顯示，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曾特首任內5份報告中最差的一份。市民經過冷靜後重新看清楚施政報告的內容，發現特首沒有或只用了少許篇幅提到扶貧和就業問題，因此支持率較上次跌了多過46%，跌了很多，差不多一半。由此可見，特首這份施政報告是多麼令人失望。

當然，政府指大家應以新思維來看這些數據。如果要辯論政府漠視或低估民意這項議題，我相信三日三夜也沒完沒了。但是，政府明顯地忽略了青少年就業問題，以及婦女和單親媽媽的失業問題。我們亦看到，施政報告亦少有提述職安健的問題。此外，最低工資的問題仍未獲解決，最高工時和集體談判等問題亦沒有提及；這些都是勞工關注的問題，政府應要盡快解決，責無旁貸。

主席，青少年一向被視為社會的未來棟梁，但今時今日，青少年會被聯想為甚麼呢？很多人會以“隱青”取代“傑青”，“雙失青年”代替“成功青年”，反映出青少年在社會上面對越來越惡劣的處境。我記得在數年前討論施政報告時曾舉出了一個例子，我今天仍記憶猶新。我的兒子問我，在中學畢業後會怎麼樣，我對他說可以讀大學，他又問完成學位後會怎麼樣，我說可以讀碩士，然後找一份好工作。然而，在我們說完這番話後不久，便聽到新聞報道，有一位碩士生因完成學業後未能找到工作而跳樓身亡。我的兒子立即問我，他怎麼辦？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

題，年青一輩未來所面對的困境會更大。其實，15至19歲青少年的失業率，在7月至9月間已達25.7%，這是我們要積極關注的情況。這說明了青少年已成為金融海嘯下的祭品，而政府對青少年失業問題仍是視而不見。

特首和張局長可能有很多解釋，堅持青少年現時的失業情況已逐漸好轉，反映政府早前推出的青少年就業措施已發揮作用，取得成效。主席，我希望局長和特首不要太健忘，因為張建宗局長就貧窮指標的文件作出剖析時，當局明言就業情況並不樂觀，勞工市場疲弱，職位可能流失，現時青少年失業率只能輕微下調。所以，政府不要以為現時的措施奏效。其實，解決青少年就業問題仍然有一條漫漫長路要走。我們希望特首能履行競選時的承諾，盡快為弱勢社群和“雙待青年”提供就業機會。

除了青少年失業問題，施政報告對婦女，尤其是單親媽媽的失業情況也沒有提及。我剛才說過單親媽媽找工作時遇到的困難。《明報》亦曾引述，在天水圍區內受訪的婦女中，有一成六任兼職和散工，失業率接近一成。有一名50歲的單親媽媽在扣除強積金供款和房租後，只餘下三千多元來照顧一家三口。她為節省美孚站至荔枝角站一程3.6元的車費，每天步行25分鐘上班。她是在乘車後要再步行25分鐘的。主席，我記得特首在國際無車日從禮賓府步行6分鐘到300米外的教堂，已大字標題地報道，但這位媽媽每天要步行25分鐘。為何我們不能對這些問題作出即時處理呢？主席，我希望政府，尤其是局長，在未來能真正為這些單親媽媽解決工作上的困難。如果她們能夠獲得更多就業機會，不單有助她們解決貧窮問題，更可令她們的家庭和子女生活得更好。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職安健的問題。最近，環球貿易廣場發生了6名工人跌入升降機槽慘死的工業“意外”。但事實上，我們看到這次並非意外，而是失誤。雖然沒有人想意外發生，但問題在於有關方面沒有做足安全措施。上星期，一名南亞裔工人在施工時懷疑程序出錯，導致天花倒塌，站在屋頂的事主連同超過1噸的瓦礫同時掉下來。昨天，一名工人在大坑一幢樓宇外工作時被高空掉下的混凝土擊中頭部，送院後不治。這些個案每年不勝其數，我想問，政府職業安全的措施是否做得足夠呢？不要只告訴我們進行了多少次調查和巡查。我希望局長就這方面真正做好措施，讓工人安心工作，並在監察、檢控和教育上做更多工作。當然，職安健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希望政府日後能制訂更清晰的藍圖，配合靈活的機制，從而進一步改善業界存在的問題。

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首先恭喜特區政府，我現在想頒獎給它，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全世界的貧富懸殊排名，香港位列第一。當然，特首一定說香港並非有很多窮人，然後便會爭辯怎樣才是窮人。特首說收入低於綜援金的便是窮人。如果按國際的貧窮線來看，收入只要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便是貧窮。如果採用社聯的報告，香港現時已有123萬名貧窮人口。大家想想，在700萬人中，123萬人屬貧窮，這個數字差不多接近兩成。

好了，特首表示不要說123萬人了，轉說綜援戶，那麼我便跟他說綜援戶。在香港，收入少於綜援金的貧窮人口達七十多萬人。好了，不要說123萬人，單說這七十多萬人。特區政府為這七十多萬人做了甚麼？是否有了綜援，政府便認為自己甚麼工夫也做足了？政府一直沿用很舊的思維。我知道特首會告訴我們甚麼，他會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把經濟搞好，這樣市民便可以脫貧。因此，搞好經濟是最重要的。這是整個政府一直以來的思維。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是天大的謊話，因為這個謊話已說了數十年，但貧窮仍然存在。

因此，除了說要辦好經濟外，最重要的是政府有適當的政策介入，令市民脫貧，而不能單憑搞好經濟便成。搞好經濟後，一定要處理脫貧的工作。如果政府說把經濟搞好便可脫貧，這便是天大的謊話，欺騙了市民。

要搞好經濟，過去的經驗是怎麼樣的？經濟好的時候，只有財團受惠，市民只可吃“餅碎”。然而，經濟不好、衰退的時候，財團會第一時間把危機轉嫁勞工階級，屆時市民甚至連“餅碎”也吃不到，惟有吃穀種。這便是在過去10年，我們所經歷的眾多風浪中的寫照。對打工階層來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此，如果說把經濟搞好便可以，這是假的。政府在過去了做了甚麼？每一次出現問題時只懂“派糖”，之後便多“hea”數年，再“派糖”，又再多“hea”數年。政府不曾真的推出一項適當的政策，長遠地解決問題。因此，現時最可憐的是，這樣的政府……坦白說，香港市民怎能不貧窮？

今次施政報告令我們看得更“眼火爆”。對於勞苦大眾，以及那些營營役役，為口奔馳的“打工仔女”來說，整份施政報告表明了一點，便是零承擔，眼尾也不看他們一下。我們現時最關心的當然是就業。施政報告中有關就業的部分，政府告訴了我甚麼？便是給失業工人發一個SMS，為他們提供一部終端機找工作，這是否太荒謬了？整個就業市場有着如此大的危機，政府卻說要為失業工人提供一部終端機。

當然，我知道張建宗局長是……我經常說他是最好的推銷員，“死都可以拗番生”。對於如此“爛”的東西，他也可以說成是新思維。他稍後一定說這是新思維：是幫助市民配工，讓他們在收到SMS後立即找工作。然而，政府不可以只是配工如此簡單，一定要令失業人士找到工作。如何幫助他們找工作？我們其實有一個很謙卑的要求，就是想一想如何令失業人士走出來找工作。我們建議提供求職津貼，每月1,000元，為期半年。這並不是失業援助。我們當然也想爭取失業援助，但我現在先說求職那部分，就是幫助他們找工作。政府不可以只為失業人士提供一部終端機，不可以只給他們發SMS，然後為他們度身訂造，說現在有這些工作供他們選擇。從更積極的角度來說，我們當然希望政府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然而，除了創造就業機會外，我希望在求職津貼方面，政府最少也要多走一步，為失業工人提供一些實際的幫助。

第二是在職貧窮的問題。打工和上班的人都是貧窮的，他們為何還要出來工作呢？然而，香港人真的十分好和善良，政府要他們領取綜援，他們卻不肯。這種民族性是很好的，但政府不應懲罰一些出來工作的人。政府如何懲罰這些人呢？便是令他們變成在職貧窮。現時，出來工作的人較領取綜援金的人更可憐，這種情況不可以長期如是的。

因此，工盟的建議其實很簡單，就在職貧窮這方面，我們一直有兩點要求。全世界都是只有兩個方法。只要兩個方法配合，雙劍合璧，便可以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

第一個方法是，大家都知道，我一定會提出最低工資。我很開心、高興，現在此法案已提交立法會。然而，我希望特區政府——特別是張建宗——必須留意數點。第一，不要像田北辰跟我說般，每小時只有24元。每1小時24元，即每月只有4,900元，這不是貧窮嗎？四千九百元不還是在職貧窮嗎？此外，有一點令我很失望的，便是整項最低工資的立法並沒有很清楚的目標。我們希望有清楚的目標，便是要解決在職貧窮。政府列出來的目標是甚麼？便是避免低收入……不是，是避免收入太低。我不知道甚麼是收入太低。我們曾爭辯甚麼是收入太低？政府要告訴我甚麼是收入太低，但它卻說不出來。然而，如果我說要解決在職貧窮，這是具積極性的。政府的寫法十分負面，說要避免收入太低、競爭力受影響和就業流失，為何政府不可以說得積極一點，便是要解決在職貧窮呢？

第二個解決方法……在我說第二個方法前，還有一點，便是我希望張建宗真的要幫幫忙。他說要有半年適應期，我是反對的。他一直說要有半年適應期，但我很希望不要訂立半年適應期，否則，我不知道又

要等待多久，或許又要多等半年了。我希望一俟立法便實施。現時，全香港的僱主其實都在適應，他們都知道這項政策即將實施。因此，我希望不要再訂立半年適應期了。

全世界都使用的第二個方法，大家都知道，便是負入息稅。甚麼是負入息稅呢？英文是tax credit，英國、美國，歐洲全都採用，就是訂了一條線，收入在這條線之上的人要繳稅，在這條線之下的，政府會補貼，而且也考慮家庭人口；家庭人口越多，兼且出來工作的人便有補貼。這等於鼓勵國民出來工作，所以稱為“Make Work Pay”，勞動有價。如果國民出來工作便有補貼，不出來工作的便沒有，只能領取較低的失業援助。然而，他們一旦出來工作，政府便立即採取鼓勵措施，全世界都用這個方法，吸引國民從失業福利走到就業的。

好了，我在香港已提出了多年，現在走了第一步，有了最低工資，我希望可以再走這一步。可是，在走這一步之前，我不禁要問，張建宗局長，為何當局連低收入人士的交通津貼也要拖延呢？現時4個地區已有數千人不能領取交通津貼，他們每月少了600元，要捱昂貴的交通費，為了外出工作，他們要付千多元交通費，但賺回來的，大家都知道，水平是在6,500元以下。政府說他們拿取1年津貼已足夠。如果他們的工資在1年後增加，我覺得也沒有所謂，但情況並非如此，為何局長不可以立即延續交通津貼？他告訴我要等到12月。我現在是哀求將其延續到11月，但局長仍未答應。我們為何要這麼辛苦？是否真的……我認為檢討是多餘的，當局根本上在7月便應延續，但卻拖延。現在已過了數個月，有些人已沒有錢。低收入、在職貧窮，是要找另一個脫貧方法。

第三個大方方法，經歷了多年，大家都知道在經濟波動、財團生意不景時，便會立即向工人“開刀”，趁機裁員——ATV裁員，TVB又趁機裁員，每次都是這樣的。政府又如何呢？一看見減人工、裁員(多謝政府)，政府便會走出來說不要隨便裁員，要多一點與員工溝通。政府是有呼籲、說了出口，但我們要求的不是出口術，我們要求的是政策。政府出口術是沒有用的。對待私人企業，我們要的政策便是集體談判權，但多年來，政府、勞工處、勞工及福利局都沒有積極推動集體談判。

他稍後當然會說有，又會說搞甚麼三方會議，說有很多企業有協助談判，進行調解。坦白說，每一次跟企業談判，差不多都是在工人罷工後才談判的，是否要弄成這個樣子呢？我們希望有一個機制，我們不是希望政府出口術。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便應該設立集體談判機制，讓企業、僱員及具代表性的工會透過談判解決雙方的矛盾。這樣對僱主好，因為如果能解決問題，員工便有士氣替僱主打拼，不會有那麼

多勞資糾紛；對僱員也好，因為僱員也不希望經常號召罷工，希望可以藉談判解決問題，讓大家安心工作。這對雙方都好，但時至今天，香港仍然沒有集體談判權。

所以，主席，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香港勞工是“無啖好食”。不過，無論如何，工盟能做多少便會做多少。如果政府不做、不理，我們便會團結工人，自己爭取。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另一個問題，便是年青人的問題、“Y世代”的問題。甚麼是“Y世代”？是在回歸10年後出來社會工作的一羣，即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出生的一羣，我覺得他們很慘。為甚麼？因為“Y世代”現在已經變了“三無”世代——無階梯，無前景，無穩定。他們為何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呢？他們並非不努力。我所指的不是普通“雙失”的青少年，而是大學畢業生現在都是“三無”，為甚麼？我們這一羣又是甚麼代？我們是“四仔”時代：所追求的是老婆仔、車仔、屋仔、BB仔，我們這裏全部都是“四仔”時代，我們已“上岸”，現在全部已是位高權重。接着又怎麼樣呢？我們懶得理會“Y世代”。大家想一想，“Y世代”的人現在大學畢業後，有甚麼事業階梯？他們正常地工作，但會忽然被裁員。銀行裁員，他們被裁了出去。如果他們在投資銀行工作還較好，因為可以分得很多花紅，但他們很多只是普普通通當一名會計，一旦被裁員，事業階梯便斷了。全部的合約員工，即使是大學畢業生，也是合約員工，約滿便失去工作。

政府是有份訂立決策的。政府現時怎樣對待年青的AO？先來三加三，然後強積金，無pension，我們的“Y世代”要捱這些苦，“四仔”時代的人卻均已“上岸”，是否便不用理會一切呢？私人機構如是，政府亦然。如果想當社工，只可以當合約員工。張局長，現時，社工界的合約員工達58%，佔了六成，你叫這羣青年怎樣看前景呢？他們是全無前景可言。所以，我說的無階梯便是在就業途中樓梯斷了，他們又要從頭再捱。他們既要當合約員工，亦沒有前景。前景是怎樣的呢？他們不知道將來如何。他們的希望何在？是完全沒有穩定性，隨時被裁員的，這便是我們的“Y世代”。

我不知道我們這羣“四仔”是否應走出來鞠躬，對“Y世代”說對不起，說我們這羣人已“上岸”？我希望這羣已“上岸”的人想一想現在無法“上岸”的人的景況。我們也不用說樓價，樓價是更不用想。特首聽了一個律師的電話，她說丈夫是醫生，但兩人也無法置業，特首便告訴她不要住在中環。這真的很傷害現時“Y世代”的心，因為他們的工作已不穩定。所以，我最後希望這羣“四仔”時代的人撫心自問，這樣對待他們，於心何忍呢？

主席，另一羣人更慘。我剛才說的是大學畢業生，但沒有讀大學的豈非更慘？不要說沒有讀大學的一羣，現時“雙失”的一羣更慘。當然，張局長稍後回應時會說現時有展翅、有青見等很多計劃。我們曾訪問展翅的學員，他們問可否給予他們更多學習時間？我覺得其中一個例子很有趣，她是修讀演藝課程的。我在想，15天內怎麼可以修畢演藝課程？我讚她“叻女”，但她在完成了15天的演藝課程後，便可以進入演藝界嗎？是不可以的。最重要的是怎樣可讓他們入職，而非只提供給他們一個課程，當作福利。

青見不要緊，因為可以入職，只要老闆願意訓練他們，但展翅的學員卻不可能在15天內畢業後入職，這是不可以的。大學畢業生已經很慘，但這羣人日後更慘，他們可能是拿取最低工資的一羣。他們是在職貧窮，更無法養家。除了是“三無”外，他們還要多加“兩無”：無工作，無希望，我們怎麼對得起現時的年青人呢？

主席，現在，香港社會喜歡追逐特首有否醜聞，這其實是沒有意思的。我希望大家追逐解決貧窮問題，解決我剛才所提出的問題，大家要真的對得起香港市民才好。

長者要求全民養老金，中央政策組從2000年開始說會研究，研究到現在2009年，仍未發表報告，我不知道全民養老金的進度是怎樣？如何解決長者的退休問題？此外便是院舍問題。現時，輪候院舍的長者，死亡的人數多於輪候到宿位的人數，荒謬至此。當然，張建宗局長稍後又會說有新思維，說可以如何釋放更多護養院宿位。這個我當然歡迎，但請不要玩弄數字，因為數目仍然不足。我們希望聽到如何切切實實解決問題。現時，在貧窮人口中，長者是在最前線、最慘的一羣，希望現在已“上岸”的“四仔”……局長稍後應走出來鞠躬，因為他真的對不起香港市民。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在整份施政報告中，我相信是這個部分是令社會上很多人感到比較失望的。在這個部分，我們所說的是關懷社會，但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這份報告對“打工仔”的關懷其實真的是不足夠。我們首先看看“打工仔”現在面對的其實是甚麼環境。在2008年8月至10月，香港的失業率是3.6%，到今年7月至9月已上升至5.3%。在個別行業中，製造業、建造業及物流業這3個行業的失業率升幅較大，其中建造業的失業率由5.5%升至9.4%，這便是“打工仔”現時所面對的環境，他們是有氣力但沒有工作。

金融海嘯影響全球，由於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因此受到較大衝擊。首先，金融海嘯令環球金融市場波動，香港金融業當然首當其衝。接着，歐美經濟衰退亦令中國出口貨物減少，這拖累了香港的物流業。金融海嘯加上豬流感蔓延，令旅遊業幾乎癱瘓，受到非常大打擊。到了這個階段，香港的傳統四大經濟支柱，其中有3條支柱已幾乎斷掉。

工聯會一直非常關心勞工階層、“打工仔”，特別是基層“打工仔”的就業情況，以及他們所面對的貧窮問題。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貧窮問題不可以只靠社會援助解決，真正的解決方法是增加就業，改善工作條件，讓市民有好的、優質的工作，這才是治本的方法。過去，在傳統的四大經濟支柱中，物流業、旅遊業及所帶動的零售業雖然可以創造很多基層職位，但這些職位同時最容易在經濟不景時被刪減。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要面對將來的經濟發展。

今天在進入會議廳前，我有機會與張建宗局長在外面傾談了一會。張局長說施政報告討論的是比較長遠的規劃，有很多工作正在進行。我正想說，政府應研究長遠來說怎樣在發展香港經濟時顧及“打工仔”，特別是基層“打工仔”的就業問題，因為不是經濟暢旺便自然會帶出職位，讓“打工仔”可以謀生的。政府應想想，怎樣可以令發展更以就業為本，令“打工仔”有好的工作、有足夠的工作。

今年的施政報告，對於貧窮這個問題着墨很少，只在“結語”的第123段提及“貧窮”兩個字。至於怎樣解決貧窮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就是簡單地以經濟增長來解決，但這樣其實不能解決我們這個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問題。

整體來說，我們這個城市絕不貧窮。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堅尼系數現在是世界排名第一，這表示了富有的人不在少數，但社會整體富裕並不能幫助貧窮的族羣。怎樣可以令財富較平均地分配？怎樣可以令貧窮，特別是在職貧窮的人可以賺到多些錢，改善他們的生活，這才是重要的。

要解決貧窮問題，有時候便好像醫生看病人般，首先要知知道病人身體哪個部位出了問題，然後才治療患處，根治問題。所以，要解決貧窮，必要從成因着手，向貧窮人口對症下藥。要解決貧困問題，便得針對不同的社羣，提供相應支援。例如針對在職貧窮的人、低收入的人士、就業困難的人士、婦女的貧窮問題、長者的貧窮問題等。

針對就業困難，工聯會在今年就施政報告約見行政長官時，其實反映了多項建議，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擴展低收入人士的交通津貼至全

香港，我們希望這可成為長期的政策。對於失業人士，在他們未符合資格領取綜援時，應為他們提供臨時援助，這都是我們提出的紓緩方法。此外，我們亦建議政府的工程在招標時，應盡量分拆每份合約至低於政府採購協議的門檻，這可有效地把多些工作保留在本地。我們亦希望政府能夠鼓勵盡量在本地生產一些預製組件。立法會正在審議有關最低工資及欠薪刑事化的法案，以及其他為僱員提供的保障，這些都能有效維護基層勞工的權益，讓他們得享勞動的成果。

另一方面，我亦想談一談關於安老的問題，因為這是今年施政報告內着墨較多的。其中提及的數項措施，我們是贊同的，包括資助安老院舍的護養宿位比例，由50%增至90%；向自負盈虧的護養院及護理安老院購買空置宿位，好讓這些宿位可以獲妥善使用；在未來5年增加安老宿位的數目，以及為院舍提供到院藥劑師服務。我們長期在安老院工作，接觸到病人，我們認為這些措施都能針對現時院舍宿位缺乏及院舍服務不足的情況。

然而，看到這些措施，我亦不禁想起兩個問題。第一，這些都是個別措施，予人少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感覺，即是說現在缺乏院舍，輪候的隊伍長了，我們便盡量想辦法增加宿位。可是，我想瞭解一下，我們的社會其實是否須有一套完整的安老政策？香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相當快，我們怎樣能在這個過程中，以主動方式應付人口老齡化？只是增加宿位，改善少許住宿的設施，是否便可以解決問題呢？還有甚麼其他方法，可以讓社會全面地、以一個協調的方式，應付香港社會快將面對的一個極大問題？

第二，我亦想指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人口老化，對安老服務的需求大，這好像是一件很負面的事，好像是給社會造成了一個很重大的包袱，但我自己的看法是，我們的社會其實已經十分富裕，這是第一點。第二，現在的勞動力其實過剩，人口老化正正可以提供不少就業機會，特別是對那些技術較低，或本身的工作已受淘汰的人而言。通過積極的再培訓，這些人很多其實可以轉型，成為非常好、優秀的護老者。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應以較積極的態度來看此事。如果發展得好，這未必是一個包袱，反而可解決部分的就業問題。

我謹此陳辭。

張國柱議員：主席，這是我第二次就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發言。很可惜，與去年一樣，我仍然不能接受今年施政報告的內容。這份施政報告繼續

忽視弱勢社羣的需要，政府對他們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簡直是置若罔聞。多年來，我們社福界要求政府制訂長遠的社會福利規劃，特首只是左耳入，右耳出。可是，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特首次欠缺遠見，對香港未來的整體發展，沒有長遠的發展藍圖，我真的很擔心我們的下一代不知會生活在一個怎麼樣的社會裏。

我先說社會福利方面的問題。特首今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以“羣策創薪天”為題，希望官、商、民為香港共創新天地，但綜觀整份施政報告，我不禁要問，特首要創造一個甚麼模樣的新天地？無論該報告提出的具體內容，還是字裏行間流露出政府的意識型態，也只是顯示今次的施政報告旨在為有錢、有權、有勢的人，打造新天地，基層和弱勢社羣仍是被遺忘的一羣。

整份施政報告將焦點集中在經濟事項，大談如何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但涉及民生和福利事項卻如九牛一毛。我曾在9月初與特首會面，反映業界的訴求，但在施政報告中，只針對長者和殘疾人士院舍及精神健康服務作出小修小補的回應；對於一些核心問題，例如業界最關心的長者政策、社會福利規劃、檢討服務投標制、18歲以上弱智人士接受教育的機會、落實多項國際公約等卻隻字不提。

施政報告指出，將資助安老院內的護養宿位由現時50%，增加至90%。表面看來增幅好像很大，但在我們行內人看來，根本只是玩弄數字遊戲，因為這樣做，純粹是將護理宿位轉為護養宿位，長者宿位數目實質上沒有增加。這情況與業界爭取5 000個護理宿位及3 000個護養宿位，相距極遠。

容許我引述一些數字，現時須入住護養院的長者，身體狀況要被評為嚴重缺損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這類輪候入住護養院的長者人數目前約有6 000人，平均輪候時間長達4年，但去年便有1 500人在輪候期間不幸離世。這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呢？長者們多年來為香港作出貢獻，卻因為政府的冷血政策令他們未能安享晚年，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此外，我想特別提出資助學童上網的問題。很多團體已強烈要求政府，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提供上網費，因為網上教育在現今社會已變得越來越重要。基層學童未能上網會造成數碼鴻溝，掉入被邊緣化的局面，長遠更會令跨代貧窮及貧富懸殊情況惡化。我想問各位官員，為清貧家庭的學童提供上網費，究竟有多大困難呢？施政報告提出派惺電膽現金券便這麼疏爽，但為貧困兒童做一點事，便要左研究，右研究，究竟政府是否要等到社會問題惡化，才想辦法解決呢？孫局長，請你憑良心辦事。

眼下青少年濫藥、援交等問題日益嚴重，便是由於政府經常輕視社會的小問題，遲遲不願解決，待問題惡化，政府才急就章推出措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惜政府仍未汲取教訓。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坦言要將一堆堆的社會問題，交予家庭議會討論，這更令我感到政府只是用“拖字訣”處理問題，因為這些諮詢架構研究問題需時太長，脫離社會需要。就好像一個病人，當發現有良性瘤後，未有及時醫治，到最後腫瘤變成毒瘤，要治療便太遲了。事實上，社福界多年要求政府為整體社會福利，制訂長遠的規劃，認真聆聽社會需要，才能對症下藥，減少社會問題出現，這才是治本的方法。

今年施政報告，將有關扶貧、扶弱的政策放在第四章，標題是“進步社會”。一個進步、開明的社會，確實要有完善的福利制度，讓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可惜的是，我們看畢整份施政報告，發現所謂“進步社會”只是空談，特首仍視社會福利為一個包袱。

首先，我們比較了在今年和去年的施政綱領中，提及有關社會福利服務的項目。政府今年提出52項措施，但其中29項的內容與去年差不多，只是在字眼上稍作更改，而且很多也是舊瓶舊酒、“炒冷飯”，看似措施多多，但實際毫無新意。例如社福界最關心的長遠社會福利規劃，兩年均有提及，但業界只聞樓梯響，政府究竟何時會向業界和社會作出諮詢呢？這個重要的問題，政府從來沒有給業界一個肯定答案。

最令人氣結的是，施政報告的結語說：“若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必須大幅調整稅制，提高稅率，我相信市民不會認同這個做法”，意思無非是將社會福利視為負累、包袱。為甚麼紓困便一定要大幅調整稅制、一定要提高稅率呢？特首又再一次以自己的意思來代表全港市民的意見。我只可以說，只有全面普選行政長官，這種說法才可以成立，市民才會尊重我們的特首。

事實上，社會福利是穩定社會的基礎，亦是社會發展的投資。我們不妨看看北歐國家的情況，像瑞典的公共開支，便佔國民收入50%。國民由出世到離世，均有很多福利津貼。國內沒有貧民區，沒有人會居於板間房、籠屋，社會非常和諧，國民的生活水準很高。北歐國家的國民，未有因為政府的高稅率政策而不斷上街遊行示威，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效法部分措施呢？政府實在有需要反思。

業界另一個爭取多年的項目便是全民退休保障，這是一種社會投資。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更多長者須依賴綜援及高齡津貼維生，增加政

府的財政負擔。至於強積金計劃亦不完善，一是未能即時解決及紓緩現時退休及臨屆退休年齡人士所面對的問題；二是其設計只是針對中等收入人士帶來若干退休保障，而低收入人士幾乎不能受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在國際社會已有共識，本港民間亦有充分討論，可惜政府有欠遠見，視之為侵吞政府財產的洪水猛獸，視之為政府包袱。我們知道中央政策組在數年前已進行專題研究，但到現在仍未公布結果，究竟政府要拖延到何時呢？

香港政府不斷堅持“小政府、大市場”的原則，要量入為出，將公共開支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約20%。不可不提，香港並沒有軍事及外交等開支負擔，我們為甚麼不可投放多點資源，那怕是多1%至2%來幫助弱勢社群呢？當然，我們不冀望政府一蹴而就，變成一個奉行福利主義的政府，但最少我們希望看到政府有心改善現時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的情況。

社會福利是一項投資，當中包括人力資本、開拓社會資本以發揮穩定社會的功能，這樣才能達致社會共融。如果政府繼續抱着社會福利開支是負累的心態，社會長遠只會更分化，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這對香港未來的發展並非好事。

談到這裏，我不得不談一談近期樓價飆升的問題。我在剛過去的星期天出席了一個“無殼蝸牛”遊行，接觸到不少市民，尤其是一些中低收入人士，他們表示要在現水平購買一個單位確實非常困難。如果特首認為市民可以住得偏遠一些，那他不妨以身作則，搬往天水圍的公屋單位住1個月，這樣既能感受基層市民每天搭巴士往市區上班的情況，亦可感受一下他們是如何生活的，讓特首在制訂政策時可更貼近民意。市民希望安居樂業，我相信這要求也並非過分，但為何在香港這個文明都市，這個小小要求卻變得如此困難？我深切希望政府能順應民意，增加土地供應，復建居屋及重建公屋，以照顧中下階層市民住屋的需求。

在每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會總結過去的工作，以及前瞻未來數年的發展，並提出長遠政策。不過，在過去兩年，我看到施政報告無論在社會福利、醫療服務、房屋規劃及政制發展等方面，均欠缺整體長遠規劃。即使當年推出的十大基建，當中至今有多少已落實呢？約有一半現在仍處於討論階段。至於近期惹來多方批評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事實上是政府提出多年後便放慢節奏，但最終在中央壓力下才急急上馬。可惜在諮詢不足的情況下，造價及收地問題弄至滿城風雨，這正是因為特首處理問題未有長遠考慮。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廣納民意才是最重要的。

特首作為香港的最高領導人，實在應有高瞻遠矚的眼界，為香港規劃未來，可惜我至今仍看不到現任特首曾蔭權有這份雄心壯志解決社會問題。如果他在未來的任期內，仍然抱着“做好呢份工”的“打工仔”心態為香港人做事，見步行步，這便絕對是香港人的悲哀。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議題其實是一項相當沉重的議題，尤其是當香港還被編為一個貧富懸殊距離相當大的地方。雖然很多國際的經濟學家均表示，堅尼系數的簡單比例應重新檢討。例如一個城市，它的財富不限於該城市所生產的，它在國際層面上產生的財富，未必應計算在堅尼系數內。不過，我不想談這些了，主席。我不是想作出包裝，指我們的貧富懸殊並不大。一個經濟活動相當蓬勃的地方，從任何角度來看，貧富懸殊同樣是很大的。

可是，我剛才聽了李卓人議員說過一大番話之後，我也感到很難過。他說現時“打工仔”的工作缺乏穩定性。我記得最少6年前，我已經在這個議會上提出過，並在議事廳跟多位勞工界朋友商討過這個問題。那時我已經提出一個所謂“適時適才”(是我翻譯出來的)的概念，導致二十一世紀的工作環境一定會不穩定，英文是“just-in-time employment”。如果在這五六年間，我們的勞工界朋友可以跟一個卑微的梁劉柔芬一起探討這項議題，研究它在香港未來所帶來的情況，我相信大多數“打工仔”可以及早作好裝備，從而避免在今時今日還在繼續追求社會給他們一個保護罩。

主席，在2001年至2002年之間，我有幸代表香港婦女團體到聯合國出席大會，帶回給香港的信息是：二十一世紀要面對的 —— 即使是聯合國也是 —— 是 capacity building，要盡量提供空間來發揮個人的潛力，不要再談保護罩了。因為保護罩的作用有限，保不了全世界，更保不了社會上所有有需要工作的人。只有這樣，婦女的潛力在這層面上才得以釋放出來，才可以在這複雜的、發展至今時今日的工商社會佔有一席位。

我相信這番說話是語重心長的，主席，撫心自問，我也應該道歉一下，因為我在立法會上是較少說話的一位。為什麼呢？因為我認為做實事比多說話好，但可能由於我少發言，說話也不像劉慧卿議員等女議員般深刻，不能跟大家分享這些意念。可是，二十一世紀就是經濟力爆發，競爭力相當大的一個世紀，時光不能倒流，話再說回頭也是無補於事

的。我們的勞工人口之中，有些人的年紀已經相當大，我們不能不幫他們一把，但對於那些年輕的，我們要盡快令他們醒覺，這樣做才是對的。

還有一點，很多地方的政府其實也在檢討，在過去的政策上，他們是否擔當了很多不應該代入的角色。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表示青少年營養不足，不如提供給他們每人一杯牛奶，或供給他們與一杯牛奶相若的金錢。結果，每個家庭都把這份錢作其他用途，青少年還不是營養不足的！我們千萬不要從代入角色的角度來做過了火的事。我們應讓他們能夠自力更生，我們也要重新檢討社會的這麼多資助，究竟會否令他們陷入一個長期受資助的角色，還是我們真的在扶他們一把，讓他們可以跳出來呢？

就這方面，我相信在此已經說了很多次。主席，我還感到歉意的是，我一向不善於表達，但內心卻一定是很熾熱的。既然這次的施政報告真正提到社會流動，不如就讓我們共同探討，如何令社會的流動機制能夠動得更活潑，使我們這個社會真正能夠出現這份關懷，而不是在角力，不是在找尋保護罩，希望“阿公”來保護自己。保護罩真的不能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真的要自己堅強地活下去。這番話說出來似乎很難聽，但實情正是如此。

我們社會的稅收可能較低，這是沒有錯的，也正因為這樣，我們社會的經濟能力才進步得這麼快。但是，不要忘記，我們社會還有另一項稅收，是一項自願的稅收(*voluntary taxation*)，如果沒有這項*voluntary taxation*，這麼多社會組織、福利組織何以能夠有這麼多資助，並長期靠這些資助維持呢？

我覺得社會上的NGOs均應重新考慮它們要走的路向，為自己的路向作好裝備。如果沒有了或缺少了這些資助，它們會怎樣呢？在這方面，我希望給予資助的，除了政府之外，還有很多機構，它們應該研究一下給予資助的條件，鼓勵機構自立，令受資助機構和受資助者都能夠有自力更生的力量。政府應該做這類鼓勵，千萬不要代入當父母的角色。我們推行的教育制度，在1980年代把所有私立學校無形中殺掉，全部歸入*subvented school*(資助學校)，已經是代入的第一步。我們應該讓更多學校獨立。

我們未來走的所謂e-learning(電子學習)的教育制度，應該鼓勵更多學校自己選擇想走的道路。我們從今天的報章報道中看到，一位曾犯事的老師在改名換姓後，又可以重投老師的制度。我在1980年代擔任一些資助學校的校董時，也看過一些老師神智不大清醒，甚至穿着“人字拖”

來應徵副校長的職位。為何我們的制度會這樣的呢？資助學校要重新想清楚它應該要走的路。

我還想說，在關懷社會方面，我們的社企數年來也未見成果，原因為何呢？馮檢基經常跟我說：“梁太，你跟我們一起做吧”。我很想做，我跟很多商界說，香港社企所欠缺的，便是一個商業頭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企業（“社企”）已習慣依賴，局長，主席，是太習慣依賴了，它不懂得轉彎。如果是現時其他社會的企業，它們根本已經走到國際市場，轉彎抹角的頭腦靈活得不得了，讓它們教導一個3歲的小孩，如何教導、如何解說呢？如果要求社企給予更多錢，便等同跟它分身家，可以怎樣做呢？我們一定要多做工作，鼓勵它們擔當社企的角色、鼓勵它們自立，不要再想着利用資助來支付社工的薪級點。如果是這樣，我也懂得做了。

還有，NGOs內很多人是賴在其職位上而不想改變的，有些人甚至做了十多年也沒有轉過職。新思維從何而來呢？他們只是霸佔着社工頭子的職位而已。

我還想說的是教育角度，我們現時推行e-learning，這裏有很大的空間可以供發展，我覺得這是好的，亦可以改變老師的思維，不再是硬傳授、死背書和考試便算。但是，我希望教育局能夠帶頭呼籲社會摒棄靠考試定成績、靠證書入職的做法，這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靈活。

主席，我剛才說了這麼多語重心長的說話，有人會問，梁劉柔芬是否只有空談呢？主席，不是的。最近，我們經濟動力的數位同事由於關心學生在這種教育制度下的苦悶，恐怕他們吸毒而墮入毒海，我們便舉行了一個名為“同心結力”的活動。我們亦透過其他組織協助路進會幫助一些展翅學生，而我們今天剛競投了一個年宵單位，讓這羣學生嘗試一下經營，作為一個學習機會，如果可行的話，我們日後會做更多。

我們還透過另一個名為“商校伙伴計劃”的組織（是為band three學生而設的），去年協助了差不多3 000名學生，目標是幫助他們轉變思維，令他們明白到即使考試成績不理想，人生的路還很長，要腦袋靈活，還要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手裏。我們都是身體力行地做，我很希望議會內的同事能夠跟我們一起多做一些這類工作。我們少數人已經可以做這麼多工作，如果集合我們60人的手，必定可以做得更多。

我們不談選票、不談名聲，只是實事求是地做事。我希望同事聽完我的發言後，能夠加入我們的行列，做些實事。

謝謝主席。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十分同意不論香港的經濟環境如何惡劣，政府也一定要盡力照顧和幫助老人家，以及殘疾人士的需要。我很歡迎施政報告就長者及殘疾人士宿位的新安排，政府推出買位、增加資助宿位比率，以及增建院舍等措施，以照顧大批護養照顧宿位。我亦支持增加資助長者日間護理服務的名額，以及透過社會企業，改善長者家居照顧服務。這一系列的措施，回應了我前年動議的“長者房屋政策”議案的部分訴求。這顯示政府願意為老人家的生活作出承擔，以及為應付人口老化作準備的決心，我們是應該予以肯定的。我希望政府的措施和安排可以在短時間內落實和推行，盡快減低宿位輪候的時間。

主席，關於貧富懸殊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最新住戶收入調查顯示，低於全港入息中位數一半，即月入少於5,000元的人口持續上升，今年上半年有123萬人，比去年增加二萬四千多人，其中65歲以上長者的貧窮問題特別嚴重，而15至24歲青年亦有18萬人月入少於5,000元。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政府一定要嚴肅正視香港越來越惡化的貧窮，以及最重要的就業問題，很多議員剛才也提出了這問題。梁劉柔芬議員剛才亦提出了政府可以怎樣做。可是，政府對這問題好像束手無策，我聽到勞工界的議員是這樣說，但卻沒有實際辦法可以創造職位。我覺得政府須投放一些資源——其實剛才已有多位議員提出政府要有這決心才可以進行一些持續和詳細的研究，以掌握社會環境和人口發展的變遷，好讓政府制訂比較貼近社會脈搏的人口政策，此外，還可以彌補《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報告所缺乏的，來跟進報告的不足。

我認為創造就業是最有效的減貧方法。施政報告亦是這樣指出。正如很多議員所說，我們面對的問題是，香港正持續向知識型經濟轉移，須具備高學歷、高科技、高技術，以及管理的人才，才可以在市場上找到工作。至於低學歷、低技術，又欠缺工作經驗的求職人士，他們又怎能找到工作呢？我們看到政府提出的四大支柱和六大產業，是不能一時間創造就業機會給這羣沒有知識、學術和技術的人。因此，政府唯一只能從教育方面着手，考慮是否要立即培訓這羣人呢？可是，教育卻又是需時甚長來進行的。因此，我看到問題在於香港工業北移後，便真的沒有這些工種讓他們就業。我記得以前人們貧窮沒有工作時，很多市民會走到街頭當小販，我希望這方法可以打擊盈利豐厚的超級市場。小販的存在，市民一方面可以買到較便宜的貨品，亦可以幫助市民就業。當然，我們不可以回到過去的年代，我只不過指出諸如此類的做法。以前很多香港市民也是靠自己的能力令自己就業，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但究竟政府有何政策和如何創造機會，讓他們可以這樣做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幫助年青人就業，大家也認為年青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梁，但現時香港出現貧窮及失業年輕化的問題，實在令我們很擔心，尤其是青少年沒有工作便會較易染上毒癮。這些承受了失業和生活壓迫的青年，就是這樣墮入毒網的了。不過，我看到政府現在已十分正視這問題，我認為方向是正確的。

可是，究竟政府如何創造就業機會呢？香港工業已消失了，我們現在很多工作也須具有技術培訓，但我覺得香港的教育推行得較為失敗。我們沒有培養年輕人建立正面的人生價值觀，亦沒有創意教育，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我教授建築課程已一段很長時間，卻從來沒有見過香港的中小學提倡創意或藝術教育，從而令學生適合修讀建築課程，真的沒有。因為中學已把學科分成文科和理科，但我們所需的人才正是要具備此兩方面知識，政府根本沒有考慮如何加強學生的創意，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最希望教育政策能以培養學生的興趣為本，而不單是求學分的。

主席，你也當了校長很久，我們怎可容忍那些補習社的存在，它們把我們的教育歪曲了。我認為第一件事要做的，便是要廢除所有補習社，怎可以容許補習社存在的呢？香港有這麼多好學校.....

主席：劉秀成議員，我們將在下一個辯論環節才討論教育問題，或許請你考慮留待該環節才就教育提出意見。

劉秀成議員：我明白，但這是關乎年青人的問題。我們的年青人要創業，要就業，香港教育卻未能培養他們成才，也未能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很多勞工界人士也指出，社會未能提供工作給他們，是因為工種不配合他們的知識。現在所談的四大支柱、六大產業，他們真的完全不認識，這些工作全是須具有學識的人才。可是，現時失業的全是低學識的年青人，所以這便是最大問題。這是我的分析，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們也要分析當中的原因。

主席，如果我們不談教育，便要想一想如何在社會上培訓他們。今次特首的施政報告，唯一令我欣賞的是“開心家庭運動”。我們是否能從建立開心家庭方面着手，培訓青年人和平衡他們的身心發展，使他們有機會找到適當的工作呢？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官員發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十分感謝剛才19位議員就“關懷社會，投資社會”議題發表意見。與各位議員一樣，政府十分關注各個涉及民生的社會問題。我首先會在福利及人力方面作出回應。

剛才很多議員對貧富懸殊的問題表示關注，貧富懸殊是政府持續重點處理的工作。我們從來沒有迴避社會上存在貧窮的問題。大家都記得政府在2005年成立扶貧委員會，目的就是要深入探討貧窮的問題，對症下藥，積極應對。

由我負責統籌的扶貧專責小組，一直竭力協調政府內部有關扶貧的工作，全面跟進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53項建議，大部分建議亦已經落實，包括開展為數3億元的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加強各項培訓和再培訓工作，提升青年、中年及低收入人士的技能和競爭力，加強接觸隱閉及獨居長者，以及落實偏遠地區交通費支援計劃等。同時，大家都知道最低工資立法如箭在弦，目的便是要保障基層勞工。

有議員認為政府對弱勢社群漠不關心，這批評有欠公允，亦與事實不符。如果大家不太善忘的話，應該記得因應經濟情況嚴峻，政府自去年至今，推出了一系列推動經濟、改善民生及就業的紓困措施，投放資源高達876億元。

有關貧窮的定義，最常見的說法是“絕對貧窮”及“相對貧窮”。“絕對貧窮”是指以一個客觀的方法，來界定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未能達到這水平者便屬貧窮；“相對貧窮”則指所擁有的相對來說及不上社會上其他人便屬貧窮。

較早時，行政長官在談到貧窮指標時，表示政府以“平均綜援金額”作為參考。這是基於前扶貧委員會深入探討有關問題後所得出的看法，因為社會普遍接受平均綜援金額是足以應付基本生活所需。但是，我一定要強調，這並非所謂的“貧窮線”，亦不是政府在制訂扶貧政策時唯一的指標。我們並非採用絕對貧窮的概念，單一地以入息來界定貧窮。

前扶貧委員會認為，要較全面客觀地審視貧窮問題，不能單看住戶入息，必須一併計算政府提供的福利或資助服務，如教育、醫療和房屋等。各種有利於個人發展的環境和機會、稅務政策，也應考慮有關人士可能擁有儲蓄或資產，其生活是否有特殊的困難等，並且要從人生不同階段來理解主要社羣的需要。我們認同這看法。

事實上，在2009-2010年度，特區政府在社會福利、教育、衛生和房屋4個政策組別的經常公共開支高達1,391億元，佔總經常公共開支57.6%。

我們一直採用委員會訂出的一套24個多元化指標，從不同角度審視香港的貧窮問題，瞭解社會上各個組別人士，包括兒童及青少年、在職人士、長者及各區居民的不同需要，以制訂各項針對有需要人士的政策和評估成效。按此機制，2008年的“貧窮人口”約為714 900人。

至於有說法指香港現時有123萬貧窮人口，是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指標，凡住戶入息“等於或少於”這水平便被界定為貧窮。這個方法涉及主觀判斷，未必能準確反映有關情況。其中最大的局限，便是沒有計算——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提供的福利和資助服務，例如教育、醫療及房屋等，也沒有考慮有關人士可能擁有儲蓄或資產。

再者，以香港的情況來看，不少按“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被界定為“貧窮”的人士，其實已是綜援受助人，或享有政府提供的其他經濟援助者。現時本港共有約49萬名綜援受助人，在2009-2010年度綜援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的預計開支為271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11.9%，這是相當高的數字。

不管貧窮人口多少，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應該如何協助這個弱勢社羣。這是富挑戰性、長遠及持久的工作，政府責無旁貸。我們會繼續以務實的態度，全方位處理問題，除了從旁扶助，提供適當的條件，要改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方法，便是推動經濟增長，走向多元化，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同時也要加強培訓及再培訓，提升勞動人口的競爭力和就業能力，促進社會流動。這正是特區政府施政的方針及路向。

施政報告在福利範疇為老弱傷殘的服務，勾劃了新的政策路向。重點集中在安老、殘疾人士和精神病患康復者的服務。今年，我們運用新思維，靈活變通，作出策略性的部署，提出質量並重的新措施，希望更好地照顧社會上特別需要我們關愛的一羣。

政府的安老政策是“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作後援”。政府統計處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的長者都希望留在家中安老，因為環境熟悉，也有家人的照顧和鄰里的關懷和照應。其實，只要社區照顧及支援適切到位，即使是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亦一樣可以在家中安老。因此，我們正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希望能逐步達成長者的意願。現時全港共有58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單位，提供個人護理、復康訓練、膳食及接送等服務。我們會致力增加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社會福利署（“社署”）現已在6個發展項目預留地方，興建附設於合約安老院舍的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面對人口老化，任何安老服務都一定建基於可持續的融資模式。單靠公帑獨力提供社區照顧及院舍服務，將不足以應付長者不同及持續增長的需要。我們將繼續與安老事務委員會合作，探討資助長者長期護理服務的未來發展，包括研究如何改善現時為長者提供的家居照顧服務，鼓勵更多機構以社會企業的方式提供這類服務。同時，我們也會繼續推廣個人、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以滿足長者的需要，並鼓勵公營及私營安老院服務均衡發展，令長者可以在物色優質宿位時有更多選擇。

在這裏，我要特別向護老者致意。護老者在支援長者居家安老方面勞心勞力，壓力之大相信大家都可以想像。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護老者的支援和培訓，由明年開始，我們會將現時的“護老培訓地區計劃”進一步擴展至長者鄰舍中心層面，鼓勵地區組織提供護老培訓課程和護老者支援服務。首輪培訓計劃完成後已培訓750人，接受服務的長者超過6 100人次。由於反應理想，我們已於今年3月將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預計新一輪的訓練課程可額外培訓1 500人。

我十分明白安老宿位的問題，許多議員都很關注。隨着人口老化，安老宿位的需求日益殷切，今年施政報告特別提出多項新猷，多管齊下增加資助安老宿位，尤其是護養院和持續照顧宿位的供應，逐步縮短輪候時間。新措施包括將現有資助合約安老院舍內護養院宿位的比率，由50%大幅提高至90%；另一方面，我們向自負盈虧的護養院及護理安老院購買空置宿位，這些都是由非牟利團體經營的優質宿位。此外，我們還會充分利用現時資助安老院舍的空間，提供更多持續照顧宿位。我強調這不是數字遊戲，張國柱議員，這些完全是實質的。除了在護養院方面的比率增加外，我們其他的做法是購買空缺和增加多些宿位，這是實際新的宿位，並不是數字遊戲。相信這些措施可於未來5年，顯著增加資助護養院和持續照顧宿位的數目。

此外，我們會繼續鼓勵資助安老院舍將沒有長期護理元素的宿位，轉型為持續照顧宿位。為加快安老院舍的改裝工程，提升其設施及裝

備，以配合轉型計劃，社署已取得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原則性同意，特別以整筆補助金的撥款模式，處理有關的申請。

我們亦會繼續向私營安老院購買宿位，增加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供應，並鼓勵私營安老院舍提高護理質素，同時繼續興建新的安老院舍。在未來的3年間，我們會有5間新建合約安老院舍投入服務，合共提供約500個宿位。社署亦同時已在12個發展項目，預留地方興建新的合約安老院舍，即是我們短期、中期和長期都有規劃。

我要強調，我們從來沒有忽略未獲分配院舍的長者，他們可以選擇先接受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到戶家居照顧服務和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很多輪候入住院舍的長者都已獲得合適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維持院舍的質素，也是不容忽視的。我們計劃與藥劑師界別的專業團體合作，推行到院藥劑師服務試驗計劃。由政府提供資助，鼓勵安老院舍與合資格藥劑師合作，共同提升院舍在藥物管理方面的能力，進一步加強他們的知識和管理經驗。這計劃為期3年，計劃完成後，我們會檢討計劃的成效及未來路向。

部分議員要求政府把高齡津貼的離港寬限進一步放寬。政府現正就此進行檢討，並會盡快向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在康復服務方面，政府政策旨在發展殘疾人士的潛能，促進他們參與社交生活，全面融入社羣。我們會增加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及早為殘疾兒童提供介入服務，也會增加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名額，以提升殘疾人士的獨立能力和就業能力。

我們十分明白殘疾人士，尤其是其家人及照顧者面對的壓力，也竭力予以支援。

大部分殘疾人士在輪候院舍宿位期間，都會接受各種日間訓練、職業康復和社區支援服務，讓他們在輪候期間，可以安心在社區生活，也可減輕照顧者的壓力。目前，社署統籌一系列為15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而設的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為加強有關的服務，我們在全港各區開設的16間一站式殘疾人土地區支援中心，已由今年1月起開始運作，提供整合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確保殘疾人士得到所需的支援，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得以減輕。

對於未能獨立生活而其家人又無法提供充分照顧的殘疾人士，我們近數年，每年都有增加資助院舍的名額，提供多元化的住宿照顧服務，以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是一項嶄新的嘗試，目的是鼓勵私營院舍營辦者提高服務質素，增加受資助宿位的來源，並鼓勵市場發展不同類型和營運方式的私營院舍。我們亦會支持非政府機構.....

主席：局長，請先停一停。梁國雄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梁國雄議員：我有一點想澄清。他是否打算回答有關那123萬貧窮人口的.....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現在不是你發言的時間。

梁國雄議員：我請問他.....

主席：你不能打斷局長的發言，除非你是提出規程問題，請你坐下。局長，請繼續。

梁國雄議員：OK，他沒有說.....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是阻礙大家的時間。你提出的並非規程問題。局長，請繼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並且鼓勵市場發展不同類型和營運方式的私營院舍。我們亦會支持非政府機構發展自負盈虧院舍，並繼續積極物色合適的地方興建院舍。我們已在3個發展項目預留地方，興建新的殘疾人士院舍，務求全方位地增加宿位的供應。

因應居住在資助院舍的智障人士日漸老化，我們會加強為年長院友提供物理治療和護理等支援，協助他們維持身體機能和健康。

此外，為確保殘疾人士院舍的服務質素，我們計劃在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殘疾人士院舍條例草案》，以實施發牌計劃，規管殘疾人士院舍，這對提升院舍質素和增加宿位供應均有正面作用。

加強對精神病康復者的支援，亦是今年施政報告的另一個重點。為照顧精神病康復者的各種需要，政府一直致力促進醫療和社福兩個服務體系的協作，並提倡以跨界別、跨專業的方式提供一整套全面和連貫的精神健康服務。社署與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和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並不斷檢視社會康復服務的運作及需求，以期有效地提供康復服務予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人。我們亦會增加醫務社工的人手，作出配合。

現時，精神病康復者須到不同的非政府康復機構和單位接受各類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社署由今年3月在天水圍成立首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居民提供一站式、綜合和方便的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我們計劃將這種服務模式推展至全港18區，使精神病康復者、其家人、照顧者及區內居民，在一個服務點得到所需的支援服務，這是一站式的服務。

我們亦會加強人手配合醫管局，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持續和個人化的深入社區支援，而推出的“個案管理計劃”，為居於社區的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主席，政府一直致力打擊家庭暴力。過去數年，我們不斷投放新資源，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預防、支援和專門服務。

來年，我們會推出一項支援計劃，加強支援家庭暴力受害人，尤其是那些正在進行司法程序的受害人，除協助他們獲取有關法律程序的資料及社區支援服務的資訊外，亦可獲得情緒支援，同時在有需要時獲社工陪伴，前往法院出席聆訊，以減輕他們的顧慮及無助感，協助他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主席，我想說說有關就業的問題。就業是民生之本，和諧之基；因此，政府對就業服務高度重視，也是勞工範疇的重點工作。

過去一年，金融海嘯來勢洶洶，特區政府因應經濟形勢逆轉，即時推出一系列“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希望把影響市民的

程度減至最低。本港最新季度的失業率經過連續3個季度維持在5.4%之後，輕微下跌0.1%，是2008年8月金融海嘯爆發13個月以來首次錄得下跌，可見政府推出的措施已陸續取得成效。

其中建造業的改善最為明顯，建造業的失業率連續5個月下跌至單位數字的9.4%，其中裝修及保養工程業同樣連續5個月顯著下跌至10.8%，累積跌幅達10.8%。樓宇更新大行動的目標樓宇有2 000幢之多，現時平均每個月有二三十幢舊樓推出進行維修，不斷創造新職位，短短數月已經有千多個職位由於這個行動而創造出來。

最新季度的青少年失業率亦同樣有所改善。15至19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大家都知道，由5月至7月的28.7%下跌至最新的25.7%，下跌3%。

勞工處推出“展翅・青見計劃”已優化為全年收生，來者不拒，一條龍的服務。在8月嶄新模式推出後，短短2個月，已收到近9 000份申請，反應很好。我們現在每收到青少年的申請，不會等候，盡早提供培訓給他們。“大學生實習計劃”亦已在今年8月開展，現在也是全面進行，至今亦已有過千名大學生受惠，顯示兩者在協助青年就業方面，發揮了一定的功用。

勞工處亦已獲撥款加強“中年就業計劃”和鼓勵僱主聘用殘疾人士的“就業展才能計劃”，我們亦進行得如火如荼。

因應金融海嘯的衝擊，僱員再培訓局作出相應的安排，包括在2009-2010年度提供123 000個培訓學額，並預留二萬多個學額作備用，以迅速回應市民對就業培訓的需求，報讀課程的人士也是相當踴躍。

同時，大家都知道，政府去年推出的中小企信貸保證計劃，穩定了過萬家企業，保存的職位超過24萬個，功效不算小。

儘管如此，現時失業率仍然高企，因此，我們不可以鬆懈，不能夠掉以輕心，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勞工市場的情況。我們必須明白，每項就業計劃或紓困措施都是持續的工作，當中必然有個過程，不能一蹴即就，但我相信我們最後一定能見到成效。

在就業方面，我們已推出了協助不同類別人士的就業計劃，並不斷予以優化。施政報告在勞工範疇的重點，集中在如何利民便民，為求職人士提供貼身到位的服務。

首先，我想說一說勞工處將於天水圍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成立先導性質的一站式就業及培訓中心，為求職者提供一條龍的就業服務和支援。除了一般的求職人士外，社署亦會逐步轉介健全的失業綜援受助者至中心，協助他們自力更生。這個嶄新的就業服務系統，目的是理順、整合和提升現時由勞工處、社署和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就業、培訓和再培訓服務。我們預計該先導中心可於2011年年初提供服務。如果試驗成功，會考慮把其模式應用到其他地區。

此外，由於今年2月勞工處成立的飲食業招聘中心，深受業內僱主和工友歡迎，而零售業與飲食業同樣面對一個很怪的現象，就是“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的情況，所以我們決定於明年年中成立零售業招聘中心，專責為業界僱主及求職人士，提供更適切到位的就業支援，包括舉辦招聘活動及即場面試。

同時，我們也會擴大勞工處的職位空缺資料庫，試行向非政府機構借出連接勞工處職位空缺資料庫的搜尋終端機，以及用短訊服務發放就業資訊予登記的求職人士。這些都是別具心思的新措施，目的是促進就業資訊流通，減少求職者的待業時間，增加入職機會。

最後，很多議員要求擴大“交通費支援計劃”至全港各區，以及延長津貼期。我十分明白議員的關注，勞工處現正就計劃進行檢討，預計一兩個月內便可完成。

我想簡單回應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到婦女事務的事宜，雖然她現時不在席。我很簡單的說，她有很多誤解。讓我扼要地說出數點，第一，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在實際工作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它正協助政府採取三管齊下的策略，即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增加婦女的能力和推行公眾教育，與我們一起合作促進婦女的福祉和權益。此外，在性別觀點主流化方面，我們亦不遺餘力地推動。舉個例子，剛才她說我在一個研討會上純粹說避彈衣一事，其實除了避彈衣外，還有許多新措施配合這方面的推動。例如康文署許多場地均有一些家庭更衣室，亦有母乳餵哺室，甚至在未來新的添馬艦政府總部，我們希望採用不反光的地板，以保護女性，我們其實舉了很多例子。我想重複一點，就是我們是高度關注婦女權益的。

此外，陳偉業議員提到天水圍方面的青少年就業問題，我們是關注的，地區上的福利專員也有協調的角色可以扮演。所以，我們會繼續在地區層面做多些工夫。

主席，各位議員，勞工福利與民生息息相關，其中不斷有完善的空间，我們是絕對不會掉以輕心，是必定全力以赴照顧老弱傷殘、扶助貧困人士，並協助有志人士從受助走向自強，貢獻社會的。我們會與所有持份者，包括非政府機構、商界和企業，甚至每一位市民，羣策羣力，朝着這個目標努力。

我希望各位議員否決馮檢基議員和黃成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以及支持劉健儀議員的原議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暫停會議

主席：這一環節官員的總發言時限為60分鐘，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剛才用了27分鐘58秒。現在已過了晚上9時，我認為其他官員的發言，不可能在晚上9時30分前完成，所以，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上午9時正恢復會議。

立法會遂於晚上9時20分暫停會議。